



# 切·格瓦拉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故事

*Che Guevara: la historia de un idealista*

主編/陳小雀 執行編輯/張立卉 封面攝影/陳小雀

切·格瓦拉逝世四十週年紀念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



# CONTENTS

推薦序 探索拉美、任重道遠 / 張家宜	2
編者的話 ¡Che!一曲雋永的革命之歌 / 陳小雀	4
<b>壹、專文</b>	
一、切·格瓦拉和現代的拉丁美洲/南方朔	6
二、革命殉道者：切·格瓦拉/胡忠信	11
<b>貳、論文</b>	
一、切·格瓦拉：二十世紀的唐吉訶德/熊建成	13
二、游擊隊員vs. 文學家 —— 閱讀切·格瓦拉/陳小雀	25
三、格瓦拉的英雄圖像：兩岸之比較/向駿	38
四、妖魔或聖者？—— 切·格瓦拉游擊隊與玻利維亞農民關係初探/褚縈瑩	47
五、從《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探討切·格瓦拉的文化認同/許菁育	59
六、馬克思青年 —— 以切·格瓦拉與郭琇琮之悲劇為例/陳錦昌、林煒舒	73
七、切：全球商品化現象/白方濟 Francisco Luis Pérez Expósito	88
八、切的人道主義/沙提諾Alberto Saladino García	95
九、革命中的革命？游擊中心理論與馬克思的科學主義/拉米雷斯 Juan José Ramírez Bonilla	101
<b>參、附錄</b>	
一、Che Guevara: Un fenómeno mundial de mercadotecnia/ Francisco Luis Pérez Expósito	106
二、Humanismo Revolucionario de Ernesto Che Guevara/ Alberto Saladino García	120
三、¿Revolución en la Revolución?La Teoría del Foco y el Cientificismo Marxista/ Juan José Ramírez Bonilla	130

# 探索拉美、任重道遠

張家宜 淡江大學校長

拉丁美洲，這片廣袤大陸蘊藏著不可思議的生命力，以及不容小覷的爆發力，係文學家、革命家、藝術家的搖籃。當我們審視種種聞人軼事，例如：馬奎斯、切·格瓦拉、卡蘿……等人幾乎顛覆了全世界，他們以魔幻寫實、游擊戰、強烈色彩……譜出堅韌的生命樂章。拉美風情絕對叫人為之傾心，拉美魅力莫不叫人為之神往。

拉丁美洲，既魔幻且神奇，彷彿千面女郎，時而溫柔，時而冷酷，丰采迷人卻又透露出捉摸不定的性格，輪廓看似清晰其實蒙上一層薄紗，是熟悉中仍有陌生感？還是從未真正瞭解她？莫測高深的特質讓拉丁美洲益發可愛，也更加凸顯探索拉丁美洲的重要性。

拉丁美洲是我國當前外交重點區域，也是政府分散經貿市場政策的重鎮。有鑒於此，淡江大學於一九八九年八月成立拉丁美洲研究所，以培養熟稔拉美歷史、文化、社會、法政、經貿等人才為教育目標，為我國第一個致力拉美人文學術研究之機構。創所十八年來，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走過襁褓期、幼年期，如今已茁壯並獨領風騷，是國內唯一的探究拉丁美洲政經人文事務的

研究所，堪稱國內拉美事務人才之搖籃。從事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之餘，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亦肩負社會責任，貢獻專長，提供產官學界專業諮詢，為大眾解構拉丁美洲，以增進國內對拉美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的認識。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學術活動十分豐盈多元，「台灣拉丁美洲論壇」係眾多學術活動之一，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均以拉丁美洲重要事件為議題，邀請學養豐瞻的專家學者，或發表論文，或參與討論。會後出版專書，與台灣各界分享研究心得。

二〇〇七年，適逢革命家切·格瓦拉逝世四十週年，全球掀起紀念活動，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與國際接軌，特別以「不朽英雄圖像」為題，於十月八日舉辦「切·格瓦拉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壇」，探討這位一生精彩且充滿傳奇的革命人物。這是一場傳統學術理論和前衛研究思維兼顧的論壇；換言之，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走出學術象牙塔，順應時代潮流，同時又不失學院派的堅持與嚴謹。

對於切·格瓦拉那張戴著貝雷帽、蓄著鬍鬚的容顏，國人一定十分熟悉，不僅偶爾可瞥見坊間

行人穿著印有切·格瓦拉容顏的T恤，在某些抗議場合總能看見那個熟悉的圖像。對於《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讀者絕對不陌生，再經過電影的詮釋，年輕朋友或多或少嚮往那段青春的摩托車之旅。談到切·格瓦拉與古巴大革命之間的故事，或是切·格瓦拉與卡斯楚之間的情誼與心結，不論是說者、抑或聽者，無不興致勃勃。切·格瓦拉是年輕人的偶像，是文學創作的靈感泉源，是電影和戲劇的題材，更是學術研究的議題，舉凡其政治理念、哲學思想、歷史辯證，皆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切·格瓦拉在一九二八年出生於阿根廷一個資本家兼莊園主的家庭。早年投身古巴大革命，後來深入非洲的剛果叢林進行解放之戰，並以拉蒙化名領導組織玻利維亞民族游擊隊(玻利維亞民放解放軍)開始軍事行動。切·格瓦拉儼然塞凡提斯筆下的唐吉訶德，滿懷理想，意圖以革命方式推翻不公不義的獨裁政府，冀望建立安康社會。他曾寫道：

我踏上一條比記憶還要長的路，一路上只有朝聖者般的孤獨相伴，我臉上帶著微笑，心中卻是悲苦無比。

濟弱扶傾、以卵擊石，乃典型「唐吉訶德」式的信念與堅持，而這也是切·格瓦拉人生的寫照。他燃燒自己，燃起微弱的游擊點；他揣度夢想，深信革命星火會變成熊熊大火，照亮拉美社會的黑暗角落，協助印地安人脫離貧窮，免再遭強權荼毒。然而，切·格瓦拉時運不濟，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被捕，隔天遭處決，年僅三十九歲。在他被處決前，審訊者問：「你現在

在想什麼？」切·格瓦拉堅定地回答：「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切·格瓦拉的一生並非就此畫下句點，反而掀起一陣狂飆，展開英雄神話，個人故事昇華為拉丁美洲的重要歷史扉頁。象徵著理想主義者，也蘊涵著反動符號，曾幾何時，切·格瓦拉與「時尚」、甚至「風格」畫上等號，成為流行創意的圖騰。從嚴肅的政治議題至輕鬆的流行話題，這個名字背後所刻劃的事實漸漸模糊不清。因之，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特意挑選十月八日，在這個深具歷史意義的日子裡，舉辦論壇，解讀切·格瓦拉，重建切·格瓦拉。

論壇已圓滿結束，也獲得熱烈迴響。身為國內唯一專精拉丁美洲研究之學術機構，秉著探索拉美、任重道遠之使命，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集結與會專家學者的論文，編輯成《切·格瓦拉：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故事》，將研究成果呈現予社會大眾。

閱讀這本特別的論文集，彷彿跨上摩托車，隨著切·格瓦拉馳騁於歷史脈絡之中，探索你我未知的拉丁美洲。特為之序。★

# ¡Che!一曲雋永的革命之歌

陳小雀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專任副教授兼所長

朋友常問，切·格瓦拉與卡斯楚之間我比較欣賞哪一位，答案總是卡斯楚，但這並不表示我不喜歡切。我曾於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九日在誠品書局信義旗艦店，以「切·格瓦拉的美好新世界」為題演講，也於十月八日在淡江大學主辦「不朽英雄圖像：切·格瓦拉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壇」，但這又不代表我推崇切。對切，有太多複雜的看法，一時之間很難說清楚，即便今日的他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被尊為拉丁美洲革命英雄，依舊有人不以為然，攻訐他當年血腥冷酷，處決反革命人士，且熱衷非法游擊戰。

「切的美好新世界」對照「切的血腥冷酷」，多麼不協調，也相當矛盾！但是，這就是切！有赤子之心，也有浪漫情懷；追求英雄主義，也充滿理想主義。誠如他所云：「革命者並非凡人」(Los revolucionarios no son gente normal)，游擊戰是手段，殺戮乃難以避免的過程，惟有經歷陣痛，才得以建立美好新世界。毛蟲若不經過死亡，怎能蛻變成彩蝶翩翩飛舞呢？建立安康社會，落實國民教育，提倡人文思想，並藉科技改善印地安人的貧困生活，乃切的美好新世界，一個烏托邦藍圖。如此藍圖蘊釀於兩度拉丁美洲之旅。旅途中，他看盡了

拉丁美洲各地的貧窮、落後、不公與不義。當時的他能力有限，僅能在心中構思。因緣際會，切結識了卡斯楚，人生從此改變，放棄醫生懸壺濟世的天職，改以槍彈拯救受難者。

我喜歡閱讀《切在玻利維亞日記》，可說到了愛不釋手的地步。我常想，不同於旅遊手札《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生死攸關之際，切怎麼還有餘力每天寫日記？在古巴大革命是這樣，在剛果解放之戰也是，在玻利維亞山區一樣日復一日寫下生活點滴和戰爭實錄。仿倣史官，對歷史負責，這就是切！鮮為人知的一面。《切在玻利維亞日記》是最樸實的紀要，未經過修飾，當然寫日記的人不會知道生命已逼近尾聲。翻閱一篇篇的日記，我的思緒隨著文字來到玻利維亞山區，儼然其中的一名游擊隊員，近距離觀察他，揣度他在生命最後時刻的心理狀況。自信、失落、孤寂、無奈……

自古英雄皆寂寞！既然革命者並非凡人，注定難逃孤獨宿命。站在海拔二千公尺的山上，望著慘淡月色，切似乎體會到理想有如月亮般遙不可及！

對於切的種種，外界難免穿鑿附會。在他被捕那一刻，曾繪聲繪影謠傳他貪生怕死，懇求說：「不要射殺我，我是切，我活著比死對你更有價值。」日

前，瑞典ATMO影片公司發行了《誰出賣切·格瓦拉》(Sacrificio)，片中訪談了當時的玻利維亞軍官布拉多(Gary Prado Salmón)、槍決前押解切的美國中情局探員羅得里格斯(Félix Rodríguez)，以及執行槍決的玻利維亞士兵德蘭(Jaime Terán)，終於拼湊出真實畫面，切並非如謠傳般的懦弱，而是慷慨就義！看完影片之後，心情頓時踏實許多，不再受那些謠傳左右。的確，切曾以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故事來自勉，這樣的人絕非懦夫。

寧願站著死去，也不願跪地求饒！

反美國資本主義的圖騰突然成為最熱賣的商品，是幸？還是不幸？切的理想遭踐踏？還是被消耗？其實這並非什麼大不了的事，切是一曲雋永的革命之歌，值得世世代代傳唱下去，印有切容顏的T恤、馬克杯、海報、明信片……若能引發更多人渴望認識切，不也是好事一樁，正如南方朔所言：「填補著一代代青年渴望公平正義的心靈空窗」。同樣，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藉切逝世四十週年，舉辦論壇，不是消耗他，而是傳誦這曲革命之歌。

論壇已圓滿落幕，對各界的支持和參與，感銘在心。謝謝蘇佩儒小姐為論壇設計了一個獨特的圖騰。謝謝聯合報系刊登論壇消息，與社會大眾分享。謝謝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全體師生，有他們作為我的後盾，論壇才得以順利進行。謝謝是日出席論壇的來賓和論文發表者，不論來自台灣各地、抑或來自墨西哥，嘉賓不遠千里，共襄盛舉，論壇因此多采多姿。

這本論文集能以專書樣貌呈現，首先感謝世理雜誌出版的孔繁鐸先生，給學術界一個走入民

間的舞台。感謝洪郁雁、陳其瑜、許偉君、劉曉儒、楊佳蓉、謝雨珊、施昱如、余南誼、方廷、蔡銘軒等幾位研究生，合力將三篇西班牙文論文翻譯為中文，王秀琦老師細心校譯也一併致謝。感謝張立卉老師和她所帶領的研究生編輯團隊，協助統一譯名、格式、校稿等工作。最後，感謝林麗華小姐，美化了這本論文集！

本書共收錄了二篇專文和九篇論文。南方朔以宏觀視野，回顧拉丁美洲被殖民、被荼毒的過去，以及切如何撒下革命種子，而革命種子終在二十一世紀開花結果。胡忠信闡述切的大無畏「死亡哲學」，以革命殉道者的精神宣揚理想。熊建成將切比擬為二十世紀的唐吉訶德，凸顯他為正義奮戰至死的勇氣。陳小雀解析切的作品，分析他的文字魅力和人文思想，重新定位英勇游擊隊員，視他為文學家。向駿比較台灣與大陸兩地有關切的研究。褚縈瑩回顧玻利維亞游擊戰，剖析切在玻利維亞農民心中如何從昔日魔鬼轉變成今日的聖者。許菁育從《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切入，探源他的革命啓蒙思想，以及文化認同模式。林煒舒和陳錦昌以馬克斯青年為題，比較拉美的切和台灣的郭琇琮，兩者之間不僅背景出身雷同，連命運也相似。白方濟從消費文化角度，探討切圖騰的商業化起源，以及這股全球化流行風潮。沙提諾探索切的人道主義、分析切對人性尊嚴的真正看法、從建立自由意識、克服物質誘惑、工作正面概念談起。拉米雷斯以革命中的革命為基礎，解析游擊戰之必要性，同時指出游擊中心理論犧牲了人道主義。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故事，一曲雋永的革命之歌，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集結不同觀點，建構出一個完整的切·格瓦拉！★

# 切·格瓦拉和現代的拉丁美洲

南方朔 文化評論家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近代傳奇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壯烈而死。十月十八日，古巴在哈瓦拉廣場舉行了為期三天的追悼式，卡斯楚發表了對切·格瓦拉有歷史定位作用的長篇演說，他預告說，切·格瓦拉已注定將成爲人類革命浪漫主義的偶像。

而到了今天，切·格瓦拉逝世已整整四十週年。他那戴著革命扁帽的頭像被不斷印在T恤和胸章上，成爲歷久不衰的商品，填補著一代代青年渴望公平正義的心靈空窗；他那張死後被拍攝存證的死亡圖像，由於和耶穌受難太過相似，這更讓他成了人們集體記憶裡的「被釘上十字架的神人」，呼喚著一代代的人，以同樣的浪漫熱情去追尋那儘管渺茫艱難但卻並非不可能的理想道路。切·格瓦拉曾感召了一九六〇年代歐美的青年反叛運動，曾呼喚出一九八〇年代以降拉丁美洲各地的種種革命運動。由於他的種籽撒得深，從廿世紀末期開始到廿一世紀的此刻，他過去拋頭顱都還達不到的目標，終於能靠著他的追隨者以選票而一點點的取得，那就是以國家和區域自主爲前提的「廿一世紀社會主義」。近年來拉丁美洲經過兩輪大選，已有古巴、委內瑞拉、

巴西、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烏拉圭、智利、阿根廷、尼加拉瓜等進入了這個陣營。一八二三年美國門羅主義視拉丁美洲爲其後院的這種強權邏輯，在宰制近二百年後，終於在被切·格瓦拉感召的拉丁美洲覺醒裡，遇到了真正的挑戰。

如果我們回顧拉丁美洲的過去，就當可察覺到在舊殖民時代，拉丁美洲即淪爲豪強莊園經濟下的受害者，因此才有了玻利瓦將軍(Simón Bolívar, 1793-1830)這個「解放者」的出現。他從一八一〇年起即屢敗屢戰，最後終於從西班牙手中解放了南美六國。他畢生主張南美洲北部各國合組聯邦，必可在世界上取得極大的成就。可惜的是拉美內部紛擾不絕，而列強的挑唆干涉也不斷，最後是他只得在分裂中引退，並鬱鬱而終。他的一生後來被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寫成《迷宮中的將軍》一書。對拉丁美洲獨立自主的難以企及，做了最沉重的告白：將軍夢碎，拉美雖然得到短暫的解放，但最後還是落入另一列強之手，原因即在於拉美無法團結，因而墜入了有如迷宮般的困境中。

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紀前被西、葡殖民三百年，而從十九世紀第三個十年起，即持續在美國宰制



之下。除了門羅主義的政策主張外，十九世紀美國主流價值乃是相信美國命中注定就是要統治西半球的「確然命定論」(Manifest Destiny)。這種價值觀不但使得美國兼併了墨西哥的德州、新墨西哥州、猶他州、內華達州、亞利桑那州、加州。美國在過去近兩百年裡，對拉丁美洲總計採取軍事行動一百四十餘次，單單廿世紀即先後改變了拉丁美洲約四十個政權。在這種宰制下，拉丁美洲也出現了舉世少有的寡頭壟斷經濟。儘管拉美資源豐富，但其利益皆由少數跨國公司、特權寡頭階級、扮演軍事保鏢的專制強人所壟斷。任何政治領袖企圖走獨立自主的道路，由於違背了上述集團的利益，即難免遭到被顛覆或暗殺的命運。智利總統阿燕德因為把銅礦收歸國有，而被美國策動政變推翻至殺害；格瑞那達因為與古巴接近而遭到入侵；巴拿馬總統諾瑞加由於拒絕讓巴拿馬成為美國企圖推翻尼加拉瓜的基地，而被入侵並抓到美國去審判；此外，美國還分別於一九五四年殺害了瓜地馬拉總統阿本茲、一九八一年殺了厄瓜多爾總統羅多士及巴拿馬總統托里喬。不久前，一個與中情局有關的經濟顧問柏金斯(John Perkins)由於良心不安而出了一本《經濟殺手的告白》，即將拉丁美洲許多這種事形做了揭露。

而促使切·格瓦拉走向革命之路的導火線，即是他一九五四年赴瓜地馬拉探尋馬雅文化，親眼看到了瓜地馬拉總統阿本茲由於反對美國聯合水果公司的壟斷，決定將其國有化，於是被美國策動政變加以殺害。這次經驗使他痛感到拉丁美洲獨立自主的必要。拉丁美洲若依附於美國，只會淪落到石油、天然氣、礦產等被壟斷，而農業也只會回應美國需要而往單一經濟作物的方向前

進，並造成「依賴而不發展」的惡果。只有透過革命，建立獨立自主的政府，走自己的經濟道路和設計自己的制度，始有重建公平正義和消除貧窮的可能。切·格瓦拉後來從事革命活動，並協助卡斯楚在古巴革命成功，所依憑的都是這樣的信念。只是他壯志未酬，即在玻利維亞革命失敗並遭到殺害。切·格瓦拉死後，美國為了遏制他在拉丁美洲所帶動出來的革命風潮，遂格外扶植各國獨裁軍事強人，打壓民主進步力量。切·格瓦拉死後到一九九〇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再民主化」這段期間，已被稱為是拉丁美洲「反革命」的階段。但儘管時代轉入黑暗，我們卻也可發現到，由於切·格瓦拉的啟發，拉丁美洲知識份子和教會在拉丁美洲特有的「經濟學依賴理論」及「解放神學」裡已對問題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再加上拉丁美洲資源被壟斷所造成的貧窮問題更加惡化。所有這些因素累積，當一九九〇年代拉丁美洲「再民主化」的時代一到，各國追求獨立自主，更加強調公平正義，並主張採取不同經濟制度的民主進步力量，即迅速成長。拉丁美洲開始進入「非美化」和「脫美化」的新階段。在各國相互鼓勵、相互支持下，進步力量已在拉丁美洲佔有愈來愈大的版圖。

而在這個新變局裡，扮演著關鍵角色的，毫無疑問的要首推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了。查維茲乃是近代少有的魅力領袖。他於一九九八年當選總統，乃是四十年來委內瑞拉的第一個左翼總統。由於他繼承的乃是玻利瓦將軍和切·格瓦拉的傳統，主張石油國有做為國家重新發展的憑藉，並強調照顧窮人，解放特權壟斷。根據後來陸續的資料透露，我們已知道當時美國已在「開發總署」下增設了一個「轉變起動辦公室」(Office

of Transition Initiate)，該辦公室即是為如何推翻查維茲而設，該辦公室後來也是美國在許多國家發動顏色革命的操盤中心。該辦公室策動出二〇〇二年的軍事政變以及在政變失敗後，又持續的發動群眾示威及要求罷免公投。一直到二〇〇四年查維茲才通過一切顛覆的考驗。而查維茲能夠通過一切顛覆之考驗，其實所靠的乃是兩大力量：一是拉丁美洲各國共同的獨立自主願望，因而當政變發生，他被拘捕，「美洲國家組織」立即召開緊急會戰，譴責政變軍人並要求立刻放人。另一則是委內瑞拉人民的勇敢態度，他們在「美洲國家組織」發出譴責後，立即湧上街頭支持查維茲並要求放人。由於眾怒難犯，原來已成功的政變遂只得停止。而這種人民的支持，也是後來美國其他顛覆行動都告失敗的關鍵。二〇〇六年十二月查維茲連任選舉，美國不但金援對手，甚至連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都前往為對手助選，但查維茲還是連任成功，靠的也是人民的支持。委內瑞拉查維茲的屢經顛覆而不倒，這對整個拉丁美洲進步力量乃是極大的鼓舞。由於二〇〇六年乃是拉丁美洲的大選年，先後有十二個國家大選。迄至目前，整個拉丁美洲的左翼進步力量，由於政治版圖擴大，已形成了兩個軸心：

一個是較激烈的反美軸心，其成員有古巴卡斯楚、委內瑞拉查維茲、玻利維亞莫拉雷斯、厄瓜多爾柯里亞、尼加拉瓜奧蒂嘉等。這些國家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性格強烈，並激烈反美。由於二〇〇八年巴拉圭將辦大選，左翼主教魯戈將棄教從政並可望勝選，這個軸心的成員還會增加。

另一個則是溫和左翼軸心，其成員有巴西魯拉、智利巴希蕾特、烏拉圭瓦奎茲、阿根廷柯希納等。這些國家強調自主精神與福利制度，但無

明顯反美傾向，也不採取國有化的措施。

然而，儘管拉丁美洲左翼有著兩個軸心的差別，真正扮演關鍵角色的，則仍非查維茲莫屬。委內瑞拉乃是油國組織第三大產油國，也是全球第五大產油國。過去由於它的油氣資源皆被外國石油公司壟斷，委內瑞拉人民反而貧窮日深，而最荒誕的，乃是儘管油氣豐富，過去一百多年，委內瑞拉人民甚至連最基本的社會安全制度皆付諸厥如。因此，當委內瑞拉國家收回了資源管轄權，國家即有了資源籌碼來從事實體建設，終結過去那種「依賴而不發展」的噩夢。除了物質資源的被壟斷外，委內瑞拉和多數拉美國家一樣，土地資源也被嚴重的壟斷集中，例如單單一個英美豪門魏斯泰家族(Vestey Family)即擁有12,930公頃大莊園，這也意謂著土地改革的迫切。

自從查維茲當權，推展油氣國有化和土地改革，因而引發美國主導的政變，以及後來一連串大罷工和被迫修憲實施罷免公投，查維茲皆一路過關以來。委內瑞拉在社會主義內部經濟重整上，的確已有改觀：

例如，查維茲由於財政籌碼增大，已能將政府收入之31.5%用於農業和福利等基本建設。二〇〇三年委內瑞拉窮人佔55%，二〇〇六降至不到30%。此外，近年來各國皆在談論孟加拉經濟學家雅魯士所推展的「微型金融」和「微型貸款」。其實這方面委內瑞拉的表現可能更可圈可點。他鼓勵人民學習經商而展開微型貸款，貸款甚至和教育綁在一起，即愈鼓勵子女受教育的愈易得到貸款，這叫做「有條件的補助」(CCTs)。此外還鼓勵私人小型創業，迄至二〇〇六年已新設1,840家小公司，僱用員工廿一萬人。而在土地重新分配方面，已在二十八個地點分配土地給

三十萬人，其他還包括興建平價國民住宅十萬戶供給都市窮人需要等。查維茲屢經顛覆，都能獲得人民挺身相救，因而屹立不倒，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而查維茲最特殊的，乃是他繼承了玻利瓦將軍和切·格瓦拉的思想，以追求拉美的互助與團結為主要發展目標。例如，委內瑞拉有油氣資源，但教育和醫療則嚴重落後。古巴則缺乏資源，但教育和醫療卻是拉美第一。於是委內瑞拉每天供給古巴九萬桶燃油。古巴則派出三萬名醫師、教師和體育教練赴委內瑞拉工作，委內瑞拉立即有了六千個醫療站，古巴也立即能源及電力充裕，生活明顯改善。巴拉圭能源也欠缺，遂每天以75折兄弟優惠價格供油8,600桶。這些互助計劃，現已演變成更大的「加勒比海石油計劃」(petro caribe)、「南美南部石油計劃」(petro sur)、「安地斯石油計劃」(petro andino)等。查維茲的經濟目標，乃是斥資一至二百億美元，建築一條縱貫南美洲的天然氣管線，以及南美洲成立自己的金融合作機構，這也是委內瑞拉退出世銀和國際貨幣基金，反對各國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理由。查維茲深信，只有透過南美本身的合作與團結，相互分享，始可能達到真正的獨立自主，否則拉美仍難免被鯨吞蠶食，而四分五裂的命運。委內瑞拉的這些做法，查維茲自稱是「廿一世紀的社會主義」，而美國的敵意媒體則稱它是「石油社會主義」。

查維茲這種以打破壟斷，強調公平正義的施政方向，除了得到自己人民的支持外，在玻利維亞與厄瓜多爾等激進反美左派國家也得到呼應。例如玻利維亞莫拉雷斯就職後即收回油氣、礦業與林業，重新分配土地1,100萬至1,200萬公頃，未

來五年還要再分配2,000萬公頃。玻利維亞以後將禁止原木輸出，而是發展木材工業，輸出木材加工品。厄瓜多爾的柯里亞也同樣將資源收歸國有，將國家收入用來擴大對窮人的補助，擴建平價住宅，重新發展小企業等。厄瓜多爾的窮人多達總人口的四分之三，除了這種激進改革，其實也別無選擇。美國諾貝爾經濟學者史蒂格尼茲會替這些國家辯護，其實也顯示出這種激進改革無論在思想和作法上有其正當性。

不過，我們必須指出的，乃是拉丁美洲的左翼化，固然有著時代的需要，這就像玻利瓦將軍的解放，切·格瓦拉的革命都有其時代的需要，但符合時代的需要卻未必就真的能夠順遂成功。原因即在於有太多考驗等著去克服。

考驗之一，乃是在拉丁美洲要走「廿一世紀的社會主義」道路時，由於這條道路基本上依靠的乃是「國家」的角色，因而領導的功能，公務系統的能力與操守，都在國家進行調控時會決定它的成敗。近年來委內瑞拉出現了所謂的「特權新貴」問題，巴西的魯拉政府則有四十名高官，包括執政黨前主席、秘書長、前交通部長等，皆因貪污而被起訴，這都對「廿世紀的社會」形象造成極大的負作用。查維茲抨擊過去是「寡頭壟斷」(oligarchy)，反對派則譏之為「玻利維亞派壟斷」(boligarchy)。由於拉丁美洲皆為民主國家，失敗即會失去政權，路線也會被棄。這也意謂著拉美左翼如何強化清廉與能力的重要。

考驗之二，依靠資源共享的模式來消除貧窮和創造各國的團結，這在現階段當然有其必要。只是重分配必須以能夠提升生產力和自足能力為目標，否則就難免淪為「大鍋飯主義」，最後難以持久，拉丁美洲因為分享而造成的團結也會星

散。這也意謂著把拉丁美洲經濟活化，企業重商活動增加，各國也發展其經濟互補特色，乃是繼分配之後而能繁榮富裕的關鍵。這也意謂著各國進一步擴大合作交流與分工之必要。

考驗之三，而且可能是最大的考驗，乃是拉美的獨立自主和採取不同的發展路徑，它在本質上嚴重的違背了美國的意識型態和過去近二百年的利益傳統，因而顛覆式的反撲隨時皆可能發生。美國極右佈道家羅伯特主張將查維茲暗殺掉；最近哥倫比亞軍情局一個處長即透露，美國持續在利用該國特工準備對查維茲進行狙殺；去年墨西哥大選，左翼的歐布拉多原先呼聲極高，但後來卻落選。一般咸信乃是美國不可能容忍鄰居的墨西哥出現反美左翼政權，遂暗中操盤以作票方式使其無法當選，去年尼加拉瓜大選，美國傾全力要阻止歐蒂嘉當選，多位部長都前後坐鎮指揮，大批金錢也流入賄選。拉丁美洲的民主制度，等於讓左翼化的時代有了一個很容易被顛覆的窗口，而左翼又不可能放棄民主，因而如何強化民主並防止被外國滲透，遂變得格外重要。

近年來，拉丁美洲的左翼化，在玻利瓦將軍及切·格瓦拉的精神引導下正在加速進行中。但各左翼國家的問題卻也開始出現。巴西的貪污和原住民未受到妥當照顧；智利巴希蕾特女士雖高票當選，但因銅礦工人生活未獲改善，已出現學生、礦工、公共汽車駕駛等的大遊行示威；委內瑞拉則出現箝制新聞自由的問題。尤其是查維茲刻意向美國挑釁，藉著激怒美國而團結內部，他到底是否真有此必要，也的確值得討論。蓄意激怒美國容易受到孤立，這對極需國際支持的拉美左翼未必一定是好事。至於拉美和更激烈的伊朗強化關係，也未必是個好的選擇。

因此，目前的拉丁美洲在玻利瓦將軍及切·格瓦拉的精神引導下，確實已到了一個更加獨立自主的新時代，但因左翼執政版圖擴大，拉美左翼國家顯然已必須更加實在的去展開進步效率，不能像過去那樣固執在意意識型態上。歷史替拉丁美洲打開了機會之窗，如何把握這個機會，真正建造出獨立自主而又繁榮小康的社會，或許才是左翼領袖們該努力的！★

# 革命殉道者：切·格瓦拉

胡忠信 文化評論家

二〇〇七年十月九日是革命者切·格瓦拉殉難四十週年紀念日，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廿世紀的革命史，切·格瓦拉有著「半人半神」的典範地位，即使他悲劇性地死亡，成為「失敗英雄」，但他的形象與影響力絲毫沒有消褪，隨著時尚主義的興起，切·格瓦拉甚至成為雪茄、名錶、T恤、泳衣、海報、叛逆、吶喊、年輕的代名詞。法國哲學家沙特稱他為「當代最完美的人」法國前總統密特朗形容：「切·格瓦拉的戰鬥就是追求自由的人的戰鬥。」切·格瓦拉的魅力已成為世界革命的不朽資產，也與當代流行時尚密不可分。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美蘇東西冷戰興起，在被世人遺忘的貧窮角落，中國、越南、古巴、阿爾及利亞等地卻發生了「鄉村包圍城市」的農民革命。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群二、三十歲的古巴青年人發動革命運動，他們滿懷改變世界的理想，以「不自由，毋寧死」做為訴求，全力推動「七二六運動」；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登陸古巴的戰役中，有一位阿根廷籍人士切·格瓦拉發揮了領導才能，不但成為卡斯楚的親密戰友，而且嶄露頭角成為傑出的軍事指

揮官，最後成為古巴政府第三號人物，主掌中央銀行、工業部長等要職。

切·格瓦拉出身阿根廷世家，醫學院畢業，但他不拿手術刀，卻拿槍桿子走上了革命之路。二十多歲之時，切·格瓦拉兩度騎摩托車旅行中南美洲，正如他在著名《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所記載：「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之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至少不再是原來的那個我。這次漫遊南美的旅行，對我的改變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深刻和激烈。」由於親身體驗了中南美洲貧民大眾的窮苦生活，切·格瓦拉決定獻身於社會主義革命，而瓜地馬拉的失敗經驗，以及隨後投入的古巴革命，使這位深具各方面優越條件的青年人勇於接受「火的洗禮」。

以現代人的觀點很難想像，三十歲就成為古巴政府領導者的切·格瓦拉如何自我改造與鍛鍊。他終其一生患有氣喘病，卻依賴意志、勇氣與決心加以克服；他以異鄉人身分投入古巴革命，卻深受古巴人的尊敬與愛戴。是什麼支撐切·格瓦拉成為浪漫的理想主義者？在《革命戰爭回憶錄》中，切·格瓦拉自述：「從一開始，一種浪

漫的同情和冒險的精神使我相信，爲了這樣一個崇高的理想，就是死在國外也值得。」

將上述理念往前推移，悲天憫人的胸懷往往來自坦然面對死亡。遍讀切·格瓦拉的日記、談話或著作，他都不時地探討死亡，一直覺得命運之神如影隨形會來敲門：「一個人一生的關鍵時刻就在於他下定決心面對死亡之時，如果他決心坦然面對死亡，他就是個英雄，至於他的事業成功與否，那已經不再是關鍵。可是假如他不能面對死亡，那麼，他永遠只不過是個政客。」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成功以後，繼續推動第三世界革命，他遠赴非洲剛果，最後落腳於玻里維亞，正是來自這種大無畏的「死亡哲學」。

在歷經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以及中蘇共產國家的衝突以後，切·格瓦拉無法滿足於成爲一個共產官僚，也不再寄望社會主義大國的現實與勢利，一九六六年在古巴革命成功十年以後，切·格瓦拉確立了自己的革命新目標，也使他走上了革命殉道之路，他深深相信有能力將革命火炬傳播到中南美洲乃至全世界；如同他的先祖唐吉訶德一般，切·格瓦拉向風車宣戰，而他只帶了少數桑丘·潘薩就發動了下一波鄉村游擊戰，進行國際共產主義革命。

切·格瓦拉完全低估了美國政府不允「後院失火」的狀況再發生，在美國中情局以及玻里維亞右翼軍政府全力圍剿下，切·格瓦拉成爲流寇般到處流竄，最後是彈盡援絕被捕，然後立即被祕密處決，在東西冷戰的嚴峻對峙下，資本主義集團絕不允許「世界頭號戰犯」多存活一日；也因爲這種理想的幻滅與殉道的悲劇，激起了一九六八年全世界性學生運動的激情與關懷，切·格瓦拉頓時成爲「叛逆」、「年輕」的革命

代言人。

切·格瓦拉的照片、海報如宗教神像般傳播至全世界各個角落，他死亡時的照片，被引喻爲「基督之死」，而且與林布倫的名畫「解剖課」類比。有一位傳記作家如此形容：「切·格瓦拉毫不畏死的精神，不是體現在他的演說和寫作中，也不是在卡斯楚對他的讚美中，甚至也不是那些對他殉道的頌詞中，而是在他不暝的雙眸裡，他似乎凝望著殺害他的人，並寬恕了他們。他似乎在凝望著世界，宣稱自己爲理想死而無憾。」

切·格瓦拉死時只有三十九歲，他未曾經歷一九八九年東歐共產集團垮台，也未看到天安門事件，更沒想到共產國家多已轉向市場經濟，卡斯楚已垂垂老矣，緬甸人民還爲自己民主在打拼，切·格瓦拉看到當今世事變局，或許會引述耶穌殉難前的一句名言：「那殺身體卻不能殺靈魂的，不用怕他。」切·格瓦拉殉道四十年以後，仍然對我們說話，他的偉大不在於一時成敗，而在他的理想與無畏，以及化苦難爲救贖的內在精神力量。★

#### 作者簡介：

胡忠信，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博士研究。

現為電視、廣播節目政治評論者，著有《解讀年代 | 胡忠信觀點》、《現代君王論》等書。

# 切·格瓦拉：二十世紀的唐吉訶德

熊建成博士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專任教授、台灣拉丁美洲論壇創始人

## 一、前言

半個世紀前，一九五三年，青年阿根廷醫生切·格瓦拉(Che Guevara，全名為Ernesto Che Guevara)與友人艾柏托·葛納多(Alberto Granado)騎著破爛的摩托車遊歷南美洲廣闊大地。在玻利維亞目睹一九五二年玻利維亞革命造成的衝擊，了解到拉美廣大百姓的貧窮與苦難，啟發了他獻身於拉美人民的解放事業。<sup>1</sup>

一九五七年七月他投入了卡斯楚(Fidel Castro)領導的古巴的武裝革命，為建立一個更公平、更正義的古巴社會而戰鬥，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並未擴大到拉美其他地區。

十年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切·格瓦拉化名為富商進入玻利維亞東南部，良加瓦蘇(Ñacahuasú)熱帶森林地區，試圖建立游擊基地，欲通過武裝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燎原整個南美洲。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革命是不可輸出的。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切·格瓦拉，卻被他日以繼夜夢想所要解放的農民出賣，受傷被俘，隔日在無花果村(La Higuera)遭政府軍槍殺。同月十五日，為紀念切·

格瓦拉的國際主義大無畏犧牲精神，古巴政府正式宣布十月八日定為「游擊英雄紀念日」(Día Del Guerrillero Heroico)。

吾人認為，緊跟著杭廷頓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則是拉美「第三波」新興左派勢力的崛起。隨著二〇〇六年拉美地區總統選舉的結果，共計十四個拉美國家由激進左派或中左派政黨執政，佔領了拉美總面積的百分之八十，覆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

二〇〇六年拉美之大選結果證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切·格瓦拉用游擊戰未能實現的革命，被拉丁美洲人民用選票實現了，意義重大。

游擊英雄切·格瓦拉於一九六六年出走古巴前往玻利維亞，與四〇二年前的唐吉訶德表面上看似毫無關係，但若深入探討後我們就不難發現彼此有著密切的關係。切·格瓦拉如同唐吉訶德所說「只要為了正義而戰，為了良心而死，他準備奮戰至地獄為止」。

今天是切·格瓦拉英勇就義四十週年，「共產主義的唐吉訶德」，「浪漫的冒險家」，及「與

---

<sup>1</sup> 戰後在新殖民主義秩序下，拉美的發展是伴隨著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所得分配日趨不均的深淵。

卡斯楚失和」等觀點也一直伴著它。

綜合《切·格瓦拉：革命生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古巴一切的最後歸鄉》、《玻利維亞日記》、《切·格瓦拉為什麼出走》和《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的二律背叛》等文章論述，可演譯為何切·格瓦拉是廿世紀的唐吉訶德。

## 二、切·格瓦拉告別古巴轉進玻利維亞之肇因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當切·格瓦拉秘密離開古巴前進剛果時，他的公開身分是古巴共產黨和國家三個主要領導人物之一。在他給卡斯楚的告別信中說他已經「在古巴的領土上，完成了對古巴革命所負的責任，世界上其他國家在召喚的我去奮鬥。我所能做的是你作為古巴的領導人所肩負的責任使你不能去做的」。接著他宣佈放棄所有在古巴的職位，甚至古巴的公民身分，這樣古巴不用為他在國外的所有行動負責。這封告別信無疑是切·格瓦拉自己和古巴官方對他為什麼出走的正式解釋，也確實可為切·格瓦拉出走的基本動機。然而，這種解讀又未免過於簡單，令人難於信服。

我們可從美國學者安得森的《切·格瓦拉：一位革命者的一生》的傳記(Jon Lee Anderson, *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切·格瓦拉的《摩托日記：一次環遊南美的旅行》，西佛曼(Silverman)主編的《社會主義在古巴》和中國大陸學者程映虹的《格瓦拉為什麼出走？》裡找到相關的線索。

我們大部分同意程映虹的觀點，<sup>2</sup>切·格瓦拉「出走」的背景無疑要比想像中複雜得多。最關

鍵點在於切·格瓦拉為什麼認為他已經「完成了對古巴革命所負著責任」。在字面意義上，這可解讀為切·格瓦拉在古巴已無事可做，但實際上古巴當時在美國經濟封鎖下，革命尚未成功，經濟狀況十分嚴峻。故「完成了對古巴革命所負的責任」說法不能成立。我們有理由相信切·格瓦拉的確在古巴已經「無法去做」，而非「無事可做」，他只有選擇「出走」一途，在另一個地方以另一種方式去尋找他的理想。

切·格瓦拉的理想是什麼？這種理想為何在革命後的古巴難以實現？程映虹認為從「人」出發，是首先值得思考的，這也符合切·格瓦拉對革命的最終追求。切·格瓦拉提出「新人」(*Hombre nuevo*)這個概念，是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一次對古巴醫務工作者的演講中提出，切·格瓦拉以自己從一個醫生轉為革命家為例說明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塑造「新人」，革命的核心價值是要消滅個人主義。

一九六五年初切·格瓦拉對「新人」概念的描述是這樣的：「我們每個人都要時刻做出一點犧牲，並意識到我們是在履行職責時得到精神滿足，並與大家一起朝著充滿希望的「新人」目標前進。前面的道路是漫長而曲折。我們知道自己的侷限，我們要造就廿世紀的人類，那就是我們自己」。換言之，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和建設新型社會主義社會就需要那種願為別人的利益做出個人犧牲的新型人類。

哈利斯(Ricard Harris)在其〈對切·格瓦拉遺產的反思〉文中引述玻利維亞學者西萊斯·德爾·巴列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游擊生活敘述》對

---

<sup>2</sup> 程映虹，〈格瓦拉為什麼出走？〉，《切·格瓦拉：反響與爭鳴》，劉智峰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9月，頁403-410。



「新人」的概念的觀察。<sup>3</sup>所謂「新人」是切·格瓦拉革命理論與實踐的思想基石。切·格瓦拉的一生是按照「新人」這個概念來奉獻犧牲的。對切·格瓦拉而言，這種新型人類來自於把人類從自私的個人主義，剝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解放出來的革命鬥爭。

切·格瓦拉的「新人」觀激勵了他的戰友和後來追隨他的玻利維亞革命戰士為爭取一個新的社會，新的人類而赴湯蹈火，在所不惜。西萊斯·德里·巴列甚至把切·格瓦拉對「新人」的憧憬及革命者的博愛同六〇年代發端於拉美天主教的解放神學的理論體系和實踐連結起來。

那麼，切·格瓦拉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實現？一九六〇年卡斯楚的革命政府實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從體制上的確為切·格瓦拉理想的實現創造了一定條件。

當時依附論者皆認為工業化就是現代化。古巴國有化的經濟目的就是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要把古巴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這也符合當時盛行拉美地區的進口替代工業發展策略。然而，事不如願，古巴從此便開始進入長期的經濟困難，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因其財產被古巴國有化和古巴向外輸出革命而對古巴實行嚴厲的經濟封鎖。在這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古巴爆發一場理論大辯論，即非中央集權的獨立核算制和中央集權的預算制的辯論。身為工業部長和國家銀行行長的切·格瓦拉是中央集權預算制派的主將，但他的立場並非完全源於經濟問題，而是帶有更多的意識形態成分。從塑造「新人」是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這點出發切·格瓦拉認為實際上是一場「物質動機」和「道德動機」之間的鬥爭。古巴

的革命就是在完全不具備客觀經濟條件的情況下由人的主動性和革命熱情所促成的，這一點成為他後來「游擊中心論」的核心基礎，即革命條件可以由少數武裝人員用暴力去創造。

切·格瓦拉更進一步指出，古巴工人不需要那種建立在報酬基礎上的主人翁意識，而是義務和責任感。總之，對切·格瓦拉而言，「物質動機」完全不符合「新人」的道德標準。由此延伸，切·格瓦拉對解決經濟困難所提出的對策唯一就是社會主義義務勞動。因為這是唯一與塑造「新人」的社會主義工程相一致的解決辦法。

這場經濟論戰到一九六五年在沒有一個明確結論的情況下突然中止了。一直沒有表態的卡斯楚這時說：「作為革命者，我們的任務不是在哲學領域進行抽象的論爭」。論戰終止的原因既有維護黨內團結的因素，亦有古巴已放棄迅速工業化的打算，退回到以農業為主並以蘇東集團取代歐美為出口對象的商業分工格局。而在這種政策變化中位居要津的農業和貿易部門也沒改弦易轍，用切·格瓦拉的「道德動機」去增加生產。無疑，以維護革命純潔性為己任的切·格瓦拉對這種結果不會不感到失望。然而使他更為失望的也許是他已感到在和平年代裡塑造「新人」是一個幾乎無法達成的目標。對人性中利己本能的克服及根除，只有在戰爭條件下方能實現。他曾多次表示「新人」就在游擊隊員中，只有在戰爭條件下人與人才會有真正純潔的兄弟關係。巴列更進一步大膽假設，很多和切·格瓦拉關係密切的人都有這樣一種看法：切·格瓦拉實際上一直期待著美國的再一次更大規模的入侵，這種入侵將會一舉解決古巴和平時期所產生的一切問題。到了

3 理查德·哈利斯，〈對切·格瓦拉遺產的反思〉，《拉美透視專輯：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義》，羅納德·奇爾科特，江時學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1月，頁310-322。

一九六五年，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美國的又一次入侵，於是便離開古巴，尋找新戰場便成爲切·格瓦拉的必然選擇。

程映虹則認爲促使切·格瓦拉出走的另一個原因是他的「大陸革命」的夢想。他跟「解放者」西蒙·玻利瓦一樣一直認爲古巴這個加勒比小島的革命是拉美大陸的先鋒和前奏，離開了拉美革命，古巴不可能單獨建立社會主義。事實上，從古巴革命勝利的那一刻起，切·格瓦拉和卡斯楚就堅信，向拉美「輸出」古巴革命是可行的。早在一九五九年古巴尚未宣布轉向社會主義時，卡斯楚應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的邀請訪美，留在國內的切·格瓦拉就派出受其訓練的尼加拉瓜游擊隊重返尼國。以後他不但是推動拉美革命的官方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訓練營地和派遣送往直接把來自不同國家的武裝份派到宏都拉斯、多明尼加、尼加拉瓜和玻利維亞等國。他還設立了「革命獎學金」用於訓練拉美各國的激進學生。

一九六一年四月對古巴的「豬灣入侵」大敗後，切·格瓦拉在公開講話中警告拉美各國政府，說倘若他們不改善內政，等待他們的就是古巴模式的革命。然而，年復一年，他所期望的美洲大陸革命遙遙無期，他派出的游擊隊一再受挫，但這沒有使他對拉美革命的形勢重新評估(六〇年代是拉美左派勢力另一波低潮期)，反而使他感到拉美游擊戰需要一位更有戰力和號召力的領導人。切·格瓦拉在一九五九年曾說過：在南美的玻利維亞或巴拉圭，找一塊與巴西、烏拉圭、智利和阿根廷接壤之處，在那裡投進一支游擊隊革命就會擴散

到整個南美洲。他把這個最富有挑戰性的使命最終留給了自己，要不是六〇年代中期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一度使他產生了非洲已成爲世界革命中心。這個幻覺並選定剛果爲走出的地點的話，他很可能早就去了玻利維亞。

安德森認爲，切·格瓦拉急於要離開古巴是爲了在拉美其他地方，尤其在他以前的故鄉阿根廷發動切·格瓦拉革命。切·格瓦拉先到剛果的行動違背了他原先要去阿根廷革命的想法，那是當時因爲卡斯楚支持他關於幫助剛果的反對派的建議。卡斯楚這麼做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爲不同意切·格瓦拉在沒有足夠準備的情況下就在拉美醞釀建立一個革命游擊中心。

然而當初抵達剛果後不久便意識到，該地區反政府武裝力量很少有取得勝利的機會，因爲這場革命運動的領導人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國外度過的，他們缺乏領導才能。切·格瓦拉說「…缺少紀律和犧牲精神是游擊隊的主要弱點。當然，擁有這樣的部隊怎麼去打勝仗？」<sup>4</sup>

當然切·格瓦拉也認識到自己對於這次使命的失敗所承擔的責任。他說：「我對游擊戰爭握有太大的信念，但我們還是失敗了。我的責任很大，我不會忘記這次失敗所得出的教訓。」<sup>5</sup>

然而，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使命的失敗同在剛果使命夭折的原因幾乎如出一轍。即切·格瓦拉在沒有徵求他政治盟友的同意後，擅自帶領一支游擊隊，悄悄潛入其他國家。就這樣「他再一次在沒有受到邀請的情況下，在異國他鄉重蹈他在剛果的覆轍。他堅信，一旦將他的部隊以先斬後奏的形式出現在他們面前，玻利維亞共產黨的

---

4 同上註，頁314。

5 同上註，頁314。

領導人就不會輕易置之不理。」但由於玻國的特殊情況，安德森批判地指出，他這次所犯的錯誤是致命的。<sup>6</sup>

現在看來，顯然切·格瓦拉的使命從一開始便註定要失敗的。玻利維亞並沒有開展成功革命的游擊戰爭的客觀和主觀條件。當時的政治形勢不能與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的古巴局勢相提並論，成功的開展革命游擊戰的條件在玻國並不存在。而且，要開展一場席卷整個南美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條件，則更加難覓蹤影。

令人略感困惑的是，切·格瓦拉其人固然大有革命犧牲精神，然而說真格的，如果我們承認，「革命是不可輸出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身上」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格瓦拉那種企圖依靠由外國人組成的游擊隊去推翻別國政府的行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長期飽受歐美列強干涉之苦的拉丁美洲人民去贊頌，似乎已經超越了可以商榷的範圍。

但切·格瓦拉及其戰友們卻一直堅信，他們能夠在玻利維亞成功地建立起一個革命游擊基地，然最終能在拉美發動一場遍及整個美洲大陸的革命運動。這一認知在一定程度上是切·格瓦拉和卡斯楚從古巴的情報部門中收到了當地局勢的「虛假情報」。

切·格瓦拉玻利維亞使命的夭折很大程度上可歸究於玻國共產黨領導階層的兩面性，尤其是黨的領導人瑪利歐·蒙赫(Mario Monje)。依據安德森，蒙赫的行為是故意的背叛。究其原因，蒙赫是為了愚弄切·格瓦拉和卡斯楚，故意向古巴

人傳達錯誤的信息，並拒絕給切·格瓦拉的游擊隊提供必要的協助。當然，其他玻共的領導人事實上是反對由古巴人去指揮一切·格瓦拉游擊戰爭的。

哈利斯，美國加州州立大學Monterey Bay分校教授，與安德森看法一致，並指出切亦把蒙赫及其黨的行爲看做是背信棄義的。切自己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的一段話：「正如我所預料的，蒙赫的態度從一開始就躲躲閃閃，後來乾脆背信棄義了。…現在玻利維亞政黨(共產黨)已經背叛了我們，我不知道它究竟把我們引向何處，但這不會阻擋我們，而且從長遠來看，他可能是有益的」。至今切仍堅信「那些最誠實，最驍勇的戰士會站在我們這一邊(事實並非如此)，儘管他們會經歷一場比較劇烈的良心危機」。<sup>7</sup>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國際共產黨運動分裂亦是促使切出走的另一重要因素。六〇年代切·格瓦拉所推崇的那套革命國際主義和游擊戰爭的思想是不為拉美大多數親蘇的共產黨國家(蘇聯亦然)所接受。這是因為他經常提到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的口號，另一方面，他確實又可以被看作是一位托斯基份子，這是因為他去拉美是爲了開展革命運動。

事實上，切·格瓦拉甚至被一些古巴領導人認爲是親中國的，那是因為切的一些觀點接近當時中國領導階層的立場，而且他越來越來對蘇聯人持批評態度。他把蘇聯在赫魯雪夫執政時期的路線看作是社會主義「向右」偏離了(所謂「蘇修路線」)，他還把古巴在蘇聯指使下重新強調甘蔗生產，物質刺激及在生產工業範圍內放鬆財政自我管理的

<sup>6</sup> 同上註，頁315。

<sup>7</sup> 切在亞非團結組織會議上說，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要求把他們與正在從事解放戰爭的國家的經濟聯繫建立在互惠基礎上，這和殖民一樣。

體制看作是對革命政權，重視工業化和用共產主義道德精神代替資本主義的物質刺激的背叛。

切·格瓦拉深信革命政權需要在古巴工人隊伍中提倡和培養一種新的，建立在道德意識，而不是物質刺激基礎上的共產主義覺悟。同時，他也堅定地認為，政府有必要採用一種在經濟部門中實行公平分配資源的中央預算體制，這一體制有利於在古巴發展經濟中建立社會主義。他亦強烈反對在會主義國家裡廣泛實行的市場經濟，物質刺激和企業的財政自我管理的經營。當時，他曾預言，如果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如繼續依靠這種方式，就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老路上。今天看來，切的預言不幸言中。

切之所以常常對蘇聯持不加掩飾的批判態度，另一原因是從「新人」的角度出發。他認為蘇聯對社會價值觀、利潤和個人利益等的認可與革命的目的是背道而馳。原因之一，是他的拉美乃至世界革命的計劃與蘇聯的世界戰略尤其是「和平共處」方針相衝突。一九六一年蘇聯在古巴飛彈危機中的退讓使他怒不可遏。他認為這是背叛古巴人民。然而他對中國的態度和對蘇聯的恰成強烈對比。切公開說中國的公社模式和對精神生活的強調為亞非拉革命提供了榜樣。在他的工業部裡的中國專家不從古巴政府那裡領取報酬，切說這充分體現了「新人」的道標準。相反，蘇聯專家的工資是從蘇聯給古巴的貸款中扣除的。此外，當時中國的對外政策在切眼中也符合「世界革命」的要求。尤其是中國當時國防部長林彪於一九六五年發表的「人民戰爭萬歲」引起了重

視。他的這種態度無疑是古巴當時在中蘇論戰中遲遲未公開表態的原因之一。但隨著與蘇東集團的經濟體系日益成為古巴經濟基礎，蘇聯對切的反蘇親中立場有了強有力的壓制手段。切最終的出走，正是在他一九六五年二月在阿爾及利亞出席亞非團結組織的經濟會議上幾乎是公開地批評蘇聯之後。<sup>8</sup>而也正是他出走之後，古巴政府於次年以中國削減對古巴的大米出口為由說中國加入了美國對古巴的封鎖，挑起了中古論戰。

### 三、烏托邦主義者(Hombre Utopía)

切·格瓦拉認為「新人」就是為解決人民的問題而存在。因此他總像唐吉訶德一般，為了實踐理想不計奉獻、犧牲、蠻憨地埋頭苦幹、勇往直前。

切在當時無論在第三世界或在西方國家都有著大批的崇拜者，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人格特質有關。他是一個真正忘我的無私無畏的革命家。他放棄高位重返戰場是犧牲自己的事跡廣為人知。他公私分明，以身作則典範不勝枚舉。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從小就患有嚴重的哮喘病，但這從未動搖他走進叢林和戰場的決心。總之，他決不是那種只會號召別人奉犧牲的「革命家」。這是這種精神使得他甚至得到敵人的尊敬。

我們基本上與大陸學者雷池明看法一致，<sup>9</sup>切是一個符號，是廿世紀下半葉理想主義者悲劇的最近最具體的詮釋。今天面對這個符號，讓我們想起另一個名字：唐吉訶德。這個名字雖然比較遙遠與抽象，但卻是一個起點，一個於近代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命運悲劇的預言所標誌的起點。

<sup>8</sup> 切在亞非團結組織會議上說，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要求把他們與正在從事解放戰爭的國家的經濟聯繫建立在互惠基礎上，這和殖民一樣。

<sup>9</sup> 雷池明，〈從唐吉訶德到切·格瓦拉：理想主義在悖論中的尷尬〉，《切·格瓦拉：反響與爭鳴》，劉智峰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9月，頁414-426。

事實上，最初把和唐吉訶德兩個名字聯結在一起的正是切·格瓦拉本人。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當切悄然離開古巴踏上他不歸的征途時，在給父母的告別信中，悲涼的情溢於言表：「兩位親愛的老人，我的腳跟再一次踏到了羅星南德的肋骨(驚駭難得〈Rocinante〉是唐吉訶德的座騎)；我挽著盾牌，重上征途」。由此推論，在內心深處，切已經把自己看作了唐吉訶德了。同時亦給孫子們留下了遺言，他說：「如果有一朝一日，你們讀這封信的話，那就是說，我已經不在你們身邊了…你們的父親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怎麼想就怎行動(言行一致)，不容置疑，他是忠於他的信仰的」。他教導孩子們要有正義感：「你們應當永遠對於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能產生最強烈的反應。這是一個革命者的最寶貴的特質。」<sup>10</sup>

切為何會自況為唐吉訶德，這當然是包含著悲涼的自嘲。他離開古巴把雖然為自我放逐，再一次開始游擊戰士的生涯，但亦包含著被動因素，面對著他視為永遠敵人的帝國主義及其是走卒的強大，面對看充滿邪惡和壓迫的不公正的人類社會，他感到自己的孤單無力。他命中注定了要向舊制度不停挑戰，而這力量懸殊的戰鬥正如唐吉訶德用長矛刺向風車，所以他發出自嘲，而這自嘲成了他日後悲壯結局殲語。

然而這兩個名字的相互聯結卻並非自嘲和箋語所能涵蓋的。倘若我們放大視角，看一看四百年來，當代意義的理想主義者究竟走過了怎樣的歷史軌跡，我們所看到的確實大體上就唐吉訶德和切·格瓦拉的重疊影像。因為在他們兩人身上，

共通的东西是那麼多，那麼主要。首先，他們倆的信仰目標是對於社會正義的永遠追求，這就是決定了他們倆始終要和弱者，被壓迫者站在同一立場 — 戰鬥是與生命共存的義務；其次，他們倆的戰鬥精神從來不因挫折而中止或妥協，因而他們倆永遠不會放棄和屈服 — 戰鬥是與生命共存的喜悅；再者，他們倆只能接受坎坷的命運，他們倆的征途不僅有凶險和仇恨，而且有同路人不斷的排斥、孤立、及令英雄最難堪的奚落和輕蔑；最後，他們倆還被注定了走向失敗的結局。

「失敗」，即從理想主義者走上他們艱難征途的第一步起，就已經如一個宿命的陷阱在前方某處張著雙臂等著。這種令人扼腕的悲劇的根源正是理想主義者為自己設定的歷史目標所決定的，因為那是一個悖論的怪圈。雷池明引述俄國文豪高爾基對理想主義者有這樣的論述：「人類的一切悲劇就起源於人有一種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的欲望。<sup>11</sup>這一強加於人的過程和終結構成普遍人壓迫人的現象。一切理想主義者的根本訴求和奮鬥的目的(也是他們賴以存在和前進的動力)，就是鏟除人類社會的壓迫和被壓迫現象。他們的終生信仰制約了他們永遠為被壓迫者而奮鬥，離開了這一點，就意味自然地放棄了理想主義者的立場和境界，也不再是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但是歷史經驗反覆地證明，人類的任何本能性的欲望，不行強制，很難消失，壓迫他人便是其中一種，甚至是最難消失的一種。當被壓迫者在理想主義者的策動，組織和支持人奮起反抗並獲得成功時，壓迫者被迫放棄了保障壓迫他人特權的統治，但僅僅放棄是不夠的，因為已站起

10 附錄〈切·格瓦拉小傳〉，《切·格瓦拉：反響與爭鳴》，劉智峰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9月，頁416。

11 雷池明，前揭書，頁417。

來的被壓迫者即使不抱有報復的渴望，也難以克服自己身上那種壓迫他人的本能，更何況還有著冠冕堂皇的理由——必須防止被推翻的敵人捲土重來，恢復他們失去的政權。於是一種新的人壓迫人的制度往往比昔日舊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就這樣，當新的統治秩序一旦建立起來，理想主義者的處境往往變得日益尷尬起來，原來舊制度下的受壓迫者中的精英份子變成了壓迫者，自己是否繼續與他們保持同一立場呢？如果說是，那麼自己便蛻變成新壓迫者的一員，然而背離了理想主義的根本原則與立場，如果說不是，那自己又該何處去尋求歸宿？如果不能或不忍把矛盾指向昔日的朋友或同志，那他就只好遷地為良——到別處去繼續反壓迫的鬥爭。作為不願意放棄初衷的理想主義者，切·格瓦拉和唐吉訶德走向了背景有別，而形式相似的道路。

故切的「出走」以其總是他主動選擇的結果，倒不如說是「被他的同志，流放的」。首先，切一直被莫斯科為是反蘇的，有朝一日會帶領古巴去親中共。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在阿爾及利亞開的亞非團結組織第二次會議上，切的長矛指向了莫斯科大風車。他指責蘇聯沒有盡到對不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責任，還暗示它是帝國主義的同謀。他進一步要求蘇聯在不發達國家的投資應該像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內投資一樣，不考慮利潤、不期望任何報酬。切這種百分百的馬克思主義者，叫俄國人受不了，於是，他非走不可。

再者，切與卡斯楚的關係亦趨緊張。這種情形在他亞非之行返國後，達到頂點。當時，卡斯楚不僅在國際事務中必須和蘇聯保持一致，而且在

國內政策上也必須接受蘇聯的全面指導，他不能聽任切反蘇立場日益強化。而切更為了政策觀點的分歧，有時公開把矛頭指向卡斯楚，影響了卡斯楚作為領袖的威望，正如一山不能容二虎。

之所以如此結局，問題的根源在於切，如同唐吉訶德是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夢想家，是廿世紀最典型最徹底的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的本質決定了他無論在主觀要求(律己)或客觀態度(處世)方面都有其特定的原則。按照這些原則，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不公正的人壓迫人的秩序，他就決不能坐視不顧，他一定要舉起長矛，策動驚駭難得衝殺過去，而絕對不願安享革命成功後的榮華富貴。

當時的古巴，確實存在著許多令他難以容忍的現象，如對大國(蘇聯)的屈從和官僚機器對個人權利的漠視和踐踏等等。他也許已經感到自己不宜於在倡導和保護這些現象的政權中長期擔任要職。但是理智卻又提醒他，解決革命後續的問題非他能承受的責任，而「在世界上創造許多個越南」以牽制「美帝國主義」，並加速其滅亡，畢竟是他心頭最大的夢想。這一夢想曾在相當時期內被古巴定為國策(切死後，這一輸出革命做法仍未停止，在安哥拉的古巴軍隊到了八〇年代才分批撤出)。但要「製造更多越南」並非易事，當時隨切遠征的都是軍中精銳，誰是最適合而且又自願領導這批人呢？除了切，還是切，他不僅是具有這樣的經驗、能力和威望，更重要的是，他有對這種任務主觀上的渴求。這樣的人，甚至可以說，在風車大戰中死去，是他最大的嚮往和快樂<sup>12</sup>，他怎麼會考慮到自己已經三十七歲並且

---

<sup>12</sup> 據傳切就義前一刻，說了一句遺言：「我是切·格瓦拉，我失敗了」。「我失敗了」，是多麼簡捷，多麼英雄本色，又是多麼沉痛！

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呢？他又怎會捨不得哈瓦那養尊處優的官僚生活？切本來從小就是一個崇尚簡樸、厭惡奢侈排場的人。真正的徹底理想主義者是稀少的，這種特質的人，自覺的生活目的就是不停地戰鬥，為了解放他人，他們是心甘情願犧牲一切。就古共黨內，切與正統的共產黨及菲德主義(Fidelismo)者確存在著矛盾與分歧。有時，他甚於公開頂撞卡斯楚。隨著古巴對蘇聯依賴性的日益劇增，蘇聯老大哥自然把自己的好惡強加給古巴小老弟。但切和他的古巴同志的戰爭情誼畢竟是在艱苦患難中形成，而他們之間的摩擦卻並未達到足以完全摧毀這種革命情誼的程度。切在給卡斯楚的告別信中寫道：「世界上另有一些山地號召我獻出微薄的力量，由於你擔負著古巴領導的責任，我可以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們分別的時刻到了…我走向新的戰場，將帶去你給我灌輸的信念…哪裡有帝國主義，就到那裡去戰鬥…」。<sup>13</sup>人們實在很難從這些話裡找出切是被放逐出境的痕跡，而切又不是一個喜歡弄虛作假玩弄政治技倆的人。在他走後，卡斯楚為澄清外界的疑惑，曾經表示過：「切，到那裡去了，這跟誰都不相關……我們沒有責任向任和人說明……不管他在什麼地方，不管做什麼，我們可以絕對肯定地說他將永遠為革命奮鬥到底」。<sup>14</sup>緊接著在哈瓦拿的街道上就出現了大幅切的畫像(此時此刻切還奔波在潛入玻利維亞途中)。一般來說共產黨人不會這樣對待被放逐的反對派。很顯然地，切在古巴的歷史功績和英雄地位是一直得到承認的。然而，無所置疑，對於

在政治理念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分歧，切的感受是深刻的。自己繼續留在古巴，矛盾發展的前景實在難以估計，也許今後連客腳的禮遇都享受不到。他不會害怕危險，但無所爭的悠閒是他無法忍受的痛苦，與其那樣他寧願選擇戰鬥或死亡。

說真格的，矛盾和分歧是存在著切與卡斯楚及黨內同志之間，但尚未到達不共戴天的程度，應屬於所謂「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

#### 四、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之矛盾

傅瑾在解讀話劇「切·格瓦拉」一文中指出，切的人格特質最具感染力有二：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sup>15</sup>前者指切為烏托邦而獻身的犧牲精神。上世紀末隨著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解體，拉美地區左派運動進入低潮，但理想主義本身的社會平等的烏托邦卻並不會因為時勢一時的變易而消失。相反，正由於他在現實社會裡的稀缺，更顯得其高尚珍貴。後者則指切對社會中弱勢者的深切同情，在國內它指的是對「窮人」這個階層的同情，在國際上，對所有因為與強權為敵而遭受打壓的國家的同情。

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均是人類社會的高尚核心價值。知識份子的責任之一就是為有缺陷的現實社會提供理想，儘管所有理想都不盡然具有烏托邦性質，但理想和烏托邦的存在始終代表了引領社會與人類進步的巨大力量。而這種為烏托邦獻身的精神，更是人類所可能擁有的較高貴的品質之一。對抗強權與同情弱者，為弱勢族群爭取其應有的社會權利，更是任何時代的知識份子應負

<sup>13</sup> 雷池明，前揭書，頁423。

<sup>14</sup> 同上註，頁424。

<sup>15</sup> 傅瑾，〈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的二律背反：解讀話劇《切·格瓦拉》〉，《切·格瓦拉：反響與爭鳴》，劉智峰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9月，頁357-360。

的社會責任。任何一個社會，無論在國內或國際上都需要這一種可貴的聲音。

但在現實社會裡，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之間，卻存在無法彌合的鴻溝。這是因為人道主義是以人類那些最為直接與最為真實的需求和慾望為出發的，他的精神實質是從正面肯定人類諸如食、衣、住、行的基本需求，當然亦包括「世界人權宣言」所指的「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的自由並免於恐懼和匱乏」之權利。而理想主義的獻身精神，卻是意味著執行者往往為了某種非個人的目的，放棄了個人某一部分的需求，遏止自己某些慾望，投身於為理想而奮鬥的事業。從這角度來看，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是無法共存於同一個精神空間的。

實際上即使人道主義可以成為理想主義的最終目標，它亦很容易遭遇到有意無意的曲解與閹割。這和把革命成功後的切每個季節究竟是參加二百四十小時還是四百八十小時的義務勞動無關。關鍵點在於當理想主義僅僅是一種個人自覺行為時，為了理想主動克制個人合理的需求與慾望是令人敬仰的。然而，當他演化為群體的行動規範，犧牲就已經不再限於個人的主動選擇，它必然成為所有社會成員是否被族群受容的先決條件，而對那些不可避免地受到生理與心理的需求與慾望的個體，形成巨大的精神壓力。終其一生，切不僅僅要求自己苦行僧般地自我殉道，他希望自己是個榜樣，即希望他的部屬，他的戰友與同事也成為像他一樣的人，或致力接近於他的人。

然而，歷史經驗顯示，一個人為理想的自我犧牲是可貴的，但是為了理想動用權利要求甚至強迫別人做出犧牲，就不僅不再可貴而是另種類型的暴政。

對切·格瓦拉而言，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

存在事實上的對立。然而，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並不是完全不能融合，它只不過是在切的宗教狂熱裡無法融合。事實上，有許多例子能讓我們看到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並存的可能性，中國聖哲孔子就是其中之一。孔子無疑是具有理想主義精神的，他的所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還是理想主義最為直觀的寫照。

## 五、小結

切·格瓦拉，這個廿世紀最具血肉的革命家。他的青春、浪漫、革命、烏托邦……這種我們這個時代最稀缺的人格特質，讓我們再次讓他沸騰，使我們似乎又獲得了青春、激情和理想。切為我們提供了生活的另一種方式，由於其不可能實現，更彰顯切國際主義大無畏犧牲精神，這是紀念切為逝世四十週年對我們永恆的意義。

另一方面，切對於今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拉丁美洲確實仍有其不可低估的歷史價值。如果我們對他當年放棄把古巴國家領導人的職位而重返游擊戰場的更深層的動機作一番思考的話，我們也許會發現切的「出走」，實為廿世紀社會主義革命史上極富象徵性和耐人尋味的事件。

人們都說，切身上有一種青年浪漫的情調，不過這是外表的膚淺印象，而在內心深處最為崇高的是他以狂熱理想主義為指導原則的幫助他人的決心和渴望。這位傳奇式革命家的巨大熱情就是積極投入於發動一場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革命，並實踐他個人的偉大目標，解放廣大第三世界被壓迫人民和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殖民地國家，扭轉拉丁美洲幾世紀以來被壓迫人民的命運。他，廿世紀的唐吉訶德，對這些信念的執著追求得到了他的大多數親密戰友以及世界上許多



崇拜者和同情者的理解和贊賞。

然而，有趣的是與切一起遊歷南美各地的阿根廷好友葛納多斯－如同桑丘(Sancho Panza)，一位現實主義者－卻並不贊同切用游擊戰術在拉美「發動」一場革命，儘管他的確曾幫助切在阿根廷北部的游擊中心招兵買馬。

關於用游擊戰發動並展開一場群眾革命的有效性問題，仍然是革命理論和實踐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在拉美沒有人比切對此所做出的貢獻更大。切的思想「游擊中心論」部分地被七〇和八〇年代的中美洲武裝革命運動所採納，且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八〇年代的尼加拉瓜桑定政權)，而且他的游擊戰術今天在墨西哥南部的薩帕塔運動中似乎仍然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來。切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這一點在「副司令馬可士」(Subcomandante Marcos)所領導的薩帕塔起義中得到證實。雖然「薩帕塔」不具有切所倡導的進攻性的軍事戰術和信誓旦旦的政治口號，但馬可士本人持槍，抽煙，沈思，嘲諷，奔放而迷人的形象讓人聯想起切。安得森推斷「人們不難從馬可士身上看到一個適應新時代的切·格瓦拉形象再生」。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切和他的最後十七名游擊隊員在玻利維亞大峽谷突圍全軍覆沒。他未經審判就遭玻國政府軍槍殺，而向政府軍告密並由之引路的正是切不惜艱苦要去解放的玻國農民。切在他的日記總結時說：「玻利維亞農民一點也不幫助我們，而且變成了告密者」。這真是理想主義者悲劇最黑暗的寫照。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路易斯·賴特所言：「有一件事過去是事實，此後還是如此，那就是美國的革命是不可輸出的」。據傳切在就義前，說了一句遺言：「我是切·格瓦拉，我失敗了」。「我失敗了」，說明了一

點：「古巴革命亦不可輸出」！

切的死訊公布，在世界各地產生規模之大，持續之久，歷史上無與倫比，真可謂備極哀榮。西歐，北美的學生，工人高舉他的畫象遊行示威和警察對抗。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政治家和天主教人士對他頌揚備致，並為他祈禱。著名的文學藝術界人士對他的崇敬和贊頌更是構成一幅前無古人的景像，其中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瓜地馬拉人阿斯圖里亞斯，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等。

世人對切的崇敬與贊揚大多是基於他以身殉理想的高尚行為。阿斯圖里亞斯說：「切體現了真正的浪漫主義，體現了壯烈的犧牲，這當然喚起各個階層的同情」。沙特則稱道：「切是我們時代十全十美的人物」。如此讚頌推崇無非是因為切自始自終沿著二百零二年前唐吉訶德的路，用那桿鏽鈍的長矛不停頓的向不公正的社會秩序挑戰，最倒在血泊中，是一個真正的、純潔的、無可挑剔的理想主義者。這正是他「出走」古巴轉進玻利維亞的主因。退一步而言，即使在玻利維亞，他又僥倖成功，此後，等待著他的還是另一類的失敗。這不僅對他自己，亦對所有理想主義者命運規律的最根本的總結。

理想主義和烏托邦存在始終代表了引領人類社會進步的巨大力量。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是向崇高的社會核心價值所在。然而，對切而言，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之間卻存在事實上的對立，無法彌合的鴻溝。但，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並不是完全不能融合，只不過是切式的宗教狂熱無法融合。

欲扭轉拉丁美洲幾世紀來被壓迫人民的命運是切的未竟之夢，雖然已進入廿一世紀這個夢仍很遙遠，制度吃人，劫貧濟富消滅貧窮將是南柯一夢。

今年首期《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周刊的社論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今天，與科技突飛猛進帶來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否衝過頭了。在全球化之下，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日趨不均，形成了所謂「M型社會」，左邊的窮人與右邊的富人變多，而原來代表多數與安定力量的中產階層，卻已逐漸赤貧化。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估計，世界上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口正處於絕對窮的境地，全球的三分之一的勞動力不是失業就是未充分就業。在拉丁美洲這種現象就更為嚴重，據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最近估算。

全球化現象所涉及的世界經濟，文化或社會核心價值道德倫理的重新洗牌，其內含的危機觸動了拉美第三波新興左派勢力的崛起，以新民粹主

義查維茲為首的拉美激進左派政權倡議「廿一世紀社會主義」路線，以追求一個更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人類新社會。

依據切的未竟之夢，吾人相信，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路線，不但有可能被扭轉，更必須徹底加以變革。

任何結果，必然有其原因。今天，在全球化熱潮中，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不多，具切式烏托邦主義的理想主義者更為稀少。切未竟之夢恐終將是南柯一夢。問題根源多來自於教育的徹底失敗。英國哲人羅素曾經說過：「人不受教育，只是笨。受了教育後，反而變壞」。這就是拉美教育的寫真集。拉美的教育往往把不能幹的人教笨，把能幹的人教壞。這個現象難道僅發生在拉美地區？包括台灣在內，值得吾人反思？★

## 參考資料

### 一、外文部分：

- ANDERSON, Jon Lee. *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Grave Press, 1997.
- CASTAÑEDA, Jorge G., *Compañero: The Life and Death of Che Guevara*, New York: KNOPT, 1953.
- 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Madrid: Aquilar, 1960.
- DEUTSCHMANN, David (Editor), *Che Guevara Reader*, Australia: Ocean Press, 2003.
- FUENTES GUTIERREZ, Hermenegildo; *Don Quijote de Cervantes de La Mancha a Sanabria (Para una Nueva Interpretación del Quijote)*, Madrid: Rehyma Artes Graficas, S.L., 1983.
- GUEVARA, Ernesto,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México. D.C.: Siglo veintiuno, 1998.
- GUEVARA, Ernesto Che, *The bolivian Diary*, Canada: Ocean Press, 2006.
- JAMES, Daniel, *The Complete Boliviandiaries of Che Guevara and Other Captures Documents*, New York: First Cooper Square Press Edition, 2000.
- KELLNER, Douglas, Ernesto "Che" Guevara,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43.
- TABLADA Perez, Carlos, *Che Guevara, Economía y Política en la Transición al Socialismo*, New York: Pathfinder, 1997.
- TAIBO II, Paco Ignacio. 1997. Ernesto Guevara, También conocido como El Che. Barcelona: Planeta
- VILLEGAS POMBO, Harry, *Pombo: Un Hombre de la Guerrilla del Che*, La Habana: Editora Política, 1996.

### 二、中文部分：

- 羅納德·奇爾科特主編，《拉美透視專輯：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義》，江時學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 劉智峰主編，《切·格瓦拉：反響與爭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游擊隊員 vs. 文學家 —— 閱讀切·格瓦拉

陳小雀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專任副教授兼所長

## 一、前言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巴蒂斯達(Fulgencio Batista y Zaldivar)棄國流亡，卡斯楚與大鬍子游擊隊(Los barbudos)在人民的歡呼聲中進入哈瓦那，光榮結束古巴大革命。受到勝利氛圍的感染，攝影家柯達(Alberto Korda)<sup>1</sup>為卡斯楚及大鬍子隊友捕捉了一系列珍貴鏡頭，以影像紀錄歷史。在柯達的眾多作品中，有一張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以下簡稱切)的半身照，被題為「英勇游擊隊員」(Guerrillero Heroico)。照片拍攝於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當時切正參加庫布雷號(La Coubre)受難者追思會，柯達自遠處悄悄按下快門，留下雋永時刻。<sup>2</sup>影中人雙眸凝視遠方，神情鬱鬱，流露出波希米亞式的頹廢，軍服拉鍊拉到頸部，是因為哈瓦那春天早晨的涼意？還是因為悲愴心情？仔細端倪，貝雷帽掩飾不了澎湃的思緒，零亂鬍鬚絲毫不減

游擊隊員的英雄本色。動靜相容、英勇頹廢並存，讓這張照片益發獨特。

但是，這張照片一開始並未引起特別注意，古巴報紙報導庫布雷號受難者追思會時，甚至未採用這張照片。一九六七年夏天，知名義大利出版業者費爾特利尼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來到古巴，並拜訪柯達的工作室，柯達加洗了二張「英勇游擊隊員」，贈予費爾特利尼利。<sup>3</sup>同年十月八日，切於玻利維亞裘羅(Churo)峽谷<sup>4</sup>遭玻國軍方逮捕，在中情局的指使下，隔天被處決於無花果(La Higuera)村。消息傳回古巴後，為了感念這位古巴永遠同志，卡斯楚政府將切的英雄事跡神格化，並以柯達的「英勇游擊隊員」為藍圖，於公共空間大量繪製切的容顏，其中，以位於哈瓦那內政部大樓外牆上的鍛鐵雕塑最為醒目。

切席捲國際的真正幕後推手乃費爾特利尼利。切遭處決後，費爾特利尼利立即將這張「英勇游

1 柯達本名為亞爾貝多·狄亞斯(Alberto Díaz Gutiérrez)，一九二八年生於哈瓦那，一九五六年開始專業攝影生涯。柯達十六歲時，曾拿起父親的「柯達35」相機為初戀女友拍照，爾後因而以「柯達」為藝名。柯達不僅捕捉古巴大革命勝利的情景，並且擔任卡斯楚隨身攝影達十年之久(1959-1969)，舉凡卡斯楚和海明威合照、或和赫魯雪夫合影，皆出自柯達之手。請參閱Alberto Korda, *Diario de una revolución*, Pisa (Italia), Edizioni Aurora, 1997.

2 一九六〇年三月四日，法國籍貨船庫布雷號(La Coubre)抵達哈瓦那港，船上滿載比利時製造的武器軍備，在卸貨時突然爆炸，造成七十名工人死亡，二百人受傷。這起爆炸案係美國中情局策劃，卡斯楚於是在受難者追思會上，首次大聲疾呼：「無祖國毋寧死」(patria o muerte)，藉以凝聚古巴人民的愛國心。

3 Jaime Sarusky, "Korda", en Alberto Korda, *op. cit.*, p. 7.

4 裘羅(Churo)峽谷或作猶羅(Yuro)峽谷，係因玻利維亞不同印地安族群，而造成發音有異。

擊隊員」照片印刷成海報，據信，海報在半年內銷售量達一百萬張。<sup>5</sup>經過媒體的渲染以及複製技術的傳播，這張照片廣為流傳，甚至不斷被變形仿製，幾乎到達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地步。

不必諱言，各界對切一生作為有兩極化的論戰。或為偏激的顛覆分子、或為英勇的游擊隊員、或為反美國帝國主義的「神主牌」、或為浪漫的理想主義者，切三十九歲短暫生命掀起狂飆，拜柯達所賜，這陣狂飆持續不下，從政治議題飄颺至流行界，成為一個崇拜符號。

曾幾何時，他帥氣的容顏似乎超越實質的革命精神，年輕人喜歡他的「反叛」、「豪邁」、「熱情」與「浪漫」，穿著印有切容貌的T恤，收藏相關副產品。革命英雄成為「流行」、「時尚」，甚至「品味」的代名詞，至於這個容貌背後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反而不甚重要。的確，在商業運作下，切被過度消費，成為一位「超級巨星」、或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商品」。然而，回歸歷史定位，切真的只是「游擊隊員」？只是古巴人民心中的「革命英雄」？只是全球年輕人的「叛逆偶像」嗎？

古巴大革命改寫歷史，因之，游擊隊員與英雄幾乎畫上等號，而英雄這個詞彷彿金箍咒，已成為切無法掙脫的宿命。切具有「能指」(significante)與「所指」(significado)的象徵意義；是游擊隊員，也是理想主義者；是永遠的同志，也是精神導師；是革命家，也是思想家。有鑑於此，本論文試圖探索切的象徵圖騰，解析《切在玻利維亞日記》(*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的訊息，旁及《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

記》(*Notas de Viajes: diarios de motocicleta*)、《古巴革命戰爭實錄》(*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等作品，藉以重新定位切的身分，將他置於創作者、理論家、批評家之間，並給予「作家」的地位。

## 二、紀錄與敘述

「寫作方式」與「文體」並非全由個人決定，亦受社會與歷史等各種客觀因素所影響。拉丁美洲的歷史沿革與社會發展有別於其他地區，因此，拉美作家不只吟風弄月，在創作文學之餘，也扮演「理論家」、或「思想家」的角色，書寫隨筆(ensayo)，<sup>6</sup>「文以載道」，不僅擔荷社會責任，同時豐富了「寫作方式」與「文體」。政治家亦然，允文允武，行文走筆闡述政治思想，以「文」流名青史。

南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Simón Bolívar)，解放委內瑞拉失利後，流亡牙買加，為了鼓舞知識分子持續解放工作，於是在牙買加寫了一封信，冀望藉由文字，告誡克里歐優白人(criollos)不可陷入歐洲血緣的迷思，並賦予「美洲人」神聖血統，這封信函並未因玻利瓦的軍人身分而被忽略文學價值，反之，被題為〈牙買加之書〉(“Carta de Jamaica”)，成為拉美文體的典範，被列入文選。現代主義先驅馬帝(José Martí)點燃古巴第二次獨立戰火，並為古巴捐軀；是文學家，也是政治家，馬帝的《樸實詩篇》(*Versos sencillos*)散發現代主義的唯美風格，而〈我們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則釋出憂國憂民情操，喚醒拉丁美洲人民沉寂三百年的魂

<sup>5</sup> *Ibid.*

<sup>6</sup> 隨筆亦稱論說文。

魄。美西戰爭(1898)之後，烏拉圭作家羅舵(José Enrique Rodó)意識到美國帝國主義的威脅，因而書寫了《愛麗兒》(Ariel)，針對西、美勢力此消彼長的局勢，將拉丁美洲比喻為莎翁《暴風雨》裡的精靈愛麗兒，呼籲拉美國家應建立以拉丁文化為主體的文化認同，防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隨著美國的戰勝而入侵拉丁美洲，再度淪為強權的附庸。墨西哥哲學家巴斯龔西洛斯(José Vasconcelos)以《宇宙族群》(La raza cósmica)一書，意圖消弭族群嫌隙，頌揚美洲混血族群，《宇宙族群》字字珠璣，堪稱絕佳的文學作品。例子不勝枚舉，我們再以雷耶斯(Alfonso Reyes)的〈美洲智慧筆記〉(“Notas sobre la inteligencia americana”)，印證思想家以「文」提倡美洲人民的價值：<sup>7</sup>

我們的戲劇係由舞台、合唱團及人物所組成。與其說舞台是一個空間，不如稱之為時間，若以音樂術語來說，時間就是節拍、抑或旋律。加入歐洲文明饗宴的尾聲，還來不及茁壯，美洲便從一個時代倉促跳到另一個時代。/……/所謂合唱團就是源自各方的美洲人民，除了原住民族群外，還加入大批的伊比利征服者、傳教士、農民，以及後來才融入的一般歐洲移民。血統衝擊、混血融合、適應同化，一幕幕上演。/……/美洲樸實內涵漸漸融入不同物質，如今，蔚成美洲人文特色，展現美洲精神。在這豐富的情節裡，人物就是智慧。<sup>8</sup>

雷耶斯的「美洲智慧」是指本土內涵，係由歐洲文化、印地安文化和其他文化所交融而成的內涵，提供拉美知識分子生長養分。一九二八年，切生於阿根廷羅薩利歐(Rosario)市，出身白人世家。父親為平庸投資客，曾從事營造業，亦曾改行投入瑪黛茶種植，雖然均未大發利市，但生活依然富裕。阿根廷係拉丁美洲最歐化的少數國家之一，在此環境下，切自小研習法文，熟讀歐美文學，歐洲文化根苗茁壯成長，美洲文化認同則有待日後隨人生歷練才漸漸甦醒。

在印地安同伴的陪伴下，切漸漸長大並入學就讀，卻因氣喘嚴重發作而兩度被迫休學。養病期間，他大量閱讀，博覽群書的母親借給他許多法國文學作品，有時他也會到父親的書房翻閱書籍。不須轉型期，他的閱讀範圍可自沙孚克理斯到《魯賓遜飄流記》，也可從弗洛伊德到《三劍客》。<sup>9</sup>

紮實的文學底子更襯托出切的與眾不同，即便加入大鬍子游擊隊，絲毫不具草莽性格。當大鬍子游擊隊落入巴帝斯達軍隊所佈下的陷阱時，一顆子彈劃過切的脖子，瀕臨昏厥之際，他想起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一則故事：「故事的主人翁一旦得知自己即將凍死在阿拉斯加的冰天雪地，便倚著一棵大樹，以求光榮結束生命。」<sup>10</sup>當卡斯楚為大鬍子游擊隊生死存亡而向西莉亞·桑切斯(Celia Sánchez)請求軍備奧援之際，<sup>11</sup>切卻請西

7 本文中的西班牙文引文皆為筆者所譯。

8 Alfonso Reyes, “Notas sobre la inteligencia americana”, en Leopoldo Zea, comp., *Fuentes de la cultura latinoamericana*, 1, México: FCE, 1993, p. 245.

9 Jean Cormier, *La vida del Che: mística y coraje*,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1997, p. 15.

10 Ernesto Che Guevara, *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 La Habana, Editora Política, 2006, p. 13.

11 西莉亞·桑切斯生於一九二〇年，死於一九八〇年，係「七二六」運動(Movimiento de 26 de julio)的核心成員。卡斯楚游擊隊重挫後，有賴西莉亞·桑切斯奔波，尋求各方支援軍備，才得以讓卡斯楚殘存的游擊隊再度整軍經武，完成革命。西莉亞·桑切斯後來成為卡斯楚的紅粉知己。

莉亞一併爲他送來《歌德》(Goethe)及數本馬克思主義作品，以伴他渡過馬艾斯特拉(Maestra)山區的游擊戰。<sup>12</sup>若切未加入卡斯楚的大鬍子游擊隊，他會是出色的醫生嗎？雖無法證實，但他的文人本質不言而喻。

書寫是切的興趣。一九五一年，與好友艾柏托·葛納多(Alberto Granado)騎著機車「強力二號」(La Poderosa II)一起探險南美洲，<sup>13</sup>切紀錄了這趟不可思議的瘋狂旅程，寫下追求理想的青春熱情，而這本日記爾後被題爲《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除了被譯成多國語文，也被拍攝成電影，足見他紀錄與敘述的功力。

美洲幅員遼闊，地形複雜多貌且蘊含多種文化，即便是美洲人必須透過實地旅行，才得以跳脫狹隘的區域主義，認同雷耶斯的「美洲智慧」。旅行不只是禮讚美洲的大自然，亦可體驗美洲多元社會，更可認識美洲的本質。質言之，旅行開闊個人的氣度與胸襟。一七九九至一八〇四年，德國自然科學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法國植物學家邦普蘭(Aimé Jacques Alexandre Gougaud Bonpland)的陪伴下，至西語美洲進行深度的科學與人文研究。其中，洪堡的研究文獻成爲爾後西語美洲珍貴的史料，贏得美洲人士的感佩，因而被尊爲美洲的「第二位發現者」(el segundo descubridor de América)。<sup>14</sup>馬帝爲了古巴獨立事業，各地奔波，返往墨西哥、瓜地馬拉、委內瑞拉和大安地列斯群島等地，藉

由旅行馬帝拓展視野，仔細觀察受西班牙殖民主義荼毒三世紀的美洲大陸，並寫出令人動容的〈我們的美洲〉，提倡嶄新的文化認同，馬帝因而從古巴民族英雄躍升爲西語美洲的精神象徵。

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一九五一年，切以二十三歲年紀進行第一趟美洲之旅。一如洪堡，也如馬帝，切見識到美洲綺麗風光，也看到美麗背後的貧窮。接觸窮鄉僻壤的印地安人，照顧奄奄一息的癲瘋病人，美洲之旅喚醒他內在的印地安意識，啓發他的人道關懷，於是他在日記首頁如此寫道：

這個故事不是令人感動的豐功偉業，這也不是「略帶犬儒學派的敘述」，至少文章本質並非如此。這是兩個生命的片段，兩人志趣相投，共同渡過一段日子。在生命中的九個月裡，一個人可以思索許多事情，可以思考既深奧且富哲理的問題，也可以因飢腸轆轆而粗鄙地只渴望一道湯。倘若這是一個冒險者九個月的故事，其客觀敘述構成這本日記，或多或少將引起他人的興趣。<sup>15</sup>

雖爲年輕人的追夢之旅，但日記內容並非旅行瑣碎記載，而是一名年輕人的蛻變歷程，已具有隨筆之風，行文走筆間透露出他的道德、生命、經歷、性情，讀者不僅可藉由文字判斷他的沉著、機智、幽默和氣度，更重要的是，發現他的「成長」：

12 Jean Cormier, *op. cit.*, p. 108.

13 艾柏托是切的好友，受到艾柏托的影響，切選擇攻讀醫學院。一九四五年艾柏托已完成藥理及生化學業，一九五一年在癲瘋病院工作，他想四處訪視癲瘋病院，因而提議南美洲機車之旅。艾柏托的第一部摩托車取名「強力一號」，「強力一號」故障後，艾柏托再買了一部諾頓(Norton)五百CC的二手機車，取名「強力二號」。「強力二號」恰似唐吉訶德的驚馬，載著二名年輕人征服世界，至於艾柏托與切之間，孰是唐吉訶德，孰是桑丘，並不重要。

14 Graciela Zamudio y Armando Butanda, "Humboldt y la botánica americana", en Leopoldo Zea y Alberto Saladino, comp., *Humboldt y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FCE, 2000, p. 51.

15 Ernesto Che Guevara, *Notas de viaje: diario en motocicleta*, Melbourne, Ocean Press, 2004, p. 25.

重新踏上阿根廷土地的那一刻起，寫日記的人已死。那個鋪陳、琢磨日記的人，「我」，已不是我；至少，內在的我已非那一個過去的我。隨意浪跡在我們「大寫美洲」上，我的蛻變超乎想像。<sup>16</sup>

切以「我們大寫美洲」(Mayúscula América)代替馬帝的「我們的美洲」。「美洲」已是專有名詞，何必強調「大寫」呢？「大寫」衍繹為「極大」之意，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何必強調「極大」呢？不是玩弄文字，而是以崇敬大地母親之心看待美洲，凸顯美洲的神聖與偉大。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已有文豪的氣勢，也有思想家的敏感心思。當年馬帝由北往南行，憂心殷殷，一路鼓吹民族自覺；切則由南向北走，馳騁於唐吉訶德式的沙塵中，在塵土飛揚的小徑上找尋前人足跡，跨越國家藩籬，延續馬帝精神，成為美洲公民。<sup>17</sup>

切的作品很多，除了隨筆、日記、書信之外，亦有文學創作。只是這些作品多為手稿，多數未出版曝光，近來在古巴切·格瓦拉研究中心的努力下，陸續付梓。切以隨筆闡述政治思想，以書信傳遞情感，以日記寫下歷史；雖然詩藝尚嫌稚嫩，但他熱愛風雅，寫詩填詞。詩是韻文，書信、日記、隨筆、小說屬敘述文；其中，書信與日記屬次文類。日記以日期排序，敘述內容含括天氣、事件、心理感受、閱讀心得、思想深處，構築出「私人世界」。一旦日記被公開之後，作者的「私人世界」則一躍成為「外表輪廓」，呈現出真實的面貌。羅蘭·巴特在〈論紀德和他的

《日記》〉中表示：

他的《日記》則是他的外表，他勾繪自己的輪廓，列示他的邊緣，閱讀、反省、敘述，顯示出這些邊緣彼此相距有多遠，紀德的外表有多麼寬廣！<sup>18</sup>

「閱讀」提供「反省」方針與「敘述」能力，關係環環相扣，構成紀德《日記》的三個要素，而這三個要素亦可在切的任何一本日記中覓得。從《日記》可以窺見紀德的思想，也可以探知二十世紀法國及歐洲的藝文界；同樣，從《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或《切在玻利維亞日記》可以窺見切的夢想與執著，也可以探知南美洲的地理、歷史、社會、經濟、人種、考古、醫療、衛生等知識：

我們只窺見聖湖的一小部分，布諾(Puno)建於岬角與湖灣接壤之處，因而擋住視野，以致無緣見識到聖湖雄偉的全貌。一艘香蒲編成的小舟漂浮在風平浪靜的湖面，幾艘漁舟划向遠處。寒風刺骨，鉛灰色的天空死氣沉沉，儼如我們的心境。<sup>19</sup>

套用羅蘭·巴特形容紀德的話：「在描繪一位詩人時，你總會發現一位博物學家。」<sup>20</sup>在切逝世四十週年之後，重新描寫他時，發現「作家」頭銜更適合切；他是日記的敘事者(narrador)，是書函的敘事者，也是隨筆的敘事者，而這個敘事者係第一人稱的「我」，是宏觀的「我」、也

16 *Ibid.*, pp. 25-26.

17 Cintio Vitier, "Prólogo", en Ernesto Che Guevara, *Notas de viaje: diario en motocicleta*, p. 11.

18 羅蘭·巴特，《寫作的零度》，台北，桂冠，1991，頁28。

19 Ernesto Che Guevara, *Notas de viaje: diario en motocicleta*, p. 94.

20 羅蘭·巴特，《寫作的零度》，頁38。

是觀察入微的「我」。「所謂敘事者就是觀察世界、體察人類，並負起保存人類記憶之責，以免任何遺漏。」<sup>21</sup>卡斯楚為《切在玻利維亞日記》作序時表示：

加入游擊隊期間，切習慣將每日的觀察詳細紀錄於個人日記中。長途行軍，山路寸步難行，叢林濕熱難耐，沉重的背包、軍備、武器將大伙壓得彎腰駝背，無論是片刻休息、抑或縱隊接獲紮營命令以結束疲憊的一天，總會見到切(古巴人一開始就以如此親密詞彙稱呼他)拿出一本小冊，以他那小到難以辨識的醫生字跡，紀錄一切重點。

爾後靠著這些筆記，切才得以編纂古巴大革命歷史，寫出一部充滿革命性、教育性以及人文內涵的精彩史實。<sup>22</sup>

顯然，切有犀利的觀察力和邏輯清晰的組織能力。「閱讀」、「反省」、「敘述」係作家必須具備的條件，也是游擊隊員應該正視的功課，正如航海家必須寫下航海日誌一般：「在這本日記裡，仔細分析每日的戰況，記下缺失、批評、反責，而這些都是革命游擊戰的必要工作。」<sup>23</sup>四次流連於加勒比海，哥倫布在《航海日誌》裡不斷以「奇妙」、「神奇」等詞彙禮讚加勒比的綺麗山水和自然生態，而成爲奇幻文學的先驅。那麼，在玻利維亞的最後日子裡，切看到了什麼？體驗了什

麼？領悟了什麼？質言之，切賦予游擊戰「革命傳奇」(leyenda revolucionaria)的美名，堅定革命信念。<sup>24</sup>《切在玻利維亞日記》儼然「黑盒子」，紀錄「本我」(sí-mismo)與「自我」(ego)的對話情緒，蘊藏訊息、喻、符號。

### 三、本我與自我

不同於佛洛伊德理論，榮格視「本我」爲心靈的整體，「自我」僅構成心靈整體的小部分；因此，「本我」引導「自我」，發展出個人的行爲模式，且完成一個人的命運，而這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就。<sup>25</sup>拯救世界是切的「本我」意識，係魂縈夢牽的使命，也是切的人道思想。於是他完成醫學院學位，懸壺濟世；他也投入游擊戰，爲正義而戰。人子、人父、醫生、同志、游擊隊員，甚至一介平民，皆爲切的「自我」。

一九五六年二月，卡斯楚委託巴優(Alberto Bayo)<sup>26</sup>於墨西哥城外的聖塔羅莎(Santa Rosa)農莊培訓大鬍子游擊隊。同年六月，因墨西哥政府的查緝而被迫中斷；十二月，這群大鬍子返回古巴展開游擊戰。本爲卡斯楚的隨軍醫生，然而，受到槍林彈雨的洗禮，以及「本我」的作祟，切寧願捨棄藥箱，改拿步槍：

一名同伴掉了一箱子彈在我的腳邊，我提醒他，清晰記得當時他以焦慮的表情告訴我，現在無法顧及子

21 José Jiménez Lozano y Gurutze Galparsoro, *Una estancia holandesa conversación*, Barcelona, Anthropos, 1998, p. 11.

22 Fidel Castro, "Una introducción necesaria", en Ernesto Che Guevara,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Melbourne, Ocean Press, 2006, p. 11.

23 *Ibid.*, p. 12.

24 在日記裡，切數次以「革命傳奇」代替玻利維亞民族解放游擊戰。

25 Franz M.L. von, "El proceso de individuación", en Carl G. Jung, et al., *El hombre y sus símbolos*, Barcelona, Paidós, 1995, pp. 161-162.

26 巴優曾投效西班牙第二共和，官拜上校，於西班牙內戰期間(1936-1939)表現英勇，不只爲卡斯楚訓練游擊隊，爾後也被尼加拉瓜桑定主義游擊隊尊爲榮譽將軍。



彈/……/或許那是第一次必須面臨抉擇，到底要盡醫生天職？還是履行革命軍的義務？眼前有一袋藥品及一箱子彈，兩樣同時背負，太過沉重，無法行動，最後我拿起子彈/……/ 27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由切與西宴佛耶哥斯(Camilo Cienfuegos)所指揮的縱隊於聖塔克拉拉(Santa Clara)一役大勝，為古巴武裝起義劃下完美句點，卻為切的往後人生掀起高潮。切受到古巴人民的愛戴，隨之進入卡斯楚政府的核心，英雄光環令他沉浸於「本我」而忘記「自我」。一九六五年四月，切告別卡斯楚與古巴，到剛果組織解放游擊戰。<sup>28</sup>他給卡斯楚的告別信中有一段話：「世界其他地方召喚我貢獻微薄力量。你必須擔負領導古巴的重責大任，但我可以做你所不能做的工作，因此，我們分別的時刻到了。」<sup>29</sup>對父母，他將自己比擬為唐吉訶德，游擊隊員成了追夢者：「我的腳跟再一次碰到驚駭難得的肋骨，我執起盾牌，重上征途。」<sup>30</sup>不論是游擊隊員、抑或追夢者，給卡斯楚及雙親留書裡的「我」乃「本我」，一個超越血肉之軀的切，象徵理想主義的切。同樣，給五名子女的留書，切依舊不忘強調「本我」精神，只是滿懷理想的吉訶德變成了語重心長的理論家，藉由「第二人稱」凸顯「本我」的存在：「特別要記得世上任何角落皆存在著不公不義，而你們必須培養敏銳觀察力，以察覺不公不義。這是一個革命分子最美麗的特質。」<sup>31</sup>

然而，沙場爾虞我詐，切並非出身行伍，光憑數個月的軍事訓練以及兩年的實戰經驗應不足以應付。果真，切深陷剛果混亂局勢八個月，最後鐵羽而歸。沒有立即返回古巴，切滯留於古巴駐坦桑尼亞大使館。沉潛期間，切翻閱剛果日誌，分析革命失敗原因，並書寫《剛果革命戰爭實錄》(*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 Congo*)。對於這場徒勞無功的革命，切毫不諱言：

這是一部失敗的歷史。原因來自於戰爭眾多事件中的一個小細節，因此，基於公民精神，必須針對戰事提出批評。若本書有一絲重要性的話，吾人認為將可作為下次革命的殷鑑。勝利是正面經驗的泉源，失敗亦同，特別是非凡的戰爭情境：參與者及情報人員均外國人，他們甘冒生命危險，深入一片陌生且語言不通的土地，僅賴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牽線，即展開一場從未經歷過的現代解放戰爭。<sup>32</sup>

從文字中不斷省察改進，切最後決定重新出發。一九六六年七月，重返古巴，與卡斯楚短暫會晤後，切旋即集訓自己的游擊隊員，接著轉往玻利維亞山區，試圖以自己最熟悉的拉丁美洲為基地，將革命思想傳播至世界各地。十一月七日，切抵達玻利維亞的良加瓦蘇(Ñacahuasú)，一如往昔，拿起行事曆，以飄逸潦草字跡滿心歡喜寫下第一句話：「今日展開新里程。」(07/11/66)<sup>33</sup>

乍看之下，《切在玻利維亞日記》是一本普通

27 Ernesto Che Guevara, *Obras escogidas*, 1959-1967, vol. I, La Hab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2001, p. 199.

28 一九〇八年剛果遭比利時併吞；一九六〇年獨立，稱剛果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Congo)；一九七一年改名薩伊(Zaire)；一九九七年以降，正式國名為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29 Ernesto Che Guevara, *Obras escogidas*, 1959-1967, vol. II, p. 697.

30 *Ibid.*, p. 693.

31 *Ibid.*, p. 696.

32 Ernesto Che Guevara, *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 Congo*, México, Grijalbo Mondadori, 1999, p. 35.

33 Ernesto Che Guevara,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p. 35.

的紀事，每天紀錄生活瑣事與作戰點滴，日復一日，內容一直記載到被捕的前一夜(1967年10月7日)。詞句簡單扼要，甚至僅寫下一句話(1967年5月15日)，偶而也有長篇記載，並於每個月底提出該月省思。此外，日記裡有些字跡無法判讀，若再加上文字曖昧不清，讀者必須仔細推敲，才得以理解其意義。誠如卡斯楚所言，這本日誌的寫作初衷並不是為了出版，而是作為日後不斷評估事件、情勢、人物的工具；<sup>34</sup>只是切沒有機會回顧這本作戰手札，再加以補述或潤色，更無法再度省思，對游擊戰略提出忠告與建議，重新謄寫出驚心動魄的《玻利維亞革命戰爭實錄》。因此，不同於《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古巴革命戰爭實錄》、《剛果革命戰爭實錄》，《切在玻利維亞日記》成為最原始、最真誠的敘述，也是切生命最後幾個月的英雄詩篇。

「我」不只是文法上的第一人稱、或是文學上的第一人稱敘事者，「我」還是一個有趣的哲學辨證。笛卡兒為後人留下「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經典名言，而蒙田(Montaigne)則在他的《隨筆》(Essais)序言裡強調「吾人即吾書中的素材」；<sup>35</sup>換言之，「我」是思想主體、存在實體、既是主詞(yo)、亦為受詞(me)。對切而言，日記除了紀錄與反省等功能之外，也強調「我」的存在意義，因此，「我寫故我在」。無論是生活瑣事、抑或作戰點滴，簡短文句不僅透露出書寫時的複雜心情，同時窺見「本我」與「自我」之間彷彿經紗緯線不斷交織，構成一個真實的切。

仿倣當年「葛拉瑪」(Granma)號航向未知，十七名游擊隊員踏上茫茫解放之路；也仿倣當年大鬍子游擊隊死後重生，切天真以為可以號召成千上萬的玻利維亞農民，共同投入玻國民族解放之戰。起初，日記的筆調輕盈，顯示信心滿滿：

晚上我們抵達莊園，一路上旅途順利。喬裝得宜，抵達科恰彭巴(Cochabamba)之後，巴丘哥(Pachungo)與我碰面，我們便搭乘二部吉普車，再走二天的路程。

快靠近莊園時，我們就停車，改為兩人共乘一部吉普車，以免附近某個業主起疑，不過他還是喃喃自語，認為我們從事古柯鹼生產。(07/11/66)<sup>36</sup>

在古巴大革命期間，切從醫生角色的「自我」變成縱隊司令的另一個「自我」。為了持續游擊隊員生涯，切刮掉鬍子，剪短頭髮，喬裝成一名禿頭的烏拉圭商人，以利入境玻利維亞，成就「本我」：

我的頭髮漸漸長了，雖然稀稀疏疏，原本的白髮不見了，反而變成金色，鬍鬚也長出來。再過二個月，就會變回那個我。(12/11/66)<sup>37</sup>

日記中的「我」有雙關語，是大鬍子游擊隊的切，也是執著於解放之戰的切。隨著時間流逝，雖然外觀恢復，但是事實與理想之間出入很大。一連串的棘手問題接踵而至：游擊隊之間心結未解，古巴人與玻利維亞人不甚和睦；人員不斷犯錯，即使自己親自挑選的古巴游擊隊員亦失誤連

34 Fidel Castro, "Una introducción necesaria", p. 12.

35 Michel de Montaigne, Dedicataria "Al lector", en *Ensayos*, vol. I, Madrid, Cátedra, 1993.

36 Ernesto Che Guevara,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p. 35.

37 *Ibid.*, p. 38.

連；玻利維亞游擊隊員似乎不熱衷戰事，軍心渙散；切的民族解放游擊隊與玻利維亞共軍漸行漸遠，造成日後切孤軍奮鬥；無法招募玻國農工階層全力投入革命，因此游擊隊人數最多不過五十，一路流失，到切被捕前夕只剩十七人。一開始是十七人，被捕前也是十七人，實在無法與古巴大革命相提並論。

我與馬可斯(Marcos)談過了，他抱怨我不該在玻利維亞人面前指責他的過錯。他的爭辯站不住腳，除了他的情緒狀態值得關照外，其他則不值得一提。(13/01/67)<sup>38</sup>

人員精神頹廢，身體狀況也一天比一天差；我的雙腳也開始浮腫。(04/03/67)<sup>39</sup>

一切看來混亂不堪，他們竟然不知該做什麼。(20/03/67)<sup>40</sup>

在印第(Inti)尚未向我報告之前，我已發現馬可斯犯了一連串的錯誤，我對馬可斯說，他將被逐出游擊隊。他卻答說，他寧願被槍斃。(22/03/67)<sup>41</sup>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切展開玻利維亞第一場游擊戰，戰績輝煌，一掃軍心渙散的陰霾。「本我」持續發酵，幻想創造出另一個令美軍灰頭土臉的越戰：

美國宣稱，派遣至玻利維亞的顧問團乃屬舊計畫，與游擊隊無關。也許我們正在譜寫新越南的第一個樂章。(13/04/67)<sup>42</sup>

事實上，勝利的喜悅並未持續太久，自四月起，游擊隊員一個個殞落。日記披露切的不安，字裡行間略見頹敗氛圍；但是，切似乎不願承認，依然執著於理想。六月十四日，正是切三十九歲生日，同時女兒西莉亞(Celia Guevara March)滿四歲，他在日記上寫下：

小西莉亞(四歲?)

我們在寒冷中渡過一天，戰火隨踵而至，期盼兩名哨兵米蓋爾(Miguel)及烏巴諾(Urbano)的消息。

/……/

這個應該思索游擊隊員未來的年紀，終於殘酷來臨，至少目前我「身心健康」。(14/06/67)<sup>43</sup>

切以「entero」(身心健康)一字表示堅定不移。滿懷偉大理想的「本我」終究不敵現實的「自我」，英勇游擊隊員畢竟是血肉之軀，難免有病痛。切自幼患上氣喘病，不論在古巴大革命中出生入死、或深陷剛果叢林、或在玻利維亞山區裡生寄死歸，這個宿疾如影隨形，一直伴隨著他。

對我而言簡直是黑色日子，必須用力呼吸，就快要喘不過氣了。(23/02/67)<sup>44</sup>

---

38 *Ibid.*, p. 67.

39 *Ibid.*, p. 96.

40 *Ibid.*, p. 106.

41 *Ibid.*, p. 108.

42 *Ibid.*, p. 127.

43 *Ibid.*, p. 166.

44 *Ibid.*, p. 89.

我的氣喘病發作了。(07/07/67) 45

疾病的折磨乃小事一樁，即便軀體死亡，但革命理想不會隨之煙滅灰燼，這也是為何切以「entero」一字來形容自己。如此執著於革命理想可溯及第二次美洲之旅，當切於一九五四年行走至瓜地馬拉之際，親眼目睹美國協助叛軍推翻亞本茲(Jacobo Arbenz Guzmán)政府，因而萌起反美國帝國主義思想，也興起社會改革信念。46 古巴大革命的勝利無疑給他打了一劑強心針，更加確定以游擊戰對抗不義的決心。

切認為，游擊戰乃群眾戰爭，是一種鬥爭方式，一種達到目的的方法，為每一位革命者必備的課題，雖不是推翻獨裁的唯一道路，卻是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最有效的作法。47在玻利維亞山區的最後兩個月，死亡陰影漸漸籠罩，切依然堅持「本我」。為了鼓舞士氣，他向隊員精神講話，並在日記寫下：

必須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刻終於來臨了，游擊戰乃訓練我們成為革命家的機會，革命家係人類的最高境界，是脫胎換骨的必經之道；若無法達到這兩項理想，那麼就自己承認，並退出游擊隊吧！(08/08/67) 48

對於這段話，卡斯楚在〈必要序言〉(“Una introducción necesaria”)裡再度提及，甚至日後研究切的思想的學者亦不斷引用。一個矢志不移的游擊隊員，注定馬革裹尸。一九六七年十月七

日，切被捕前夕，他在日記上寫了些什麼？

從展開游擊戰至今已滿十一個月了，戰局不複雜，還頗有田園味道；十二點三十分，一名牧羊老嫗將羊群趕進我們所紮營的砲彈區，必須逮捕她。老嫗並未提供任何有關政府軍的可靠消息，她表示什麼都不知道，說她已好一陣子沒路過那裡了。老嫗提供了一些山路資訊，從她的口中，得知我們大約距無花果村(Higueras)一里格(legua，為西班牙里，相當於5.5公里)，也距哈固艾伊(Jagüey)一里格，離布卡拉(Pucará)約二里格。十七點三十分，印弟、安尼西多(Aniceto)、巴布里多(Pablito)陪老嫗回家，家中一個生病的女兒，一個半侏儒；弟兄們給了她五十塊披索，要求不準吐露半點口風，但對老嫗是否信守承諾卻一點把握都沒有。我們十七人在慘淡月色下行走，疲憊的走著，我們在砲彈紮處留下太多行蹤了，附近沒有住家，只有引自溪澗灌溉的馬鈴薯田。凌晨二點我們停下來休息，因為再前進毫無益處。一旦必須夜晩行軍，艾爾奇諾(El Chino)便成為真正的負擔。

軍方發布一個奇怪的消息，宣稱在西拉諾(Serrano)部署二百五十名士兵，意圖圍堵附近的通道，以防止三十七名革命軍逃脫。軍方又說我們藏身於亞西羅(Acero)河和歐羅(Oro)河之間。

這個消息似乎故意聲東擊西。

海拔二千公尺。(07/10/67) 49

這是切的最後文字，也是一篇富含「時間」的敘事文。文本裡的時間一開始顯得倉促，由過去

45 *Ibid.*, p. 182

46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四年間，瓜地馬拉在亞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 Bermejo)和亞本茲的治理下，初現民主曙光，因而被歌頌為十年春天。後來因亞本茲進行土地改革，動及美國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經濟利益，導致美國國務院、中情局與聯合水果公司聯手，策劃推翻亞本茲政權。從此，瓜地馬拉十年春天的民主神話成為絕響。

47 María del Carmen Ariel, *Che: pensamiento político*, La Habana, Editora Política, 1993, pp. 62-63.

48 Ernesto Che Guevara,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p. 200.

49 *Ibid.*, pp. 243-244.

的十一個月匆匆飛馳至當下。筆鋒一轉，時間刻意眷戀當下，速度十分緩慢，藉由「十二點三十分」、「十七時三十分」、「凌晨二點」刻劃冗長的日子。登上「海拔二千公尺」，切就在「慘淡月色」下完成這天的日記；但是，他體會出風雨前的寧靜？還是依然沉浸於理想主義？想必讀者各有定論吧！

《切在玻利維亞日記》儼然一部安地斯山區版的《奧德賽漂流記》，勾勒切的輪廓、陳述一舉一動。孰料，主人翁遭逢不測，雖然漂流(流浪)因此畫下休止符，卻由「作戰日記」轉變成「命運紀錄」。日記的時間雖為線性，卻有豐富的節奏；文本的演展雖為日常生活紀要，卻充滿戲劇張力。羅蘭·巴特曾表示，紀德的《日記》不再屬於他，不僅開始超越他，且朝向獨立作品的境界。<sup>50</sup>同樣，切的任何一本日記亦不再屬於他個人的紀錄。切並非刻意雕琢文字的藝匠型「作家」，他的日記亦非「文學日記」；但是，他個人創造歷史，也書寫歷史，並闡述理念，再者，日記涉及特定時間、空間、事件以及人物，已不能視為單純的「個人隨筆」，應昇華至眾人的「集體記憶」。

#### 四、結語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切一行人於裘羅峽谷遭埋伏，切的右腿中彈，M-2步槍壞了，手槍子彈用完，只好束手就擒。被逮捕後，玻利維亞軍方打開他的背包，裡面有：十二捲底片、二十張地圖、一個手提收音機、二本行事曆、一本綠色

筆記本。<sup>51</sup>二本行事曆引起玻國極大騷動，影本後來輾轉送到卡斯楚手中，並出版為《切在玻利維亞日記》。至於那一本綠色筆記本則無人青睞，筆記裡一樣布滿切那小到難以辨識的筆跡，抄寫了巴耶荷(César Vallejo)、奇彥(Nicolás Guillén)、聶魯達(Pablo Neruda)、菲利浦(León Felipe)等偉大詩人的作品，共計六十九首。為何有這麼一本筆記呢？切進行游擊戰時，除了軍備外，總會準備一些書籍；據信，為了減輕背包重量，切抄下詩作，以利朗讀。玻國軍方查閱筆記後，認為無關軍情而隨意丟棄。四十年後，這本綠色筆記本終於曝光，由墨西哥西伊巴拉爾(Seix Barral)出版社付梓，題為《切的綠色筆記本》(*El cuaderno verde del Che*)，讓讀者更認識切的文學修養。當年在馬艾斯特拉山區有《歌德》相伴，在玻利維亞山區則有「詩選」相隨，陪他渡過生命的最後日子。

切的傳記早已汗牛充棟，相關紀錄片、商業電影、報導紛紛出籠，文學界熱烈探討他著作中的哲學思想，音樂界亦不忘歌誦他的生命傳奇。在「商品化」與「神格化」的推波助瀾下，世人似乎過於強調切的傳奇，雖不至忽略他的革命理念、哲學思想，卻鮮少探討其文學素養。被定位為革命家、思想家，切的思想隨筆陸續出版，作為革命圭臬，重要的日誌、書信也不遑多讓，亦被譯成多國語言。然而，他作詩、寫文評、創作短篇小說，只是這些文學作品多數未曝光，導致其文學天賦被政治風采掩蓋。傳記作家戴伊波(Paco Ignacio Taibo II)為《切的綠色筆記本》作

50 羅蘭·巴特，《寫作的零度》，頁28。

51 Paco Ignacio Taibo II, "Los diarios", en *El cuaderno verde del Che*, México, Seix Barral, 2007, p. 9.

了五篇序文，不斷提及切係詩作愛好者，其中第三篇，戴伊波以〈詩人切〉（“El Che poeta”）之標題，說明了切的詩藝創作歷程。<sup>52</sup>

回顧短短三十九年歲月，切在動靜之中譜寫生命樂章。所謂「動」係指他身體力行：遊歷美洲，加入古巴大革命，出任古巴國家銀行總裁、工業部長，到剛果、玻利維亞傳遞革命思想。「靜」則指他大量閱讀、不斷反省、勤於書寫，每次有所作為後即埋頭伏案，以文字闡述思想與理念。走走停停、打打殺殺、讀讀寫寫。誠如卡斯楚回憶切時所言：「戰士可以身亡，但是理念不滅」，<sup>53</sup>切留給世人的記憶，不該只是摩托車之旅的青春日記，也不只是煙塵繚繞的游擊戰生涯，更不只是一張張暫停於三十九歲的英雄容顏，而是一冊冊充滿人道主義的思想文字。拋開游擊隊員的圖騰，作家的身份似乎更適合切。★



攝影/Lucía Chen

圖為《切的綠色筆記本》、《剛果革命戰爭實錄》《古巴革命戰爭實錄》。

52 Paco Ignacio Taibo II, “El Che poeta”, *op. cit.*, pp. 19-21.

53 Fidel Castro, *El Che en Fidel Castro*, La Habana, Editira Política, 1998, p. 194.

## 參考資料

### 一、外文部分：

- ANDERSON, Jon Lee, *Che Guevara: una vida revolucionaria*, Barcelona, Emecé Editores, 1997, 704 págs.
- ARIET, María del Carmen, *Che: pensamiento político*, La Habana, Editora Política, 1993, 169 págs.
- CASTRO, Fidel, *El Che en Fidel Castro*, La Habana, Editora Política, 1998, 222 págs.
- CORMIER, Jean, *La vida de Che: mística y coraje*,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1997, 368 págs.
- DEUTSCHMANN, David, ed., *Che en la memoria de Fidel Castro*, Melbourne, Ocean Press, 1998, 206 págs.
- GUEVARA, Ernesto Che,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La Habana, Instituto del Libro, 1968, 346 págs.
- ,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La Habana, Editora Política, 2004, 428 págs.
- ,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México, Siglo XXI, 2005, 286 págs.
- ,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Melbourne, Ocean Press, 2006, 291 págs.
- , *Notas de viaje: diario en motocicleta*, Melbourne, Ocean Press, 2004, 168 págs.
- , *Obras escogidas, 1957-1967*, 2 vols., La Hab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2002.
- , *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 La Hab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2002, 199 págs.
- , *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 La Habana, Editora Política, 2006, 362 págs.
- , *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 Congo*, México, Grijalbo Mondadori, 1999, 347 págs.
- , *Socialismo y el hombre en Cuba*, México, Siglo XXI, 2003, 429 págs.
- KORDA, Alberto, *Diario de una revolución*, Pisa (Italia), Edizioni Aurora, 1997, 77 págs.
- JIMÉNEZ LOZANO, José, y Gurutze Galparsoro, *Una estancia holandesa conversación*, Barcelona, Anthropos, 1998, 151 págs.
- JUNG, Carl. Gustav, et al., *El hombre y sus símbolos*, Barcelona, Paidós, 1995, 320 págs.
- MEDINA, Néstor, *¿Te acordás, Che comandante?*, México, Ediciones y Gráficos Eón, 2007, 168 págs.
- MONTAIGNE, Michel de, *Ensayos*, 2 vols., Madrid, Cátedra, 1993.
- NERUDA, Pablo, León Felipe, Nicolás Guillén y César Vallejo, *El cuaderno verde del Che*, México, Seix Barral, 2007, 179, págs.
- SANDISON, David, *Che Guevara, Barcelona*, Ediciones B, 1997, 160 págs.
- S/A, *Selfportrait: Ernesto Che Guevara*, Melbourne, Ocean Press, 2005, 305 págs.
- TAIBO II, Paco Ignacio, *Ernesto Guevara también conocido como El Che*, Barcelona, Planeta, 1998, 849 págs.
- ZEA, Leopoldo, comp., *Fuentes de la cultura latinoamericana*, 2 vols., México, FCE, 1993-1995.
- ZEA, Leopoldo, y Alberto Saladino, comp., *Humboldt y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FCE, 2000, 138 págs.

### 二、中文部分：

羅蘭·巴特，《寫作的零度》，台北，桂冠，1991，286頁。

# 格瓦拉的英雄圖像：兩岸之比較

向駿 致理技術學院副教授

二〇〇〇年四月起史詩劇《切·格瓦拉》在北京、廣州、上海等地演出造成轟動，被媒體形容為「席捲中國社會、思想界的紅色風暴。」劇中如下的對話似乎把兩岸給聯繫在一起了：

正C：沒有古巴人們站立起來，美國會在經濟上給拉丁美洲小恩小惠麼？

反甲：有這事兒？

正A：沒有中國人民站立起來，蔣介石集團會在台灣實行土地改革麼？

二〇〇五年兩岸陸續有不少與這位死於玻利維亞的阿根廷籍悲劇英雄相關的活動。年初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在台灣上映，四月大陸作家出版社推出由師永剛和詹涓編著的《切·格瓦拉畫傳》，半個月售出五萬冊，七月台灣聯經發行該書繁體字版一個月內銷售衝破八千本。果實出版社則於六月出版由陳小雀所著《古巴一切的最後歸鄉》一書。

今年不只是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

遇難四十週年，也是華人移居古巴一百六十週年。一八四七年六月三日一艘西班牙船載運了二百六十名所謂「契約華工」抵達古巴，據統計，自一八四七至一八七四年間，古巴有十四萬一千名華人，佔當時人口十分之一，第一個華僑社團「結義堂」於一八六七年在哈瓦那成立。古巴於一八六八至一八七八年的第一次獨立戰爭，以及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的第二次獨立戰爭中，均有全由華人組成的部隊。古巴獨立英雄德給薩達將軍(Gonzales de Quesada)對華人曾有如下的讚譽：「在古巴獨立戰爭中，沒有一個華人當逃兵，沒有一個華人做叛徒。」而在格瓦拉和卡斯楚兄弟共同推翻巴蒂斯達(Fulgencio Batista)的革命中，亦有數百華人參加游擊隊，其中三位後來晉升將軍的分別姓蔡(Armando Choy)、徐(Gustavo Chui)和王(Moises Sio Wong)。<sup>1</sup>

此一歷史巧合和上述《切·格瓦拉》史詩劇中的對話挑起了我比較兩岸對格瓦拉看法的念頭。誠如一九九七年格瓦拉的遺骸在玻利維亞被發現運回古巴後，卡斯楚在聖塔克拉拉發表的紀念演

<sup>1</sup> 陳之獄，〈古巴華人沒有一個是逃兵〉，《亞洲週刊》，2007年9月2日，頁22-23。

Armando Choy, Gustavo Chui, and Moises Sio Wong, *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y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 Pathfinder Press, 2006.



說中所說：「他怎麼可能只存在於紀念碑下？他怎麼可能只限於在此廣場之內？他怎麼可能只僅屬於我們鐘愛的古巴小島？只有他夢想、生活、並為之戰鬥的全世界，才夠寬廣地容納他。」<sup>2</sup>而兩岸對格瓦拉則有褒有貶。

先看大陸，身為中國國家一級編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的陸天明在探討「士」和文學的關係時曾謂，「我這裏說的『士』的精神，是指中國知識份子的優秀傳統。也就是，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應堅持做自己的事，要有定力，而不要被各種各樣的是非所左右。…我再舉一點拉美文學的例子。拉美出過世界級的大詩人大作家。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許多人也許不知道，這些大詩人大作家幾乎都曾經是他們國家出色的革命家，而絕不是只顧自己寫作的「書呆子」。比如卡彭鐵爾曾擔任過古巴革命政權的宣傳部長，荷西·馬帝、胡安·魯爾弗、略薩、亞馬多、普伊格等人都有過革命家的身份和馬克思主義的背景，其中不少作家本身就是共產黨員。我們還可以看到，離開玻利瓦省、阿燕德、格瓦拉、卡斯楚、查維茲等這些革命家的活動，就無法理解拉美文學。拉美文學的重要遺產之一，就是政治介入性，拉美文學整體上是對社會、對拉美、對整個世界的介入。」<sup>3</sup>

然而，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張耀杰則指出，「筆者並不知道，格瓦拉帶領「十七位古巴革命者」前往玻利維亞時，是不是也進行了相關的加入玻利維亞國籍的法律手續？有一點卻是肯定的，格瓦拉到玻利維亞「輸出革命」既沒有得到

玻利維亞政府的認可也沒有得到玻利維亞「人民」的歡迎。按照話劇《切·格瓦拉》的說法，「這些壓在最底層的人民被舊世界剝奪了一切，包括看到自己根本利益的機會。他們非但不願支持格瓦拉游擊隊，反而向政府軍告密。」即使按照社會主義中國現有的外交政策來比照，格瓦拉的這種以正義自居的「輸出革命」也絕對是一種非法的侵略行徑，其性質顯然要比美國導彈轟炸中國大使館嚴重得多。」<sup>4</sup>

再看台灣，二〇〇五年二月「台灣北社」曾在「壯大主流民意 捍衛台灣價值一二二八全國大動員緊急呼籲」中寫到，「廿世紀最偉大的革命家切·格瓦拉曾說：「真正的革命家，不是等待革命形勢的到來，是去開創革命形勢。」所以我們要向所有熱愛這塊土地的同胞們呼籲：最壞的形勢，就是開創者最好的形勢。台灣要成為正常國家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們不要氣餒也不要失志，大家回到戰鬥位置，繼續努力，繼續匍匐前進吧！我們不達到目的，絕不中止！」

就出版《切·格瓦拉畫傳》的聯經發行人林載爵而言，對格瓦拉最嚴厲批評應屬陳述他被槍決時現場目擊者的證詞，說他並非慷慨就義，而是懇求「不要射殺我，我是切，我活著比死對你更有價值」，當然這是無法獲得證實的。一個英雄本來就有神話與真實兩種面貌，格瓦拉也是同樣的情況。<sup>5</sup>儘管如此，格瓦拉在世人面前至少呈現了以下的特殊圖像。

其一他有悲天憫人的情懷。《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的主題曲「河的那一邊」(Al Otro Lado

2 卡斯楚(黃裕美、樂為良譯)，《切：卡斯楚的回憶》，台北，立緒文化公司，2006年12月，頁222。原著David Deutschmann, ed., *Che: A Memoir by Fidel Castro*, Ocean Press, 2006.

3 陸天明，〈文學的二次回歸與『士』的精神〉，《人民日報》，2007年3月19日。

4 張耀杰，〈《切·格瓦拉》：中國化的革命基督與基督革命〉，《大紀元》，2001年3月4日，原載《中國之春》。

5 林載爵，〈英雄的兩面：神話與真實〉，《聯合報》，2006年7月31日。

del Río)在二〇〇五年奧斯卡影展中獲獎因為「河的那一邊」住著很多麻瘋病患，但格瓦拉卻不顧自己的氣喘宿疾，從河的這一邊游泳到「河的那一邊」。

其二他是忠於革命的悲劇英雄。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下午四時許，幾個士兵進入格瓦拉的囚室，一陣射擊後格瓦拉當場死亡。其屍首運回拉巴斯驗明正身後，開放了很短的時間給攝影記者拍照。然而，「玻利維亞軍方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定沒想到，讓格瓦拉的遺體拍照，已替廿世紀創造了一個具有耶穌形象的受難英雄。」<sup>6</sup>

其三他有反抗強權的執著。當摩托車之旅經過秘魯時格瓦拉對印加文明的發源地一庫斯科有如下的描述：「當西班牙軍隊掠奪這個戰敗的城市時，他們把怒火發洩到印加神殿上，這一方面是要滿足他們對黃金的貪婪，也要滿足他們一種虐待狂的樂趣，就是要把一個憂傷民族的快樂…的象徵，轉換成一個快樂民族的憂傷偶像」。

就悲天憫人的情懷看，近一個世紀來，台灣新莊某山丘之所以無人聞問、宛如禁域，因為那裡曾居住著一千多名的麻瘋病患。近年來因台北捷運公司的迴車場工程才使其再度受到媒體的關切，但坐在特製輪椅上的七十多歲老病患對政府強制拆除他們一輩子賴以維生的家園豈有招架之力？園外的台灣本土政權雖早已取代了日本和國民黨政權，但園內麻瘋病患宣稱只認同「麻瘋共和國」，只想安心終老葬在他們專屬的靈骨塔裡。<sup>7</sup>

若就英雄形象看，儘管他被認為「是一個真正將信念變成勇敢行動的人，艱難困苦和名利都不能腐蝕他的意志，阻止他前進的步伐，」<sup>8</sup>但，

《切·格瓦拉》編劇之一的黃紀蘇卻認為下面這段對革命的質疑頗具代表性，「所有的革命者都說要帶領人民走向天堂，結果卻把他們引進了地獄，包括格瓦拉、馬克思等人。「文化大革命」也犯了很多錯誤，兒女反對父母，母親出賣孩子，這是人性的墮落。我覺得改造社會應該用改良的辦法而不是革命。」<sup>9</sup>

從國際正義看，其實直到今日西方國家對拉美的壓迫仍然存在，只是手法更精緻些。二〇〇五年九月在墨西哥舉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學家協會第九屆大會中，該協會主席曾說，「西方國家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進行的新自由主義試驗加劇了這個地區的依賴、不平等和資本化的混亂…美洲從來沒表現出今天這樣的脆弱性…在拉美地區有九千六百萬人生活在貧困狀態。」「自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開始，我們就越來越受剝削，被排斥在發展之外。」<sup>10</sup>令人鼓舞的是，就在格瓦拉遇難「三十九年之後，烏托邦偏偏在格瓦拉選中的地方以現實的形式上演。一個中學都沒有讀完的印第安土著總統，上任半年，就火急火燎地跑到格瓦拉殉命的無花果村，以國家元首的身份為昔日的遊擊隊恐怖分子隆重紀念七十八歲生日。」<sup>11</sup>他就是玻利維亞的印第安土著總統莫拉雷斯(Evo Morales)。

從以上的現實狀況不難理解何以南方朔在

6 南方朔，〈20世紀的悲傷浪漫英雄〉，《切·格瓦拉畫傳》，聯經出版社，2005年7月，頁10。

7 胡晴舫，〈麻瘋共和國〉，中國時報，2005年8月31日。

8 劉承軍，〈切·格瓦拉與他的「新人」思想〉，《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6期，頁34。

9 劉智峰(主編)，《切·格瓦拉：反響與爭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117-118。

10 〈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加劇拉美的混亂〉，《人民日報》，2005年9月22日。

11 索颯，〈切·格瓦拉犧牲紀念日—三十九年後的致敬〉，《讀者》，2006年10月19日。

《切·格瓦拉畫傳》一書的序言中會認為，「在這個世界復歸野蠻，大國任意凌辱弱國，而且可以炮製假證據肆意侵略的時代，難道像格瓦拉這樣的人不應該更多一些嗎？」他甚至認為「拉美的左翼化，在玻利瓦將軍及切·格瓦拉的精神引導下正在加速進行中。」<sup>13</sup>

## 格瓦拉在臺灣

《廿世紀最後革命家：切·格瓦拉》一書作者楊碧川在自序中指出，「格瓦拉是一個平凡的阿根廷人，他的詩寫得相當粗糙、他的學問沒什麼系統可言，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如說是對革命浪漫的衝動。這樣一個醫學院畢業的醫生，如果生長在臺灣，一輩子絕對不會浪漫地去為別的國家的人打游擊，最後慘死在雲深不知處的高山峻嶺中。格瓦拉可以像其他醫生一樣，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與傲人的社會地位，但他卻選擇了一條不歸路—革命。對被壓迫大眾的關懷，在臺灣人的醫生是一種驕傲的施捨；為被壓迫者去搞革命，在臺灣人的心目中是瘋子。並非臺灣知識份子沒有過浪漫的情懷，只是現實告訴他一這等傻事讓那些沒讀書的人去幹，等到他們快要成功的時候再臨門一腳，奪取他們的革命成果，篡改歷史就夠了。這是幾十年來臺灣知識份子的卑劣，誰都可以拿「二二八」當藉口，誰都可以說國民黨太可怕了，誰都可以說不要激怒中共。…撰寫這本小書的目的，除了回應十八年前的約定外，也同時批判臺灣的反動御用文人：別以為只有你們擁有解釋權，革命者的人格不容你

們這些狗奴才去污蔑的！」他認為「死，死道友，不可死貧道」，是臺灣知識份子最無恥的藉口。<sup>14</sup>

該篇序文完稿於二〇〇〇年三月五日，全書於同年八月出版，亦即台灣首次「政黨輪替」之後。可惜楊碧川當時未能指出他想「批判台灣的反動御用文人」是那些人？那些「狗奴才」又是如何利用解釋權去污蔑「革命者的人格」的？而他認為「死道友，不可死貧道」的「台灣知識份子」又是那些人？果能如此當能讓更多人瞭解台灣曾經如何看待、曲解、利用格瓦拉。

前述《切·格瓦拉》一劇曾有如下的獻詞：「請相信這個因窮人的情誼而感動不已的人，請相信這個靠窮人的祝福而跋涉不停的人，請相信這個為窮人的將來而告別過去的人。」如果這段獻詞是真心的，台灣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中似乎看不到格瓦拉的影子。

以貧富差距為例，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受僱者勞動報酬最高的前五分之一與最低的後五分之一，兩組間的差距十餘年來一直呈現擴大之趨勢。一九九四年為7.1倍，至二〇〇三年攀升為11.67倍，即使換算成家戶可支配所得的差距倍數，兩組之間也高達6.07倍，明顯高於過去四至五倍之間的水準。<sup>15</sup>根據二〇〇七年的「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二〇〇六年家庭年可支配所得超過二百五十萬元的三十六萬戶比前一年大增6%，增加幅度遠高於家庭總戶數2%的年增率。顯示台灣新富家庭「贏家通吃」的態勢明顯，累積財富速度愈來愈快。亦即

12 南方朔，〈20世紀的悲傷浪漫英雄〉，《切·格瓦拉畫傳》，聯經出版社，2005年7月，頁15。

13 南方朔，〈拉美左翼的機會與考驗〉，《亞洲週刊》，2007年10月21日，頁6-7。

14 楊碧川，〈自序〉，《20世紀最後革命家：切·格瓦拉》，大作出版社，2000年8月，頁33-35。

15 〈貧富差距擴大是誰造成的？〉《自由時報》(社論)，2005年7月15日。

前所未見的浮華世界正在台灣迅速擴張中。<sup>16</sup>

另根據二〇〇五年一項跨國企業薪酬趨勢調查報告，在受調查的十四個亞太國家中，台灣的勞務薪資成長率僅0.08%，是十四個國家中的最後一名，顯然國內勞工的所得近年來處於停頓狀態幾無增加。<sup>17</sup>但前財政部長林全卻發現全台前四十大企業所有者有八人一毛錢稅都沒繳，導致不論是長期、短期，台灣的金融痛苦指數都是亞洲十國裡最高的。<sup>18</sup>二〇〇七年九月國際勞工聯盟公佈，五年來台灣勞工的薪資幾乎原地踏步，平均時薪提高不到1%，幾近零成長。另根據從事人力資源調查的跨國公司萬寶華（Manpower）所公佈二〇〇七年第四季全球就業展望調查，台灣在亞太地區八個國家中墊底，是亞太地區聘僱需求最弱的國家。<sup>19</sup>但「企業大老闆或執行長所領取的現金股利卻是以億元計，如此兩極化發展，加深新貧階級的相對剝削感。」<sup>20</sup>

更可悲的是連被視為正義最後防線的司法檢察部門也早已崩塌：其中有冒名入獄的，有營私買官的，有設局詐騙投資人的，有買賣奴工的，其手段之卑劣、情節之離奇，簡直是夷所思。<sup>21</sup>近來更出現因法院認定未在出生兩個月內聲請拋棄繼承，使得出生不到三個月就成為債務人的情形。<sup>22</sup>大法官透過釋字第三百七十一號緊握法律

的違憲審查權，卻又以不受理的方式對繼承惡法漠視不理。這種冷漠、對弱勢者苦難漠不關心的態度，只能用尸位素餐、造惡業來形容。號稱人權立國的台灣，竟有這種「債務無期徒刑」的惡法持續荼毒人民，讓弱勢者永難翻身！此不僅是所有法律人，尤其是大法官們的集體之恥！<sup>23</sup>難怪剛卸任的前司法院長翁岳生會有「政治踐踏司法」的「椎心泣血」之歎！

### 樂生療養院

再看位於新莊的樂生療養院案例。該院是「全球六十多個類似機構中少數仍存在的一個，它見證了現代化的過程中，人類如何以國家暴力以「淨化」社會而對社會弱勢（包括不同種族、下層階級、精神病患、傳染病患、異見分子等）進行汙名及迫害。…聯合國相關的癡瘋病患國際組織IDEA亦認為樂生療養院係世界級遺跡，要求台灣政府加以保護。」<sup>24</sup>而日本漢生病（癡瘋病）大使及著名動畫導演的宮崎駿曾謂「現在日本政府好不容易對這些病患認了錯、謝罪，能這樣真的很好。我忽然想到，在日本各地，除了病患本身之外，包括他們的親人、子女和朋友在至親被強行隔離的情況下，仍須沉默以對之時—那私下偷偷落淚的情景。」<sup>25</sup>

二〇〇七年三月時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因支持

16 彭漣漪，〈新富暴增 浮華一族勢力擴張〉，《中國時報》，2007年9月10日。

17 〈貧富差距擴大是誰造成的？〉，前揭文。

18 陳一珊，〈亞洲十國 金融痛苦指數 台灣最高〉，《中國時報》，2005年9月29日。

19 〈揪出抑壓勞工薪資的真兇〉，《自由時報》（社論），2007年9月21日。

20 〈活絡經濟幫助新窮人站起來〉，《中國時報》，2007年10月15日，版T4。

21 向駿，〈台灣需要格瓦拉〉，《蘋果日報》，2005年10月8日。

22 戒撫天，〈勞工苦 只因企業無力〉，《聯合報》，2007年9月11日。

23 陳長文，〈三月娃背債 大法官冷眼看？〉《聯合報》，2007年9月10日。

24 廖咸浩，〈樂生保存 事在人為〉，《中國時報》，2007年3月23日。

25 宮崎駿(Honkwun譯)，〈全生園の灯〉，《朝日新聞》，2002年4月20日。

樂生院拆遷成爲支持保留樂生文化團體的箭靶，蘇因遭民進黨內的總統競選對手游錫義和謝長廷圍勸，先後簽署支持樂生療養院自救會的二項訴求，包括促請行政院暫定該院爲古蹟，並保留九成院區，希望行政院「仔細傾聽與評估各方聲音」。謝長廷甚至表示他在閣揆任內就支持保留樂生。在樂生院拆遷爭議中，看似局外人的游、謝原是前後任閣揆，他們和當初樂生院拆遷的決策是脫不了關係的，後來因爲保留樂生的聲浪變大，其的立場也跟著搖擺。<sup>26</sup>

誠如台北市前文化局局長廖咸浩所謂，「自詡進步的台灣卻在慰安婦、外勞人權、樂生等眾多案例上不斷反其道而行。要在國際上受尊敬，不是徒然逞口舌之能即可，而必須要身體力行進步價值。」<sup>27</sup>結果導致「四百多位部落客與HEMiDEMi黑米共享書籤網友」共同署名發起、贊助在平面媒體刊登「要做事？做好事！一保留90% 樂生能讓捷運與新莊更好」的半版廣告，<sup>28</sup>成爲台灣首次由一群背景迥異、興趣紛歧的網友，因爲一項公共議題，自發性募資委刊的報紙廣告，他們除了集資刊登廣告、組織樂生巡守隊，更在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七日發動街頭遊行。這群部落客的力量逼使陳水扁總統要求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溝通協調、原訂的拆除期限也往後順延。「沒有抵抗，就沒有痕跡。因此，樂生療養院事件仍是一場不容忽視的小革命，我相信未

來，今天明天或某一天，我們會不斷撞進這張問題清單裡。」<sup>29</sup>

## 一、殷琪崇拜格瓦拉？

總統府國策顧問、高速鐵路公司董事長殷琪年輕時曾崇拜過格瓦拉，嚮往以革命手段推翻社會的不公不義。<sup>30</sup>她在接受《讀者文摘》訪問時曾表示「年輕時，崇拜過鼓舞群眾反抗暴政的古巴軍事革命家切·格瓦拉。他只管革命，卻不從政，在我年輕的叛逆時期，做了些當時我還不了解的事。那時對他有強烈好奇心。除了他，我再沒有崇拜過別人。…我十四、五歲到十八、九歲這段時期是比較叛逆吧，但現在回頭看，也不覺得自己叛逆，只是當時有很多疑問，沒有人可告訴我答案。」<sup>31</sup>近來有人對她也「有很多疑問。」

根據高鐵公司二〇〇七年八月舉行通車以來首次股東會上的財報資料，高鐵前一年虧損達一百三十一億元，然包括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等二十四位高階幹部前一年薪資就高達一億五千多萬元，更有五人年薪破千萬，小股東大罵「簡直是笑話」。<sup>32</sup>高鐵的「M型」薪資結構連交通部都看不下去，因此表示「高鐵如果想要形象好一點，薪資結構要調整！」<sup>33</sup>年輕時的殷琪雖曾崇拜過格瓦拉，但現在的殷琪似乎成了格瓦拉革命的對象！

26 童清峰，〈樂生院拆遷案案中案〉，《亞洲周刊》，2007年4月8日。

27 廖咸浩，前揭文。

28 詳見〈要做事？做好事！一保留90% 樂生能讓捷運與新莊更好〉，《蘋果日報》，2007年3月19日，A10版。

29 黃哲斌，〈紀錄一場未竟的小革命：樂生院拆除事件〉，中時電子報，2007年9月12日。

30 〈慢跑換騎單車〉，《自由時報》，2007年5月13日。

31 〈深情對話：殷琪—人生應有起伏〉，《讀者文摘》，2003年7月，頁34-41。

32 蔡惠萍，〈高鐵虧131億 高幹領高薪小股東譙〉，《聯合報》，2007年8月17日。

33 蔡惠萍，〈高鐵M型待遇 年薪百萬vs.月薪2萬〉，《聯合報》，2007年8月17日。

## 二、格瓦拉是陳菊的偶像？

從以下兩個例子可以看出陳菊對格瓦拉是相當有好感的。其一是二〇〇一年勞工節，也就是民進黨上台之後的第一個勞工節慶祝大會上，有一塊印著格瓦拉人頭像的標牌上寫著「遊行顧問」和「陳菊的偶像」兩行字。其二是二〇〇六年在談到她前往勞工育樂中心參加由民進黨中央黨部青年部所舉辦的公共事務體驗營的感受時，她寫到「看著這些年輕人的熱情洋溢，讓我想到「永遠的革命家」切·格瓦拉當初參與南美洲革命運動所帶有的挑戰與改變的精神。的確，年輕人的熱情是可以改變世界。」<sup>34</sup>

然以陳菊任勞委會主委期間發生的高捷泰勞案為例，經查每名泰勞仲介費九到十五萬元不等，而非法佣金高達五千多萬元到一億五千多萬元。<sup>35</sup>二〇〇六年高雄市長候選人提名期間羅志明點名泰勞案背後的「有力人士」就是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和陳菊，意在拉下當時民調領先的代理市長陳其邁而由陳菊取代參選。今年八月高雄地方法院一審宣判泰勞案後，陳菊表示尊重司法、信任司法。一個對虐待外勞案未採取積極作為的政府官員說格瓦拉是她的偶像，能相信嗎？陳菊雖說「年輕人的熱情是可以改變世界」，但她還有年輕人的熱情嗎？

## 三、格瓦拉在大陸

早在廿世紀六〇年代，中國就曾讚揚格瓦拉在古巴推行遊擊戰路線，至二〇〇〇年史詩劇

《切·格瓦拉》推出後，其戰鬥和生活的軌跡再次與大陸緊密相關。<sup>36</sup>儘管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索颯認為格瓦拉「勇敢地實踐著自己的戰略，以一支不足百人的隊伍對付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做好了長期戰鬥和犧牲的準備，這種必勝的信念和勇氣，對於渴望正義的弱小者難道不是一種永世的鼓舞嗎？」<sup>37</sup>但《切·格瓦拉》劇中的一段對話可能是他死不瞑目的原因之一。

反甲：怎麼居然還有人提「革命」？

反乙：怎麼居然還有人寫「革命」？

眾反：怎麼居然還有人粉墨登場演「革命」？

反乙：……窮不怕，咱們可玩股票，玩期貨，玩樓花，玩網絡呀！……再不行，咱還可玩搖滾，玩實驗，玩先鋒，脫得光溜溜的在外國友人面前玩裸奔呀！天下的花活千千萬，玩什麼不好偏得玩革命呀！！如今時代的最強音—

眾反：WWW.Com!

反乙：如今時代的最弱音。

眾反：傻-B-呵-呵-革-命-啊！！

再回頭看一遍《切·格瓦拉》話劇的獻詞：「請相信這個因窮人的情誼而感動不已的人，請相信這個靠窮人的祝福而跋涉不停的人，請相信這個為窮人的將來而告別過去的人。」如果這段獻詞是真心的，大陸的經濟發展中似乎也看不到格瓦拉的影子。

34 〈感受青年活力〉，《民進黨電子報》，第10期，2006年9月1日。

35 〈泰勞案非法抽佣 恐逾1.5億元〉，《自由時報》，2005年11月2日。

36 〈切·格瓦拉魅力長存的傳奇戰士〉，《北京青年報》，2002年10月9日。

37 索颯，〈切·格瓦拉，永遠的懷念〉，《讀書》，1998年，第5期。

#### 四、山西黑磚案

格瓦拉的摩托車之旅在一九五二年曾經過智利的丘基卡馬塔(Chuquicamata)——全世界最大的露天銅礦。他成功地混進礦區當看門的卻碰到了罷工，格瓦拉在日記中寫到：「那些傻瓜美國人，他們不肯多給可憐的工人一丁點兒工資，結果罷工的時候，他們每天得損失上百萬比索。」<sup>38</sup>其實同樣的戲碼至今仍在上演。

十年前媒體就曾揭露山西磚窯奴工的慘狀，十年後同樣的悲劇在同樣的地方繼續上演！山西的黑磚窯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和產業聯盟，十幾年來肆虐為害已是公開的秘密，但地方政府冷漠無為甚至為虎作倀，在驚動中央後展開整頓救治行動，居然自我宣傳為解救奴工的「救世主」。

二〇〇七年七月四日一審開庭，法院人士表示「案情並不複雜，一天內就可以審完。」檢方以涉嫌非法拘禁、強迫職工勞動、故意傷害等三項罪名，對包括黑窯主王兵兵、黑包工頭衡庭漢以及數名打手在內的犯罪嫌疑人提出了公訴。但僅以上述三項罪名進行審判和量刑，明顯有避重就輕之嫌。媒體因此引用英國思想家培根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十倍於犯罪，因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是污染了水源」表示不滿。<sup>39</sup>

山西磚窯案中奴工之悲慘、地方政府之腐敗，不但讓中國老百姓為之憤怒，更導致國際輿論譁然。在中國社會經濟正向現代文明轉型、試圖在國際社會和平崛起之際，慘絕人寰的奴工事件不但給渴求現代文明的中國人心靈上不可承受之痛擊，

也在中國當局的臉上劃上難以掩飾的傷疤。當年中國共產黨號召工人和農民起來革命，而現在包身工、奴工、童工現象在中國死灰復燃，公權力的蕩然無存，導致北京當局的合法性備受考驗。<sup>40</sup>

根據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興維的專文——「尋求遏制貧富分化的中庸之道」，中國的經濟總量即將超過德國，財政收入已入世界前三甲，但卻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根據亞洲開發銀行八月八日在北京發佈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增幅已是印度的兩倍，僅次於尼泊爾而位居亞洲第二。周興維認為，儘管中國持有的外匯資產已高達1.3兆多美元，財政收入直逼一兆美元，滬深股市市值超過GDP總值，但粗放投入日復一日，投資飢渴日甚一日，資源環境日暮一日，他認為，此三者才是中國最值得警惕的「泡沫」。而當前中國最突出的矛盾就是「精英」與「平民」的利益衝突日益尖銳起來。<sup>41</sup>

#### 五、結語

古巴政府曾希望格瓦拉生前最鐘愛的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能為他寫一首悼念的詩，但聶魯達一直沒寫，因為他認為，「這種輓歌不僅應該包括直接的抗議，還應該有關於這一令人痛苦的歷史事件的深刻反響。我要反覆思考這首詩，直到在我腦海裡和血液中構思成熟。」<sup>42</sup>如果連聶魯達都無法精準表達對格瓦拉的悼念，本文如能表達對其追思的萬一，也就算是沒有白寫了。★

38 師永剛、詹涓編著，《切·格瓦拉畫傳》，聯經出版社，2005，頁61。

39 童大煥，〈黑磚窯案起訴罪名引爭議〉，《東方早報》，2007年7月5日。

40 高尚行、尚中校，〈揭開現代中國奴工產業鏈真相〉，《亞洲週刊》21卷25期，2007年7月1日。

41 〈學者：中國最大矛盾 是精英與平民利益衝突〉，中央社，2007年9月3日。

## 參考資料

### 一、書籍：

- 卡斯楚，《切：卡斯楚的回憶》，黃裕美、樂為良譯，台北：立緒文化公司，2006年12月。
- 南方朔，〈20世紀的悲傷浪漫英雄〉，《切·格瓦拉畫傳》，台北：聯經出版社，2005年7月，頁9-15。
- 師永剛、詹涓編著，《切·格瓦拉畫傳》，聯經出版社，2005年7月。
- 楊碧川，〈自序〉，《20世紀最後革命家：切·格瓦拉》，大作出版社，2000年8月。
- 劉智峰主編，《切·格瓦拉：反響與爭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二、期刊：

- 陳之獄，〈古巴華人沒有一個是逃兵〉，《亞洲週刊》，2007年9月2日，頁22-23。
- 南方朔，〈拉美左翼的機會與考驗〉，《亞洲週刊》，2007年10月21日，頁6-7。
- 索颯，〈切·格瓦拉，永遠的懷念〉，《讀書》，1998年，第5期。
- 索颯，〈切·格瓦拉犧牲紀念日——三十九年後的致敬〉，《讀者》，2006年10月19日。
- 高尚行、高中文，〈揭開現代中國奴工產業鏈真相〉，《亞洲週刊》21卷25期，2007年7月1日。
- 童清峰，〈樂生院拆遷案中案〉，《亞洲周刊》，2007年4月8日。
- 劉承軍，〈切·格瓦拉與他的「新人」思想〉，《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6期，頁31-34。
- 〈深情對話：殷琪——人生應有起伏〉，《讀者文摘》，2003年7月，頁34-41。

### 三、報紙：

- 向駿，〈台灣需要格瓦拉〉，《蘋果日報》，2005年10月8日。
- 戎撫天，〈勞工苦只因企業無力〉，《聯合報》，2007年9月11日。
- 林載爵，〈英雄的兩面：神話與真實〉，《聯合報》，2006年7月31日。
- 胡晴舫，〈麻瘋共和國〉，《中國時報》，2005年8月31日。
- 宮崎駿著，Honkwun譯，〈全生園の灯〉，《朝日新聞》，2002年4月20日。
- 陳一姍，〈亞洲十國 金融痛苦指數 台灣最高〉，《中國時報》，2005年9月29日。
- 陳長文，〈三月娃背債 大法官冷眼看？〉，《聯合報》，2007年9月10日。
- 陸天明，〈文學的二次回歸與『士』的精神〉，《人民日報》，2007年3月19日。
- 張耀杰，〈切·格瓦拉：中國化的革命基督與基督革命〉，《大紀元》，2001年3月4日。
- 童大煥，〈黑磚窯案起訴罪名引爭議〉，《東方早報》，2007年7月5日。
- 彭漣漪，〈新富暴增 浮華一族勢力擴張〉，《中國時報》，2007年9月10日。
- 廖咸浩，〈樂生保存 事在人為〉，《中國時報》，2007年3月23日。
- 蔡惠萍，〈高鐵虧131億 高幹領高薪小股東譙〉，《聯合報》，2007年8月17日。
- 蔡惠萍，〈高鐵M型待遇 年薪百萬vs.月薪2萬〉，《聯合報》，2007年8月17日。
- 〈切·格瓦拉魅力長存的傳奇戰士〉，《北京青年報》，2002年10月9日。
- 〈貧富差距擴大是誰造成的？〉，《自由時報》，2005年7月15日。
- 〈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加劇拉美的混亂〉，《人民日報》，2005年9月22日。
- 〈學者：中國最大矛盾 是精英與平民利益衝突〉，中央社，2007年9月3日。
- 〈揪出抑壓勞工薪資的真兇〉，《自由時報》，2007年9月21日。
- 〈活絡經濟幫助新窮人站起來〉，《中國時報》，2007年10月15日。



# 妖魔或聖者？

## ——切·格瓦拉游擊隊與玻利維亞農民關係初探

褚榮瑩 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 一、前言

二〇〇四年十月八日，位在玻利維亞東南部的無花果村(La Higuera)，因為切·格瓦拉之路(Ruta del Che)的經營運作，在國際援助團體玻利維亞照護團(Care Bolivia)與玻國軍隊的協助下正式展開，而突然成為國際媒體注目的焦點，而無花果村(La Higuera)正是切·格瓦拉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死於玻國軍官槍下處。其實，因為景仰切·格瓦拉而跑到這個遙遠又荒涼的小村莊的旅遊行為，並不是二〇〇四年才開始的；但二〇〇四年無花果村受媒體矚目的原因，恐怕是因為，接受國際援助團體及官方協助，當地居民企圖將游擊隊活動的歷史、遺物及空間，轉換為生財之道，因而熱情擁抱切·格瓦拉，對照一九六六至六七年時他們對切·格瓦拉游擊隊的恐懼及敵意，成為許多國際媒體暗暗嘲諷與感嘆的一點。

無論是從切·格瓦拉自身的記述(《切在玻利維亞日記》)，或者日後眾多民間、學界出版品中探討游擊隊當初失敗的原因，以及大眾媒體的再現中，這群在玻利維亞東南部當初可能與游擊隊有所接觸的農民，是「背叛」了切·格瓦拉的一群人：他們因為所受的思想教育有限，無法理

解游擊隊其實是為了解放深受美國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所苦的他們，才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進行武裝革命；這群農民甚至向軍方告密，加速了游擊隊的滅亡。而現在，他們不但不以自己過去背叛了切·格瓦拉為恥，還因為觀光的利益而熱情擁抱切·格瓦拉。這對許多景仰切·格瓦拉的人來說，不啻是一大諷刺。

站在切·格瓦拉當時的革命理想這邊，沒有錯，這的確是一大諷刺。但是我們從這些試圖平衡報導的記者手中，也看到一些當地居民想法透露出的蛛絲馬跡，讓我們用另一種可能性，來理解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間，農民不接受游擊隊的歷史懸案。換言之，這篇文章想要探討的，並不是剖析切·格瓦拉游擊隊失敗的原因，而是初步透過一些當地民眾說法，延伸出可能的切入角度，來理解為什麼當時切·格瓦拉令農民聞風喪膽、陽奉陰違，又為什麼他死後部分地區人們將他視為地方上的聖者(santo)？人們今日又擁抱他，純然只是因為他帶來人潮與錢潮嗎？這群農民只是一群無知又只注重眼前利益的人嗎？到底玻利維亞東南部的農民如何認知這個外來者呢？

這篇文章將分為三個部分進行，首先要說明

切·格瓦拉當時為什麼選擇玻利維亞的良加瓦蘇(Ñacahuasú)地區作為根據地？其次，這個地區的整體圖像為何？而當地居民可能又是如何看待切·格瓦拉所率領的游擊隊？說明以上各點時，也會穿插切·格瓦拉的玻利維亞日記，試圖分析他當時可能遇到了哪些問題？

## 二、為什麼切·格瓦拉選擇玻利維亞？

玻利維亞軍官布拉多(Gary Prado Salmón)在他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的日記上，記述他與切·格瓦拉談話的內容時，提及他對切·格瓦拉說，他來到玻利維亞從事游擊隊活動，根本就是選錯了國家；而切·格瓦拉回答他，難道，玻利維亞不正是拉丁美洲獨立的起源地嗎？布拉多回答說，但玻利維亞也是最後一個成功獨立的國家。<sup>1</sup>如同布拉多的見解，許多探討都指出，切·格瓦拉的失敗是因為他不了解當時玻利維亞的情況。在這個段落中，我們將先試圖了解，玻利維亞當時處在什麼樣的狀態中，而切·格瓦拉選擇玻利維亞的原因是什麼？他為什麼又選擇了當時人煙稀少、農民動員能力較弱的良加瓦蘇地區進行游擊隊活動？

首先我們必須從切·格瓦拉所抱持的革命理論談起，先理解他是如何構想革命計畫的。根據古巴革命成功的經驗，切·格瓦拉當時進入玻利維亞時，所抱持的思考方式被稱為中心理論(foquismo)，大意是由一個處在地下狀態的武裝小組，創造出一個革命的中心(foco)，只要在中心

點燃火花，革命的烈火就會延燒全國，擊潰寡頭政治國家的正式編制軍力，而拉丁美洲的中心就在農村。這是因為，依照早期的依附理論，拉美的城市是統治階級的根據地，城市中的工會非常容易受到壓迫；而徒具民主形式的選舉活動，又非常容易受到控制，因此，唯一前進的辦法只有武裝革命。而拉丁美洲的農村早已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並不是封建的模式，因此武裝革命中心要贏得農村支持並不會有障礙，等到農村根據地形成後，再來尋求城市的支持。<sup>2</sup>

切·格瓦拉選擇玻利維亞，一方面是因為玻利維亞，特別是安地斯山脈區域的印地安人，有悠長的動員反抗歷史，連綿至切·格瓦拉身處的一九六〇年代，特別是在礦工的部分，因為軍政府的打壓而格外蓬勃。<sup>3</sup>雖然這並不代表切·格瓦拉完全認同玻利維亞動員的有效性。比如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西部高地的二十世紀礦坑(Siglo XX)發生軍方屠殺礦工事件後，切·格瓦拉計畫透過信差將〈第五號公報〉(Comunicado N° 5)送出游擊隊根據地，文中表達對礦工運動的同情，同時也呼籲礦工加入武裝革命的行列，因為「英勇的胸膛抵擋不了機關槍，抵擋不了現代的毀滅性武器，就算建得再堅固的路阻，也沒有用。」<sup>4</sup>事實上切·格瓦拉所欣賞的玻利維亞長久的動員反抗歷史，在身體與空間的使用上，或許是抵擋不了國家軍隊的武力，但卻不一定是毫無效果的。<sup>5</sup>

另一方面玻利維亞也有一些客觀條件上的優

1 Gary Prado Salmón, *The Defeat of Che Guevara: Military Response to Guerilla Challenge in Bolivia*, Deredita J. transl, New York, Praeger, 1987, p.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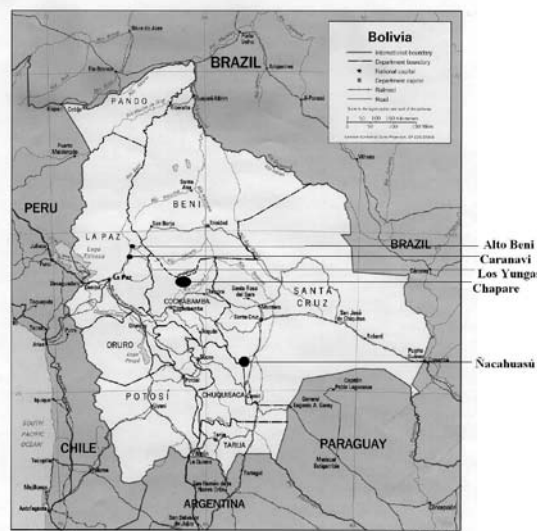
2 Leslie 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ume VI, Part 2, 193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Mary-Alice Waters, ed., *Fertile Ground: Che Guevara and Bolivia*, New York, Pathfinder,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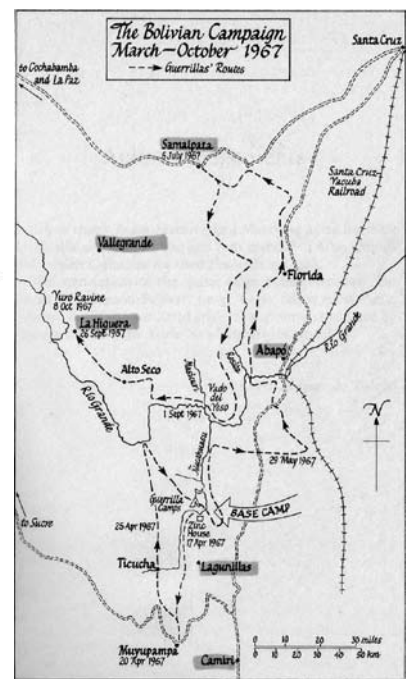
4 Gary Prado Salmón, *op. cit.*, p. 148。

5 褚榮瑩，《玻利維亞社會運動策略的空間政治》，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勢。切·格瓦拉進入玻利維亞前所構想的，是在此建立拉丁美洲的游擊隊基地，這個基地選址的要件，最好可以和很多國家接壤，首先完全控制基地國，再深入鄰近國家，加強既有革命中心或創造之。因為是個訓練基地，所以選擇的區域必須孤立，氣候及地貌要接近受訓者即將面臨的實際狀況。最終，基地國應成為整



圖一、切·格瓦拉游擊隊曾考慮的基地地點。  
(來源：[http://images.nationmaster.com/images/motw/americas/bolivia\\_po193.jpg](http://images.nationmaster.com/images/motw/americas/bolivia_po193.jpg))



圖二、游擊隊在良加瓦蘇地區的行動地點。  
(來源：《切在玻利維亞日記》)

個拉丁美洲革命的政治軍事中心。本來有兩個國家納入切·格瓦拉考慮的範圍：秘魯、玻利維亞，但秘魯共產黨武裝鬥爭失敗後，國內風聲鶴唳，使得玻利維亞成為較容易進入的國家。

那麼要在玻利維亞的何處設立呢？依照游擊隊中玻國成員的理解，國內有幾個重要的動員區域是墾殖者(colonizador)<sup>7</sup>的區域，如圖一表示，包括拉巴斯(La Paz)地理區(departamento)的卡拉納維(Caranavi)與永加斯(Los Yungas)一帶，科恰彭巴(Cochabamba)地理區的恰怕瑞(Chapare)，聖塔克魯斯(Santa Cruz)，阿多貝尼(Alto Beni)等。阿多貝尼和永加斯首先被挑出來不作考慮，因為這兩地的工會由政府支持；<sup>8</sup>玻國游擊隊成員事先在卡拉納維和良加瓦蘇都購買了土地，而

選擇位在聖塔克魯斯的良加瓦蘇是因為這裡屬於熱帶氣候，可能與將來受訓成員的運作地點較相似。且此地人口稀少，游擊隊訓練活動不易被發現；此外，良加瓦蘇區域地形多變，作為訓練將來要適應各種地形的游擊隊訓練基地十分有利。且良加瓦蘇附近有卡米立(Camiri)油田，或許可以藉由控制油田來打擊美國。<sup>9</sup>良加瓦蘇及其鄰近地區如下右圖所示：

換言之，良加瓦蘇是被選中當作一個訓練游擊隊的基地，並作為農場種植補給所需，而不是當作游擊隊運作地點，這點可以從玻利維亞日記一開始，切·格瓦拉提到要找一位農藝專家來證明。沒想到，游擊隊卻因為行蹤過早暴露，而在此被迫作戰。當年參與游擊隊城市支援活動的羅

6 *Ibid.*

7 所謂的墾殖者，是指玻利維亞一九五二年國家革命後，政府積極鼓勵。過剩的西部高地人口往東部大片平坦、空曠國土開墾的移民。

8 國民革命運動黨(MNR)在一九五二年革命成功以後，承諾農民將過去屬於大莊園的土地分給農民，並且在農村村社中扶植工會組織，平行於國家的行政體系，各地農地歸還與工會滲透的程度不一，簡略地說，西部比東部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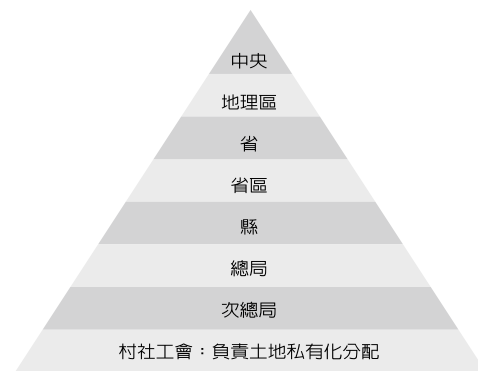
9 但事實上卡米立和塔塔倫達(Tatarenda)只生產家用燃料。詳見Gary Prado Salmón, *op.cit.*

多爾佛·薩拉達紐(Rodolfo Saldaña)也承認，良加瓦蘇的確是一個人煙稀少又沒有組織動員力量的地方。<sup>10</sup>

不僅僅是良加瓦蘇地區的農民組織動員力量微弱，批評者多認為切·格瓦拉忽略了玻利維亞農民運動有它自身獨特的歷史，特別是指他無視於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間的軍農協定(Military-Peasant Pact)，造成當時農民運動並不同情游擊隊武裝革命的情勢。所謂的軍農契約，興起背景必須從玻利維亞一九五二年的國家革命的結果談起。一九五二年革命以後，國民革命運動黨(Movimiento Nacional Revolución, MNR)本來想以平行於行政體系的農民工會組織治國，但是經濟衰退與財政吃緊，使得黨與農民之間立定的社會契約出現裂縫。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四年間的歷史研究顯示，只有科恰彭巴是以農民工會組織人群相當成功且穩定的地區，西部高地比如位在拉巴斯的阿恰卡奇(Achacachi)，農民工會組織被村社吸收成爲反抗組織；在波多西(Potosí)則遭到反抗，農民工會只是官方組織。<sup>11</sup>

從一九六四年巴利多斯(Barrientos)執政後展開的軍農協定，是軍隊直接與政府資助之工會運動連結的體制性結構，相對於國民革命運動黨時期國家——黨——工會的連結結構。具體說來，是取消了縣(cantón)的縣長(Corregidor)、省(provincia)的副省長(subprefecto)等職位。而次總局(sub-central)和總局(central)層級的首長由軍隊指派的代表擔任。<sup>12</sup> 這個嚴重性必須從

革命後玻利維亞的行政體系結構來了解：國民革命運動黨將國土分爲地理區(departamento)，省(provincia)，省區(secciones de provincias)，縣(cantón)，總局(central)，次總局(subcentral)，村社(comunidad)等層級，並在每個層級設置相對的農民工會，如下圖所示。從圖示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軍隊確實直接由工會組織的中、高層級，控制了農民工會機器。這點也從游擊隊最後被追擊的過程可以印證，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游擊隊抵達無花果村，此地的行政長官(magistrato)早在幾天前就通報大峽谷省(Vallegrande)的副省長，稱此處有游擊隊活動，<sup>13</sup>這個行動代表的不仅是向行政上級報告，同時也是軍方內部間接得知游擊隊動向的情報流通方式。



圖三、國家革命後玻利維亞行政體系示意圖（來源：自製）。

所謂的軍農契約，最重要的權力基礎來自巴利多斯的個人領袖魅力，使農民能夠投射父權國家(paternal state)的想像在他身上，而軍農協定也特別是在巴利多斯出生地科恰彭巴最爲成功；換言之，巴利多斯執政時期軍農契約也並不是十分

10 Mary-Alice Waters, *op. cit.*

11 Silvia Rivera, "Oppressed but not Defeated." 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87。

12 *Ibid.*

13 Ernesto Che Guevara, *Bolivian Diary*, London, Pimlico, 1968, p. 179。

14 Silvia Rivera, *op. cit.*

穩定。<sup>14</sup> 因此，與其說切·格瓦拉對當時玻國軍農契約的狀態相當無知，不如說他對於這個契約不穩定的狀態感到樂觀，認為或許有機可乘，這點我們可以從玻利維亞日記清楚推知。

比如在日記中，對於一九六七年三月的分析，切·格瓦拉指出敵方已經開始採取行動反制游擊隊，方法之一是農民動員。<sup>15</sup> 所謂的農民動員，是指原本巴利多斯政府曾考慮以工會系統動員農民軍，但後來因為諸多考量而暫緩實施。<sup>16</sup> 即便如此，特別是科恰彭巴地區農民的主動表示願意參戰，彰顯了軍農契約有力的部分。比如七月十九日的記載指出，科恰彭巴農業工會組成政黨，聲援巴利多斯。<sup>17</sup> 不僅是對於整個國家尺度的軍農契約有警覺，切·格瓦拉也意識到他所在的區域也受到軍農契約影響。包括同年六月三十日記載，接待他們的盧卡斯(Lucas)為他們介紹環境時，特別提到鄰居安多爾佛·迪亞斯(Andulfo Díaz)是此區農民工會總書記，支持巴利多斯。<sup>18</sup> 六月分析中指出，軍隊對農民的滲透很成功，村社裡每個人都成了告密者。<sup>19</sup>

換言之，切·格瓦拉對於玻利維亞軍農契約狀態，是有意識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認為這個契約並不穩定，游擊隊有機會成為革命的觸媒：六月十三日，切·格瓦拉藉由廣播內容，寫下他認為玻國的政治巨變很有趣，無數的協定與反協定，游擊隊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最適合擔任催化

劑。<sup>20</sup> 七月十四日更記載，正統革命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Auténtico, PRA)和玻利維亞社會民主黨(Partido Socialdemócrata Boliviano, PSB)從革命陣線(Frente de la Revolución)退出，農民警告巴利多斯不能與玻利維亞社會主義集團(Falange Socialista Boliviana, FSB)結盟，政府分崩離析，可惜游擊隊人力不足。<sup>21</sup> 同時，從親身與農民互動的經驗，切·格瓦拉也感受到農民對軍方並不是完全的臣服與順從，而是一種策略性的結盟，例如七月二十日記載游擊隊六日在薩瑪帕達襲軍的行動已經傳遍鄰近區域，農民們還加油添醋，軍隊的失敗成為農民的笑柄。<sup>22</sup> 玻利維亞軍官布拉多認為，聯盟關係的不穩定，一向都是玻國政治生態的特色，並不會因此發生革命一般的秩序崩解，切·格瓦拉的評估實在過於樂觀，也說明了他並不了解玻國政治。<sup>23</sup> 姑且不對布拉多的評價表達立場，我們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切·格瓦拉意識到軍農契約的存在，且在推動革命者的眼中，它是有機會轉化成革命能量的。

### 三、良加瓦蘇及其周邊地區整體圖像

游擊隊打算當作訓練基地的這個地區，正好處在巍峨的安地斯山脈與平原之間，西部是安地斯山脈的延伸，海拔高度達三千公尺；東部是潮濕的平原，海拔高度僅有五百公尺左右。聳立的山頭之間是深切的峽谷，行進非常困難。<sup>24</sup> 當時主

15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 72.

16 Gary Prado Salmón, *op. cit.*

17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 136.

18 *Ibid.*, p. 125.

19 *Ibid.*, pp. 126-127.

20 *Ibid.*, pp. 116-117.

21 *Ibid.*, p. 134.

22 *Ibid.*, p. 136. 事實上，布拉多也認為游擊隊沒有針對這點乘勝追擊，是他們最終無法贏得農民的重要原因。詳見Gary Prado Salmón, *op. cit.*

23 Gary Prado Salmón, *op. cit.*

24 *Ibid.*

要聚落人口數如下表所示<sup>25</sup>：

聚落名稱	1967年人口數
拉昆尼亞斯(Lagunillas)	932
穆猶彭巴(Muyupampa)	876
卡米立(Camiri)	12,871
佛羅利達(Florida)	280
賽邁巴塔(Samaipata)	1,696
高旱村(Alto Seco)	420
無花果村(La Higuera)	296
大峽谷(Vallegrande)	7,841

相較於當時西部高地一個重要的人口移入城市高地市(El Alto)，一九六七年人口為95,000人，這個區域最重要的新興採油聚落卡米立<sup>26</sup>也只有12,871人，加上前述此區地形常有深切峽谷，不易出現集村狀態，正符合游擊隊訓練基地要求人煙稀少的條件。

這個區域自古就是印加帝國伸展的東緣，游擊隊運作地區的西部有幾個聚落的名稱是屬於蓋楚瓦(Quechua)語，亦即印加帝國統治者的語言：賽邁巴塔(Samaipata)，布卡拉(Pucará)，印加瓦希(Incahuasi)，穆猶彭巴(Muyupampa)，裘羅(Churo)。而此地區東部則多是屬瓜拉尼(Guaraní)語的聚落名稱：亞巴波(Abapó)，伊畢大(Ipitá)，良加瓦蘇(Ñacahuasú)，伊里比迪(Iripiti)等。<sup>27</sup>雖然聚落名稱的語言，並不一定等同於當時居民所使用的語言<sup>28</sup>，但大致上我們可以了

解，一開始游擊隊主要行經的東半部區域，居民多使用瓜拉尼語；最後兩個月行經的西部高海拔聚落如高旱村(Alto Seco)，無花果村等地的居民是使用蓋楚瓦語的。越接近城鎮，居民使用西班牙語的比例和頻率越高。雖然游擊隊的非玻國成員，從一月十一日起就開始學習國內最多原住民使用的蓋楚瓦語，<sup>29</sup>但被迫提前進入作戰狀態，以及大多數時間都在居民使用瓜拉尼語的區域活動，也成為游擊隊與當地居民溝通的障礙之一。

雖說這個地區當時農民組織動員的能量非常微弱，但如果從長期的原住民反抗歷史來看，居住在這個區域，屬於使用瓜拉尼語的奇利瓜諾(Chiriguano)印地安人，可是以抵抗印加帝國、西班牙殖民者及玻利維亞共和國政府的鎮壓聞名。<sup>30</sup>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八九二年的古里尤奇(Kuriyuqui)<sup>31</sup>戰役，這是瓜拉尼人民第一次的嚴重挫敗。璜·德黑里那(Juan Tejerina)回憶起老人說過，戰役發生時有好幾千人參與，後來倖存者就分散到阿根廷或者高山上去；無論是女人、小孩或成人分配或販賣到富人家裡或大莊園裡作工，開始了一百年沈默、分散與服從的時代。<sup>32</sup>一直到一九八二年玻利維亞東部原住民聯盟(CIDOB)創立，一九八七年玻利維亞瓜拉尼大會(APG，在CIDOB之下)創立，才又開始一個積

25 *Ibid.*

26 卡米立，是恰克戰爭(Guerra de Chaco)以後因為石油開採而新興的城市，有來自各地的移民。因位在巴拉備迪(Parapetí)河岸，在恰克戰爭時扮演重要的角色，戰後軍方亦積極組織發展此城市，促使它因開採石油相關人員與軍隊而持續成長。詳見 Gary Prado Salmón, *Ibid.*

27 Gary Prado Salmón, *Ibid.*

28 比如穆猶彭巴，根據《切在玻利維亞日記》，當時居民是瓜拉尼人。

29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 29。

30 例如拉昆尼亞斯(Lagunillas)就是一八三〇年代共和國政府為了抵禦奇利瓜諾印地安人而設置的聚落所發展出的城市。詳見 Gary Prado Salmón, *op. cit.*

31 距今日卡米立六十公里遠。詳見 Washington Estellano, “Indígenas se organizan para reclamar sus derechos”, *Revista del Sur*, No. 77, 1998。

32 期間雖然有再組織的行動，比如一九三六-一九四七年間的拉加伊彭巴印地安團體(Las Escuelas Indigenales de Raqaypampa)，最後因為缺乏資源及莊園主的壓迫而式微。詳見 Washington Estellano, *Ibid.*

極組織動員的時代。<sup>33</sup>

就連一九五二年的國家革命，在一連串的鼓勵土地墾殖過程中，也未能帶給這個區域組織動員的能量。革命後，聖塔克魯斯(Santa Cruz)的土地並不像西部被沒收重新分配<sup>34</sup>，而是藉由資本的挹注、現代科技與僱傭勞力的使用，從大莊園(latifundio)轉型成為大規模農作企業。特別是聖塔克魯斯北部區域的居民，從原本以佃戶(asentado)<sup>35</sup> 或長工(apatronado)<sup>36</sup> 方式滿足莊園勞力需求，轉為搭上革命後東部土地鼓勵開墾的風潮，想要擁有自己的土地(雖然大部分土地仍為大企業主持有)，不願忍受甘蔗或棉花莊園的工作，而如果需要現金薪資，就在各個莊園間移動打零工。由於農業革命之後勞力需求增加，莊園經營者認為這樣的勞力形式相當不可靠，加以國家政策鼓勵移民，強力招募來自高地、谷地的農民<sup>37</sup>，以及來自山脈省(Cordillera)的奇利瓜諾(Chiriguano)印地安人。<sup>38</sup>換句話說，游擊隊當時遭遇的人群，包括藉由墾殖熱潮獲得自己土地的小規模農作者<sup>39</sup>，或者在大規模農作莊園間打工的農民或印地安人，也可能是兩種身份兼具者。例如七月二日記載，前鋒部隊前一晚所借住的地方是位於毗猶黑拉(Piojera)河畔，屬於尼可米德斯·亞德亞加(Nicomedes Arteaga)的咖啡莊

園(plantation)，以農事共享(share crop)的方式運作，有六個來自聖璜(San Juan)的農場工人。<sup>40</sup>

而農業革命後建立的工會，一開始相當於一個村社的範圍，由於要共同爭取關於墾殖地的福利，工會還有某種程度的凝聚力。但六〇年代期間，因為大地主併吞土地情形增加，生計方式由自給自足的耕作轉向薪資勞力後，村社內部因此產生空缺，由高地或谷地來的移民填補。不同來源的移民使用不同的語言或方言，加上經濟分化，以及軍隊的控制，使得工會漸漸失去功能。<sup>41</sup>換言之，切·格瓦拉當時遭遇的，正好是此地村社組織動員呈真空狀態期間，農民對土地的需求所能帶動的動員能量，似乎還沒有累積到一定程度。不過，這也不代表此地完全沒有組織人群的方式。

自小在大峽谷成長的玻國軍官布拉多就指出一項顯著的人群組織方式：家族。<sup>42</sup>例如大峽谷，建於一六一二年，因位於高地與平原間，成為重要的貿易與商業中心，居民擅長貿易活動，活動範圍遠至拉昆尼亞斯(Lagunillas)及其他城市，並擴展他們的家族聯繫。所以拉昆尼亞斯所在的山脈省地區，特別是城鎮裡面，與大峽谷有強大的家族聯繫。這點在游擊隊的地方形象經營上有很大的影響，三月二十三日，游擊隊在與軍方交火時，也誤殺了軍方的農民嚮導艾比法尼奧·瓦

33 Washington Estellano, *Ibid.*

34 例如山脈省(Cordillera)當時只有6.7%的土地在奇利瓜諾村社手上，其中只有一半擁有產權，其餘都屬於大莊園。Washington Estellano, *Ibid.*

35 為莊園主耕作，提供勞力以換取住處、少量薪水，地主常藉由授與工人土地來擴張可耕地範圍。Lesley Gill, *Peasants,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Change: Frontier Development in Lowland Bolivia*,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7.

36 直接隸屬於莊園主(hacendados)，主要由印地安家庭組成。Lesley Gill, *Ibid.*

37 主要移出地為科恰彭巴和裘基沙卡(Chuquisaca)，移民族群身份屬蓋楚瓦語系。Lesley Gill, *Ibid.*

38 Lesley Gill, *Ibid.*

39 格藍德河(Rio Grande)附近的土地，過去屬於瓜拉尼村社居住，墾殖風潮期間，由一個大莊園主賣給墾殖者。Washington Estellano, *op. cit.*

40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 128.

41 Lesley Gill, *op. cit.*

42 Gary Prado Salmón, *op. cit.*

加斯(Epifanio Vargas)，<sup>43</sup>游擊隊成員固然對農民的背叛感到生氣，切·格瓦拉還是親自登門向他的繼父羅達斯(N. Rodas)道歉，以表示他們不是濫殺無辜的惡魔；但是四月二十五日，游擊隊與軍方交火時又誤殺了一名農民嚮導路易·貝特蘭·羅達斯(Luis Beltrán Rodas)，卻不知道這就是羅達斯的孫子。第二個家族成員遇害，引發了遍佈穆猶彭巴(Muyupampa)區域的羅達斯家族對游擊隊的憎惡。<sup>44</sup>穆猶彭巴居民甚至早在四月二十日就組織了代表團去見游擊隊，要求和平的生活，卻得到游擊隊認為武裝革命是唯一出路的回應。<sup>45</sup>

總括來說，這個區域的整體圖像，是一個地形複雜、人口稀少且分散、族群及語言多元、家族內部與家族彼此之間聯繫強大，但農民工會組織真空、土地需求尚未累積到很尖銳程度的區域，作為游擊隊與地方居民互動的大舞台。



攝影/Lucía Chen

#### 四、地方居民如何看待游擊隊——妖魔還是聖者？

由於游擊隊行蹤很早就被軍方發現，使得游擊隊一直處於被追擊的狀態，而幾乎沒有時間和地方居民作長時間的接觸，因此關於地方居民如何看待游擊隊，必須從許多片段的紀錄來拼湊。而這個段落的分析又可分為游擊隊運作時期，及切·格瓦拉身亡後兩點來談。

從《切在玻利維亞日記》，我們對此地農民的最大印象就是，他們大多十分恐懼游擊隊的到來。無論是四月十六至十八日往南邊穆猶彭巴方向推進，所經之處如貝亞維斯塔(Bella Vista)，帝古查(Ticucha)，穆猶彭巴的居民，<sup>46</sup>或者是七月五日至七日從拉胡塔(La Junta)朝北往賽邁巴塔(Samaipata)推進時，<sup>47</sup>切·格瓦拉都記載了居民對他們感到害怕。尤有甚者，從拉胡塔一直遠到拉昆尼亞斯的居民，都恐懼游擊隊會帶來軍隊的報復，而舉家逃離。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害怕呢？今日大峽谷(Vallegrande)的市長艾爾菲多·賈西亞(Alfredo García)回憶起當時(他十二歲)的情景：「因為軍隊的宣傳，我們在夜裡都很害怕，不敢入睡。他們說游擊隊會殺死我們的老人、強暴女孩、偷走小孩。」採訪記者下了一個結論，當初農民不敢加入游擊隊，是因為切·格瓦拉被軍方妖魔化。<sup>48</sup>而這個所謂妖魔化的過程，與地方居民和游擊隊有限的互動經驗，及他們看待外來者的方式都很有關係。

43 早在三月五日，游擊隊的前鋒部隊就在卡米立油田的水源地塔塔倫達遇到採油工人艾比法尼奧·瓦加斯，向他詢問附近情況，因此游擊隊員一眼就從屍首認出他的身份。

44 Gary Prado Salmón, *op. cit.*, p. 93.

45 Gary Prado Salmón, *Ibid.*, pp. 89-90.

46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p. 83-85.

47 *Ibid.*, pp. 129-131.

48 "Bolivia Looks to Che Trail to Attract More Visitors", The Miami Herald, 2004/08/10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07, from <http://www.latinamericastudies.org/che/che-trail.htm>)



他們是「高大、滿臉鬍子的人，帶著背包和武器，操著外國口音，還帶了很多錢。」不過其中有人會講蓋楚瓦語(Quechua)，讓人放心不少。<sup>49</sup>從三月九日油田雇用的卡車司機與其助手討論5日遇到游擊隊前鋒部隊的方式，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大的印象：個子高大、攜帶武器、外國口音、帶了很多錢。而游擊隊最早進駐的鐵皮屋，也早在一月十九日因為附近居民懷疑他們從事古柯鹼製造，意圖牟取暴利而遭到搜查。<sup>50</sup>從這些片段的形象描述，以及具體的恐懼反應，我們該如何理解居民看待游擊隊的方式呢？在此我必須借用惠斯門托(Weismantal)<sup>51</sup>對安地斯山脈區域一個關於種族話題的惡魔形象——庇斯塔克(Pishtaco)來說明。

庇斯塔克是安地斯山脈地區流傳的一種妖魔，它並不存在於某個特定的傳說故事裡，而是一個具體出現的外來者，可能被描述、流傳的形象。雖然關於他的外型與作為描述不一而足，但大致上，從外型看來庇斯塔克是白人，眼睛是藍色或綠色，體型非常高大，身著皮衣皮靴，常常偽裝成某種具有特殊身份或技術者，<sup>52</sup>有書面身份證明可掩蓋其非法行動，並攜帶奇怪的器具；而庇斯塔克進入村莊是想要綁架受害者，將受害者的脂肪擷取殆盡，利用這些脂肪獲利。二十世紀中，庇斯塔克的故事版本也出現軍

官的形象，比如發生在秘魯反光明之路的骯髒之戰(Querra Sucia, 1985-2000)，無論是官方軍隊，還是光明之路游擊隊員，對農民來說都是新的良卡(ñakaq，即蓋楚瓦語的庇斯塔克)，他們像吸血鬼般，把農民的肉拿去餵養游擊隊。<sup>53</sup>維爾加拉·菲格羅(Vergara Figueroa)和卡拉斯克(Carrasco)<sup>54</sup>訪問從高地來的難民時，發現庇斯塔克傳統已經變成談論政治暴力的一種方法。

當然我們並沒有足夠的證據斷言，當時地方居民的確是以庇斯塔克這個概念看待游擊隊當中的非玻國成員或者是切·格瓦拉本人，不過可以從這個概念洞悉的，卻是地方居民有限與游擊隊接觸的經驗裡，大部分是游擊隊的補給，以及的確有幾個當地農民被殺害的消息。雖然切·格瓦拉的游擊隊在補給時，對農民都給予相當大方的現金報酬，或者至少會留有賒帳記錄，以表明他們不是強取豪奪之輩，不過牲畜對此地的農民來說是非常珍貴的家產，而不是大規模畜養販賣的商品，農民賣掉任何一隻牲畜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彌補損失。<sup>55</sup>不過在畜牧業發達的阿根廷成長的切·格瓦拉卻難以理解這點，他在七月三日的日記寫道游擊隊必須用很貴的價錢採買，他認為這是農民用來平衡他們的恐懼的方式，<sup>56</sup>殊不知就連玻國軍隊在此也同樣遭遇肉品補給的問題。<sup>57</sup>

49 Gary Prado Salmón, *op. cit.*, p. 57.

50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 32.

51 Mary Weismantal, *Cholas and Pishtacos: Stories of Race and Sex in the And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52 可能包括教士、僧侶、研究者、攝影記者、工程師等等。

53 Mary Weismantal, *op. cit.*

54 Freddy Ferrúa Carrasco, "Ayacucho: de nuevo los degolladores", en Ansión J., ed, *Pishtacos: de verdugos a sacajos*, Lima, Tarea, Asociación de Publicaciones Educativas, 1989, pp. 123-136。

55 Gary Prado Salmón, *op. cit.*, p. 88.

56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 129.

57 Gary Prado Salmón, *op. cit.*, p. 88.

換言之，雖然游擊隊竭盡所能地友善對待當地居民，他們的存在仍對居民來說是一種剝削，可能就像庇斯塔克一樣，帶走他們的財產，帶走人的生命。九月二十二日，游擊隊到達高旱村，首次有機會與農民作長時間接觸，企圖以演說吸引新血加入窮途末路的游擊隊，並說明自己拿起武器奮戰的理由，沒想到台下的農民一片靜默，<sup>58</sup>他們當時可能並未親眼見過什麼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卻只看到眼前的游擊隊用槍指著他們，<sup>59</sup>指責他們不了解一切都是為了他們而戰，並換走了村子裡許多補給品。

然而，當切·格瓦拉被捕身亡後，最後拘禁他的無花果村，以及他的屍體暫時放置地大峽谷，除了當地居民，十月八日、九日還湧入了許許多多鄰近村社的農民圍觀。玻利維亞軍官推測，<sup>60</sup>想看看傳聞已久的惡煞也是人之常情，此外玻利維亞高地也一直都有關於私刑、屍首示眾的現象及相關討論。<sup>61</sup>不過這個屍體的觀看行動，卻產生了意料之外的結果。當初在大峽谷的醫院幫忙清洗屍體的護士蘇珊娜·奧莘娜加(Susana Osinaga)說：「他來的時候眼睛還開著，讓我印象深刻，他看起來就像基督，有大鬍子、長頭髮

和睜開的眼睛。<sup>62</sup>」

於是，無花果村聖者格瓦拉(San Ernesto de La Higuera)和大峽谷的基督(El Cristo de Vallegrande)的名號便不脛而走。今日，切·格瓦拉的圖像出現在無花果村家戶的牆壁上、市場的攤位上，和耶穌、聖母瑪麗亞、其他天主教聖者的形象被擺在一起。<sup>63</sup>這個現象無法理解為觀光化之後，農民對切·格瓦拉的擁抱；因為聖者施展神蹟的名聲，必定需要靠時間累積。無花果村農民馬努耶·科蒂斯(Manuel Cortez)說：「就好像他還活著，與我們同在，像個朋友一樣。他對我們來說像是聖母一般，我們說『切，幫助我們的工作，也幫助我們這次的耕作。』然後就總是很順利。他當時就像我們的父一樣受難，骨肉都是。<sup>64</sup>」另一個農民璜·巴布羅·艾斯科巴(Juan Pablo Escobar)說：「如果你向天輕聲呼喊切·格瓦拉的名字，或者為他點根蠟燭，你就會找到你走失的牛羊。<sup>65</sup>」

大峽谷的情況則比較複雜，護士蘇珊娜·奧莘娜加和大家一樣有一張切·格瓦拉的照片，她認為：「因為他的血流在大峽谷的土地上，我們將永遠和切的名字連在一起。<sup>66</sup>」市長艾爾菲多·

58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 177.

59 Gary Prado Salmón, *op. cit.*, pp. 168-169.

60 *Ibid.*

61 如Mark Thurner, "Guerra Andina y Política Campesina en el Sitio de La Paz, 1781: Aproximaciones Etnohistóricas a la Práctica Insurreccional a Través de las Fuentes Editadas", *Poder y Violencia en los Andes*, H. Urbano, ed, Cuzco: Centro de Estudios Regionales Andinos,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991), Daniel M. Goldstein, *The Spectacular City: Violence and Performance in Urban Boliv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等。另外，據聞巴利多斯總統知道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時，表達了想要看到他的頭被插在矛頭上，放在拉巴斯城裡展示的樣子。

62 "Bolivia Looks to Che Trail to Attract More Visitors", *op. cit.*

63 "In Bolivia, Push for Che Tourism Follows Locals' Reverence", *Common Dreams News Center*, 2004/08/17,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07, from <http://www.commondreams.org/headlines04/0817-07.htm>)

64 *Ibid.*

65 "On a Tourist Trail in Bolivia's Hills, Che's Fame Lives on", *The Boston Globe*, 2004/10/17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07, from [http://www.boston.com/travel/getaways/latinamerica/articles/2004/10/17/on\\_a\\_tourist\\_t\\_rail\\_in\\_bolivias\\_hills\\_ches\\_fame\\_lives\\_on/](http://www.boston.com/travel/getaways/latinamerica/articles/2004/10/17/on_a_tourist_t_rail_in_bolivias_hills_ches_fame_lives_on/))

66 "Che Guevara Legacy Live on in Bolivia", BBC News, 2004/08/26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07, from <http://news.bbc.co.uk/go/pr/fr/-/1/hi/world/americas/3594994.stm>)

賈西亞說：「現在我們把他看成一個聖者，聖者埃內斯托，彌撒時人們為他的靈魂祈禱，他們覺得他是為我們而死，他的墳前總是充滿了花。<sup>67</sup>」但文化之家博物館館長卡洛斯·索沙(Carlos Sosa)也證實了：「有好一段時間，這裡的人不願意讓我們的城鎮等同於切的名字。他的名字過去還真是嚇壞了大家。但現在我們看到他可以帶給我們的好處了。<sup>68</sup>」

外來者令人恐懼的強大力量，可以是剝奪地方居民的財富與生命的負面力量，也可以是保佑生業順利的正面力量。或許我們不應該說觀光化以後，過去背叛切·格瓦拉的地方居民才很諷刺地熱情擁抱他，因為他們對持有力量的外來者的期待也許從來不曾改變：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切·格瓦拉記下，一位農民向他們借貸一千披索

(peso)來買豬、養豬。切·格瓦拉的觀察是，他有資本主義式的野心，但這個事件也呈現了當地居民對持有力量的外來者的期許。

## 五、後記

在切·格瓦拉逝世四十週年的今日，全世界依然有許多年輕人景仰他的思想、行動與精神。而這樣一篇在有限時間內，完全依靠整理文獻而得的文章，能為景仰切·格瓦拉的青年學子提供的，是除了投注社會關懷的熱情外，我們還需要瞭解被關懷對象如何看待他們生活中遭遇的問題？他們期待我們帶來什麼？和我們原本的理想有什麼不同？如果不同，我們又該如何繼續前進？都是重要的問題。★

---

67 “Bolivia Looks to Che Trail to Attract More Visitors”, *op. cit.*

68 “On a Tourist Trail in Bolivia’s Hills, Che’s Fame Lives on”, *op. cit.*

69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 46.

## 參考書目

### 一、外文部分：

BETHELL, Lesli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ume VI, Part2, 193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GILL, Lesley, *Peasants,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Change: Frontier Development in Lowland Bolivia*,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7.

GOLDSTEIN, Daniel M., *The Spectacular City: Violence and Performance in Urban Boliv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GUEVARA, Ernesto Che, *Bolivian Diary*. L.Á.d., Toledo, transl. London: Pimlico, 2004[1968].

PRADO SALMÓN, Gary, *The Defeat of Che Guevara: Military Response to Guerilla Challenge in Bolivia*, J. Deredita, transl. New York: Praeger, 1990[1987].

RIVERA, Silvia, *Oppressed but not Defeated*, 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87.

THURNER, Mark, “Guerra andina y política campesina en el sitio de La Paz, 1781: aproximaciones etnohistóricas a la práctica insurreccional a través de las fuentes editadas” , *Poder y violencia en los Andes*, H. Urbano ed., Cuzco: Centro de Estudios Regionales Andinos,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991, pp. 93-124.

VERGARA FIGUEROA, Abilio, and Freddy Ferrúa Carrasco, “Ayacucho: de nuevo los degolladores” , *Pishtacos: de verdugos a sacajos*, J. Ansión, ed., Lima: Tarea, Asociación de Publicaciones Educativas, 1989, pp. 123-136.

WATERS, Mary-Alice, ed., *Fertile Ground: Che Guevara and Bolivia, A Firsthand Account by Rodolfo Saldaña*, New York: Pathfinder, 2001.

WEISMANTAL, Mary, *Cholas and Pishtacos: Stories of Race and Sex in the And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二、中文部分：

褚榮瑩，《玻利維亞社會運動策略的空間政治》，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三、網路資訊：

“Bolivia Looks to Che Trail to Attract More Visitors” , The Miami Herald, <http://www.latinameircanstudies.org/che/che-trail.htm>, 2004.08.10.

HALL, Kevin, “Push for Che Tourism Follows Locals’ Reverence” , *Common Dreams News Center*, <http://www.commondreams.org/headlines04/0817-07.htm>, 2004.08.17.

ATKINSON, David, “Che Guevara Legacy Live on in Bolivia” ,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go/pr/fr/-/1/hi/world/americas/3594994.stm>, 2004.08.26.

TOBAR, Hector, “On a Tourist Trail in Bolivia’ s Hills, Che’ s Fame Lives on. The Boston Globe, *Los Angeles Times* , [http://www.boston.com/travel/getaways/latinamerica/articles/2004/10/17/on\\_a\\_tourist\\_trail\\_in\\_bolivias\\_hills\\_ches\\_fame\\_live\\_s\\_on/](http://www.boston.com/travel/getaways/latinamerica/articles/2004/10/17/on_a_tourist_trail_in_bolivias_hills_ches_fame_live_s_on/), 2004.10.17

ESTELLANO, Washington, “Indígenas se organizan para reclamar sus derechos” , *Revista del Sur* No. 77, [http://www.redtercermundo.org.uy/revista\\_del\\_sur/texto\\_completo.php?id=1050](http://www.redtercermundo.org.uy/revista_del_sur/texto_completo.php?id=1050) , 1998.

## 四、地圖：

1. 玻利維亞全國地圖 取自[http://images.nationmaster.com/images/motw/americas/bolivia\\_po193.jpg](http://images.nationmaster.com/images/motw/americas/bolivia_po193.jpg)
2. Ñacahuasu鄰近區域地圖 取自：Guevara, Ernesto Che, *Bolivian Diary*. L.Á.d. Toledo, transl. London: Pimlico, 2004[1968].

# 從《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sup>1</sup> 探討切·格瓦拉的文化認同

許菁育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所研究生

## 一、前言

自拉丁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Simón Bolívar)受德國科學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啓蒙，進而提出美洲主義概念後，拉美文化認同於焉而生。洪堡對拉丁美洲之瞭解，亦說明「旅行」對認識文化的重要性。對切·格瓦拉而言，這趟拉美漫遊意義甚大，不僅對置身所處之美洲文化、習俗、甚至是社會問題等等有更深一層體會，更在旅途中找到自我。

關於文化意含，泰勒爵士(Edward B. Tylor)下了這樣的定義：「所謂文化或文明，在其廣泛民族志之意義上來說，是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慣及其他人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所有能力和習性複合體。」<sup>2</sup>認同包含族群認同，前者比後者範圍要大的多。……群體認同是以文化範疇(或稱社會範疇，有時也可能是生物特質)來建構，所以基本上是一種文化認同，也是一種文化建構。<sup>3</sup>文化認同則是指建立在文化行爲者間，彼此對

類似文化上的自我歸屬感。

西班牙人來到美洲，除了帶來征服所需的武器外，隨之而來的是歐洲文化，特別是語言和宗教的傳入。然而，在這種所謂強勢文化的衝擊下，原生的印地安文化，並未完全因征服者的殺戮而消殆，反而並蓄於歐洲文化中。秘魯學者羅德里格斯(Eugenio Chang-Rodriguez)的「稜鏡說」，具體地描述了美洲大陸文化交匯現象：「自十八世紀起，更加明亮奪目的西方光線在攝入美洲稜鏡後便分解為自己的基本原色，並與原住民的光束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型文化光譜。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光譜已不再是印地安人的，也不是西方的，而變成印地安美洲的文化光譜。」<sup>4</sup>而各種族、文化交融的結果，不僅使得原本美洲不再純粹外，自獨立時期開始，這種以文化為基礎的認同課題便一直存在迄今。政治上，雖然拉美諸國各自為政，但從委內瑞拉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到古巴的荷西·馬帝，甚至於切·格瓦拉的美洲主義還是

1 本文乃參考切·格瓦拉《摩托車日記》中文譯本。中文版全名為《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拉丁美洲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手記》，梁永安等譯，台北，大塊文化，1997年。

2 莊錫昌，《維多視野中的文化理論》，淑馨，1991年，頁123。

3 謝繼昌，《文化、族群與認同》，《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平埔族群與台灣社會大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年，頁1。

4 王松霞、王傳龍，《涅槃與新生—拉美文化的面貌與精神》，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頁60。

殷殷期盼著美洲統合。

本文主要參考其著作《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旨在探討切·格瓦拉的文化認同模式；日記最後切對其美洲主義的論述，為本文探討之重點。對美洲主義者而言，他們的祖國指的是美洲大陸，其依據在於彼此共同的歷史經驗及文化傳承，這也是文化認同中的「可歸化」因子。對美洲主義的信仰，除在切身上可見到，我們在一些拉美歷史人物身上亦可見到這樣的概念。「民族自覺」一章中，我們試圖詮釋形成美洲主義的成因；文章最後，將解析美洲主義未竟之因。

之所以選擇這本書的原因在於日記前面，他寫道：「寫這本日記的這個人，在他重新踏足阿根廷的那一天，就已經死了。組織和打磨過這本日記的那個我，早就不再是我了；最少，現在的我，已不再是過去的那個我了。漫遊南美洲對我所造成的改變，遠超過我所能預見。」<sup>5</sup>另外，一九六〇年，時值古巴革命成功之際，格瓦拉在一次演講中，曾說：「……畢業後，尤其是南北美洲的旅行的展開，改變了我的性格。我從而覺悟到和名醫有貢獻的途徑，這就是解救人類免於貧困、饑餓、疾病的大事業。」<sup>6</sup>是故，這趟環拉丁美洲之旅對其影響之大，可見一斑。另一方面而言，他從小生長在阿根廷，這個公認歐化最深的拉美國家，不論其白人身份或是其文化內涵之養成，皆以西方思想為主體。《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中所記載的見聞，藉著其個人(主體)與拉丁美洲大陸(客體)的互動，並與拉丁美洲騷人墨客、政治家思想比較其異同，我們得以歸納出切·格瓦拉的文化認同

模式。

## 二、 認同與拉丁美洲

在傳統的原始社會，集體意識甚於一切，同時它亦是傳統信仰及社會集體的一個先決條件，並嚴格地規範思想領域及行為。當時以部落群體為主的社會，個體所扮演的角色，都照著人類既定路線而行，個體不會經歷認同危機亦無主體性。到了現今社會，由於社會快速變遷，認同變為更個人化，也賦與更多的自我反思。一些社會學家如黑格爾(Hegel)，將認同定義在相互承認上，就好比說自我認同有賴於他人承認並結合自我確認(self-validation)。<sup>7</sup>也就是說「認同」往往是在與他人或組織發生關係的過程中產生的。構成認同的基礎不僅有共性，且有差異性，有時更因差異而帶來認同的需要。米德(George H. Mead)認為，人的意識是在相互聯繫、相互依賴的行動過程中產生，人對外部世界的認識與適應是通過詮釋(語言)而實現，並提出人類心靈對「象徵符號」的理解和運用，涉及自我發展三階段-玩耍階段(play)、遊戲階段(game)和概化階段(generalize)。其中概化階段，也是社會化地從主我(I)產生客我(me)的過程，並進一步認為，一旦經過了概化他人作用，就能從做為生理上的有機體轉化為具備「反身性」的、社會性的「客我」階段。<sup>8</sup>也就是說，主、客體可以相互轉換。接著以最原始的自我認同出發，慢慢地，發展出族群認同。

傳統的族群認同是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所

5 梁永安等譯，前揭書，台北，大塊文化，1997年，頁20。

6 楊碧川，《格瓦拉傳》，台北，大作文化，2000年，頁63。

7 Scott Lash and Jonathan Friedman, *Modernity and Identity*, Frankfurt, Blackwell, 1992, p. 142.

8 石計生，《社會學理論》，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頁285。

形塑的一種歸屬感形式，這種共同價值觀的賦予，使他們的生存利益，生活習慣、規則與文化，擁有共同的核心。族群認同元素，基本上是由血統、傳統、習俗、宗教、語言等等人類原生情感因子所構成。族群或族群性的產生和持續是人們「主觀」認定，再經由「根本賦予的情感」和「社會關係」二個主、客體要素作用下的產物。主觀認定是一個族群認同的主觀認知與情感，牽涉到與他族互動的過程經驗。<sup>9</sup>在主、客體要素運作下，族群經由共同來源，以進行認同，而這些共同來源指的是可被繼承的原生生物或文化特質，像血緣等等；也可以是「歸化的」(Naturalized)，如語言、宗教或族群歷史等等。<sup>10</sup>

一九八六年，杜納(Turner)和塔非爾(Tajfel)區分了個體認同與社會認同，認為個體認同是指對個人的認同作用，或通常說明個體具體特點的自我描述，是個人特有的自我參照；而社會認同是指社會的認同作用，或是由一個社會類別全體成員的自我描述，也就是說個體認識到自己屬於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意識到作為群體成員帶給個體本身的情感和價值意義。<sup>11</sup>杜納(Turner)進一步提出「自我分類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他認為人們將他人分類時，會自動地，區分我群和他群，並自我定型。<sup>12</sup>族群意識方面，柯達克(Conrad P. Kottak)認為所謂族群意識是指對其所屬族群的認同感，並對他族加以產生排斥感。<sup>13</sup>

綜合以上，族群認同範疇，大至社會、文化、小至生物等特質為其建構之本，因此進一步而言，族群認同是一種文化認同形式。總而言之，文化認同是指，文化身份的認同，加上自我歸屬感，並建立在彼此所擁有的相似文化基礎上，也就是說，文化認同立基於歷史事實及其社會價值之賦與上。

拉丁美洲自殖民時期開始，由於歐洲白人、黑人、甚至是後來的有限亞洲移民，加上種族間混血而成的新種族形態，使得其種族結構，從殖民前的單一原住民種族，轉變為多元種族型態。原本族群以其生物特質來認同族群性之因子，面對拉丁美洲多元族群型態，漸以傳承自西方語言、歷史、宗教或原住民文化這些可歸化的文化特質之建構，作為其認同的依據。切·格瓦拉在日記中的一段對庫斯科大教堂的描寫，以印地安人或麥斯提佐人在杉木上的聖人事蹟雕刻，所展現的天主教派與拉美當地居民精神之結合，不但表現出歐洲人和拉美原住民，從種族衝突到文化融合之果，更說明了拉丁美洲文化的獨特性及多元性。

真正的藝術精華，是那些木頭唱詩班座席。印地安人或麥斯提佐人在杉木上的雕刻，描繪一些聖人的行跡，真正結合了天主教派精神和安第斯居民謎樣的靈魂。……庫斯科寶貝之一，也是所有觀光客都應該一遊的，是聖巴拉斯大會堂的講道壇……比如大教堂裡的唱詩班座席，也透露出兩個民族的融合，雖然

9 江孟芳，《族群運動與社會過程—當代「噶瑪蘭」認同現象分析》，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7。

10 Rita Astuti, "The Vezo are not a kind of people: Identity, Difference, and "Ethnicity" among a Fishing People of Western Madagascar", *American Ethnologist*,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pp.464-482. 轉引自謝繼昌，前揭書，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年，頁4。

11 Henri Tajfe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pp. 24-36.

12 張寶瑞、佐斌，〈社會認同及其發展〉，《心理科學發展》，第14卷3期，2006年，頁475-480。

13 Conrad Philip Kottak, *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97, p. 50.

互敵，但也互補。<sup>14</sup>

族群方面，荷西·馬帝在《我的種族》中，說道：「種族主義者現在是一個含混不清的字眼……人不能因為屬於這個或那個種族就享有權力，因為只要說人，就等於說出了所有的權力……要和平就須有天然的共同權力：分裂的權力是反自由，亦是和平的大敵。」可見得，對他而言，不分人種，定居在拉丁美洲的就是美洲的一份子。<sup>15</sup>

### 三、真、假自我

然而，一旦一文化、民族共同體若喪失文化認同，心理生存將會迷失在一個以「假自我」來維持的衝突情境中，因而無法找到「真自我」。一九三〇年代，時值歐洲面臨法西斯主義挑戰。由於當時西班牙發生內戰，導致許多西班牙哲學家流亡至墨西哥。這股歐洲知識力量的重新注入，影響文化認同的再省思。為此，拉莫斯(Samuel Ramos)對文化確實性提出答辯：問題一、區域文化形成是否僅反應出本土或異國價值觀，亦或是二者皆可並存於區域社群內？問題二、一獨特文化是否能凝聚持久自主價值？舉個例子來說，以墨西哥而言，文化本身能否有認同過去和認同未來的能力。換言之，其文化未來是否任由流行或外國文化所主宰。<sup>16</sup>

針對這二個問題，他認為這是文化核心價值存在與否的問題。一國甚至是一個區域的文化價值，面臨異文化的衝擊時，不應一味地仿效，而

是在保有並認同自體文化價值外，再思索其他文化之可能性。同時，困惑或缺乏自我認同及自我現實的明確定義，將導致失去確實性。一個文化選擇全然模仿外來文化，表示文化無法定位自我價值，並且在過度崇拜外來文化後，最後失去認同價值的能力。

以墨西哥為例，拉莫斯強調「不確定性」的徵結在於：一、文化優劣：一般人認為墨西哥文化低於歐洲文化，他認為這就是導致墨西哥人盲目地讓歐洲文化囿限之因；二、自我認知不足：對本身缺乏現實認知結果，致使墨西哥人活在不真實的幻象中，並會加深現實與幻覺的斷層；三、基本的道德價值貧乏：將會使墨西哥人誤認為，人活著就只為生存，活一天算一天，而對過去或未來不假思索。<sup>17</sup>對於拉莫斯而言，自我認同定位是明確且至關重要的，其實不僅止於墨西哥，對於自我價值未定位，亦存在於整個拉丁美洲。

對那裡的女人來說，有一個「白人男友」可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你完全不需要工作，那裡的女人自會供養你；你唯一要管的就只有吃喝拉睡和讓她們爽這兩件事。』照他們的說法，復活節島有最理想的氣候、最理想的女人、最理想的食物、最理想的工作（因為根本不用工作）。到得了復活節島的話，誰又會在意一年內無法離開？誰還會把研究、工作、家人這些事放在心上？在一間餐廳的櫥窗內，擺設一隻墊有高苣菜的龍蝦，我覺得牠好像在用整個身體對我和阿爾貝托說話：「我來自復活節島，那裡有最理想的氣

14 梁永安等譯，前揭書，頁149-150。

15 林盛彬，〈拉丁美洲文學發展模式：從哥倫布到二十世紀初〉，《拉丁美洲研究》，台北，五南出版社，2001年，頁273。

16 Ofelia Schutt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Liber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 75-80.

17 *Ibid.*



候、最理想的女人。」<sup>18</sup>

聽到兩個人報案說有人被謀殺，這兩人分別是死者的兒子及自稱為死者朋友的黑白混血兒……他們懷疑兇手是印地安人，兩人還把他的照片帶來。當值士官把照片給我們看時，說：「你們瞧，長得一付標準殺人凶手模樣。」<sup>19</sup>

……卡車上和我們一道的是那個前去報案的混血兒，有次停車休息時他買了東西請我們吃，跟我們大談咖啡、木瓜及秘魯黑奴，他祖父就是個黑奴。他對這點並不諱言，但他顯然對這事引以為恥。<sup>20</sup>

三段文字皆取自日記中 前段是人們對復活節島的描寫及格瓦拉的心得，第二段是值士官對兇手的評斷，後段是格瓦拉對黑白種混血兒朋友的描寫。三者(特別是第二段值士官對兇手之不察)表現出來的是，層層看似分明但卻又模糊的種族階層，仍存在於拉丁美洲行爲者中。白種人本身存在著優越感，而其他種人則是因經濟、文化、政治及社會各層面的劣勢，面臨一般所認知的優勢白人文化，其自我認同開始混淆，進而選擇崇拜。藉由這個白人男友，以凸顯自身價值。另外，第三段，藉穆拉托人(Mulato)對於本身血緣的不肯定，這剛好呼應拉莫斯所點出的三點不確定性的徵結。這時候的格瓦拉，不論是人們對他的評價，或是其個人思維，皆以一個白人爲出發點。可見得，對他這個時期而言，所認爲的存在價值，莫過於其白人血統。但這個從殖民時期的

族裔秩序所建立之血統憑證，卻一直困擾著克里歐優人。委內瑞拉解放者西蒙·玻利瓦曾說過：「……我們既不是印地安人，又不是歐洲人……我們仍是一個醞釀之中的族類……。」可見得，對土生白人或是其他人種而言，在找尋真自我的過程中，其處境相當尷尬。

拉莫斯認爲唯有保有核心價值，才能有兼容其他文化的本錢。話雖如此，對於拉丁美洲這個擁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及混血族群中，其核心價值又何在？長久以來，拉丁美洲文化是以歐洲文化爲主體，而原住民、非洲、和有限的亞洲等文化則成爲解構這個主體文化的次要元素，也因此，拉丁美洲富有特色的混合文化結構，構成其文化獨特性。然而，在這樣豐饒的文化中，該如何保持其文化特性呢？委內瑞拉詩人安德烈斯·裴優(Andrés Bello)在《美洲文化自主性》(Autonomía cultural de América)中，提到「我們尤其要預防過度依附於文明歐洲的學術……希臘文化征服了羅馬；當歐洲各個現代民族致力於重整他們的文化之時，希臘和羅馬文化征服了他們；現在，我們受到歐洲的影響，在吸收他們光芒之餘，我們應該模仿其思想的獨立。」<sup>21</sup>由此可知，對於裴優來說，他深知除保有拉美在地文化外，唯有學習歐洲文化長處，才能讓拉美文化富有特性，進而創造自身文化。現實上，獨立後，各國地域及利益上限制，相較於拉美各國的國族認同，更突顯泛拉丁美洲文化認同課題實行的困難性。

無論如何，三百年的殖民統治，最後在歐洲啓蒙思想的啓發下，拉丁美洲人逐漸萌發了獨立意

18 梁永安等譯，前揭書，頁77。

19 梁永安等譯，前揭書，頁170。

20 梁永安等譯，前揭書，頁171。

21 林盛彬，前揭書，頁273。

識，認為拉丁美洲是一個整體，不應由西班牙、葡萄牙這樣的宗主國來主導，因此，造就了一個新的民族——拉丁美洲民族。<sup>22</sup> 然，拉丁美洲自殖民時期開始，直至現代，無論是在社會、經濟、政治方面都深受外界影響。想當然爾，對拉丁美洲人而言，在好不容易擺脫西班牙殖民者的桎梏後，面對著其他歐洲國家，甚至是與之相鄰的盎格魯·薩克遜美洲的經濟侵略，無不隱隱觸動著他們心中的敏感帶，不單激起拉美人的抗禦情結，他們更從中尋找自我認同。

#### 四、 民族自覺

拉美人主觀實體(subjective reality)的心理狀態上，不論男女，皆為文化行為者(makers)。<sup>23</sup> 康諾(Walker Conner)曾針對發生民族自覺情境，提出四個因素，當中，經濟、政治或文化的相對剝奪感，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個變因。沒有上述之相對剝奪感發生，那麼，對於存留內心的族群意識和關切群體的共同利益，這兩方面覺醒是不會發生的。<sup>24</sup> 對於長久以來，自覺深受外界其害的拉美人而言，面對著接踵而來的外界壓力，激發出拉美的民族主義。這樣的民族意識是相對於殖民主義下的產物，也誠如柯達克所言，族群常藉由族群意識來對於其他族群加以排斥。拉美人善於描繪與歐洲及盎格魯薩克遜美洲間，如此二元對立的情緒，其例不勝枚舉。

日記中，除了看到切·格瓦拉遊歷各國的趣事及軼聞，我們發現，一篇篇平凡無奇的記載之

中，隱含著格瓦拉對拉丁美洲這塊母土的積極態度，蘊釀著一個大拉美情懷。其民族自覺模式，是他本身的文化素養而成，也或許是屬於拉丁美洲行為者自發性的民族主義，以致於讓我們在他身上找到了與其他拉丁美洲行為者的交集點。

南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在〈牙買加之書〉(“La Carta de Jamaica”)提出美洲主義概念後，一種打破疆界、族群藩籬的在地情感，拉美文化認同因而產生。書信內容中，不難看出在歷經西班牙三百年殖民過程中，拉美人面對著殖民者(他)與被殖民者(我)間，這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從屬關係，漸漸地，演變成屬於自己的主觀思維。

顯而易見的是，當時土生白人，或是多元混血族群，普遍對自己身份認同的不明確性，並試圖定義自己的在地認同感，意念中的拉丁美洲民族，應運而生。時至近代，日記中，切·格瓦拉以一個白人的身份，參訪著名印地安古蹟，一方面讚賞著原住民的智慧，並對於那段西班牙征服歷史，提出自己的看法。從其評論中，我們發現，他的拉丁美洲在地意識已形成。文章中所稱的「你」則代表著全體拉丁美洲人，藉以「印加帝國」為發想，代表著擁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拉丁美洲。

當奧克洛媽媽(Mama Occllo)的黃金楔子從手中落下，倏忽掉落在土壤裡之後，最早的印加人知道：這就是比拉可恰給祂的選民所挑好的永遠家園……

22 王松霞、王傳龍，前揭書，頁66。

23 Ofelia Schutte, *Op.Cit.*, p.23.

24 Chen-Feng Shih, “The Emergence of Basque Nationalism, an examination of some explanatory variables”, *XV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ional Peace Reserch Association*, Malta, 1994, p. 3

25 梁永安等譯，前揭書，頁135。

所以，當愚蠢而又無知的西班牙征服者摧毀了他們的要塞後，在那些廢棄的、殘破的神殿裡，在那些劫掠一空的宮殿中，在那些遭受摧殘的印地安人之間，我們聽到的是那個在哀怨低吟的庫斯科。這個庫斯科在邀請你化身為戰士，棍棒入手，防衛印加的自由與生命。<sup>25</sup>……另外，還有一個庫斯科。這是一個活力充沛的城市，見證那些在西班牙旗幟底下征服這個區域的勇氣，這些勇氣寫在紀念碑、博物館和圖書館裡，呈現在教堂的裝潢裡，流露在白人領袖到今天還以征服者自傲的獨特面容裡。這個庫斯科邀請你穿起盔甲，跨上強健的戰馬，在不堪匹敵的印地安人血肉之軀間殺出一條血路，使他們的人牆在奔騰的鐵蹄下灰飛煙散。……<sup>26</sup>

認同、尊重、包容在美洲上各種族文化，如西方文化、原住民印地安古文明，為拉美文化核心價值外，如前述康諾所言，發生民族自覺的主要情境因素中，經濟、文化、政治的相對剝奪感，亦發生在拉丁美洲人尋找認同的模式中。除了原先與歐洲強權間的愛恨情仇外，對於以美國為主的盎格魯撒克遜美洲，我們在拉丁美洲人身上發現，他們除了有著不亞於歐洲殖民者的拮抗情節外，其情緒甚至更加複雜糾葛。《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中，切·格瓦拉以智利為例，藉著對美國影響力的評析，表達既不滿卻又無可奈何的心情：

就智利這個國家而言，任何人只要不是無產階級，也就是說，任何人只要接受過一定的教育和技術智

識，而他又想工作，那智利政府就會提供各種經濟上的可能發展。……智利首要之務，是擺脫他們背上煩人的洋基佬朋友，但由於美國的投資十分鉅大，不管他們在何處的利益受到威脅，他們都可以輕易地製造一些經濟壓力，所以，這還是件艱鉅的任務。起碼目前如此。<sup>27</sup>

早在一八九八年美西戰後，烏拉圭思想家羅舵(José Enrique Rodó)一九〇〇年所出版的《愛麗兒》(Ariel)一書中，他以莎翁《暴風雨》(la Tempestad)中之要角愛麗兒(Ariel)、卡利班(Caribán)角色的象徵性及意識化來代表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文化思維。以美國為首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為卡利班、<sup>28</sup>愛麗兒則代表拉丁美洲精神。<sup>29</sup>羅舵愛麗兒主義的發表，藉由如波斯牟尼教善惡二元論般的表現，與其所謂的「北方巨人」霸權對抗而生，同時也冀希拉美人能傳承拉丁美洲自身的文化價值。

此外，對於與盎格魯撒克遜美洲的拮抗情節，一八九五年古巴文學家荷西·馬帝(José Martí)談及美國時，有這樣的描述：「我曾生活在怪物體內，它內部構造我瞭若指掌，而我的武器僅是大衛的投石機。」其散文作品《我們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中，亦提到：「我們(拉丁美洲人)是身著英國長褲、巴黎毛衣、美國夾克、西班牙帽子的破布偶。」<sup>30</sup>，可見得他認為拉丁美洲人應走出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而非一味隨列強擺佈。對於荷西·馬帝來說，他指的兩個美洲，一個是「我們的美洲」(即拉丁美洲)，另一個則是背景迥異的

26 同上註，頁135-136。

27 同上註，頁109。

28 原文字型類似canibal，意指食人族。

29 陳小雀，《加勒比海諸國史-海盜與冒險者的天堂》，台北，三民書局，2007年，頁3。

30 José Martí, *Nuestra América*, La Habana, Editorial Nacional de Cuba, 1963, p.63.

另一個美洲(即盎格魯薩克遜美洲)，並期望拉丁美洲能鞏固本身的文化自主性。一方面，他也注意到這兩個美洲遲早要建立正常關係，但前提是要在足夠的力量以及自信心的基礎上，方能有平等關係。<sup>31</sup>墨西哥文學家帕斯(Octavio Paz)，對拉美民族與北美民族間，明確地，描述這種又愛又恨(odio-amor)的情緒關係，他提到：

北美人總是會長伴我們左右，包括當他們忽視我們及背對著我們的時刻。他的身影完全地涵蓋了半個世界。這是個巨人影子。而這個巨人所賦予我們的意象和所有仙女傳說故事所描述的不謀而合；他是一個和藹的大傢伙，有點簡約，一個漠視自身力量的天真者，大部分的時間，我們對他懵懂無知，但他的氣息一不小心卻會將我們毀滅。<sup>32</sup>

切在參訪印加古蹟馬丘比丘(Machu Picchu)後，對如此二元民族間之關係，亦有這樣的一段敘述：

不能否認的是，我們所看到的，是美洲大陸上最固有也最強悍的民族真實呈現，征服者的文明沒有影響到這裡……來自北美洲的觀光客，被他們對這個世界現實所局限，也許可以把旅途中看到的沒落民族代表和那些一度生機盎然的山壁相聯想，但他們卻沒法區分這兩者間精神上的差異，只有南美洲人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精神，才可以掌握其中微妙的區別。<sup>33</sup>

這裡的北美人指的是來自盎格魯薩克遜美洲的

美國。對於切·格瓦拉而言，其所謂的美洲，亦分為兩個美洲，即北方的盎格魯薩克遜美洲，和南方的拉丁美洲。這段話，藉著「沒落民族」和「生機盎然的山壁」二者對比，以後者來代表一個民族文化精神的不死。雖然民族遭禍，但其文化生命力卻永不朽於世人面前，接著他以北美人不懂其差異，比喻著拉美多元豐富的文化歷史，儘管面對著北美文化入侵，卻無法抹滅其文化特性。無庸置疑地，對玻利瓦、羅舵、馬帝、帕斯及切·格瓦拉而言，他們在時空、地域的錯置下，卻有志一同地，對其土生土長的地區產生文化情感連結，達成共識。

## 五、 美洲主義

在日記的後半部，在聖帕布羅的麻瘋病村行醫時，麻瘋病院全體人員，為切·格瓦拉舉行的二十四歲生日派對中，他以拉丁美洲為名所發表的一席慷慨激昂談話，為該書重頭戲之所在。而這也呼應了西蒙·玻利瓦、荷西·馬帝的美洲主義。他們深信所居住的美洲，乃繼承著歐洲及美洲本土文化，因此擁有共同的文化傳統。我們更可觀察到，美洲主義乃是拉丁美洲區域文化認同的重要一環，這也是許多拉美人經過長久以來，外界在經濟、文化、政治方面，令他們感受到相對剝奪感下的產物，亦為反映民族自覺之結果。

雖然我們本來不認識，你們卻如此熱情為我慶生，彷彿我是你們的一份子。我還想再說幾句話。再過幾天，我們就要離開秘魯，所以我的話也算是餞別。

31 王松霞、王傳龍，前揭書，頁71。

32 José Guadalupe Vargas Hernández, "Algunos Mitos, Estereotipos, Realidades y Retos de Latinoamérica", *Hoal*, Núm. 3, 2004.02, pp.62-63.

33 梁永安等譯，前揭書，頁145。

我要強調我對這個國家所有人民的感謝之意，自從我們在塔克納踏上秘魯的土地以來，你們一再表現出好客之風。我想再說一件事，……我們雖然是微不足道，但我們相信把美洲劃分為各個不穩定且本來不存在的國家，是一種膽大的虛妄，而我們的旅途更加增強了我們的信念。我們是個單一的混血融合民族，有著種族上太多的共同點，從墨西哥到麥哲倫海峽都一樣。也就因此，為了打破所有的偏狹地域主義，我舉杯為秘魯及團結的美洲祝賀！<sup>34</sup>

一八二六年，巴拿馬會議召開，玻利瓦進一步提出建立「美洲聯邦」的想法，以落實美洲主義理想。雖然當時其大拉美共和國理想並未實現，但他對美洲整合的意念，卻成爲了後來拉丁美洲文化傳統的一部分。<sup>35</sup>事實上，切·格瓦拉亦是繼承這個傳統的文化行爲者，然而，這種屬於拉丁美洲的文化認同根基，除了在於可被繼承的原生生物或文化特質，其立論依據是在於語言、宗教或族群歷史等可「歸化的」特質。對美洲主義者而言，西班牙三百年來的統治，所帶來的宗教、語言的強殖，以及混血種族的多樣化，早已使得原本族群認同定義像血緣等生物特質共同來源鑑別，不敷使用。因此這些所謂可被繼承的文化特質，便成爲他們所信仰的對象。

美洲主義興起時間，溯源至獨立運動時期，十八世紀末，西方世界經歷了大變革。統治人類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在歐、美兩洲大部分地區呈現全面解體和崩潰之勢，民主革命於一七七六至一七八三年及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間，分

別在北美英屬十三個殖民地與歐洲大陸的法國獲得成功，而這股浪潮，也影響了長期遭受西、葡兩國殖民主義與專制統治的美洲上。<sup>36</sup>拉丁美洲人民紛紛高舉民族解放的革命旗幟，並打著獨立的訴求，向舊帝國主義的殖民母國宣戰。阿根廷學者帕拉西歐(Alfredo Palacios)曾列舉了在一八一一到一八四七年間，一些發生於美洲的大事件，並將當時參與革命的人物，如玻利瓦、聖馬丁(San Martín)、沃伊金斯(Bernardo O'Higgins)等等，稱其爲「美洲團結英雄」。以下是節錄自其論文中的一段引文，他認爲無論是巴拿馬會議、墨西哥革命等皆是爲美洲祖國所做的努力。文中，他對所謂美洲共同特性的描寫，清晰可見。

一八二六年巴拿馬會議確立了一個聯邦共和國。接著在一八四七年的利馬宣布，拉丁美洲上的眾共和國皆擁有相同的來源、語言、及傳統。由於地理位置的相關性，基於共同防禦外侮、和擁有類似的創制機構的理由，以及，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彼此有共需、互利之事實，因此各邦不能只顧自己，而是要視其爲聯邦共和國的一份子。<sup>37</sup>

美洲主義的出現，微妙地詮釋了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間的關係，換言之，族群建構可以爲一種文化建構。帕拉西歐認爲所謂「美洲主義」的基礎訴諸於國族主義情愫。從下文中，我們可清楚看見他對於這種情緒的描寫：

34 同上註，頁201。

35 王松霞、王傳龍，前揭書，頁70。

36 李春輝，《拉丁美洲史稿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年，頁131-156。

37 Alfredo Palacios, "La juventud universitaria y la tentativa de fascismo en la Argentina", *Conferencia en la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1928, p.163.

阿根廷的軍隊在智利吹起勝利的號角，解放秘魯。哥倫比亞人是愛阿庫綽的贏家；委內瑞拉人，玻利瓦爾，解放了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和玻利維亞。由北到南，秘魯人賈西亞·卡德隆還記憶著，那美妙的手足情、奇特的祖國交流，……在這些光榮的戰役中，那有志一同，如兄弟般的長期緊密關係，激勵著一份歷久不衰的情感：美洲主義。我們的革命是屬於整個美洲的。所有史學家皆有鑑可證，羅哈斯(Rojas)也業已肯定了阿根廷文化(La argentinidad)擁抱著美洲文化(La americanidad)那高貴的靈魂……我們只認為，必須要在我們的美洲及全體身為革命之子的美洲人身上推動一個永久公義的理想，……<sup>38</sup>

從其論述中，除孺慕美洲大一統外，亦顯示另一個重點，來映襯著美洲主義的必要性，正如本文前述之與美國的拮抗情結。整個論調中，他表達反帝國主義態度。事實上，美洲團結思想之實踐，不單是由拉丁美洲人所提出。一八二三年美國總統門羅，其「門羅宣言」就已明白地宣示美洲人之主權。但拉丁美洲人卻認為，美國以此宣言為口號，藉以干涉美洲各國事務。帕氏針對美國所策劃的門羅宣言、泛美主義等等的政策有所批判，並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美洲乃為歐洲的美洲，對拉美人而言，它是另一個歐洲殖民主義遺毒。因此他主張「我們就是我們」(nosotros somos)，<sup>39</sup>意即是包含印地安原住民及混血族群的拉美人應走出自己的路，甚至提出「美洲公民」(ciudadanía continental)<sup>40</sup> 概念，以實踐其文化認同內涵。

依照帕氏所言，所謂美洲主義乃是一種愛國主義的延伸，其思想勾勒出拉丁美洲民族主義的輪廓及特徵。實際上，帕氏的美洲主義概念和時空背景與切·格瓦拉相差無幾，同時遙應玻利瓦。切·格瓦拉業已肯定原住民文化，在其秘魯總督城一遊中，有這樣的描述：「這個貴族氣息城市中我們最喜歡的一角，是考古及人類學博物館，我們常到這來重溫我們對馬丘比丘的記憶。此館是由純印地安血統的學者胡立歐·泰耀(Julio Tello)所創立，館內有著許多珍貴少有的收藏，展現了整個文化的深廣度。」<sup>41</sup>字裡行間，隱約嗅出他推崇原住民文化的氣息，且認同其文化地位與歐洲文化互容於拉丁美洲大陸。

## 六、 失敗之因

這理想美洲主義，其實踐性相當值得懷疑。歷史上，拉丁美洲從來就沒有建立過一個完整的美洲國。一直以來，拉丁美洲這個名詞僅表一個，相較於歐亞非洲及包括美國的北美洲，在社會、文化、及政治方面更為同質的大陸。這是由於歷經三世紀殖民統治後，殖民母國將這塊土地，同化之果。然而，美洲主義者立論之依歸(指的是宗教、語言、傳統、及混血種族等因子)，縱然是美洲統合的充分條件，但卻非必要條件。現實上仍有許多因素制衡著美洲主義，如殖民時期行政區的劃分，促使區域間各單位權力競逐，這後來演變為鞏固各國民族主義的原因之一；另外，文化、種族間衝突、宗主國商業壟斷政策，再加上地域阻隔等等，造就區域間互不干涉的孤立狀

38 *Ibid.* .p. 162.

39 *Ibid.* p. 168.

40 *Ibid.*

41 梁永安等譯，前揭書，頁216。

態，更令美洲在整合之路上，顛簸難行。

殖民結束後，接踵而來的是伊比利美洲各國民族主義興起。自一八一一至一八四四年間，由於各區域寡頭階級間(Oligarquías)的權力衝突，導致內戰不斷爆發。這使得因獨立戰爭，而百廢待興的拉丁美洲，很快地，又置身於一場場，由利益團體所引爆的內戰之中。一八一一年，巴拉圭自阿根廷獨立；一八二一年，巴西併吞烏拉圭；一八二五年玻利維亞從秘魯與巴西獨立，並與阿根廷發生衝突；一八二八年烏拉圭自巴西獨立；一八三〇年大哥倫比亞分裂為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三國；一八三二年，哥倫比亞向厄瓜多宣戰等等，直到一八四四年聖多明哥共和國自海地分裂。

殖民時期的行政區統治階級，獨立後，演變為各國寡頭階級，其組成皆為克里奧人。事實上，這些克里奧統治階級，雖是直接促成拉美獨立的因子，他們也是造成美洲主義滯礙難行的原因之一。西蒙·玻利瓦當時做了以下評述：

……既然擁有同一個根源、同一種語言、相似的習慣和同一種宗教，他們本應該組成一個共同政府，讓它聯合起已經建立起的不同國度，然而這是不可能的，特殊的氣候、差異的形勢、悖逆的利益、紛染的特點分裂了美洲。……但願有一天，我們能夠有幸在那裡建立一個包括各個共和國、王國、帝國在內的大型代表會議機構…… 42

可見得，玻利瓦雖瞭解到拉丁美洲在文化、

社會、傳統上有著許多同質處，並夢想著，能連結這麼一塊各方面如此雷同的大陸，但他亦深知拉丁美洲整合的困難性。德哈達(Luis Tejada Ripalda)認為拉丁美洲國族主義興起是基於以下二個因素：其一、殖民時期劃分的行政區：造成根深蒂固的地區主義，而獨立時期的「保持佔領原則」(uti possidetis)，則轉變為爾後國家用來擴張領土的準則。其二、各地寡頭階級及政治利益團體的出現：不僅鞏固地方勢力，並促使地方統治團體出現(特別是克里歐優領導的軍隊)。43由此可見，拉丁美洲國家的創建並非立基於各族群間相同的歷史、社會、文化，而是在於行政區隔與政治利益之糾葛。德氏亦認為，對統治團體而言，其祖國概念主要是基於前面所提及之「政治-行政暨領土之國家表述」(el Estado como expresión territorial y político-administrativa)，而非視國家為一「歷史共同體」(la comunidad histórica)。44 基於以上理由，對於以文化共同體為表述的美洲主義而言，無論在現實層面及其內涵上，皆無實踐之可能。

然而，對於奉美洲主義為圭臬者而言，他們堅信美洲民族之所存，在於語言、種族、宗教、傳統之共同性。也因此，早期許多克里奧美洲主義者們，常把美洲大陸寄語母親之名，將拉丁美洲文化行為者以手足相稱，以隱喻其美洲特性。另外，由於其克里歐優身份，與政治利益團體相符，因此，他們的美洲主義亦遭人詬病為合理化其政治意圖之藉口。雖然後人對美洲主義質疑聲浪不斷，但此番漫遊拉美，切·格瓦拉

42 王松霞、王傳龍，前揭書，頁18。

43 Luis Tejada Ripalda, "El americanismo: Consideraciones sobre el nacionalismo continental latinoamericano",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 Núm 12, Lima, 2004, p.174.

44 *Ibid.* p.173.

以一個平凡的旅人角色，透過共同的語言、文化的理解，與當地居民與古原住民文明對話。他的角色，非權謀的政治家，而是以文化觀察者的身份，置身其中，確立對美洲的文化認同。

## 七、 結論

從西蒙·玻利瓦到荷西·馬帝、到近代的切·格瓦拉等等，這些承襲自歐洲傳統的拉美在地政治家、學者、甚至是百姓，無不汲汲營營地，找尋屬於拉丁美洲的文化認同。然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是極其複雜敏感的問題。拉丁美洲在歷史的洪流中，從原住民社會、歐洲殖民至近代，其文化主體及行為者組成不再純粹，人種的混合、文化的交流，有如百匯一聚。歐洲文化、非洲文化甚至亞洲文化一同，在這個曾發展出高度文明、地形詭譎多變、土地遼闊的異世界中，與美洲原住民文化，交織而成拉丁美洲文化。種族方面，拉丁美洲經過了多種族間的衝突，漸漸地，在各個迥異文化磨合過程中，慢慢地去學習尊重彼此文化。也就是說，在拉丁美洲這個移民社會中，其文化為一多族群融合的文化，所謂的族群認同定義，像血緣等生物特質共同來源，已不適合將此標準套用其身。事實上，除去政治意涵的質疑，這趟美洲之行，切·格瓦拉的認同，是極具拉美特色的文化認同，他認為拉美文化，乃全體拉美人民可參與之，且不因身份背景差異而有所區別。

從切·格瓦拉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超越族群性的文化認同意象。他出身於優沃的克里歐優階級，在阿根廷甚至是整個拉丁美洲社會，皆以歐洲文化為其文化主體。旅行的過程中，他對所居住的土地不僅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及反思外，更

注入了對拉美文化的熱愛及認同。其理念的出發點，還是在於他認同自身所處的文化，立定自我核心價值。我們可以說，其文化認同的形成，是由拉丁美洲多元社會客體及其自我主體，交互影響而成。誠如拉莫斯認為，唯確立自身價值，才有兼容其他文化的本錢。然而，他後來的失敗，不但再度道出美洲主義的烏托邦化，也顯示出拉丁美洲以文化共同體為基石，來進行整合的困難處。對拉丁美洲而言，文化上的相對同質性也許提供良好的合作平台，然而倘若無實質的政治、經濟層面主導，「美洲主義」無疑是南柯一夢。

認同問題，是人類窮其一生所追求的課題，然而自我的形成，除了生而賦有外，還要靠社會外界的客體，不斷的影響自我這個主體，並經主、客體轉換的過程中，進而更加提升自我的豐富性。從個人認同到族群認同，再到文化認同，這過程得以實踐對文化兼容並包的態度。在全球化發展趨勢之下，不論是在拉丁美洲，甚至是在我們所生長的土地上，不僅要立定自身核心價值，更應積極地發揮包容性，朝多元文化發展。★



## 參考資料

### 一、外文部分：

- ASTUTI, Rita, “The Vezo are not a kind of people: Identity, Difference, and “Ethnicity” among a Fishing People of Western Madagascar” , *American Ethnologist*,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 BELLO, Andrés, *Obras Completas*, Caracas, La Casa de Bello, 1952.
- BETHELL, Leslie, *Latin America politics and society since 193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CHEN, Hsiao-Chuan., “La Conciencia de Ariel en la sociedad latinoamericana” , *Acta de V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la Asociación*, Taipei, Universidad de Tamkang, 2005.
- DEUTSCHIER, Eckhard, “La búsqueda de la identidad en latinoamerica como problema pedagogico” ,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1989.07.
- GUEVARA, Ernesto Che, *Che desde la memoria*, La Habana, Ocean Press, 2004.
- , *The Motorcycle Diaries*, La Habana, Ocean Press, 2004.
- JEKINS, Richard , *Social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 KEYES, Charles., *The Dialects of Ethnic Chang in Ethnic Chan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 KOTTAK, Conrad Philip., *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New York, McGrawHill, 1997.
- LASH, Scott and FRIEDMAN, Jonathan, *Modernity and Identity*, Frankfurt, Blackwell, 1992.
- MARTÍ, José, *Nuestra América*, La Habana, Editorial Nacional de Cuba, 1963.
- , *Ensayos y crónicas*, (Madrid: Anaya & Mario Muchnik, 1995).
- PALACIOS, Alfredo., “La juventud universitaria y la tentativa de fascismo en la Argentina” , *Conferencia en la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1928.
- SHIH, Chen-Feng., “The Emergence of Basque Nationalism, an examination of some explanatory variables” , *XV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ional Peace Reserch Association*, Malta, 1994.
- SCHUTTE, Ofelia.,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Liber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 TAJFEL, Henri,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 TEJADA RIPALDA, Luis, “El americanismo: Consideraciones sobre el nacionalismo continental latinoamericano” ,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 Núm 12, Lima, 2004.
- VARGAS HERNÁNDEZ, José G. uadalupe, “Algunos Mitos, Estereotipos, Realidades y Retos de Latinoamérica” , *Hoal*, Núm. 3, 2004.02.

### 二、中文部分：

- 王松霞、王傳龍，〈涅槃與新生—拉美文化的面貌與精神〉，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 石計生，〈社會學理論〉，台北市，三民書局，2006年。
- 李春輝，〈拉丁美洲史稿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年。
- 林盛彬，〈拉丁美洲文學發展模式：從哥倫布到二十世紀初〉，〈拉丁美洲研究〉，台北市，五南出版社，2001年。
- 江孟芳，〈族群運動與社會過程—當代「噶瑪蘭」認同現象分析〉，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所碩士論文，1997年。
- 杜聲峰著，〈皮亞傑及其思想〉，台北，遠流出版社，1988年。
- 梁永安等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拉丁美洲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手記〉，台北，大塊文化，1997年。
- 莊錫昌，〈維多視野中的文化理論〉，淑馨出版社，1991年。
- 陳小雀，〈加勒比海諸國史—海盜與冒險家的天堂〉，台北，三民書局，2007年。

楊碧川，《格瓦拉傳》，台北，大作文化，2000年。

謝繼昌，〈文化、族群與認同〉，《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平埔族群與台灣社會大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年。

### 三、網路資訊：

ARAUJO, Orlando, “Simón Bolívar, el hombre, Index” , <http://www.simon-bolivar.org/>.

“José Martí-El ideal republicano” , <http://www.josemarti.info/>.

# 馬克思青年——以切·格瓦拉與郭琇琮之悲劇為例

陳錦昌、林煒舒 講臺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 一、前言

當我們發現台灣史上的一位革命家醫師——郭琇琮與切·格瓦拉在人生的歷程上有著許多類似的經歷時，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比較、分析的題目，並希望能在切·格瓦拉逝世四十週年的紀念日時，透過此篇論文，將台灣史與拉丁美洲史做出聯結的嘗試。

在二〇〇七年的世界上，與台灣建立邦交的國家之中，以切·格瓦拉所出生的拉丁美洲為主，就此一觀點而論，拉丁美洲確是對台灣最友好的區域。但很可惜的，台灣人普遍展現親美國、遠拉丁美洲的「畸型」感情，對拉丁美洲甚至存在著從心態到思想上的輕蔑，對於在國際孤立環境下的台灣，獨獨對我友好的拉丁美洲世界，卻也是我們最不肯深入了解的世界。

其次是，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前，台灣的知識分子曾經與世界潮流同步流行共產主義，成為國際和中國共產革命的一環，但之後的白色恐怖，使台灣頓時成為無菌——共產主義——狀態，左派在台灣徹底消失，這段紅色歷史因而空白，彷彿馬克思思想從不會在台灣存在過。

乍看郭琇琮與切·格瓦拉雷同的人生，不禁

令人立即聯想，在元建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國志話本》中所描述，韓信、英布、彭越為劉邦所殺，四人因之投胎轉世成曹操、劉備、孫權和漢獻帝的「因緣果報」。切·格瓦拉當然不可能是郭琇琮投胎轉世，況且，他們兩人同時在世約二十二年。

我們研究主軸的兩位主人翁——郭琇琮出生在東中國海上最大的台灣島，接受從中國大陸傳來的共產主義思想，卻在準備進行游擊戰時被補殺；切·格瓦拉則在拉丁美洲最大的島嶼古巴完成一生最重要的事業，最後卻在南美洲大陸進行游擊戰時被殺害。

然而相較於切·格瓦拉在全世界無遠弗屆的影響力，郭琇琮的醫師加戰士形象，卻對台灣人不曾起過一絲漣漪，只在台灣史上留下一個連台灣人自己都很少有人知曉的名字。

感謝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陳小雀老師，讓我們有這個機會，能將一位幾乎消失在台灣人記憶裡的醫生游擊戰士的形象，藉由此篇論文的發表，重新介紹給台灣人民認識。

## 二、背景比較

### (一)兩人相差十歲

郭琇琮，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生，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處決。筆名周樹文，化名林逸俊、李志光、郭琮。台北州七星郡士林街(今台北市士林區)人，居住在士林二七八號(今大東路五四號)。<sup>1</sup>

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生，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遭到處決。原名埃內斯托·切·格瓦拉·德拉塞爾瑟納(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生於南美洲阿根廷的羅薩里奧市(Rosario)。羅薩里奧是阿根廷的河港與第三大城，位於聖塔菲省(Santa Fe)東南部巴拉那河(Parana River)西岸，東南距離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約二百九十公里，是個商業貿易興盛的城市。<sup>2</sup>

兩人年紀相差十歲，皆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郭琇琮的家鄉台北的地理位置在東經121度、北緯25度，切·格瓦拉的故鄉羅薩里奧市則在南緯33度、西經61度的位置，一在東半球一在西半球，一在北半球一在南半球，以地表相對位置而言，剛好在地球的兩端。

### (二)同為望族的家世背景

郭家為士林望族，係舊舉人出身。郭琇琮的祖父是大地主，日治初期，郭琇琮的祖父曾率領

(郭、何、潘)三姓壯丁潛赴芝山巖，殺了在那裡教書的六個日本老師。<sup>3</sup>

雖然如此，郭琇琮的父親郭坤木卻率先接受日本殖民當局的教育，為台灣第一所小學八芝蘭公學校(今台北市立士林國民小學)的第一屆畢業生。<sup>4</sup>更考進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實業部農業科，一九〇七年三月畢業後入臺北廳殖產科及農會，工作了九年，後來進入彰化銀行台北支店，後升為板橋支店長，開啓了郭坤木在戰後成為銀行家的契機。<sup>5</sup>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派郭坤木任彰化商業銀行籌備處委員，接收彰化銀行，翌年三月一日，彰化銀行改組為彰化商業銀行，郭坤木即任常務董事。<sup>6</sup>

郭琇琮為次子，但是，由於他的大哥郭琇瑩早逝，因此，他父親郭坤木對他就更加期待。<sup>7</sup>

切·格瓦拉的家庭是西班牙和愛爾蘭裔的混合。切·格瓦拉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十二代，是聲譽卓著的望族。切·格瓦拉的父系祖先派屈克·林區(Patrick Lynch)一七一五年出生於愛爾蘭，後來經過西班牙移民到阿根廷，至十八世紀晚期，林區已經成為巴拉那河區域的總督；而切·格瓦拉的母親達莉亞·德拉塞爾瑟納·約薩(Thalia de la Serna Llosa)家族也在阿根廷居住達七代，同樣也是貴族家庭，祖先約瑟·德拉塞爾瑟納(Joseph de la Serna)是西班牙最後一任秘魯總督。

切·格瓦拉的父母於一九二七年結婚，隔年，

1 林進發，《臺灣人物評》，台北，赤陽社，1929年8月，頁20。

2 陳小雀，《加勒比海的古巴——雪茄與蔗糖的革命之歌》，台北，果實出版，2006年6月，頁131。

3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受難的高貴靈魂》，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5月，頁13。

4 〈創校至清政府推翻期間（1895-1911）〉，《士林國小校史沿革》，士林國小：[http://www.slps.tp.edu.tw/schoolinfo/school\\_history/ourstory\(info\).html#h9](http://www.slps.tp.edu.tw/schoolinfo/school_history/ourstory(info).html#h9)，2007年9月18日。

5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台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年3月，頁24。

6 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5月，頁211。

7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頁25。

切·格瓦拉即出生。<sup>8</sup>有些資料認為切·格瓦拉實際上係五月十四日出生，其出生證明被刻意修改，是為掩飾其母親結婚時已懷孕之實情。<sup>9</sup>

### (三)同為醫科畢業

小學，郭琇琮就讀於日本人和本島望族才有資格入學的樺山小學校。初中就讀於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學(今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跟辜振甫、林挺生……同學。當時，除了少數家境富裕的台灣人子弟(如郭琇琮)例外，台北一中根本就是日本人子弟才能就讀的學校，一般的台灣人子弟，儘管成績再好，也只能到台北二中(今台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就讀。<sup>10</sup>

一九三八年，郭琇琮考入集全台灣青年精英於一堂的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第十四屆理科甲類。高校期間，郭琇琮曾在標槍擲遠勇奪冠軍。<sup>11</sup>

一九四一年，郭琇琮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六屆)。這時期，他不論在騎馬、游泳、田徑、音樂和思想上都展現了超出同儕的傑出才華；但他也因為反日被捕下獄，直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才補考畢業考並通過而畢業，擔任台北帝大附屬醫院第一外科醫生。<sup>12</sup>

切·格瓦拉幼時顯然體弱多病。一九三〇年五月二日，切·格瓦拉的母親帶著才三歲的他去游

泳，中午時分，切·格瓦拉的父親發現切·格瓦拉穿著一身濕淋淋的泳衣，冷得直發哆嗦，母親塞莉亞卻還在游泳，從此，切·格瓦拉便終生患得嚴重的哮喘病。<sup>13</sup>

一九四七年二月，切·格瓦拉考上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院，三月入學。

大學就讀期間，切·格瓦拉在首都市政府謀得一份抄寫工作，每天打工達六小時，他利用打工的時間，編寫一份一六五頁的哲學辭典，內容包括希特勒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這個時期的切·格瓦拉在思想上還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認同。對切·格瓦拉一生影響最深遠的其實是拉丁美洲的解放者、委內瑞拉國父玻利瓦(Simón Bolívar)。列寧曾說：「偉大的革命鬥爭會造就偉大的人物。」玻利瓦一生為拉丁美洲諸國的解放而努力奮鬥，並摧毀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根基，切·格瓦拉一生的短暫痕跡則留存著玻利瓦深遠的影響。<sup>14</sup>

大學時期的切·格瓦拉是位用功的學生，總是花費大量時間閱讀。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一日，切·格瓦拉順利完成學業，六月十二日拿到醫師執照，成為一位合格的醫師。<sup>15</sup>

## 三、祖國在那裡？

### (一)反抗殖民政府

8 Иосиф Ромуальдович Лавреики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譯，《格瓦拉傳 Эрнесто Че Гевар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頁9-16。

9 楊碧川，《20世紀最後革命家——切·格瓦拉》，台北，一橋出版社，2000年8月），頁43。

10 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1991年6月，頁240；藍博洲，〈來自北京景山東街西老胡同的歷史見證：戰後台灣學運領袖陳炳基的腳蹤〉，夏潮聯合會：[http://www.xiachao.org.tw/i\\_f\\_page.asp?repno=302](http://www.xiachao.org.tw/i_f_page.asp?repno=302)，2007年9月20日。

11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20；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人間》，第21期，1987年7月，頁73。

12 同上註，頁24-25。

13 Иосиф Ромуальдович Лавреики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譯，前揭書，頁17。

14 王春良，《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11月，頁47。

15 Fidel Castro著，黃裕美、樂為良譯，《切——卡斯楚的回憶》，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12月，頁39。

在小學時，郭琇琮就「因為開口罵過來視察的日本郡守而名噪台北」。一九四一年之前，郭琇琮即參加了士林協志會，與會中較有抗日思想的人結拜，成為會中的反日核心分子，並組織讀書會，研讀《孫文學說》……等。<sup>16</sup>

因為受到祖國五四運動的思想影響，一九四一年三月，台北高校畢業後，郭琇琮即以第一名成績考上東京工業大學，好「回大陸建設，讓中國的科學發達起來！」但他的父親反對他唸工科，只得返台。

進入台北帝大之後，郭琇琮參加了在該校中文和北京話的徐征教授於課後成立的一個讀書會，研讀作家魯迅、巴金、老舍的作品，學習中文和北京話，成為一個具有強烈中國人意識的民族主義者。暑假，郭琇琮並渡海到對岸的祖國旅行考察，去了上海、廈門、廣州，實際了解了祖國抗戰的艱苦狀況。<sup>17</sup>

由於士林協志會「的主要目的就是抵制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運動』、保護和宏揚中華文化、台灣本土文化」，郭琇琮等因此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假士林公學校舉辦「士林文化展覽會」，介紹台灣的鄉土文化，也就是不同於日本文化的漢民族文化，迂迴抵抗日本殖民當局的皇民化運動。<sup>18</sup>

郭琇琮更與同學蔡忠恕籌組秘密反日團體——

大漢民族聯盟。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日本憲兵在台灣北部校園展開連續三天的大檢舉行動，郭琇琮因此被捕，並被嚴刑拷打，打斷了二根肋骨，判刑三年。<sup>19</sup>

## (二)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當切·格瓦拉還是學生時，就常利用假期周遊拉丁美洲。一九五〇年一、二月間是南美洲的暑假期間，切·格瓦拉騎著腳踏車遊歷了阿根廷北部的十二個省，走過長達四千多公里的路程。隔年又跑上輪船打工，走過阿根廷的幾個群島。

一九五一年，切·格瓦拉在藥劑師艾柏托·葛納多(Alberto Granado)的建議下休學一年，環遊整個南美洲，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一輛一九三九年製造的諾頓(Norton)摩托車，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發，決定的路線為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經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委內瑞拉。途中，他們的摩托車壞掉了。切·格瓦拉還在秘魯的一個麻瘋病人村做了幾個月的義工。<sup>20</sup>此行，切·格瓦拉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次旅行中漸漸定型，並開始認為拉丁美洲各個獨立的國家其實是一個擁有共同的文化與經濟利益的整體。<sup>21</sup>離家八個月後，一九五二年九月，切·格瓦拉搭機回到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機場迎接他。<sup>22</sup>

16 蔡漢廷口述。見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前揭書，頁243；藍博洲，〈我要讓鮮血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27。

17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26-27。

18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28-29；張勇，〈訪台灣光復親歷者老台胞黃幸：始終心繫祖國〉，人民網：<http://tw.people.com.cn/BIG5/14810/3789281.html>，2007年9月21日。

19 藍博洲，〈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98年4月，頁141；藍博洲，〈我要讓鮮血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30-33。

20 Daniel James著，復旦大學歷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譯，《Che Guevara》，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頁84-96。

21 格瓦拉認為：「但我們相信，把美洲(Latin)劃分為幾個不穩定的而且本不存在的國家，是極不合理的，而我們的旅行更加強這個想法」。見Ernesto Che Guevara, *The Motorcycle Diaries: Ernesto 'Che' Guevara*,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2003, p. 149.

22 Che Guevara著，王星譯，《南美叢林日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頁160。

切·格瓦拉後來追憶道：「除了海地和多明尼加之外，我走遍了拉丁美洲各國。我一開始是以學生的身分，後來則是以醫生的角色，在旅行中親自接觸到貧窮、飢餓與疾病；我知道因為缺乏資源而無法醫治一個孩童是什麼滋味；我見到了由於吃不飽和長久的困頓所造成的無力感，竟然使得父母覺得失去一個孩子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在這次旅行之後，切·格瓦拉的思想正在朝著馬克思思想的方向與無產階級的立場持續進行轉化。切·格瓦拉在此次旅行中所寫的日記後來被出版，二〇〇四年，好萊塢據此拍攝電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The Motorcycle Diaries)。於是「一個美洲的戰士，從這裡出發了。」<sup>23</sup>

切·格瓦拉開始拼命複習，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正式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他本可成爲一位受人尊敬的醫生，不過，這次旅行卻徹底改變切·格瓦拉。<sup>24</sup>

#### 四、參與革命

##### (一)左派思潮的洗禮

日本投降後，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台灣義勇軍上校副總隊長張士德抵台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並親到台北監獄的牢房裡把郭琇琮接出來，想拉攏對台北知識青年有號召力的郭琇琮加入，但他婉拒了。<sup>25</sup>

不過，戰後台灣第一個全島性的學生組織——「臺灣學生聯盟」即以郭琇琮爲中心，於十月初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成立，郭琇琮被推舉爲主席。<sup>26</sup>

光復後，郭琇琮轉至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的衛生局防疫課當技士。一九四六年五月，台灣爆發霍亂疫情，郭琇琮組織「霍亂巡迴醫療隊」，帶領剛離開台灣大學醫學院校門的醫生，以及大學生組成的青年學生隊，在基隆、台南、高雄的彌陀和頂茄荳、宜蘭展開巡迴治療和公共衛生的推廣工作。

郭琇琮還深入山地部落 原住民同胞治病，並且 他們讀書識字，深得山地朋友的信任。

雖然如此，官僚的腐化終於讓郭琇琮看不過去而走上反抗之路，說：「時代亂成這樣子，我們得先改造社會，爲全台灣的人民謀求生存的尊嚴。」<sup>27</sup>郭琇琮先是帶隊前往台北市警察總局靜坐抗議，並用粉筆在牆上書寫反對官僚腐化的標語，接著又率眾包圍在中山堂開會的台灣省參議會，要求取締官僚貪污，起用台灣人才……，<sup>28</sup>同時投書〈在防疫面顯露的社會相〉……等至《臺灣新生報》，透露了他對陳儀接收執政的絕望，希望以民主的方式改革台灣的社會。<sup>29</sup>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七時多在台北市延平路(今延平北路一段)天馬茶房前發生的緝菸事件，在翌日引爆成爲蔓延全台的「二二八事

23 Che Guevara著，梁永安、傅凌、白裕承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9月，頁248；師永剛、劉瓊雄編著，《Che said切·格瓦拉語錄》，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7月，頁127。

24 チェ・ゲバラ著，高橋正譯，《ゲバラ日記》，東京都，株式會社角川書店，平成11年2月，頁196。

25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37。

26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43。

27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52。

28 高倉樹、劉明證言。原載於1989年8月1日美國《太平洋時報》，轉引自藍博洲，〈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40。

29 林雪嬌，〈申請二二八賠償理由〉，《行政院公報》，第11卷33期，綜合行政篇，2005年2月22日。

件」，郭琇琮目擊長官公署衛兵射殺群眾場面，便以台北士林一帶學生聯盟為班底，組織蕉農、工人、漁民和原住民一起對抗國府軍，保護一般民眾。

三月一日，他與台灣省參議員王添 和台大文學院代院長林茂生等至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抗議；下午，透過廣播電台，號召全省人民「團結起來戰鬥！」<sup>30</sup>

長期反抗國府，郭琇琮於是組織「學生軍」，繼續爭取台灣人民之政治自由平等。<sup>31</sup> 郭琇琮認為，陳儀的一切措施只是他狡詐的緩兵之計，只有把自己武裝起來，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於是暗地裡糾合學生與工農組織，彼此確保聯絡，並加緊奪取武器。<sup>32</sup>

不過，這段期間，他聽從徐征的建議，一直以化名「林俊逸」活動，<sup>33</sup>「林」取自其妻林雪嬌之姓，「逸」取自崇敬之孫逸仙之名，<sup>34</sup>並始終蒙面指揮。<sup>35</sup>

三月四日下午，各校學生代表在延平學院召開秘密會議，在共產黨員李中志的策劃下，動員台北地區學生組成「學生軍」，由李中志擔任總指揮，郭琇琮擔任副總指揮，其中，在建中集合的第一大隊由陳炳基指揮，在師範學院集合的第二大隊由郭琇琮指揮，在台大集合的第三大隊由李中志指揮，擬於三月五日凌晨二時，先由第三

大隊會合烏來的原住民同胞，攻打戒備較鬆的景尾軍火庫，然後再與第二大隊會攻戒備較嚴的馬場町軍火庫，取得充分的武裝，再分頭攻取市內軍、警、憲武裝據點，拂曉時，會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sup>36</sup>

郭琇琮把第二大隊學生分成幾個小隊，然後由各隊分開幾路，沿著萬華到新店的鐵道(今汀州路)，前往中正橋下，準備與烏來山胞會合。<sup>37</sup>

但到預定時間時，烏來方面始終沒有動靜，第三大隊因此自行起事，切斷軍火庫的電源，惟遭守軍盲目掃射，行動因此失敗，無法展開。葉紀東回憶道：「凌晨三點多時，第三大隊的楊建基騎著腳踏車冒雨回到總部報告狀況後，我們才知道整個行動已經完全失敗了。作為總部聯絡員的我，立刻奉命前往馬場町找郭琇琮，要他取消這次的行動計劃。我冒著滂沱的大雨，……好不容易才在馬場町附近的堤防下找到郭琇琮時，已經是凌晨四點左右了。儘管我向他傳達了總部的指令，他還是堅持到確定沒有起事的可能的黎明前才把隊伍解散。」<sup>38</sup>

三月九日，廿一師開進台北，郭琇琮「與學生便分頭逃亡，先逃至台北市長安西路，之後流亡台灣各地」，<sup>39</sup>一直到四月，接到父親病危的消息，蓄著鬍子的他才拿下眼鏡，一身工人裝扮，潛回士林老家，<sup>40</sup>幾乎連家裡人都認不出他來。這以後

30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55-56。

31 林雪嬌，〈申請二二八賠償理由〉，前揭書。

32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56。

33 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前揭書，頁84。

34 朱家慧，〈兩個太陽下的臺灣作家——龍璣宗與呂赫若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

35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61。

36 陳炳基口述。見藍博洲，〈在歷史的荒溼中消逝的野百合〉，《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4年12月，頁141。

37 蘇有鵬口述。見藍博洲，〈他們沒走完的路我們一定要繼續：蘇有鵬醫師〉，《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受難的高貴靈魂》，頁122-123。

38 藍博洲，〈在歷史的荒溼中消逝的野百合〉，前揭書，頁143。

39 林雪嬌，〈申請二二八賠償理由〉，前揭書。

40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61。



整整一年，他都以這副形容在外遊走。<sup>41</sup>

## (二)參加古巴革命

由於貝隆(Juan Domingo Perón)政府當時在阿根廷的獨裁統治，擔心兒子被徵用做軍醫的母親讓切·格瓦拉逃離阿根廷。一九五三年七月，切·格瓦拉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拉丁美洲之旅。在玻利維亞經歷了一次革命之後，切·格瓦拉從厄瓜多前往瓜地馬拉。切·格瓦拉在瓜地馬拉成爲一位真正的馬克斯主義的信仰者，並且對於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帝國主義行徑深深痛恨。<sup>42</sup>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宏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瓜地馬拉軍官阿瑪斯(Carlos Castillo Armas)領導的雇傭軍，阿本茲政權很快被推翻，阿瑪斯成爲瓜地馬拉總統，開始對左翼人士進行殘酷的鎮壓，幾個月之內，約九千人被捕或被殺害。從此，切·格瓦拉堅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認爲共產主義是解決目前拉丁美洲種種困難的唯一途徑。一九五五年九月，切·格瓦拉前往墨西哥，並在此遇見卡斯楚(Fidel Castro)。<sup>43</sup>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楚率領百餘名大學生攻占聖地牙哥市的蒙卡達(Moncada)兵營失敗。卡斯楚被捕後，在法庭上，發表一篇慷慨激昂的答辯辭，後來以《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History Will Absolve Me)之名出版。一九五五年，卡斯楚被釋放出獄，即和友人赴墨西哥做推翻古巴政府的準備。<sup>44</sup>

對於卡斯楚與切·格瓦拉的初次見面，卡斯楚是這麼回憶的，「切·格瓦拉最特別的地方是他並非古巴人，而是阿根廷人。我們在墨西哥初識之前他在瓜地馬拉行醫。瓜地馬拉的政治進程及農業改革使他對政治充滿熱情。他目睹美國的干預，深感痛心。這是他的天性。他馬上加入我們，如他所說，我們第一次交談他就加入我們。」<sup>45</sup>

「切」(Che)，是一個西班牙語的感嘆詞，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區廣泛流行，是人們打招呼 and 表示驚訝的常用語，類似於華語中的「喂」、「喔」，帶有親密的色彩。古巴大革命時，古巴戰友便以「切」的綽號稱呼切·格瓦拉，「切·格瓦拉」從此取代他的本名。<sup>46</sup>

一九五五年，切·格瓦拉同卡斯楚在墨西哥城相遇，當時卡斯楚兄弟正爲重返古巴進行武裝鬥爭並推翻巴蒂斯達(Fulgencio Batista)獨裁政權而進行準備。切·格瓦拉迅速加入卡斯楚的「七二六運動」軍事組織。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七二六運動」八十一名戰士擠在小艇〈格拉瑪號〉(Granma)上，駛往古巴，展開歷時兩年的游擊戰爭。<sup>47</sup>

41 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前揭書，頁84。

42 Daniel James著，復旦大學歷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譯，前揭書，頁119。

43 格瓦拉曾說：「在我的心中，馬克思主義已經下了根，而且不斷被純化。」透過在拉丁美洲大陸的旅行，他逐漸鍛鍊自己成爲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信徒。見師永剛、劉瓊雄編著，《Che said切·格瓦拉語錄》，前揭書，頁223。

格瓦拉回憶：「我們談了幾個小時，到那天凌晨，我就決定加入古巴革命的行列了」。見Robert E. Quirk，《古巴共黨強人——卡斯楚（上）》，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2月，頁92。

44 同上註，頁50-56。

45 Fidel Castro著，黃裕美、樂為良譯，前揭書，頁159。

46 陳小雀，前揭書，頁131；格瓦拉曾說：「我是格瓦拉司令。切是留給我的戰友和朋友叫的。」見師永剛、劉瓊雄編著，《Che said切·格瓦拉語錄》，前揭書，頁209。

47 陳小雀，前揭書，頁96。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比計劃推遲了兩天，他們在古巴南部的一片沼澤地登陸，遭到巴蒂斯塔的軍隊的襲擊，只有十二人倖存。切·格瓦拉，做為軍隊的醫生，在一次戰鬥中，當面前一個是藥箱，另一個是彈藥箱時，他扛起彈藥箱。從這一刻開始，切·格瓦拉徹底從醫生轉變為了一名戰士。在戰鬥中，切·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氣及毅力、出色的戰鬥技巧和對敵人的冷酷無情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包括卡斯楚的賞識；而每當有卡斯楚出現的地方，切·格瓦拉就很少說話，完全由卡斯楚獨占光芒，切·格瓦拉很快就成為卡斯楚最得力和信賴的助手。一九五九年元旦，切·格瓦拉領導的革命軍攻下聖塔克拉拉(Santa Clara)；一月四日，開進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政權崩潰，切·格瓦拉協助卡斯楚完成古巴的革命。<sup>48</sup>

## 五、投入馬克思的懷抱

### (一)參加中國共產黨

二二八事件後，郭琇琮的思想一度陷於無出路的苦悶。一九四七年五月，郭琇琮經由徐征的介紹，認識了「老蔡」，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郭琇琮的遺孀林雪嬌說：「認識老蔡，無論如何，是他一生命運中另一個重大轉捩點。……老蔡叫他重新認識了苦難中國的全貌，叫他重新找著了一顆尋求國家認同的心的新

歸宿……。」<sup>49</sup>

六月，郭琇琮為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廖瑞發吸收，參加了中共。<sup>50</sup>當時，廖瑞發住在台北新莊，專門收容癲瘋病患的樂生療養院。

胡鑫麟回憶道：「後來就我所知，在台灣參加蔡孝乾的組織的人，為數很多。但參加的人並不真正想參加共產黨，很清楚自覺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人，非常少。大部份是看到國民黨的腐敗貪污和胡作非為，起了反感。你起反感，我起反感，能怎麼樣？自然就想要有一個組織來做事情。蔡孝乾就是利用這種心情和機會，來招人入組織，所以組織發展很快。」<sup>51</sup>林雪嬌也表示，「當時參加組織的人，有一些只是農民或十五六歲的少年，他們並不懂共產黨；我先生(郭琇琮)因日據時代即抗日，並且讀較多左派的書籍，所以可能是較有自覺的。」<sup>52</sup>

十月，郭琇琮任北工委會委員，負責學生，廖瑞發則負責工運。<sup>53</sup>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的外圍組織新民主同志會即改隸北工委會，由郭琇琮領導。<sup>54</sup>

郭琇琮以強烈的政治熱情，迅速延攬了許多優秀的教授、學生。一九四七年七月，親自吸收了日本京都帝大醫學部出身的吳思漢，一九四八年二月吸收了台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許強。<sup>55</sup>

一九四八年五月，郭琇琮與蔡孝乾、張志忠、

48 Daniel James著，復旦大學歷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譯，前揭書，頁132-134、155-157。

49 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前揭書，頁85。

50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64。

51 胡慧玲，〈醫者之路／傅斯年與我〉，《島嶼愛戀》，台北，玉山社，1995年10月，頁111。

52 朱家慧，〈兩個太陽下的臺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

53 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人權奮鬥證言——白色封印：白色恐怖1950〉，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出版，2003年，頁159。

54 藍博洲，〈高唱歡喜的青春之旅〉，《幌馬車之歌》，頁218。

55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72-73。

孫古平……等十一人至香港，參加中共華東局於六月召開的台灣幹部會議，月底返台後代理北工委會書記。「回國後的郭琇琮……活得更有幹勁！更忙碌了！二二八的陰霾掃光了！我看見他的眼眸重又燃起炯炯的火光。」林雪嬌說。<sup>56</sup>不久，正式擔任書記，直接領導臺灣大學附屬醫院支部，以及所屬各支部。<sup>57</sup>

郭琇琮並帶領後來成為他的妹婿的台大學生姜文鑑所帶領的台大學生辦讀書會，也在社會上辦夜校，教育工人。林雪嬌說：「郭琇琮領導的台大學生所辦的夜校，主要是針對瑞芳的礦工和社子的蕉農，他們國語。郭琇琮非常強調『群眾路線』的工作原則，他希望這些學生能夠通過學習與群眾打成一片，而完成自我改造與社會改造的理想。」<sup>58</sup>後來，郭琇琮加入台灣省郵務工會，<sup>59</sup>即帶領這些學生到郵電工人補習學校給那些工人上課。

由於蔡孝乾和郭琇琮都覺得戲劇可以教育民眾，尤其是在當時社會改造的革命形勢已經形成之際，只需要推動一下即可，<sup>60</sup>郭琇琮於是策劃、帶領這些台大學生和郵電工人於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在中山堂演出改良歌仔戲《白蛇傳》，一方面以劇情來反映社會，另一方面則藉此團結學生與工人的感情。<sup>61</sup>

## (二)在古巴擔任官員

戰爭結束後，古巴新政府成立，二月九日切·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身分，並被任命為國家銀行總裁，開始對古巴經濟體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企業收歸國有，並實行了土地改革。<sup>62</sup>

切·格瓦拉認為古巴革命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我們所以能夠取得政權，是開展農民鬥爭的結果，是以土地改革和農民階級的其他當要求為口號，武裝農民和組織農民的結果。……在城鄉掀起革命，經歷了三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創立小型的游擊隊；第二階段，當這支游擊隊壯大之後，分出一部分戰士到另外一些地區去活動，當然這些地區的幅員還是有限的；第三階段，所有這些游擊支隊又聯合起來，組成革命軍，和反動軍隊進行一系列野戰，將他們擊潰，奪取勝利。」這是切·格瓦拉游擊理論與實踐的核心思想，也是切·格瓦拉在讀過西班牙文本的《毛澤東選集》後所受到的啓發。<sup>63</sup>

切·格瓦拉幫助卡斯楚在古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國經濟封鎖後，切·格瓦拉與蘇聯簽定了貿易協定。一九六五年三月後，切·格瓦拉與卡斯楚在諸如對蘇關係、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問題上的分歧日趨嚴重。不久就辭去職務，四月一日搭機前往剛果。<sup>64</sup>

切·格瓦拉向剛果人灌輸古巴共產革命思想及

56 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前揭書，頁85。

57 國家安全局，《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2輯，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12月，頁14-22。

58 藍博洲，〈在歷史的荒煙中消逝的野百合〉，前揭書，頁154。

59 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前揭書，頁86。

60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65。

61 藍博洲，〈在歷史的荒煙中消逝的野百合〉，前揭書，頁154-155。

62 1月22日，格瓦拉在電視上發表演說，對被授予古巴國籍一事，讓他深深感動。見Иосиф Ромуальдович Лавреики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譯，前揭書，頁211。

63 Иосиф Ромуальдович Лавреики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譯，前揭書，頁218。

64 とにかく四月一日，チェは有名なカストロへの訣別の手紙を残して早々にキューバを去った。見チェ・ゲバラ著，高橋正譯，前揭書，頁214。

游擊戰術，並期許能訓練出一批驍勇善戰的游擊戰士。然而，由剛果人組織起來的烏合之眾漫無紀律、內部紛爭不休，導致作戰的失敗。同年十月，在非洲叢林吃足苦頭之後，切·格瓦拉沮喪地與古巴戰友離開剛果。<sup>65</sup>

## 六、實踐游擊戰

### (一)建立游擊組織

一九四九年十月，郭琇琮將台灣省地圖及《台北市工委會工作報告書》交林秋興帶往香港。不過，林秋興於啟程前被察覺，在基隆逮捕。保密局隨即循供嚴密偵查郭琇琮。<sup>66</sup>

月中，郭琇琮和林雪嬌奉命到宜蘭，但他「走到哪，就與當地組織聯繫，繼續發展工作。」林雪嬌說：「在宜蘭，我們一直都在鄉下，搞農村工作。」<sup>67</sup>

之後到三星做原住民工作，後來又再轉移到羅東，搞工人的組織工作，建立南方澳游擊基地。日治時期曾在台北第三高女任教的琉球那霸行政官員小林氏因同情台灣左翼革命運動，經吳思漢聯繫，曾將日軍遺留武器一批以漁船走私運來南方澳，再分送其他基地，<sup>68</sup> 嘉義阿里山基地的軍械就是從南方澳基地運過去的，不過，武器並不是很多，只是一些步槍和普通的手槍而已。<sup>69</sup>

阿里山支部係吳思漢所成立。一九四九年底，吳思漢因身分暴露，無法在台北市立足，於是將

李瑞東、黃石巖等轉入阿里山的嘉義縣參議員湯守仁處，成立武裝組織阿里山支部。時，湯守仁以其在山地經營的一所醬油廠收容、掩護，將其偽裝成工人，一面從事生產以維生活。<sup>70</sup>

四月，郭琇琮也轉至嘉義，以雜貨商為掩護，發展阿里山基地。<sup>71</sup>

### (二)前往玻利維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切·格瓦拉帶領一小隊游擊隊員進入玻利維亞，在叢林中展開游擊戰。拋棄古巴優裕且安寧的城市生活，再進入毒蛇蚊蟲出沒的南美叢林，對从小便患哮喘病的切·格瓦拉絕非易事，但為了理想，他義無反顧。在近一年艱難的山區游擊跋涉中，切·格瓦拉只靠一匹騾子馱行李，忍受了諸多困苦，面對追剿和陷入絕境也毫不動搖，並宣布絕不讓敵人活捉自己。<sup>72</sup>



圖三 一八六七年十月，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游擊區域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網頁，網址[http://es.wikipedia.org/wiki/Imagen:Ruta\\_del\\_Che\\_-\\_Bolivia\\_-\\_1967.png](http://es.wikipedia.org/wiki/Imagen:Ruta_del_Che_-_Bolivia_-_1967.png)，2007年9月20日。

65 同上註，頁215。

66 國家安全局編，《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2輯，頁15。

67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76。

68 林雪嬌口述。2004年5月12日與曾建元、李耀村談話。曾建元、曾薰慧，〈青春戰鬥曲：戰後國立臺灣大學政治事件之研究（1945-1955）〉，台灣法律網：[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4,&job\\_id=102772&article\\_category\\_id=17&article\\_id=43890](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4,&job_id=102772&article_category_id=17&article_id=43890)。

69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77。

70 藍博洲，〈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原住民戰歌：台灣蓬萊民族解放運動〉，《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頁86。

71 國家安全局，《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頁14。

72 チェ・ゲバラ著，高橋正譯，前揭書，頁6。

玻利維亞總統巴利多斯(René Barrientos)下令軍隊搜尋切·格瓦拉和追隨者。當美國政府得知他的革命活動地點後，很快便派出了中央情報局人員進入玻利維亞援助反革命。因為美國的援助，玻利維亞軍隊由美國陸軍特種部隊顧問訓練，而切·格瓦拉在游擊當中卻得不到玻利維亞共產黨協助。此時，用來與古巴聯絡的兩台短波發射機損壞而無法發送消息到哈瓦那，游擊隊員用來為從哈瓦那發出的短波解碼的錄音機亦在渡河中遺失，切·格瓦拉的游擊隊完全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形勢顯得相當不利。<sup>73</sup>

## 七、白色恐怖下的死亡

### (一) 浸血的白襯衫

當時，保密局認為，「蔡孝乾在台發展的組織中，由高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台北市委員會是最主要的一個單位。因此，若能順利逮捕市委會書記郭琇琮，再循其口供找出這個組織中的重要成員，對抗共產黨在台活動這盤棋，就贏得篤定了。」因此谷正文派張清杉帶領偵防組十餘隊員，<sup>74</sup> 據張秀伯和蔡孝乾的供詞「窮追線索，擴大偵查」，於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深夜，荷槍實彈突擊，郭琇琮夫婦被捕。「熄燈之後，有警察以槍柄用力敲門，然後把我們拖下床帶走了。」林雪嬌回憶道，然後連夜押往台北市的保密局南所，而且，一入獄就用一套十斤重的腳鐐銬在郭琇琮的雙腳上。<sup>75</sup>

谷正文回憶說，郭琇琮很快就供出了台灣學生工作委員會書記李水井、學委會支部書記楊延琦及學委會分支單位台大法學院支部書記葉城松等人。<sup>76</sup>五月十三日，台大醫學院副教授許強等也被捕。

被移往軍法處看守所後，郭琇琮在傳給林雪嬌的紙條中用日文寫道：「如果我死了，屍體冷了，我願意讓更多人來擁抱我，我的理想，我兒子會繼承，並且有更多人會繼承，他們會了解我，靜靜地，可以閉上兩眼，這樣我的人生也是很痛快的。」「有的人活到一百歲，也不如短暫的生命裡轟轟烈烈地幹過一番革命事業。」<sup>77</sup>

九月七日，軍法處審判官鄭有齡裁定，郭琇琮被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的罪名判處死刑，「全部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sup>78</sup>

判決後，郭琇琮傳紙條給林雪嬌，只簡單地寫道：「二條一。死刑。」「承受不住一旦面臨殘酷的事實時內心尖銳無比的痛苦」的林雪嬌寫了張紙條告訴他說：「如果我活下來，我一定會把你的一生寫下來；你在這短短三十三年的一生，做了他人五十年、一百年都做不完的事。題目我已經想好了：《美しき世紀》(美好的世紀)；但這題目好俗氣，怕你會不喜歡。」翌日，郭琇琮回條說：「題目『俗氣』沒關係，只要你能把我這短暫一生所信仰的理想和所做的事寫下來，我就感到非常安慰了！」<sup>79</sup>

73 Robert E. Quirk, 《古巴共黨強人——卡斯楚(下)》，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2月，頁593-601。

74 谷正文口述，許俊榮、黃志明、公小穎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出版資料不詳，頁242。

75 林雪嬌口述。見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前揭書，頁89。

76 谷正文口述，許俊榮、黃志明、公小穎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頁242。

77 藍博洲，《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頁148。

78 國家安全局，《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頁22。

79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89。

九月二十一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將「匪台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的〈(39)安潔字第二二〇四號判決書〉報奉國防部審核；十一月二十五日，國防部以〈(39)勁助字第一〇三九號代電〉核定軍法處的判決，並定死刑執行日期為十二月三日。惟後來執行槍決的日期提前了五天。臨刑前一天，郭琇琮傳紙條給林雪嬌，說：「雪嬌，請交代爸爸媽媽：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將骨灰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請勇敢地生活下去……。」<sup>80</sup>

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四時半，郭琇琮穿著曾同囚的劉明所送的白襯衫，<sup>81</sup> 呼喊著口號走出去，然後被押往馬場町槍決，死的時候，臉上還微微笑著。<sup>82</sup>

## (二)受難者的形象

一九六七年十月，切·格瓦拉游擊隊中的一個逃兵向玻利維亞特種部隊透露了切·格瓦拉游擊隊的營地。十月八日，當切·格瓦拉在裘羅(Churo)峽谷附近帶領巡邏時，玻利維亞部隊包圍營地，切·格瓦拉的游擊隊遭遇伏擊。<sup>83</sup> 激戰後，切·格瓦拉被俘，並被囚在無花果村(La Higuera)一處破落的校舍。翌日中午一時十分，玻利維亞士兵把切·格瓦拉帶出校舍，將切·格瓦拉的手反綁，由一個陸軍中士特朗席(Mario Teransi)執行槍決，這是古巴革命有史以來最黑

暗的一天。<sup>84</sup>

屍體在當日下午五時送到醫院，由醫師馬丁尼茲(José Martínez)做出診斷：「屍體上有幾個彈孔，腿上有五處，喉嚨有一處，其他一處在胸部，乳房左下方。這顆子彈穿過心肺。」「這是致命的一槍。」切·格瓦拉在死亡前曾向特朗席中士說：「我知道你要在這裡殺我。開槍吧！懦夫，你只是要殺一個人」。面對槍口，切·格瓦拉昂首挺胸，無愧於偉大戰士的形象！<sup>85</sup>

軍醫切斷切·格瓦拉的雙手與頭顱後，玻利維亞陸軍將切·格瓦拉屍首轉運到一個秘密地方，並拒絕透露遺骸是否已遭埋沒或火化。十月十五日，卡斯楚在電視演說中宣告古巴全國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被認為大力鼓吹了當時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思想遍及至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sup>86</sup>

一九九七年七月初，切·格瓦拉的缺手骸骨與其他游擊隊員骨骸在玻利維亞被找到，由DNA辨認吻合，並運回古巴。遺體以最尊崇、榮耀的軍禮安葬在聖塔克拉拉，以紀念切·格瓦拉贏得聖塔克拉拉古巴革命的決定性戰役。同時，卡斯楚也發表紀念感言，說：「他所捍衛的價值，在面對日形猖狂的帝國主義者強權、霸權、支配及干預下，更形高貴。」「切·格瓦拉過去是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現在則是革命家與共產主義者的楷模和典範。」<sup>87</sup>

80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前揭書，頁91。

81 陳銘誠，〈「台灣百合」被構陷入罪的礦業鉅子—劉明〉，《台灣日報》，2004年11月6日。

82 藍博洲，《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頁148。

83 陳小雀，《古巴——一切的最後歸鄉》，台北，果實出版，2005年6月，頁135。

84 チェ・ゲバラ著，高橋正譯，前揭書，頁226。

85 Fidel Castro著，黃裕美、樂為良譯，前揭書，頁49-50。

86 卡斯楚得知格瓦拉遇害的消息當天，把自己關在房間，曾經猛捶牆壁，狂踢房門。見Robert E. Quirk，《古巴共黨強人——卡斯楚（下）》，頁602。

87 Fidel Castro著，黃裕美、樂為良譯，前揭書，頁222。



攝影/Lucía Chen

## 八、結語

郭琇琮與切·格瓦拉兩人在人生的歷程上有許多相當類似的經歷。

郭琇琮出生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最大的島嶼台灣，接受從中國大陸傳來的共產主義思想，卻在進行游擊戰時被補殺；切·格瓦拉則出生在南美洲大陸，在拉丁美洲最大的島嶼古巴完成人生最重要的社會主義事業，最後在南美洲大陸進行游擊戰時被殺害。

郭琇琮與切·格瓦拉兩人同為在殖民地的名門望族。但是，在階級的屬性上，郭家是殖民統治者下的被統治階級的菁英；切·格瓦拉的家族則是由歐洲移民到拉丁美洲的白種統治階級。亦即，郭家是殖民地的被統治者，地位較類似拉丁美洲介於白人與印地安人中間的「梅斯蒂索人」(mestizo)，而切·格瓦拉原本就是統治階級的白種人，在階級屬性上較趨近於統治台灣的日本人。

他們兩人都是醫生，革命期間都蓄留鬍子。

更巧的是，兩人都跟痲瘋病有點關連，吸收郭琇琮加入中共的廖瑞發住在專門收容痲瘋病患的樂生療養院，而切·格瓦拉則曾於一九五二年在秘魯的一個痲瘋病人村做義工。

不過，兩人身後的際遇卻如天壤。

切·格瓦拉死後，隨著他的屍體照片的傳播，切·格瓦拉的事蹟開始傳播到全世界。全球陸續舉辦抗議殺害切·格瓦拉的示威，同時出現許多頌揚和記錄切·格瓦拉生平，以及死亡的文學作品，就算是對共產主義思想嗤之以鼻的人，也對切·格瓦拉自我犧牲精神表達出由衷的欽佩。<sup>88</sup>

相對於切·格瓦拉在全世界無遠弗屆的影響力，郭琇琮只在台灣史上留下一個連台灣人自己都很少有人知曉的名字，遑論形象。

在一九六〇年代晚期的中東和西方的年輕人，切·格瓦拉成為公眾偶像般的革命象徵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詞。在巴黎、柏林、墨西哥市進行抗議的群眾和學生都曾高舉著「切活著！」的標語，切·格瓦拉的身軀雖然消逝，但他的影響力才正要展開。<sup>89</sup>

切·格瓦拉穿著戰服、蓄著鬍鬚的照片成了為擺脫苦難而奮鬥的人民的偶像。切·格瓦拉的肖像照片迅速成為二十世紀最知名、重要的圖片之一，流傳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切·格瓦拉的肖像也被複製成為許多資本主義商品上的圖案，切·格瓦拉的魅力在死後對全世界的影響極為深

88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大師沙特 (Jean-Paul Sartre) 曾說格瓦拉是「我們時代最完整的人」。見 Robert E. Quirk, 《古巴共黨強人——卡斯楚 (下)》，頁 602。

89 Daniel James 著，復旦大學歷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譯，前揭書，頁 479。

卡斯楚曾經在格瓦拉死後這樣預言：「但是，切卻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一筆遺產，而我們這些非常瞭解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成為他的遺產的受益人。」卡斯楚的預言，對於拉丁美洲與全世界而已，已經實現。見師永剛、劉瓊雄編著，《Che said 切·格瓦拉語錄》，頁 233。

遠而巨大。而切·格瓦拉的吶喊：「我武裝自己的身軀，做好戰鬥的準備。要讓這血肉之軀，成為莊嚴的場域；以接受無產者所發出充沛著新幹

勁與和新活力的吼聲。」至今依然迴盪在全世界受壓迫人們的心中，永不止歇。<sup>90</sup> ★

---

90 Ernesto Che Guevara, *The Motorcycle Diaries: Ernesto 'Che' Guevara*, p. 165

## 參考書目

### 一、外文部分：

GUEVARA, Ernesto Che, *The Motorcycle Diaries: Ernesto 'Che' Guevara*,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2003.

チェ・ゲバラ著，高橋正譯，《ゲバラ日記》，東京都，株式會社角川書店，平成11年2月。

### 二、中文部分：

Che Guevara著，王星譯，《南美叢林日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Che Guevara著，梁永安、傅凌、白裕承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台北市，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9月。

Daniel James著，復旦大學歷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譯，《Che Guevara》，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

Fidel Castro著，黃裕美、樂為良譯，《切——卡斯楚的回憶》，台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12月。

Robert E. Quirk，《古巴共黨強人——卡斯楚（上）》，台北市，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2月。

Robert E. Quirk，《古巴共黨強人——卡斯楚（下）》，台北市，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2月。

Иосиф Ромуальдович Лавреики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譯，《格瓦拉 傳 Эрнесто Че Гевар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

チェ・ゲバラ著，高橋正譯，《ゲバラ日記》，東京都，株式會社角川書店，平成11年2月。

〈創校至清政府推翻期間（1895-1911）〉，《士林國小校史沿革》，士林國小：[http://www.slps.tp.edu.tw/schoolinfo/school\\_history/ourstory\(info\).html#h9](http://www.slps.tp.edu.tw/schoolinfo/school_history/ourstory(info).html#h9)，2007年9月18日。

《革命英雄——追求自由與理想之路》，台北市：得利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年不詳。

王春良，《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11月。

朱家慧，《兩個太陽下的臺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

許俊榮、黃志明、公小穎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

林雪嬌，〈申請二二八賠償理由〉，《行政院公報》，卷11期33（綜合行政篇），2005年2月22日。

林進發，《臺灣人物評》，台北市，赤陽社，1929年8月。

胡慧玲，〈醫者之路／傅斯年與我〉，《島嶼愛戀》，台北市，玉山社，1995年10月。

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人權奮鬥證言——白色封印：白色恐怖1950》，台北市，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出版，



2003年。

國家安全局，《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輯2，台北市，李敖出版社，1991年12月。

張勇，〈訪台灣光復親歷者老台胞黃幸：始終心繫祖國〉，人民網：<http://tw.people.com.cn/BIG5/14810/3789281.html>，2007年9月21日。

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4年5月。

陳小雀，《加勒比海的古巴——雪茄與蔗糖的革命之歌》，台北市，果實出版，2006年6月。

陳炳基口述。見藍博洲，〈在歷史的荒溼中消逝的野百合〉，《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1994年12月。

陳銘誠，〈「台灣百合」被構陷入罪的礦業鉅子—劉明〉，《台灣日報》，2004年11月6日。

曾建元、曾薰慧，〈青春戰鬥曲：戰後國立臺灣大學政治事件之研究（1945-1955）〉，

台灣法律網：[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4,&job\\_id=102772&article\\_category\\_id=17&article\\_id=43890](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4,&job_id=102772&article_category_id=17&article_id=43890)。

楊碧川，《20世紀最後革命家——切·格瓦拉》，台北市，一橋出版社，2000年8月。

維基百科網頁，網址[http://es.wikipedia.org/wiki/Imagen:Ruta\\_del\\_Che\\_-\\_Bolivia\\_-\\_1967.png](http://es.wikipedia.org/wiki/Imagen:Ruta_del_Che_-_Bolivia_-_1967.png)，2007年9月20日。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台北市，臺灣新民報社，1934年3月。

藍博洲，〈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醫師〉，《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受難的高貴靈魂》，台北縣，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5月。

藍博洲，〈來自北京景山東街西老胡同的歷史見證：戰後台灣學運領袖陳炳基的腳蹤〉，夏潮聯合會：[http://www.xiachao.org.tw/i\\_f\\_page.asp?repno=302](http://www.xiachao.org.tw/i_f_page.asp?repno=302)，2007年9月20日。

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人間》，第21期，1997年7月。

藍博洲，〈美好的世紀：尋訪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幌馬車之歌》，台北市，時報，1991年6月。

藍博洲，《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台北市，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98年4月。

# 切：全球商品化現象

白方濟 Francisco Luis Pérez Expósito 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專任教授

## 一、簡介

「切·格瓦拉」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物？他的腦海中竄動著那些想法？是什麼運動喚醒了他的革命意志？隨著他征戰四方的軍靴放於何處？吶喊出的聲音又是如何？活在世上的人們如同在深廣林中移動的一只水晶盒，我們是飛翔在海上勾畫出人生悲喜的受傷小鳥發出的嘆息。我們的人生有不斷接踵而來的挑戰，過程中發出的嘆息或聲響，終將隨著呼吸的靜止在海洋中永遠地安息，漸漸地被遺忘。然而，已死去的切·格瓦拉，他那消瘦的雙頰及深邃的雙眼所組成的清秀容顏，並未隨著他的死亡而消失，他持續向全世界發送訊息。無論他穿的是幾號的軍靴，多大的襯衣，甚至褲襠拉鍊是什麼樣的牌子，都已無法磨滅大眾對他的崇拜，他的身影及思想都仍在這喧鬧不止的世界廣為流傳著。

失去呼吸的格瓦拉，穿越了死亡之門，在門的後方，魚停止擺動尾巴，鳥不再飛翔，羽毛筆的墨水已經用光，而人類在命運的灰色頁面上留下了汗點。他已不再是他，亦不是曾經的他。切，現在只是個木偶，是被人們填滿木屑或用高科技做成的玩具，同時被畫上哀傷或快樂的彩虹色

調。

在某些地方，切是「妖魔·格瓦拉」，那是壞心的和反感的象徵，代表著不幸和壞預兆。就像是某些西班牙搖籃曲中提到的魔鬼：「快睡吧！我的孩子，不然妖魔會來，把不睡的小孩吃掉」。在其他神話中，切是「小耶穌·切」，有如西班牙的民間信仰：「我生命中的小耶穌，你如同純潔嬰孩，讓我非常仰慕，並把我的心獻給你」。也有人形容切是「沙文·切」，這個過度沙文化的人物，征服了婦女的心，就像在次資本主義者家中，使用殺蟲劑消滅蒼蠅一樣地簡單。我甚至以為在日本將會出現有如「凱蒂貓·切」一般可愛的卡通角色，有如不會發胖的甜食，陪伴寂寞的孩子們，以及十五歲的青少年度過成熟期。

我們都必須接受格瓦拉已不在人世的事實。那個血肉之軀，有思想、行動、著作及話語的切，現在只是我們的感覺及創作。我們就像是貪婪的野人，虎視眈眈地打量著走過身旁的路人，在世界各角落活動的民眾，或是在歷史上留名的人物，伺機而動地想將偶像、藝術家、公眾人物甚至是政客一一吞噬。我們使用這地球上最受歡

迎的兩個動詞「崇拜或厭惡」來描繪這些人物。並將崇拜的對象神化，因此出現了妖魔或英雄的角色、國家或政黨的創立者、聖人或使徒等角色。或許，將切吃掉的譬喻稍嫌誇張，但再進一步的解釋，就是每個人用自己的思維去塑造切，將他顛沛流離的一生簡化，用個人偏好的色彩描繪出自身心目中的切，而且把他變成一種「神話·切」。而這樣的格瓦拉就是多數人們所認識的，切。

可惜的是我並未和切誕生在同一個年代，無法聞到他散發出來的汗味、親自感應他跳動的脈搏，更無法聽到他那如天使般的話語。但是，很幸運地我曾生活在他的時空及情境中，體會獨裁政權下的感受，在貧窮與痛苦中的騷動，如同他一樣，自我放逐，漸漸地活得不像真實的人類，並走向自己從不想去的地方。更因我的種族、歷史淵源、國家、年代以及情感等因素，我可以大膽的說自己曾經和切十分靠近，我可以深刻地體會他一生所遭遇的潮起潮落，以及心中不停竄動的那些不滿情緒不斷鞭策著他的靈魂，但是這樣的真性情最後卻如同在沙漠中的微塵般不受重視。在我的家鄉人們訴說的切：「我的切，是血肉之軀的人」。對於貪婪的群眾而言，切，只是一個宣傳工具，更是一種可銷售的商品，因此切被商品化並不令人意外：在這世上，只要有價值的，就能販售。和銀行業一樣，「切」成爲一門賺錢的生意，始於義大利，在時尚、義大利麵，革命及基民黨政府所在的羅馬帝國總部的一位公民手中開始。不錯，是一位名爲費爾特利尼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的義大利左派出版商，他將亞爾貝多·狄亞斯·柯達(Alberto Díaz Korda)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於古巴一個紀念儀式中所拍攝的照片，印製成海報並廣爲散播。而

這幅切的肖像成爲大多數人們心目中「切」的形象，也成爲了著名的蒙娜麗莎畫像，甚至是瑪麗蓮夢露裙擺飛揚的照片的主要競爭商品，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可看到他的蹤影。

## 二、神話般的切式照片

柯達他成天帶著照相機，是菲德爾·卡斯楚的私人攝影師，如果您不認識卡斯楚的話，他是留著大鬍子的古巴革命英雄，成天抽著雪茄導致健康狀況不佳。

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九年間柯達曾是《革命報》(Revolución)的記者，也當過Granma報的短期記者。在他當任記者的這段期間裡，用了1萬2千卷的底片來拍攝了卡斯楚、切·格瓦拉及其他革命領導者的相片，同時製作了大量的報導相片。

一九六〇年的三月五日，柯達以革命報記者的身份參與一項儀式，要向那些在阻止法國貨船加庫布雷號(La Coubre)號運送武器至古巴的破壞行動中一百三十六名受害者致意。這活動在哈瓦那的廿三街及十二街轉角處舉行，講台上站著革命領袖及受邀的外國名人，當卡斯楚進行演說時，戴著黑色貝雷帽不修邊幅的切·格瓦拉在第二排觀察現場狀況及領袖。柯達使用九十釐米鏡頭的老萊卡相機，他回憶著：「突然間，傳奇人物切的身影在我的相機前出現。他的眼神是如此深刻，以至於我的思緒混亂了一陣子，我移動著，顫抖著，但我馬上按壓快門，照了兩張相片。接下來，他的影像於盡頭消失。那不是事先規劃的，完全是直覺反應。」

在拍攝切的那個下午，古巴人民正處於極度悲傷的時期。根據古巴人拉法爾·歐哈斯·馬丁尼斯(Rafael Hojas Martínez)向我們敘述：在前往

柯隆(Colón)墳場的悲傷路程中，數以千計的人民都來到了首都的大街上，陪伴這些因破壞行動而喪生的人們。拉法爾曾譴責該罪行，並指其為「企圖」阻止鄰近島嶼取得自衛武器的「恐怖行動」。在葬禮中卡斯楚說出他著名的口號：「祖國或死亡」，同時也說「為祖國犧牲才算活著」。在這樣鼓舞人心及充滿強烈情感的氛圍中，柯達為後人捕捉了一張切·格瓦拉站在演講台上對著群眾演說的經典畫面。

在一場訪談中，柯達告訴我們接下來關於鏡頭裡的細節。「我就在距離演講台八到十公尺之處，在卡斯楚演講時，切有一瞬間往台上的欄杆靠近(他站在第二排，從我的位置是看不到的)。他探頭瞧了瞧擠在廿三街的民眾。我只用了兩張底片來拍攝他。然後切隨即離開，他在那個位置待了將近有半分鐘。」

這張照片直到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才公開，放在一則宣佈當時擔任工業部長的切的演說的新聞上。攝影師反問自己：「切是否看過這張相片？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依照切他看報紙那麼仔細的樣子應該是有瞄到那張照片，但他卻不曾跟我提起。」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也就是切在玻利維亞過世的四至五個月前，有個陌生人來到了柯爾達的工作室，他看到了切的照片便跟柯達要了一張複本。這位古巴的攝影師指出：「這位陌生人離開了工作室。他是從玻利維亞來的費爾特利尼利，他想到玻國政府爭取將雷吉斯，戴伯瑞(Regis Debray)釋放。我料想費爾特利尼利有消息來源，才知道切出現在玻利維亞，這件事世上知道的人不多。」底片到了費爾特利尼利，這位義大利編輯的手中，將其大量製成一百公分乘七十公分的海報，短短六個月，在歐洲發行了

一百萬份，卻都沒有提到照片是出自柯達之手。

直至柯達在墨西哥將底片交給義大利女記者吉烏莉娜·西梅(Giuliana Scimé)，並要她在義大利雜誌《影像前進》(Progresso Fotografico)上刊登文章，世人才知道這張舉世聞名的照片出自他之手。

從三月份柯達替切拍照的那天起，直到一九六一年的首次公佈，歷經一年。格瓦拉在一九六一年的這些日子裡，出生入死多年，曾擔任卡斯楚工業部部長，切成為古巴革命中的重要支柱，再不到七年，一九六七年的某天，切在玻利維亞森林開始走上一去不回的旅程。其他攝影師的相機也捕捉了他臨死的瞬間，如佛萊迪·亞爾貝多(Freddy Alberto)；他的相片正好反映出與柯達的相片相反角度的切。這個對立存在於切的兩張照片中，向我們展示「真實的生命」：有如肥皂泡泡般破滅於空氣中，戀愛中人和垂死之人的口哨聲，以及無知的人只能看見如短暫戲劇中演出的權力與榮耀，又如同淡水美麗的朦朧夏夜裡的黃昏與夜晚；海歐的叫聲與身上的汗水沉入因微弱燈光而反射影子的黑暗之河。

重回歷史，在一九六〇年代那段愉快的日子裡，我們相信切對那張拍攝於哈瓦那午後的相片感到滿意，雖然相片中他是「憤怒與悲慟的」。然而，在費爾特利尼利將柯達的相片從遺忘的記憶中找回前，那些底片被孤單的擺著，且佈滿塵埃。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革命前夕費爾特利尼利將其印製成海報，此時海報變成了一種藝術表現的媒介。之後，一位以民間藝術成名的愛爾蘭藝術家吉姆·費滋派翠克(Jim Fitzpatrick)，以費爾特利尼利的海報作出了切的肖像，激發了二十五萬學生、藝術家和年輕人的創意。柯達塑造出的

影像，無論是否更改過，都已經成為「一個六八年代的聖像。重現在壁畫，海報和衣服並且變成一種反抗標誌，之後在歐洲、美國和拉丁美洲，年輕人也使用此張相片來表示對政治的不滿。在八〇和九〇年代，此圖在第一世界曾被用來形容「極端激進」，形容對人或意識形態一知半解的某些世代。這個圖案出現在許多不同產品上，如啤酒、伏特加、手錶和衣服，甚至被刺青在拳擊手泰森(Mike Tyson)的腹部。」切的圖樣結合了他外表的魅力和浪漫，頂著過去革命的榮耀，使年輕人沈浸在理想和熱情中。因此，在「奇摩知識」某則有關切的回答中寫到，切如此受歡迎是因其外表很「酷」，及自由派年輕人重視外貌多於內在的愚蠢特質，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切的魅力不只影響自由派和左派份子的思想，還包括真正的革命，如恰帕斯印地安人以及保守份子。

事後，費爾特利尼利的兒子卡羅(Carlo Feltrinelli)為他作傳時，在傳記《卓越貢獻》(Senior service)中說明切肖像被快速複製的過程：「他將柯達所攝的知名相片沖洗成數千張的海報放在許多書店中」。這個圖案遍佈全球，費爾特利尼利把裝滿鈔票的公事包交給古巴大使館，並說：「這個出版物的利潤將全部用於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毫無疑問，切海報的成功激勵了安迪·沃荷(Andy Warhol)，他在一九七一年發表一系列毛澤東的肖像畫，在中國有超過二十億的發行人。

葡萄牙籍作家約瑟·撒拉馬哥(José Saramago)，在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日一份名為《解放》(Liberación)的馬克斯派雜誌專欄中，提供我們關於切神話般形象的思考，簡短又豐富的省思，他表示「用抒情或戲劇的方式作深沈的

省思，再以歷史學家的客觀眼光來看，切有如一位朋友，想要與他對話卻發現還來不及認識他便失去了他。」那張照片，成為世上所有革命家夢想的象徵，勝利的保證擺在其他事物之前，從不消退與懷疑，如邪惡中的善良、不公正中的正義、以及對自由的渴望。注視著斑駁的牆壁，葡萄牙土地上依舊存在著對切肖像的政治論戰、辯論，同時也降低了人們的沮喪感，揚起希望之鵠的叫聲。他被視為從十字架走下來的耶穌基督，有絕對的能力從石頭中擠出水來解除大家的口渴，並將水變成酒，喝了之後生命會籠罩光輝。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在成千上萬人的眼中，格瓦拉的形象是人類至高的尊嚴。

撒拉馬哥表示，有些表面認同切政治理念的特定意識形態團體操弄了切這位阿根廷革命英雄的肖像，他並希望知道「世界上所有將切的肖像放在床頭上、辦公桌前，或是接待朋友的客廳，自認為相信他的人們在想些什麼？」有些人會說：生活改變了，格瓦拉輸掉他的戰爭，我們也失去我們的戰爭，因此流淚也沒有用，就像小孩子打翻牛奶一樣。其他人則認為他們只是剛好處在時代的潮流中，就像鬍子變多或亂髮變長，彷彿革命是理髮師們的問題。正直的人則坦承感到心痛，他們一直覺得悶悶不樂，彷彿真正的生活已停滯不前，現在他們無所適從，毫無希望，對於未來更是茫然。

在臺灣，切的圖像有很多崇拜者。民進黨的高雄市長陳菊在辦公室放了一張切的照片，親陳總統的大陸工程總裁殷琪。但是切的崇拜者不僅僅只有掌權者，二〇〇六年欲罷免台灣總統的組織團體也包括在內，天母的時裝商店和許多夜市都販賣切的衣服和其他有革命偶像圖案的裝飾品。

### 三、切的肖像於商品上的推展



攝影/Lucia Chen

無論如何，切的肖像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後的用途不勝枚舉。有的被抹黑，有的被操弄，或者被神格化，以及商業化。從陶製杯子到金屬製的鑰匙圈，他的照片被大量複製，並以不同方式呈現。他也成為左派世界及在廿一世紀的全球化及後工業化之工業社會的領導象徵。對於有進取心的左派份子跟精明的資本家來說，「切」的形象就如同金雞母一般。他的肖像在上衣，打火機，棒球帽，甚至在妙齡女郎在海灘及游泳池的昂貴比基尼上。矛盾的是，這位馬克斯革命者的形象每日都在滋養這個消費社會，完全違背他一生追求的宗旨。舉例來說，我們到 <http://www.thechestore.com> 網站去，將可在棒球帽，上衣，以及所有的配件上看柯達和費爾特利尼利所攝之「切」的肖像。神聖的革命刺激了我們穿印有「切」肖象之希爾費格(Hilfiger)的衣服、耐吉(Nike)的運動鞋、戴高堤耶(Gaultier)的眼鏡，甚至喝思美洛(Smirnoff)的伏特加來洗淨我們的內臟。他的肖象也出現在瑪丹娜《夢醒美國》(American Life)的專輯封面上、威克穆尼茲(Vik Muñoz)的「Che Frijol」作品中，以及瑞奇傑維

斯(Ricky Gervais)的DVD「政治」(Politics)裡。在各種產品中，我們在西班牙的香煙、墨西哥的保險套、美國的手帕、法國的酒及加拿大的飲料產品中均可看到印有「切」的標記。

「切」肖像的多樣性，沒有失去其政治感染力，它仍持續代表各種的革命，繼續給予抗議群眾勇氣來面對警察的棍棒及步槍。「切」的肖象總會出現在反全球化的遊行集會標語及上衣中，如於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九年、二〇〇〇年、二〇〇一年、二〇〇七年分別在馬德里、西雅圖、布拉格、熱那亞、羅斯托克舉行之反全球化運動，多場世界社會論壇出版物和反伊拉克戰爭遊行中；切的形象也激勵了薩巴達民族解放陣線(EZLN)及其副司令馬可士(Marcos)在集會遊行上大聲疾呼革命；人們在反對布希參加二〇〇六年美洲高峰會的遊行上穿它，在二〇〇七年三月與布希同時訪問拉丁美洲的查維茲身上也穿著印有「切」肖象的衣服；還有在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日的美國，人們聚集在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所發起之勞工遊行也充斥著它。「切」的名聲所得到的讚揚並不僅止於如查維茲及莫拉雷斯等左派人士，也獲得了其他如支持新自由主義的阿根廷前總統梅南、中國的異議份子梁國雄、車城領導者巴薩耶夫(Shamil Basáyev)及反桑定主義領導人帕斯德拉(Edén Pastora)等人之讚頌。「切」的形象擁有如魔幻般的吸引力：他是一個強硬卻富有情感的人，他所談論的是反叛與暴力，但卻也談論正義與博愛，他超越階級及文化水平，勞工及革命者都喜歡他，腳踏車及迪斯科舞廳都看得到他。眾多的召喚中有他的救贖，也有他的沉淪。

切·格瓦拉是很風行的。有眾所皆知的冰品

「Cherry Guevara」，還有蕃石榴味道的切·格瓦拉唇膏可來「對抗嘴唇疼痛及乾裂」，只賣2.99英鎊。也可以穿上切·格瓦拉拖鞋，你只要上網到<http://www.shircity.com>網站上使用信用卡就可以讓自己「切·格瓦拉化」。我們可以在台北的夜市看到切·格瓦拉的衣服，但你若想要其他正版的產品，可以到Vito en Pantalla買一件20.88歐元的上衣，或9.84歐元的切·格瓦拉肖像的旗子，或是以7.64歐元重製由費爾特利尼利所繪的海報。

難怪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會在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二十九日舉辦一個「革命與商業：柯達所攝之切革瓦拉肖像遺產」的專題展覽。展覽中，陳列了許多柯達拍攝標著「遊記英雄」那張相片的海報、照片、影集、遊行的布條及裝飾藝術。此次展覽的承辦人崔夏·季芙(Trisha Zif)向我們解釋了他對切的肖像如此迷戀的原因：在我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了柯達的作品裡有幾點特殊之處，也將它們概括為三大類。其一命名為救世主，再者是被商業化的切，最後則是藉由照片描繪出切的個人特質。其中對我而言最有趣的部份是解構這位偶像的過程。由於世界各地對於切的肖像解讀有所不同，我便追尋著歷史的軌跡來探討切肖像的意涵。如在二〇〇〇年的恰帕斯(Chiapas)，切的肖像的意義顯然完全不同於《浮華世界》(Vanity Fair)雜誌中由奧茲奧斯朋(Ozzy Osbourne)與安妮萊柏維茲(Annie Leibovitz)所拍攝之照片，更不同於在法國被使用在滑雪板上專供販售之用的意義。而在革命的意義快速淡化的同時，肖像本身的涵意僅存在特定的情況之內。在眾多因素驅使下，切的圖像漸漸變成眾所皆知的普通事物。這種情形其

實是由許多不同且複雜事物結合而成，與時空背景、切的個人特質和他被暗殺的事實互有關聯。

並非所有人皆以正面的態度來看待這些印有切圖像的相關商品之暢銷。在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二日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海里亞市(Hiellah)的伯靈頓(Abrigos Burlington)工廠前，舉行了一場反對商家用兇手的圖像做為商業產品的激烈示威遊行，群眾攻擊所有販售印著切肖像襯衫的公司，而紐約的阿帕曼(Appaman)地區，人們也拉起寫有「共產主義者一點也不酷」標語的抗議布條。儘管如此，或許仍可以跟隨時代潮流且販售任何附有切圖像的物品，如同網路上所見的「Che-Wbacca」的襯衫。

Converse的波蘭子公司便邀請JWT廣告公司的安德烈·德蘭(Andrei Dragan)，利用阿茲納和切的合成像捕捉出兩人相似之處並提出「不論祖國或死亡，我們都大賣」的標語。而海報的呈現是以切的面貌搭配著兩隻反向的鞋子所構成的衣肩徽章為基礎。而設計師為了使兩人的容貌更加相像，不斷挖掘許多相似點，例如在「Che Aznar」的帽子印上五角星的圖樣。

阿爾瓦羅·巴爾加斯·羅薩(Álvaro Vargas Llosa)同時也對切肖像之商業化做出回應：切的圖像被裝飾於杯子、打火機、鑰匙圈、皮夾、帽子以及牛仔褲上，同樣的也出現在那些隨處可見且印有柯達所攝之切影像的服飾上，至於切的圖像則是在切革命的前幾年，亦即這位英俊的社會主義者在偶然的情況下被相機所捕捉到的身影，在他死後三十年，成為了現代革命份子的形象代表。至今，與切有關的製品已經觸及到任何所能想像到的領域，就像Burlington Coat 工廠所製作的一段電視廣告裡的主角便身穿印有切肖像的上

衣及迷彩長褲的相關商品。同樣地，這些革命份子也指出現下切被商業化的風行程度：只要透過網路，便可在「The Che Store」店裡買到「任何革命所要的必需品」；義大利作家吉雅妮·蜜娜 (Gianni Minà) 甚至將切於一九五二年所撰寫的南美洲遊歷日記的電影版權出售給羅伯特·雷德福 (Robert Redford)。

而世界上不論支持或反對的人士，皆常把切的圖像用於消遣，例如西班牙前總理阿茲納的「El Che-Ma」襯衫，台灣總統陳水扁的「A-BAIN」襯衫，最新的一件，由Kevin Liao設計，旨在支持台灣總統以及讚許他為台灣所做的貢獻。他說「我們要讓第一家庭知道，還有很多人在這麼艱困的時候支持著他們」，他同時也承認他決定設計支持陳水扁的T恤是因為有很好的商機。

#### 四、結論

切·格瓦拉是神話般的革命者，他的死猶如馬克思主義的殉教者，在廿世紀和廿一世紀，他同時也是左派永恆的象徵。在那張著名的相片中，眼神似乎迷失在地平線以及他那頂象徵反叛軍首領的貝雷帽，代表著反抗主流以及反資本主義和對社會的不妥協。然而近年來，在世界各個不同的角落裡，例如古巴，中國，美國，歐洲以及台灣，他的影像牢牢綁住了市場，成爲一種消費品。如今，他的臉印在各種卡片、襯衫、打火機甚至比基尼上。除此之外，在廿世紀和廿一世紀，他的照片也用於一些消遣、批評和嘲諷的用途上，同時也用於政治宣傳和攻擊群眾領導人，例如台灣的陳水扁、委內瑞拉的查維茲，以及西班牙的阿茲納。

切的照片會成功的秘密，不只是因爲古巴和世

界上所有的左派運動都將其視爲標竿，同時也是因爲他在世時所處的環境，和格瓦拉本人的人格特質以及在歷史的定位。切的一生充滿了革命者的浪漫，他的照片是那樣的獨特、清晰和簡單；六〇年代以後，切被塑造成優雅，生動，帥氣的年輕人，他的不妥協深深烙印在第一世界以及其他的地方。

馬克斯無疑是深刻的理論家，但他的生命缺乏切·格瓦拉的革命浪漫及形象。其他的革命者，如毛澤東，也擁有浪漫的一面，且有一個龐大的國家支持著他的革命運動，但他不是白人，也不像切如此的帥氣，使得毛澤東在第三世界中，沒有得到同樣的吸引力。

切的早逝，就像瑪麗蓮夢露 (Marilyn Monroe)，卡洛斯賈爾德 (Carlos Gardel)，貓王 (Elvis Presley) 或是詹姆斯狄恩 (James Dean) 一般繼續著神話傳說。活得太長久勢必不能留住光彩，因爲這會脫離年輕時因浪漫的想法所導致的錯誤、背叛、犯法以及不妥協等等，進而失去傳奇般的偶像地位。海報中的影像以及人格特質，需要以失去性命來換取永遠保持年輕美麗。活得太長久會減少魅力，這也是其他著名人士的肖像不能如切一般流行的原因。

切肖像的傳播無遠弗屆，可歸因於他的不妥協與浪漫的革命，與其他的領導者不能相提並論。他那清晰又具體的照片，帶點模糊但有吸引力的特質，充滿著浪漫革命者與對抗的氣息，有點不協調的優雅，再加上早逝，結合成成功行銷成果。

我對切感受最深的是他對邊緣人的情感，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胸襟，以及他對於奮鬥才能促變的信念，他的理想主義及浪漫主義。★

\*方廷、余南誼、施昱如、楊佳蓉、蔡銘軒、謝雨珊譯 / 王秀琦校譯

原文請參考附錄第106至119頁。



# 切的人道主義

沙提諾 Alberto Saladino García 墨西哥州立自治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 一、埃內斯托·切·格瓦拉生平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埃內斯托·格瓦拉·德拉塞爾納(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以下簡稱切·格瓦拉)生於阿根廷羅薩里奧市，於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在玻利維亞的無花果村(La Higuera)被殺害。切·格瓦拉始終如一的政治思想發展的歷程，不但使他成為拉丁美洲革命家的象徵，更影響了全世界。也因此，在切·格瓦拉逝世四十週年之時，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舉辦了「切·格瓦拉：不朽的英雄」這個學術活動，藉以分析了解切·格瓦拉的思想及其作品。

切·格瓦拉一方面透過閱讀了解拉丁美洲經濟、政治及社會的真實情況，另一方面他大膽的走遍了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祕魯、委內瑞拉及中美洲，並曾定居於玻利維亞、瓜地馬拉、墨西哥及古巴，成為一個覺醒的拉丁美洲人。因為上述的經歷，切·格瓦拉自我完成並決定透過主張自由的戰鬥來克服國家間的分裂以及建立共產主義，終其一生都投注於這個高貴的目標。

事實上，切·格瓦拉有許多為人所知的行動，例如支持瓜地馬拉民族主義者亞本茲(Jacobo

Arbénz)的政府；也參與了推翻古巴獨裁者巴帝斯達(Fulgencio Batista)的行動，他獻身於古巴政府從事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參與玻利維亞的游擊行動，以便將革命擴散至整個拉丁美洲。

人們對切·格瓦拉的革命生涯給予諸多肯定，尤其是在他逝世之後。不過在其生前，古巴的維亞斯中央大學(La Universidad Central de las Villas)曾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頒發了教育榮譽博士學位給切·格瓦拉。四十年後該所大學的學者表示：

儘管切·格瓦拉總司令只願意以「人民」的名義接受該學位，且自認為他不應得到這個頭銜，但我們覺得這個榮譽博士的學位他是當之無愧的。切·格瓦拉總司令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表現出對於教育的熱愛：他了解無論是在戰爭或者獲勝後，教育大眾是必不可少的一環；也唯有如此，方能獲得完全的勝利以建立一個新的社會。

很明顯的，對切·格瓦拉最深的肯定，可說是年輕一輩對柯達(Alberto Korda)為切·格瓦拉所拍攝的照片及其塑造出來的反抗英雄及清新的革

命家形象的崇拜，該相片已在全球進步人士之間廣為流通。

不過我們不能因為切·格瓦拉游擊份子的形象，而遺忘他擔任數種公職期間，將自己的理念付諸實行所建立的另一種生活模式。切·格瓦拉曾任國古巴家農業改革研究院工業處處長、古巴國家銀行的總裁、工業部部長以及在國際論壇中擔任古巴的代表。在其公職生涯中曾有幾次令人難忘的表現，例如在一九六一年的美洲國家組織會議，以及一九六四年的聯合國大會。除此之外，切·格瓦拉持續在革命武裝力量組織中擔任要職，並在一九六五年協助創立了古巴共產黨，該黨是經由七月二十六日運動與人民社會主義黨及三月十三日革命領導等機構組合而成。

一九六五年切·格瓦拉決定辭去公職並離開古巴，在全世界繼續投入擴展革命的戰鬥。第一站他來到非洲的剛果，幫助盧蒙巴(Patricio Lumumba)比屬剛果的解放；之後，切·格瓦拉抵達玻利維亞對抗其軍事獨裁政府並自一九六六年起協助擴展整個拉丁美洲的革命解放運動，但是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切·格瓦拉在艾爾優洛山谷(El Yuro)遭到軍隊逮捕，隔天即被處決。

當深入研究切·格瓦拉的生平及作品時，許多學者都會將研究重心放在其政治活動的實踐上。因此現在我將要強調的是補充的部份，也就是切·格瓦拉行動的理論基礎；接下來我將要探討切·格瓦拉在實踐其革命人道主義時展現的特徵及方法。

## 二、切·格瓦拉人道主義之基礎

在切·格瓦拉的作品中融合了理論與實踐，若以義大利的葛蘭姆西(Antonio Gramsci)以及墨西

哥的桑切斯(Adolfo Sánchez Vázquez)這兩位馬克思主義者的分類，切·格瓦拉可被視為拉美實踐哲學之代表人物，。因此我認為應該澄清切·格瓦拉的人道主義的基礎特徵。

在切·格瓦拉的作品中分別闡述了許多他對人的基本概念，本文將藉由其自由的概念、有關如何克服誘惑的想法、對於團結的態度與對工作的功能的正面肯定等，來了解他對人性尊嚴的真正看法。因此對切·格瓦拉而言，人類是歷史發展中的產物；他並透過以下的說明來讓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新人類更團結一致：「成爲一個實質的人，要成爲這樣的人，必須與世界公民共同努力、身體力行並且團結一致，將情感發揮到淋漓盡致」。

要分析切·格瓦拉是如何努力去造就十足的人類必須先闡明支持他政治行動的基礎。

### (一)建立自由觀念

首先唯有完全的自由才能建立人性尊嚴。當我們了解完全的自由內涵時，就會發現到其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因為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它的使用及觀念都會有所不同，連內容都不盡相同。舉例而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就會有資產階級的意識，但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則會看到企圖擺脫欲求的王國的各種努力的痕跡。因此切·格瓦拉建立了他認為可以讓人類尊嚴發揮到極致的一種自由，他肯定的說道：「古巴是美洲國家的先驅，它向拉丁美洲的大眾指引出通向完全自由的大道。」

他甚至提出一種新的自由實踐的概念，將由主義的理論限制在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不受限制的個人行爲，這有助於自我發展的實踐，這樣並不

會否定個人的功能，反而可以讓他完全的發展。

## (二)克服物質誘惑

要建立一個和諧發展的自由王國就必須先戰勝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中無所不在的誘惑，也只有像切·格瓦拉這樣已經克服它的人可以鼓舞他人如此做。他指出透過集體社會參與及對人類的教育建立一個新的生產模式，可以「讓人們獲得社會人的完全自覺完全實現標，並且衝破誘惑的枷鎖。」

因此超越人類的異化成為建造自由社會不可或缺的條件。切·格瓦拉也是基於這樣的理念來進行革命行動並對抗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並且強調共產主義的新生產模式中的工作的自覺行為。

## (三)工作正面概念

對切·格瓦拉而言，透過工作的自覺行為來克服誘惑，生產活動將創造走向自由王國的條件。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闡述為工作是構成人性的一部份，一個可以使他自大自然解放的社會運動；這種概念切·格瓦拉利用兩個主要理念對此做了詳盡的說明：

1. 應以此作為新人類產生的主要的社會機制；
2. 因此，可以將之設想為社會建構的轉折點。

切·格瓦拉有關的敘述如下：

經由自由的工作可以使人更貼近其本質，而透過文化及藝術則可以使人表達出其本身的狀態。要使人發展人的本質，第一步就必須改變工作的狀態；以人為商品的情況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一種提供配額的系統以實現社會義務；生產工具歸社會所有而

機器只是為了完成其義務而存在。人類會開始解放其思想並發現不需要為了滿足其基本需求而工作；透過既訂的目標及已完成的工作，人類會開始發現他自身的重要性；人類再也不需要為了工作出賣其勞力，這是一種自我的解放，也是對他所屬的生命共同體的貢獻，更是一種社會義務的實現。

在建立古巴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切·格瓦拉強調他是透過無可逃避的社會承諾賦予「工作」新的道德意涵，當工作成為自願行動的產物時，將獲得更大的自由。但是切·格瓦拉也承認在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一九六五)，仍需要藉助強迫的手段來雇用員工；儘管如此，他依然相信新習慣的養成將可以建立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也就是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而工作將被視為主要人類生活的體現。

## (四)團結

切·格瓦拉的革命人道主義談到社會關係以及國家間的團結合作，尤其是不同社會間應強化團結時所應採取的新態度，他說：

記住！如同我們應該記住自己在古巴的行動，對我們的美洲來說我們就是一個真實且明顯的例子，對世界上的其他為自由奮戰國家來說也是一樣，我們一起對抗著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其他任何不公平的體制的壓迫；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就是自己的鏡子，而每一個人都是為了古巴而奮戰，同樣的我們也是其他美洲國家及其他為自由抗戰國家的借鏡。

很明顯的可以看出這篇對國際團結有益的激昂

談話是出於切·格瓦拉本身的革命特質以及它採取馬克思主義以對抗資本主義的作法。當切·格瓦拉身上背負著實踐自由的承諾時，這成爲他的個性中不可分離的特質也使他願意強烈的表達其思想。

切·格瓦拉的人道主義有革命的特質，他希望可以透過上述的價值及改變現有社會條件的保證訓練出新人類，因此當他說：「戰鬥改革了我們，對革命家而言沒有一個經驗會比戰鬥還要更深刻的……」的時候，可以看出這是他親身的體驗。

由於切·格瓦拉的革命覺醒，對於以協調建立以新人類爲基礎的社會抱持著希望；在革命初期切·格瓦拉堅持盡其所能與其他古巴革命家一同將其祖國轉變爲社會主義的範例，他說道：

現在我們不只是國家內的行動者，在這個時刻我們要打過固有的美洲的希望。那些強大的壓迫者的眼睛以及懷有希望的民眾的眼睛都盯著我們看；美洲民眾運動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未來的態度以及我們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而我們的每一步都將被無所不在的敵人密切監視，也會被樂觀的美洲友邦們所關注。

由於在古巴建立社會主義，切·格瓦拉激發了革命青年的思想，他們就如同新人類的典範一般，衷心承諾繼續建立其共產主義社會。

### 三、新人類來臨的方法

切·格瓦拉人道主義的源由和依據在他的思想視野上可以看到，切他曾坦承：

…馬克思思索人類的解放，並且認爲共產主義是

解決誘惑所造成矛盾的自覺行爲。值得一提的是，不能將共產主義視爲高度發展社會中階級對立的結果，在到達巔峰後將自行轉型解決。人是歷史中有意識的行爲者。沒有這個社會人的意識，就沒有共產主義。

因此切·格瓦拉認爲，新人類的存在是形成一個共產主義新生產方式的歷史道路中的重要因素，是他生命中主要的抱負，也是他希望古巴在革命勝利後所促成社會情況造成的結果。

因此，新人類來臨的方式、允許共產主義實現和構築的基礎，皆需要訴諸於革命態度的凝聚、教育的再創立，並了解科學及其技術所展現的解放作用。緊接著下面我將逐一解釋：

#### (一) 革命的實踐

在切·格瓦拉的生命與作品中從各種角度呈現出深度的革命承諾，這是因爲藉由鬥爭來改變資本主義者的宰制及誘惑，是使得人們變得更有尊嚴的必要條件。因此切·格瓦拉的人道思想以爲，欲改變現狀，形成以平等對待爲基礎之合諧關係及使新人類得以形成之條件，必須採取行動改變現狀。

爲了使他的人道主義的理想具體化，切·格瓦拉首先提出革命態度的發展與實踐，在他有生之年，一直主張承諾提升此態度，並且以此態度作爲所有反資本主義行動的指引。在這方面，他的作品充滿了鼓舞人心的訓示，這些訓示鼓勵人們隨時實現這種態度。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在第一屆國際農業學生會議閉幕式中，他懇求：

…我們不應忘記古巴革命強大的示範力量，它不僅存在古巴內部，更超越古巴邊界。我們應將革命意識

的熱情傳播到美洲所有的角落和世界上所有知道我們的角落。應該隨時察覺世界所有不幸、掠奪與不公平……。

故知革命者的任務是成為所有轉化的原動力。它最終的結果將是於該社會中，孕育出新的人性。

切·格瓦拉甚至坦言：

…真正的革命者是被強大的愛所牽引。真正的革命者不可能缺乏此特質。身為許多不幸領導者之一，他應該結合一個熱烈的靈魂、一個冷靜的頭腦，並冷靜的做出痛苦決定。我們的革命先驅必須把愛傳達給那些人民，將那些神聖的動機理念化，並使它們結合一起，不可分開。不能夠像平凡人一樣以一丁點的日常的愛為滿足。

所以，新人類不只是一個未來的人類，它已經在切這位革命者的行為及思想中落實。他的任務在於締造具人道特質新社會來臨的條件。只是他和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將它稱為共產主義。有鑑於此，我把他的理論及實踐視為革命的人道主義。

## (二) 教育的功能

對於切·格瓦拉而言，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培養新人類與眾不同表現並賦予其生命意義。換言之，他的目的是在為革命的人道主義到來創造知識與物質條件。

因此切·格瓦拉所希望的教育包括了非系統化的、間接的及系統化的、直接的特質。有關前者，他表示在極端的情況下皆可權宜。「…增加道德價值；為了保持它的有效性，發展新的自覺以便使各種價值取得新的意涵也是必要的。整體

社會必須變成一座大型的學校。」因此教育不只是具體被約束在特定空間的活動，而是在總體社會當中培養日常生活中各種價值的自覺與實踐。

以上概念外，可再看看對古巴革命政府建立的系統化教育的描述上：

在我們的情況中，直接教育比較重要……。國家的教育機構都依照總體文化、科技與思想來進行，由教育部的組織以及政黨的宣傳機構來運作。教育普及至一般大眾，經由倡導新的態逐漸變成習慣；一般大眾把教育內化並對那些尚未受過教育的人們施加壓力。這就是教育給一般大眾的間接方式，也跟直接的一樣有效。但是過程是自覺的；個人持續接收到社會壓力的新衝擊，並領會到這對他並不是完全適當的。在間接教育的影響壓力下，人們試著適應一個他覺得公正，但因其自我發展的欠缺導致他無法照做的情況。這就是自我教育。

因此我們要締造一個使切·格瓦拉付出生命的人道社會，必須將教育視為主要的解放行動，因為教育它有價值培養及使人們重新自我檢視的功能。

此外他也提及宣導綜合教育與智力及體力的培養互相配合，學校也和社會上工作實習的地方建立聯繫，「…教育逐次變得更加完整，我們別忘記教育一開始便與工作接軌。我們領獎學金的學生可以在放假的時候，做體力上的工作，同時又跟學業結合。教育的方式下，工作在某些情況上是個獎勵，是一種教育工具，不過有時它也是一種懲罰。一個新世代因而誕生」，又是另一個教育實踐的產物。

### (三) 科學的促進

教育內容的本質部份包含它所倡導的文化的、理性的概念，以此為基礎，教育可以檢視科學知識在人道社會建構過程中的優點。

為了維護這種立場及強調他對科學多方面的研究，根據勞爾福爾內特(Raúl Fornet-Betancourt)指出，他發覺到相應的科學結果可以看作是解放工具。

由於要讓科學知識扮演的腳色更具體化，他指出科學對於培養批判的客觀的及理性的頭腦以解決社會問題有其重要性，因此主張古巴革命應支持科學。不過他也承認「…在剛開始時限制是很大的。我們的科學家不能進行他們想要做的研究。有時是缺少進行研究所需的染料及技術原料…」說真的，這樣的情況，是因為美國持續對古巴實施經濟封鎖的緣故。

由於強調科學知識在解決問題之運用，並倚仗科學來建構新社會，他將科技與技能相提並論，由於其特質及多重意涵，我將在下一節再討論。

### (四) 科技的武器

切·格瓦拉，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哈瓦那舉行的第一屆國際農業學生會議閉幕式代表致詞時，他又再次提出了一個標題「不能忘記科技是武器」，他總結其中心理念說：

…科技能征服人民，也能使人民得到解放…

為了讓科技的武器對社會有幫助，必須先能控制社會。為了控制社會，必須摧毀那些壓迫的因素、必須改變在某些國家的現行社會條件，並且交付所有科

技給人民。科技的武器及其功用是屬於所有相信地球某些地區需要改變的人們的。

因此他的觀點是認為，必須使科技為解放戰爭所用，它是建立新社會、維持這個社會形象，甚至落實社會新關係的不可或缺武器。換言之，他主張科技的人道特質，引導它走向為解放而戰，以突顯科技必須服務人群。

切·格瓦拉是個有遠見的人，他將科技視為建構共產社會的支柱之一。因此他強調科技的發展，善用其他社會之科技成果。他在古巴革命的初期時闡明過：「路大部分是長遠以及不知名的；我們要知道我們的限制。我們將教育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在日常行動中訓練自己，創造一個新科技的新人類。」

總而言之，切·格瓦拉藉助各種理性的文化資產的理念，作為實現他的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工具。

因此可見，切·格瓦拉的革命人道主義的主張，忠實反映出他部分接受自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批判性的思想以及其政治承諾。誠如淡江大學所言，其主張也使他成為不朽的英雄，其地位等同玻利瓦(Simón Bolívar)、聖馬丁(José de San Martín)、阿蒂加斯(José Artigas)、沃斯金斯(Pablo de O' Higgins)、蘇克雷(José Antonio Sucre)、莫雷洛斯(José María Morelos)、胡爾雷斯(Benito Juárez)、馬蒂(José Martí)、桑定諾(Augusto César Sandino)等等拉丁美洲的名人。

★

---

\*洪郁雁、陳其瑜譯 / 王秀琦校譯

原文請參考附錄第120至129頁。

# 革命中的革命？

## 游擊中心理論與馬克思的科學主義

拉米雷斯 Juan José Ramírez Bonilla 墨西哥學院亞非研究中心教授

你我一起來創造，我們一起來創造  
讓我們拿起創造新人類的黏土  
我們將賦予新人類  
家喻戶曉的游擊戰士之心  
(丹尼爾·維列提：新人類之歌)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南方的無花果村(La Higuera)被暗殺身亡。埃內斯托·格瓦拉·德拉塞爾納(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以下簡稱切·格瓦拉)出生於阿根廷，出於自願及古巴人民的決定成為古巴公民，並由於其深刻的信念成為為國際主義奮鬥的戰士。

距離切·格瓦拉悲劇性的死亡，已經長達四十年之久，雖然這位傳奇人物已成為全球消費市場的明星，有些人仍能感受到他在戰場上的吶喊。現今透過行銷手法與軍事干預試圖讓民主成為唯一的社會模式，但有些人仍然認為游擊戰才是改變世界並使其轉型的方法。

而今，在廿一世紀的初期，拉丁美洲游擊運動有了不同的風格：哥倫比亞革命武裝部隊(FARC)被視為拉丁美洲七〇年代政治災難後倖存的恐龍，但卻無法適應全球化的新環境；相反的，墨西哥恰帕斯洲的薩帕帝斯塔起義卻重新塑造出革命游擊傳奇浪漫的形象，一個由切·格瓦拉及其當代人物所鼓動，卻在軍政府的壓制下已幾乎消失殆盡的形象；墨西哥人民革命軍(Ejercito Popular Revolucionario)在以搞破壞的方式重現社會後，被視同為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

日的恐怖組織的同類。

由於以游擊中心的模式進行的暴力，目前仍出現在拉丁美洲的政治舞台，因此有必要再次就其理論前提加以批判，並將其與新的現實加以對照。

### 一、游擊中心理論的先決條件

切·格瓦拉所撰寫的《游擊戰爭》(*La guerra de guerrillas*)一書中，闡述了他在古巴革命的經驗。雖然只是一百六十五頁簡短的篇幅，卻深深影響了拉丁美洲革命軍人。他的文章雖然一方面缺少相關理論，但是談到古巴經驗卻描繪得相當豐富。然而，如何建立切·格瓦拉的軍事思想理論？毫無疑問地，只好以間接的方式來切入。雷吉斯·德佈雷(Régis Debray)在一封從玻利維亞卡米立村(Camiri)的監獄中寄出的信件中提供了線索：「如果他們出版了切·格瓦拉的筆記，就可以發現切·格瓦拉對我著作的《革命中的革命？拉丁美洲的武裝與政治鬥爭》的讚賞，切·格瓦拉認為此著作仍然過度保守，儘管與大多數人的想法相左，不過即便作者發表自己的意見時還是相當激進。」這樣看來，依據德佈雷的觀

點，我們大致上可認為切·格瓦拉在某種程度上與德佈雷的理論論述雷同。在這點上德佈雷是坦誠的，他說：「這本書是使我入罪被判三十年徒刑的主要信念，其內容也是判刑的主因。」最後他說，他的判刑乃出於錯誤的論證，而此論證「完全是基於馬克思主義核心的矛盾。」其矛盾的論述似乎也鼓舞了後代支持他論點的所有哲學家與政治家，他們針對機械論或唯意志論；強調經濟或凸顯良知；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或人道的馬克思主義；資本論的馬克斯或手稿的馬克思，一直爭論不休。於是乎，德佈雷的理論與切·格瓦拉的軍事思想理論，廣義來說，是奠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想當然爾，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作品為框架來分析暴力在切·格瓦拉在軍事論述的地位是最適當不過的。

### (一) 戰爭方面

切·格瓦拉一開始便以「科學的」分析方法來定義游擊抗爭的本質，他認為戰爭必須符合一系列的科學法則，若違反這些法則，必以失敗收場。切·格瓦拉的著作之最終目的即是釐清這些準則，使之系統化並提供給任何想要實踐社會體制改革的人士，「而我們的職責就是將事實理論化，將(古巴)經驗結構化原則化以供世人所用。」

然而，切·格瓦拉的思維是以巴帝斯達(Batista)時代的環境為前提假設推敲而得，在其他地區或不同年代下不必然是正確的。他的前提假設是：「不可能透過公民的爭訴維持爭取社會訴求的鬥爭」，如此一來，迫害者與受迫害者之間的對立無庸置疑成了必然的結果，唯有暴力才能解決問題。

壓迫者一向擁有專業的軍隊來維持既有的統治領導地位，這點乃引用馬克思，然而，依據恩格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詮釋，認為：「國家並不是由社會外部所強加的力量所形成。它應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所出現的產物，當這社會也已捲入其內部無法避免的矛盾之中，甚至因無法調和的對立而分裂時，將呈現的結果。恩格斯認為，在國家的兩大特色之一為公共武力的設置，由於社會階級分裂的情形致使人民自發性的武裝組織的可能性已然消失，故此，公眾力量的建立更形必要。

恩格斯的理論明確地指出國家的工具性特質，「國家由遏制階級鬥爭而產生，同時也從階級鬥爭而來。一般而言，強大且主宰經濟的階層，也會在政治上形成宰制，並從中得到用以壓制及剝削那些受壓迫階層的工具。

在眾多馬克思主義的分支中，根據恩格斯的理論，革命的任務就是讓無產階級及勞工階層成為政治的支配者；對馬克思主義改革者而言，這個轉變是透過政治力量在體制上的勝利所獲得，對馬克斯主義的革命者來說，只有摧毀資本主義體制並以無產階級體制代替，方可讓勞工階層成為政治領導階層。緊隨著恩格斯的腳步，列寧認為「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特殊壓迫力量」，應該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特殊壓迫力量」所取代，也就是「現前政體的破壞」。

我們回到正題，對切·格瓦拉而言，這些受壓迫的人，也就是「國家的人民」，面對壓迫者的不平等狀態，他們不但無法抵消壓迫者軍隊的暴力，更無法實現對社會的訴求。所以他們需要游擊隊，因為「武裝的中心就是人民的先遣部隊，



其動力來自人民大眾」。

以上由古巴經驗所衍生的法則成爲德佈雷的小冊的基礎：馬列主義者已改變一場於一九一七年十月在聖彼德堡，由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布爾什維克派所領導的蘇維埃武裝起義，後由列寧用幾個公式加以理論化，成爲馬列主義者的革命典型。切·格瓦拉認爲這些公式跟現在情況是完全沒有關聯的。相反的，「古巴在拉丁美洲開啓了武裝革命的先河，這個依據公平爲原則的政治路線的展開，才是根本的。」他並認爲「在今日的拉丁美洲，一個無法以聯貫及確實的軍事路線呈現其效果的政治路線，不能被視爲革命。每一種革命路線應該可以針對以下問題給予一個具體的解答：如何擊垮資本主義政權？也就是說，如何打垮這個政府日漸被北美軍事顧問所強化的軍隊？」總而言之，由於拉丁美洲條件的不同，由政黨所領導之革命，被傑出人物所領導之中心所取代。而游擊戰成爲一場革命中的革命，有兩種意義：一方面是游擊隊成爲一個制服軍人的政治要求已達到最後目的的中心要角，在另一方面，游擊戰因其卓越性成爲一個唯一的政治革命路線。然而，德佈雷雖然致力於切割現在與過去，他的思想綱領仍是源自經由恩格斯詮釋的馬克思思想。

## (二) 政治方面

以軍事策略領導政治策略，人類不再爲了避免互相殘殺而建立政治體制，這些都是革命過程中必要之結果。依據當時其他著名的革命派馬克思主義者之看法：切·格瓦拉的游擊理論就是克勞塞維奇(*clauswitziana*)的理論，因爲他認爲戰爭是武裝革命政治的延伸。米夏埃爾·勒威

(*Michael Löwy*)解釋切·格瓦拉主義的演講的內容時扭曲了克勞塞維奇的舊有思想：戰爭是以其他方式進行之政治的延續。然而，切·格瓦拉在關於游擊隊的文章當中只是轉換了克勞塞維奇的舊有思想：對切·格瓦拉來說，政治只是以戰爭方式進行之戰爭的延續；此一轉換可藉由他賦予游擊隊的中心功能看出來；此外，似乎他也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古巴政治體制的本質及發展。

的確，切展現出群眾的革命狂熱：「古巴人民對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的武裝起義勝利已改變了拉美人民行爲上的舊有標準，藉著游擊戰，顯示出人民有能力來解放折磨他們的政府。」在古巴革命對美洲革命運動的三大貢獻中，我們對於第二點特別有興趣：「不一定必須等待所有革命的齊備；革命的中心可以自己創造這些條件。」

有心的讀者一定會注意到聖經的影子：一開始是壓迫者體制的渾沌局面；對於如此的渾沌，群眾的意願有所盤算；中心指揮說讓群眾的意志實現，革命便與不良份子分離；初期革命份子爲少數，但當人民看見群眾的意志是良善的，革命份子便逐漸增加，直到游擊隊轉變爲有足夠力量消滅敵人的正規民兵軍團。

切·格瓦拉筆記本中的二十個章節曾提及有關革命條件的緣起，也就是說，革命政治不只是衍生自游擊戰的邏輯，也受到游擊隊戰爭的邏輯的制約及領導。因此，儘管賦予游擊隊員「社會改革者」的腳色並指派他們來「改變讓沒有武裝的兄弟姐妹們活在不名譽及困苦中的社會制度，並盡一切可能來打破制度的窠臼」，戰爭的最終目標仍是：「獲得勝利，殲滅敵人」，並加以普及。

德佈雷闡述「古巴教訓對未來之影響」時，他

清楚說明，在未來重要的是開展軍事中心而不是政治中心。爲了扼要簡明地說明一切，我們可以說：將由軍事中心走向政治運動，因爲政治運動可以被看作是政治本質中武裝鬥爭狀況的自然延伸，但除非例外情形，不應從純粹的政治運動轉爲軍事中心。

在七月二十六號的武裝運動勝利後近四十九年，古巴政權似乎仍持續和過去的幽靈抗爭著，「取得勝利，消滅敵人」的思想使古巴無法發展出安全並有利於古巴社會人的制度。如果切·格瓦拉仍然在世，想當然爾，他也會起身反抗這一種新的壓迫。

## 二、游擊中心理論前提與馬克思思想

也許切·格瓦拉的理論主要的缺失在於古巴變革中的政治本質，又希望拉丁美洲也以之爲目標。以「新人類」的思想摧毀舊治度以建立新制度，其實反映出恩格斯及列寧對革命的看法，也就是：以被壓迫者的特殊壓迫力量取代壓迫者對被壓迫者的特殊壓迫力量。不過以暴制暴，只是讓被壓迫者變成壓迫者，並回到最初的混亂中，使解放戰爭轉變成薛西弗斯(Sisifo)的工作。

透過「人類解放」的概念，馬克思提出一項烏托邦的見解，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必須：將「政治解放」分爲兩個部份，一方面將人縮小爲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員，獨立而自私的個人；另一方面將公民縮小爲道德人。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社會，個體活在分裂的形式中：作爲真實的人，人是具有個別具體需求的主體；作爲抽象人，人是政治的客體；另一方面，他也將「人類解放」定義爲「認知和組織自我力量如同社會力量，同時在政治的形式下不將社會力量從

自我中分割出來」。

從分裂這個概念出發，在一八四四年出版的《經濟哲學手稿》(*Manuscriptos económico-filosóficos de 1844*)這本書中，馬克思將「異化」的概念解釋爲，人類所創造之社會力量的自主化，及社會力量與其創造者之間的關係轉化。因此，在現代社會中，個人的異化生活，意指由人類所創造之社會力量對人類的控制。

透過費爾巴哈(F Feuerbach)《宗教的本質》(*Esencia del cristianismo*)這本書，馬克思了解到，宗教是「異化」的昇華。黑格爾在《權利哲學》(*Filosofía del Derecho*)一書中，提到政治異化；也就是說，對他而言，國家不只是階層的工具，而是社會的自主產物，並控制其創造者。在《政治經濟學評析》(*Contribución a la crítica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一書中，恩格斯發現即使在公民領域，個體過著異化的生活，在資本、薪資及利得的形勢下，他們受到財產及社會生產的宰制。馬克思推論出，在現代社會，無產階級集所有異化的形式於一身，而基於需要，他們是唯一對解放人類並重組其自身力量爲社會力量之激烈革命有興趣的階級。換句話說，革命在馬克思的邏輯中，並不代表特殊壓迫力量的替代，而是對於個人自己創造出來的社會力量建立集體掌控。

古巴政體如同其他的社會主義制度一樣，努力讓國家成爲最完美的「特殊壓迫力量」，以便「得到勝利，殲滅敵人」。帝國主義死敵的實際存在以及爲了對抗古巴所建立的據點，都是古巴政權繼續以政府爲工具，以維持少數對多數之宰制的藉口。其政治仍是沿用戰爭邏輯，只是這次轉到國際層級：現在施壓者是由美國政府爲代表，受壓者則是古巴政權。同時，完全漠視馬克

思所認知的激進革命的烏托邦計畫。

由於德佈雷受過比切更完整的學術訓練，他完全了解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問題，因此他明白的指出兩個不同的馬克思：1.「資本論」(El Capital)以及《經濟哲學手稿》(Los manuscritos económico-filosófico)的馬克思；社會科學的以及人道主義的馬克思；專注於唯物經濟法則的人物以及尊重人道倫理的可敬人物。德佈雷和切·格瓦拉一樣，自始便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但是卻忽略無論是否是馬克思主義，科學也是一種自主的不確定社會力量，它可能使創造者反而被控制。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爲了科學性而忽略個體所創造出來力量的社會特質，游擊中心理論(La teoría del foco)犧牲了「人道主義」，但卻造成其他伴隨資本主義宰制機制的異化型態。因此，也許可能產生新的問題，就是，要如何達成科學以及人道主義之間的平衡呢？此外，不論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政權下，此一均衡要如何超越資本主義體制之下人類所歷經的異化？也許最初步的答案是去了解，社會力量創造者欲重建對那些力量的掌控，不必然需要透過暴力手段，也可藉由直接參與政治生活的方式來完成。

在文學論述之外，切·格瓦拉願意爲其理想而犧牲個人的典範，顯示出直接參與政治生活的可能性，或許，現在的口號就是「號召千萬與切·格瓦拉有同樣犧牲意願的人」，而非「創造一個或多個越南」吧。★

---

\*余南誼、許偉君、楊佳蓉、劉曉儒、謝雨珊譯 / 王秀琦校譯

原文請參考附錄第130至137頁。

# Che Guevara: Un fenómeno mundial de mercadotecnia

Francisco Luis Pérez Expósito

Instituto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Universidad Tamkang

## 1. Introducción

¿Quién es Che Guevara? ¿Qué ondas magnéticas pasaron por su cerebro? ¿Qué movimientos arquearon sus dedos y masajearon sus músculos y huesos? ¿Dónde se posaron sus botas? ¿Qué sonidos surgieron de su glotis? ... Los seres humanos nos movemos en una pequeña caja de cristal, en una jaula inmersa en un bosque. Somos un suspiro de un ave herida dibujando la angustia y el gozo en medio del mar... Nuestra vida es un amasijo de movimientos, estertores, ruidos, nudos de contactos que se enmarañan y desembocan en el mar del olvido, en esa cálida nada que es el descanso eterno. Sin embargo, como excepción a la regla, hay quienes después de la llegada de la Parca, de esa bella Muerte de cuencas grandes y pómulos de modelo famélica, siguen teniendo batería en su transmisor mensajero hacia el mundo. Y Che Guevara sigue vivo, emitiendo en ondas digitales a este mundo convulso, sin que importe el número de bota que calzaba, la talla su camisa o la marca de la cremallera de su bragueta.

El Che está muerto. Ha atravesado ya la puerta en que el pez deja de agitar su cola, el ave interrumpe su vuelo, la pluma se queda sin tinta, y el ser humano deja un borrón en la página gris del destino. Ahora ya no es él, ni es suyo (si algún día lo fue). El Che es ahora una marioneta, que los juguetones hombres rellenan de serrín o de artefactos de la más puntera tecnología, y pintan con un arcoiris de colores tristes o alegres.

En unos lugares, el Che es el “Coco Guevara”, ese ser malo y repugnante, portador de desgracias y mal agüero. Algo así como el Coco de las canciones de cuna españolas: “Duerme mi niño que viene el Coco y se come a los niños que duermen poco”. En otros lares, el Che es “Jesusito Che”, como en la devoción popular hispana: “Jesusito de mi vida, tú eres niño como yo por eso te quiero tanto y te doy mi corazón”. Y no faltan ojos que ven al Che como “el Macho Che”, ese hombre exuberante de masculinidad que mata corazones de mujeres como el insecticida DDT elimina las moscas

en los hogares semicapitalistas. Y supongo que en Japón existirá el “Che Hello Kitty” como personaje simpático y bonito, acompañante de la soledad de niños, quinceañeras y jóvenes maduras de corazón endulzado con salvia y otros azúcares que no engordan.

La verdad es que el Che ya no existe. Lo que queda de ese trozo de carne y huesos, sentimientos y acciones, pensamientos, libros y palabras es tan sólo nuestras sensaciones, nuestra creación. Somos antropófagos, devoramos a los seres que pasan a nuestro lado, al mundo y a la historia. Nos comemos a ídolos, artistas, personajes públicos y políticos. De ellos creamos simplificaciones para amar u odiar: los verbos favoritos del vocabulario en este planeta. Así, de esta antropofagia, surgen los cocos y los héroes, los fundadores de naciones y partidos, los santos civiles y religiosos, en una palabra: los mitos. Sí, aunque suene fuerte al Che lo hemos devorado entre todos, y cada uno lo ha digerido a su manera, lo ha simplificado, lo ha pintado del color de su personal moda, y lo ha convertido en “Mito Che”. Ese es el Che que yo y muchos millones de seres humanos hemos conocido.

No he tenido la suerte o desgracia de oler su sudor, de sentir el pulso de su sangre al estrecharle la mano, de saber de su presencia por vapores flatulentos o por el murmullo tierno de una voz

angélica. Sin embargo, sí he tenido la suerte de vivir sus años, sus circunstancias, sus sensaciones de impotencia ante la dictadura, su conmoción ante la pobreza y la desnudez del hombre sufriente, y también me dejé, como él, secuestrar por el vagón de las seguridades ideológicas que poco a poco, nos alejan del ser humano real y nos llevaban donde nunca querríamos ir. Por desgracia, puedo decir con verdad que estoy muy cerca de Ernesto y que debido a mi historial étnico, nacional, cronológico y emotivo puedo entender sus flujos y reflujos, y las fuertes marejadas que azotaron su espíritu, pero eso poco importa en este desierto de granos de arena que es la humanidad. Mi Che ser humano de carne y hueso, nariz y pescuezo, como dice el pueblo en mi tierra. Sin embargo, para las multitudes que recomen los senderos del mundo, el Che es un instrumento propagandístico y un producto, por eso no es de extrañar que se haya convertido en fenómeno de mercadeo: todo lo que vale, se vende. Y este negocio del Che como la banca empezó... en Italia, por supuesto. ¡ En las manos de un súbdito de la sede perfumada del imperio romano de la moda, de la revolución espagueti y de los gobiernos democristianos pintados de rosa!. Sí fue un impresor italiano de izquierda, llamado Feltrinelli, quien imprimió y difundió el famoso póster del Che, basado en la fotografía tomada por Alberto Díaz (Korda)<sup>1</sup>

---

1. La mejor caracterización de Korda, nos la ofrece el epitafio de su amigo, el también fotógrafo José Alberto Figueroa: “Queridos amigos: hoy las madres y padres celosos de mujeres hermosas de La Habana van a dormir tranquilos; Alberto Korda murió. Estoy seguro de que muchas de ellas dormirán tristes por no haberlo conocido. Murió como vivió, a todo tren, en París, rodeado de amigos, homenajes y jóvenes hermosas mujeres.

, el 5 de marzo de 1960, durante una ceremonia conmemorativa en Cuba. Y esa imagen creó gran parte del Che superviviente en nosotros y se convirtió en la principal competidora de la Mona Lisa y de las faldas al vuelo de la Monroe, por el liderazgo en difusión pictórica mundial.

## 2. La mítica foto del afiche del Che

Korda, el hombre tras la cámara, era un consumado fotógrafo de modas enlistado al servicio personal de Fidel Castro, un héroe revolucionario con barba que vive en Cuba, fumaba habanos y disfrutaba de mala salud, por si no lo conocen.

Entre 1959 y 1969 Korda fue reportero de Revolución y durante un breve tiempo del Granma. En ese período produjo grandes fotorreportajes y tomó instantáneas de Fidel, el Che y otros líderes de la Revolución, en total unos 12 mil negativos.

El 5 de marzo de 1960, Alberto Díaz cubría como fotógrafo de Revolución un evento en honor a las 136 víctimas de un sabotaje contra el carguero francés La Coubre, que

transportaba armas para Cuba. El acto tenía lugar en la esquina de 23 y 12, en La Habana. En la tribuna flotaban los rostros de dirigentes de la revolución e invitados extranjeros de la talla de Simone de Beauvoir y Jean Paul Sartre. Fidel Castro pronunciaba uno de sus millones de largos discursos, mientras en la segunda fila, Che Guevara observaba el mundo y al Jefe, con su boina negra y el pelo liberal y desordenado. Korda, que utilizó ese día un lente de 90mm montado en su vieja Leica, recuerda que “de pronto aparece desde atrás la figura legendaria del Che ante mi cámara. La expresión de sus ojos fue tan fuerte que me turba unos instantes, me muevo, me tambaleo, pero inmediatamente oprimo el obturador y tomo dos fotos. Acto seguido la figura desaparece de nuevo por el fondo. No fue concebida, fue intuitiva” .

En esa tarde de la foto del Che, el pueblo cubano vivía “momentos de profunda tristeza” . “Cientos de miles de sus hijos desbordaron las calles de la capital para acompañar, en luctuosa peregrinación hasta la necrópolis de Colón, a

---

“Visitó todos los países imaginados y por imaginar. Hizo de las suyas en aviones, trenes y bodas, y siempre salió por la puerta grande. Fotografió y abrazó a presidentes, secretarios, Papas, premios Nobel y pueblo. Fumó donde quiso, aviones, aeropuertos, trenes, baños públicos, museos, ómnibus y casas. Llamó en sus narices ‘criminales y monstruos’ a los aludidos, usó su dinero y siguió fumando. Le ofrecieron de todo para tomar, pero sólo tomó (ron de) ‘tres años’ .

“Fue el primer millonario cubano pobre, y siguió adelante; el segundo cubano en estar en el libro Guinness de récords, y siguió adelante; el hombre con más reproducciones de su obra en t-shirts y ceniceros, y siguió adelante; el hombre con más mujeres hermosas en su haber, y siguió adelante; el artista cubano con más documentales, y siguió adelante; el hombre que perdió por dos veces la mayor parte de su obra, y siguió adelante. En fin, el hombre que además tuvo la delicadeza de morirse en París, debido al fallo de su único órgano sano –después del otro– para darnos a todos nosotros unos días de respiro antes de acostumbrarnos a su ausencia.

“Levanto mi copa. Los invito a ustedes. Figueroa.” (Carlos Batista. “La foto intuitiva del Che” . En <http://www.saladeprensa.org/art509.htm>).

las víctimas del abominable sabotaje al vapor "La Coubre" , nos narra el cubano Rafael Hojas Martínez (Cfr. <http://www.trabajadores.cubaweb.cu/columnistas/hojas/coubre.htm>), quién condena el atentado y lo califica de acto terrorista que intentaba "impedir la adquisición de armas para la defensa" de la cercada isla. En ese funeral público, Fidel Castro pronunció su famosa consigna de "Patria o Muerte" , diciendo que "morir por la patria es vivir" . Este es el ambiente electrizante, preñado de hondas emociones, en el que Emilio Korda capturó para la posteridad esa famosa imagen de Che Guevara en el podio, arengando a las masas.

En una entrevista, Korda nos contó los siguientes detalles acerca de los pormenores de la placa: "Estoy a 8 ó 10 metros de la tribuna con el lente semitelefoto y hay un instante en el discurso de Fidel en que el Che se aproxima a la baranda de la tribuna (estaba en un segundo plano y desde mi posición no se veía). Se asoma a mirar toda la calle 23 llena de gente. Yo le tiro dos negativos, nada más. Y él se va inmediatamente. Habrá estado medio minuto en esa posición" <sup>2</sup> .

La fotografía no se "se publica hasta el 15 de abril de 1961, en una nota de prensa que anuncia una conferencia del Che como Ministro de Industrias" , dice el fotógrafo que se pregunta si "el Che conocía mi foto; que me conste a mí,

no. Me imagino que como él leía el periódico rigurosamente debe haber visto la foto, pero nunca lo hablamos" <sup>3</sup> .

Unos cuatro o cinco meses antes de octubre de 1967, fecha en que muere Che Guevara en Bolivia, llegó un desconocido al estudio de Korda, vio la foto del Che y le pidió una copia. "Y el hombre se va. Era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que venía de Bolivia, de tratar de intervenir con el gobierno de ese país por la libertad de Regis Debray. Me imagino que de algún modo Feltrinelli tuvo información de que el Che estaba en Bolivia, cosa que sabían muy pocas personas en el mundo" <sup>4</sup> , señala el fotógrafo cubano. Así es como el negativo llegó a manos del editor italian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quien la reproduce en un gran póster de 100 cm por 70cm, del que se distribuyen un millón de ejemplares en Europa, en tan sólo seis meses, pero sin mencionar la autoría de Korda.

Habría que esperar a que una periodista de Italia, Giuliana Scimé, a quién Korda dejó el negativo en México, publicase un artículo en la revista italiana *Progresso Fotografico* (junio, 1983), para que el mundo supiese que Korda era el autor de la ya mundialmente famosa instantánea.

Antes de la famosa foto de Korda, aparecen en los medios internacionales otras fotos del Che, la primera es de junio de 1957, y en ella se ve a Fidel

---

<sup>2</sup> Yenima Soto (2001). "Korda la aventura del lente" . La Gaceta de Cuba. Reproducida en La Jiribilla. <http://www.lajiribilla.cubaweb.cu>

<sup>3</sup> *Ibid.*

<sup>4</sup> *Ibid.*

Castro y miembros de su alto mando. Desde la derecha están el Capt. Juan Almeida, Capt. George Sotus, Fidel Castro, Capt. Raúl Castro, (arrodillado en el frente), Capt. Guillermo García, (con casco a la izquierda), Teniente Universo Sánchez, un asistente de Castro, (tercero desde la derecha) y el Dr. Ernesto Guevara, (segundo desde la izquierda), entonces el médico oficial de las fuerzas rebeldes. FOTOGRAFÍA: Bettmann/CORBIS.

Desde el día de marzo en que se tomó la foto del Che de Korda hasta que se publicó por primera vez en 1961, pasa un año. Guevara, en esas fechas de 1961, ya se acercaba al medio siglo de sudores vitales, era ministro de Industria de Fidel Castro y se había convertido en uno de los más firmes puntales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 y estaba a siete escasos años de los sudores fríos del viaje sin retorno, iniciado sin pompas en las selvas bolivianas, un día cualquiera de 1967. Ese instante mortal también fue congelado en las imágenes de la cámara de otros fotógrafos, como Freddy Alborta, y constituyen un contrapeso, el polo opuesto de lo encerrado en el negativo de Korda. El contraste entre las dos instantáneas de Ché nos enfrenta a la “realidad de la vida” : a las pompas de jabón suaves que se rompen en el aire, a los silbidos de los enamorados y de los agonizantes, al poder y la gloria ignorantes de que tan sólo representan una efímera obra de teatro, al rojo y al negro de una turbia noche de verano en la bella Dansui, entre graznido de gaviotas y rumores del sudor que sube por el cuerpo y se funde en el agua

del río sumergido en una oscuridad interrumpida sólo por el tenue reflejo de las luces.

Retomando la historia, en las fechas felices de 1960, diremos que el Che se sintió complacido con su fina estampa en esa tarde habanera, en que se sintió “encabronado y doliente” . Sin embargo, los que serían famosos negativos se quedarían viudos y solitarios, colgados y polvorientos en el estudio de Korda hasta que Feltrinelli los rescató del olvido, y los convirtió en un póster en vísperas de la revolución estudiantil de 1968, en un momento en que el póster se había convertido en un medio privilegiado de expresión artística. Más tarde, el artista irlandés Jim Fitzpatrick, famoso por sus trabajos de arte folk de su tierra natal, creó su retrato de Che Guevara, basado en el afiche de Feltrinelli, y le permitió así el acceso a los cuartos de millones de estudiantes, artistas y jóvenes en general. La versión recortada del retrato realizado por Korda, modificado o no, se convirtió en “un icono para la generación del 68. Reproducida en murales, posters y camisetas se convirtió en un símbolo de rebeldía y sigue siendo un icono para la juventud no afiliada a las tendencias políticas principales en Europa, los EUA y Latinoamérica. En los años ochenta y noventa esta imagen fue utilizada en el primer mundo como lo "chic radical" para una generación que sabía poco o nada acerca de la persona o la postura ideológica del hombre detrás del retrato. La imagen apareció en productos de prestigiosas marcas de cervezas, vodka, relojes y ropa, e incluso tatuada en el



vientre del boxeador Mike Tyson”<sup>5</sup>. Esta imagen del Che combina el atractivo de su fisonomía y su deje romántico, con un halo revolucionario rompedor con el pasado, lleno de idealismo juvenil y sumergido en una energía desbordante. Por eso, la respuesta, en “Yahoo! Answers”, que atribuye la popularidad del Che a su apariencia “cool” y a la estupidez de los jóvenes liberales que valoran más el envoltorio que el contenido, es como mínimo incompleta.<sup>6</sup>, porque el magnetismo del Che no sólo afecta a liberales con inclinaciones o veleidades izquierdistas, sino a verdaderos revolucionarios, a indios en Chiapas e incluso a conservadores.

La rápida multiplicación de la imagen del Che nos la narra Carlo Feltrinelli en *Senior service* (Tusquets), la biografía de su padre, el editor italian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Imprime el negativo de la famosa foto de Alberto Korda (Che in the Sky with Jacket) en miles de pósteres para sus librerías. La imagen se difunde por todo el planeta y Feltrinelli padre entrega a la embajada cubana un maletín lleno de billetes de banco: ‘Los beneficios de esta publicación se destinarán íntegramente a los movimientos revolucionarios de Latinoamérica’. Sin duda, el éxito de los afiches del Che sirve de acicate para que Andy Warhol realice, en 1971, la famosa serie sobre

Mao, de la que se distribuyen más de 2.000 millones de copias en China.

El escritor portugués José Saramago, en un artículo en la revista marxista *Liberación*, del 20 de mayo de 2002, nos proporciona una breve y jugosa meditación sobre el mítico retrato del Che, con un llamado a “reflexionar profusamente, de un modo lírico o de un modo dramático, con la objetividad prosaica del historiador o simplemente coma quien se dispone a hablar del amigo que descubre haber perdido porque no lo llegó a conocer...” Esa foto, que “se convirtió en la imagen universal de los sueños revolucionarios del mundo, promesa de victorias a tal punto fértiles que nunca habrían de degenerar en rutinas ni en escepticismos, antes darían lugar a otros muchos triunfos, el del bien sobre el mal, el de lo justo sobre lo inicuo, el de la libertad sobre la necesidad. Enmarcado o fijo a la pared por medios precarios, ese retrato estuvo presente en debates políticos apasionados en la tierra portuguesa, exalto argumentos, atenuó desánimos, arrullo esperanzas. Fue visto como un Cristo que hubiese descendido de la cruz para descrucificar a la humanidad, como un ser dotado de poderes absolutos que fuera capaz de extraer de una piedra con que se mataría toda la sed, y de transformar esa misma agua en el vino con que se bebería

---

5 Trisha Ziff. “El Che de Korda: La historia de un retrato”. En <http://zonezero.com/kordasche/introsp.html>.

6 “What is it with Che Guevara? Can someone please explain to me WHY Che Guevara is so popular? Who is he really? What did he do? Why do people worship him? What is it with Che Guevara? I see a lot of people wearing Che Guevara stuff but not Fidel Castro stuff wdup with that? I don’t support them but I’m just CURIOUS”. Y la mayor respuesta seleccionada dice: “Because he looks “cool” and Liberal kids are stupid, appearance over substance is their first commandment.”. Cfr. <http://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70116033158AA0H2jr&show=7>.

el esplendor de la vida. Y todo esto era cierto porque el retrato de Che Guevara fue, a los ojos de millones de personas, el retrato de la dignidad suprema del ser humano” 7 .

Saramago se hace eco de la manipulación de la foto del Ché por parte de grupos ideológicos superficialmente comprometidos con los ideales políticos del revolucionario argentino, y expresa su deseo de saber “lo que piensan de sí mismos esos millares y millares de hombres y mujeres que en todo el mundo tuvieron algún día el retrato de Che Guevara a la cabecera de la cama, o enfrente de la mesa de trabajo, o en la sala donde recibían a los amigos, y que ahora sonríen por haber creído o fingido creer. Algunos dirían que la vida cambió, que Che Guevara, al perder su guerra, nos hizo perder la nuestra, y por tanto era inútil echarse a llorar, como un niño a quien se le ha derramado la leche. Otros confesarían que se dejaron envolver por una moda del tiempo, la misma que hizo crecer barbas y alargar las melenas, como si la revolución fuera una cuestión de peluqueros. Los más honestos reconocerían que el corazón les duele, que sienten en el movimiento perpetuo de un remordimiento, como si su verdadera

vida hubiese suspendido el curso y ahora les preguntase, obsesivamente, adonde piensan ir sin ideales ni esperanza, sin una idea de futuro que de algún sentido al presente” 8 .

En Taiwán, la imagen del Che tiene muchos admiradores. Desde la alcaldesa de Kaohsiung Chen Chu, del gobernante Partido Demócrata Progresista (PDP), quien tiene una foto del Che en su oficina, hasta la empresaria Nita Ing, presidenta de Continental Engineering y simpatizante del Presidente Chen<sup>9</sup> . Pero los amantes del Che no sólo se circunscriben al círculo de personajes ligados al poder, ya que no faltaron las imágenes del Che entre los organizadores de la campaña para deponer al mandatario isleño en 2006 y en las boutiques de Tienmu y los mercados nocturnos no faltan las camisetas del Che y otros objetos decorados con la imagen del ídolo revolucionario.

### **3. La expansión mercantil de la imagen del Che**

Sea como sea, en los años que siguieron la década de 1960, la imagen del Che se utilizó con infinitas variaciones y en una miríada de contextos, fue mancillada, manipulada, ensalzada, deificada

---

7 Jose Saramago. “Breve meditación sobre un retrato del Ché Guevara” . Rebelión., 20 de mayo de 2002. En <http://laventana.casa.cult.cu/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140>.

8 Ibid.

9 “Somehow Ing got into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where she studied economics. It was the 1970s, when rebellion and leftist ideology reigned on U.S. campuses. Ing idolized the Cuban revolutionary Che Guevara and the psychedelic rock musician Jim Morrison. From their lives and ideals, she began to get a sense of purpose, of wanting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Imagine her shock when she returned to Taiwan after graduating in 1978. The island was under martial law, in place since 1949. The KMT under Chiang Ching-kuo, the son of Chiang Kai-shek, still vowed to retake the mainland. Hardly anybody who disagreed dared speak to their minds. Those who did ended up on Green Island, Taiwan's offshore gulag, or disappeared altogether.” Allen T. Cheng. “Today is Her Time” . Asia Week. Vol. 26, No. 28, 21 de Julio de 2000. En <http://www.asiaweek.com/asiaweek/magazine/2000/0721/nat.taiwan.html>).

y comercializada. La fotografía de Ernesto Che Guevara se multiplicó en millones de copias y en todo tipo de soportes, desde la cerámica de los vasos al metal de llaveros, y tomó el liderazgo in discutido en la iconografía de la izquierda mundial y también del inconformismo con la sociedad industrial de consumo y su versión post-industrial y globalizada del siglo XXI. El Ché se ha convertido en una alcancía con forma de la gallina de los huevos de oro, tanto para izquierdistas emprendedores como para capitalistas astutos<sup>10</sup>. Su imagen está en camisetas, mecheros, gorras de béisbol... y hasta en los bikinis de una costosa colección de prendas para el baño en playas y piscinas de bellezas sensuales. “Paradojas de la vida, la imagen del revolucionario marxista Che Guevara alimenta cada día a la sociedad de

consumo contra la que precisamente luchó hasta su muerte” . Para ofrecer un ejemplo, entre miles, vayamos a la página [thechestore.com](http://thechestore.com), y encontraremos gorros de béisbol, camisetas y todo tipo de accesorios embadurnados en la imagen kordiana y feltrinelliana del Che. Allí, el sacrosanto revolucionario presta su imagen para incitarnos a vestir Hilfiger, nos calcemos zapatos deportivos Nike, nos encasquetemos gafas de sol Gaultier y limpiemos nuestras asaduras con vodka Smirnoff.<sup>12</sup> . La imagen del Che también aparece en la portada del disco “American Life” de Madonna, en “Che Frijol” de Vik Muñoz, y en el DVD “Politics” de Ricky Gervais. La marca Che cubre, entre otros productos, cigarrillos en España, condones en México, pañuelos en Estados Unidos, vino en Francia y una bebida en

---

10 Cfr. Michael Glover . “The marketing of a Marxist: From revolutionary to advertising icon, Che Guevara’ s image sells nearly everything” .En [http://entertainment.timesonline.co.uk/tol/arts\\_and\\_entertainment/article671878.ece](http://entertainment.timesonline.co.uk/tol/arts_and_entertainment/article671878.ece)

11 Sheila Grandio. “La familia Guevara denuncia uso ilícito de la imagen del Ché” . Informativos Telecinco. Madrid, 30 de agosto de 2005. En [http://www.informativos.telecinco.es/che-guevara/foto/derechos-autor/dn\\_11308.htm](http://www.informativos.telecinco.es/che-guevara/foto/derechos-autor/dn_11308.htm).

12 En el año 2000, una asociación cubana presentó en Inglaterra una demanda en nombre del autor de la foto contra la empresa Smirnoff. La denuncia sostenía que la imagen del Che había sido utilizada en un anuncio de vodka sin la autorización del fotógrafo. “Estoy indignado porque han empleado la imagen para vender bebidas alcohólicas” , dijo en su momento su autor, Alberto Díaz, más conocido por el nombre artístico de Alberto Korda. Alegaron que Guevara, acérrimo opositor del comercio capitalista, nunca hubiera aceptado que su imagen sirviera para vender un producto. Y además, parece ser que era abstemio. El tribunal dio la razón a los demandantes y Smirnoff fue condenado a pagar 70.000 dólares al fotógrafo. Korda destinó todo el dinero de la multa a un centro de salud infantil en Cuba.

13 “The image of revolutionary ‘Che’ Guevara that ignited uprisings in the most explosive places in Latin America and elsewhere lies now in the cold art galleries in New York and London and on billboards advertising drinks, clothes and cigarettes. ” “A long queue waits in front of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in London for the exhibition entitled ‘Che Guevara: Revolutionary and Icon’ which highlights the ingenious ways capitalism has used the image of Che to make millions.” The show is based on one of the most reproduced images in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taken by Alberto Korda on March 5, 1960, ‘Guerrillero Heroico.’ (···)” “The museum presents the different shapes that sole image has taken throughout its 45 years of existence: from banners, stamps, films and fashion clothes to the most ingenious artefacts found in around 30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album cover of Madonna’s ‘American Life’ , Jean-Paul Gaultier’s sunglasses campaign and Vik Muniz’s ‘Che Frijol’ and Ricky Gervais’s ‘Politics’ DVD.” “ ‘The popular view of Guevara as young, handsome and charismatic, the revolutionary who died aged 39, inevitably contributes to the mystique surrounding Korda’s iconic photograph which captures his enigmatic gaze, an expression of both determination and desire,’ the V&A museum says.” “Some of the most unique uses of the image include: a cigarette brand in Spain, a condom in Mexico, a handkerchief in the United States, wine bottles in France, a drink in Canada and a Chihuahua that uses a Che hat to sell tacos in Miami.” “In modern times, Che’s image has been used as an anti-establishment symbol as well as for more trivial commercial causes. ‘It has inspired art, fashion and culture for the past five decades and is recognisable in its most simplified form,’

Canadá.<sup>13</sup>

Pero no se equivoquen, la maleable y polisémica imagen del Che, no ha perdido su virulencia política y sigue abanderando revoluciones de todo tipo y paradero, y no deja de armar de valor a manifestantes enfrentados contra las porras o rifles de la policía. El Che está siempre presente en pancartas y camisetas del Movimiento Antiglobalización, en sus cumbres de Madrid de 1994, Seattle de 1999, Praga de 2000, Genova de 2001, Rostock de 2007, en las distintas ediciones del Foro Social Mundial y en las multitudinarias manifestaciones contra la guerra en Irak. La imagen del Che también anima a la revolución zapatista y acompaña al Suncomandante Marcos y el EZLN en sus giras y mítines. En 2006, por ejemplo, camisetas con la imagen del Ché llenaron las manifestaciones contra la participación de Bush en la Cumbre de las Américas, y de nuevo han acompañado a Hugo Chávez en su gira

paralela a la visita de Bush a Latinoamérica en marzo de 2007. En Estados Unidos poblaron las calles en las manifestaciones obreras del primero de mayo de 2006, organizadas por los sindicatos AFL-CIO<sup>14</sup>, y supongo que en otros años. Sin embargo, la gran fama del Che ha arrancado la admiración no sólo de políticos de izquierda como Hugo Chávez o Evo Morales, sino personalidades como el ex presidente neoliberal de Argentina Carlos Menem, el líder disidente chino Leung Kwok-hung<sup>15</sup>, el dirigente checheno Shamil Basáyev y el dirigente antisandinista Edén Pastora, entre muchos otros. La imagen del Che parece poseer una atracción mágica: muestra a un hombre duro, pero también afectuoso; habla de rebelión y violencia, pero también de justicia y fraternidad; supera las clases y los niveles culturales, gusta al obrero y al revolucionario de carne, biblioteca o discoteca. Y en esa multiplicidad de evocaciones consiste su salvación y perdición.

---

the V&A museum adds. According to Trisha Ziff, the curator of the exhibition, "You cannot dissociate it from radical ideas and change. A museum may be frightened of that and not wish to support it, but in the end it can't control it. This image will continue to have that resonance, despite multiple t-shirts, g-strings, bras and badges. In the end there ar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actually see it as a symbol of change, of idealism, and they'll wear it for those reasons." "The works on show include art works by Pedro Meyer, Martin Parr and Annie Liebowitz; Larry Towell's photograph of the image graffitied on a wall in Bethlehem; films, including clips of 'The Motorcycle Diaries'; and other paraphernalia such as Russian matryoshka dolls, French wine, model cars, cigarette packets and stamps. 'Che Guevara: Revolutionary and Icon' ends August 28." (Javier Espinosa. "Light Me Up, Che!-- How capitalism has abused an icon. OhmyNews International, 27 de junio de 2006. En [http://english.ohmynews.com/articleview/article\\_view.asp?no=307440&rel\\_no=1](http://english.ohmynews.com/articleview/article_view.asp?no=307440&rel_no=1).)

14 Humberto Fontova. "Che at the marches". Lewrockwell.com. 29 de mayo de 2006. En <http://www.lewrockwell.com/fontova/fontova58.html>

15 "After winning enough votes to earn a seat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s mini-parliament), a professional protester and self-professed Trotskyite named Leung Kwok-hung was sworn into office amid a storm of controversy that he was more than happy to generate...Dressed in his trademark Che Guevara T-shirt and also wearing a black armband in commemoration of those killed in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 Long Hair was sworn into his new office in the usually sober and august Legco (Legislative Council) chamber." (Kent Ewing. "Of Hong Kong clowns and puppet regimes". Asia Times Online, 15 de Septiembre de 2004. En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FJ15Ad05.html>).

El Ché Guevara está de moda, vende. Hay helados “Cherry Guevara”, que no saben mal. También pueden “rebelarte contra los labios dolientes y reseco”, con el bálsamo de labio Che Guevara, con sabor a guayaba y el módico precio de 2,99 libras esterlinas. También puedes llevar zapatillas Ché Guevara, puedes pasar por [www.shirtcity.com](http://www.shirtcity.com), sacar tu tarjeta de crédito y guevarizarte. Las camisetas Che Guevara se pueden encontrar en los mercados nocturnos de Taipei, pero si quieres algo más auténtico entra en Vito en Pantalla y prepara 20,88 euros para una camiseta, 9,84 euros para una bandera con la foto del Che y 7,64 par auna reproducción del mítico poster del Feltrinelli (Cfr. [http://www.vistoenpantalla.com/famoso\\_che\\_guevara-opc\\_5\\_290.html](http://www.vistoenpantalla.com/famoso_che_guevara-opc_5_290.html)). Con una camiseta del Che seremos compañeros de artistas y famosos, entre los que se cuenta el Príncipe Harry de Gran Bretaña.

No es de extrañar que en la Universidad

Riverside, California, Estados Unidos, se organizase una exposición acompañada de un simposio titulado “REVOLUTION & COMMERCE: The Legacy of Korda's Portrait of Che Guevara”, del 29 de enero al 29 de mayo de 2005. En el evento, se exhibieron posters, fotografías, videos, filmes, pancartas y arte y artefactos logados a la icónica fotografía de Emilio Korda, titulada “Guerrilla Heroica” (Cfr. <http://www.photographers.it/articoli/cheguevara.htm>)<sup>16</sup>. Trisha Zif, el alma de la exposición, nos describe así su fascinación por la imagen del Che: “Durante mi búsqueda encontré áreas específicas que incluían la imagen del Che de Korda y las clasifique en varios grupos. Uno de ellos lo llamé Jesucristo, otro grupo lo llamé Comercial, otro más Personalidades que usan la fotografía para proyectar su propia imagen, Che arcoiris, Che en la calle, esto por citar solo algunos ejemplos. Para mí lo que es más interesante es el proceso de deconstruir al icono. Sigo la historia de esta

16 La propaganda del evento reza: “Alberto Korda’s iconic photograph, Guerilla Heroica, of Che Guevara has represented the spirit of revolution around the world ever since it was first published outside of Cuba in 1967. Taken in 1960, the portrait of Guevara was generally unknown to the public until Guevara’s death. A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reproduced images in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Guerilla Heroica has sustained its popularity within a larger global context through its association with notions of counterculture and revolution. A product of the tumultuous decade of the 1960s, the photograph was reproduced in Italy and was quickly appropriated to symbolize uprisings from the May 1968 events in Europe to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hotograph quickly became an icon of rebellion and youth and was utilized in 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 as it appeared on murals, posters, and T-shirts.”

Korda’s image of Che is a unique contemporary phenomenon which 45 years after its making retains its power as a ubiquitous symbol of revolu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merged into the world of popular culture, fashion and celebrity. Emblazoned on commercial products as radical-chic, the complex ideological beliefs of Guevara are often trumped by the generic revolutionary symbolism of his image. The portrait’s use as a marketing tool run very much counter to Guevara’s values as a Marxist and opponent of capitalism, however, the image’s use has reinforced capitalism by selling the idea of the alternative mainstream. But at the same time Korda’s Che continues to appear in Latin Ame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as a legitimate political symbol in the fight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This exhibition has been produced by independent curator Trisha Ziff for UCR/California Museum of Photograph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entro de la Imagen, Mexico City, and [www.zonezero.com](http://www.zonezero.com). The exhibition features over 40 photographs and art works by artists and photographers including Vic Muniz (Brazil), Rubén Ortiz Torres (USA & Mexico), Annie Liebowitz (USA), Pedro Meyer (Mexico), Raymond Depardon (France), Martin Parr (England), and Marcos Lopez (Argentina); 30 magnificent original posters lent by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Graphics in Los Angeles; and 50 artifacts including banners and Che memorabilia. The exhibition will travel from UCR/CMP to the Centro de la Image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venues after it closes at UCR/CMP on May 1st.”

imagen porque en diferentes partes del mundo tiene diferentes significados. Por ejemplo en el campo en Chiapas en el 2000 su significado era muy obvio y era completamente diferente al de la imagen que apareció en la revista Vanity Fair en una foto de Ozzy Osbourne y de Annie Leibovitz, o el que se da para vender esquíes a la gente adinerada de Francia. Cuando el significado de la Revolución se diluye a gran velocidad, lo que sucede es que el significado de una imagen sólo vive en un contexto específico. Hay muchas razones por las que una imagen como ésta se convierte en imagen del dominio público antes de tiempo. En este caso es una combinación de diferentes cosas complicadas, relacionadas con el momento, la personalidad del Che, el hecho de que fuera asesinado antes de tiempo, de que fuera bien parecido” . 17

No todos ven con buenos ojos el éxito comercial de los artículos con el logo del Che. En Estados Unidos, frente a la Fábrica de Abrigos Burlington, en Hielah, Florida, el 12 de abril de 2004, se celebró una furiosa manifestación en contra del uso comercial de la imagen de quien consideraban un asesino. Se arremetió contra las empresas que venden camisetas con la imagen del Che, entre las que destaca Appaman de Nueva York y se

mostraron pancartas en las que se decía que “los comunistas no son cool” . Quizá podrían unirse a la corriente y vender camisetas con adaptaciones de la imagen del Che, como la camiseta del Che-Wbacca, que puede verse en la red.

La filial en Polonia de la firma Converse utilizó una fotocomposición con Aznar y Che, realizada por Andrei Dragan, de la agencia publicitaria J. Walters Thompson (JWT), que capta el parecido de las dos figuras políticas, y que lanzó con el lema "Patria o muerte, venderemos". “El cartel se basa en una fotografía de un rostro que recuerda el del Che y que emerge de dos zapatillas contrapuestas, que hacen las veces de hombreras de una chaqueta. Para rizar el rizo, el creador del cartel ha trabajado con otra similitud: la estrella de cinco puntas característica de la marca coincide con la que muestra la gorra del Che Aznar” 18

La firma suiza de ropa Kustom Diffusion fue condenada, en enero de 2006, a pagar 25.000 euros a la hija de Korda, por el uso sin permiso de la foto del Che en una serie de prendas . 19

Álvaro Vargas Llosa también se hace eco de la comercialización de la imagen del Che: “Su imagen es adorno de tazas, mecheros, llaveros, carteras, gorras, pantalones vaqueros, sobres de infusiones y, por supuesto, esas omnipresentes

---

17 Citado en Félix Romeo. “El Ché S.A.” . En Letras Libres. Febrero de 2007. En <http://www.letraslibres.com/index.php?art=11859>

18 La `reconversión´ del ex presidente Aznar en líder revolucionario. Periodista Digital, 18 de mayo de 2006. En ([http://blogs.periodistadigital.com/periodismo.php/2006/05/18/la\\_reconversiona\\_de\\_aznar\\_en\\_lider\\_revol\\_1](http://blogs.periodistadigital.com/periodismo.php/2006/05/18/la_reconversiona_de_aznar_en_lider_revol_1)).

19 [http://www.cooperativa.cl/p4\\_noticias/antialone.html?page=http://www.cooperativa.cl/p4\\_noticias/site/artic/20060109/pags/20060109165028.html](http://www.cooperativa.cl/p4_noticias/antialone.html?page=http://www.cooperativa.cl/p4_noticias/site/artic/20060109/pags/20060109165028.html)

camisetas con la fotografía tomada por Alberto Korda: el galán del socialismo, con gorra, en los primeros años de la revolución, pasando casualmente por delante del visor del fotógrafo y quedando fijado en la imagen que, treinta años después de su muerte, sigue siendo el logo del chic revolucionario. .. Los productos Che son comercializados tanto por grandes corporaciones como por pequeños negocios, como la Burlington Coat Factory, que sacó un anuncio de televisión en el que un muchacho con pantalones militares llevaba una camiseta del Che. Los revolucionarios también se apuntan a este frenesí de la mercadotecnia: desde The Che Store, que cubre "todas tus necesidades revolucionarias" por Internet, hasta el escritor italiano Gianni Minà, que vendió a Robert Redford los derechos cinematográficos del diario que escribió el Che en su viaje por Suramérica en 1952." 20 .

Los usos humor, apoyo o crítica de adaptaciones de la camiseta de Che se extiende por todo el mundo, desde España con su camiseta El Che-Ma sobre Aznar, hasta Taiwán con su camiseta A-BAIN, sobre el presidente isleño. Esta última

camiseta, diseñada por Kevin Liao, busca apoyar al mandatario taiwanés y mostrar que ha realizado "aportaciones significativas a Taiwán y merece ser alabado" 21 .

"We want to let the first family know that we are behind them and there are many people supporting them during this time of distress," said Liao, who also admitted that he decided to sell pro-Chen T-shirts because he thought it was a good business opportunity.

#### 4. Conclusión

El Che Guevara fue un mítico revolucionario en vida, mártir marxista tras su muerte y un eterno icono pop izquierdista del siglo XX y XXI. Su famosa fotografía con la mirada perdida en el horizonte y su inconfundible boina de comandante rebelde es símbolo de la rebelión popular y anticapitalista en particular y del anticonformismo social en general. Sin embargo, en los últimos años, y en lugares tan diferentes como Cuba, China, Estados Unidos, Europa y Taiwán, por citar sólo algunos casos, su imagen ha sido secuestrada por las leyes del mercado y se ha convertido en objeto de consumo. Ahora, su cara puede verse

---

20 Álvaro Vargas Llosa , "Che Guevara, La Máquina de matar" , [http://www.ileperu.org/contenido/Articulos/cheguevara\\_avll.htm](http://www.ileperu.org/contenido/Articulos/cheguevara_avll.htm)

Álvaro Vargas Llosa, "Che Guevara, la máquina de matar: Una visión cruda y desmitificadora de la trayectoria del revolucionario argentino colaborador de Fidel Castro" , [http://www.elpais.com/articulo/reportajes/Che/Guevara/maquina/matar/elpdmrpj/20050731elpdmngrep\\_6/Tes](http://www.elpais.com/articulo/reportajes/Che/Guevara/maquina/matar/elpdmrpj/20050731elpdmngrep_6/Tes)

21 "Kevin Liao, the brainchild behind a design which portrays Chen as the notorious Cuban revolutionary Che Guevara, said the president has made many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aiwan and deserved to be praised. We want to let the first family know that we are behind them and there are many people supporting them during this time of distress," said Liao, who also admitted that he decided to sell pro-Chen T-shirts because he thought it was a good business opportunity" . ( "First family scandals spark merchandise craze" . Taiwan News, 2006/06/19. In <http://english.www.gov.tw/egov2/web/upload/TaiwanHeadlines/index.jsp?catid=10&recordid=96007>)

estampada en pancartas, camisetas, mecheros o llaveros e incluso bikinis. Además, su carácter de símbolo referencial del siglo XX y XXI ha hecho que proliferen los usos humorísticos, críticos y sarcásticos de su foto, que también ha encontrado abundante uso en la propaganda política y los ataques a dirigentes públicos mundiales de extracciones tan diferentes como Chen Shui-bian de Taiwán, Hugo Chávez de Venezuela y Aznar de España.

El secreto del éxito difusivo de la foto del Che no está sólo en el importante apoyo de Cuna y de todo el movimiento izquierdista mundial, que lo ha convertido en su primer estandarte y ha financiado su difusión; sino también en circunstancias ligadas a su vida, a las características particulares de la foto y al marco histórico en que surgió y en el que vivimos. La vida del Che está llena de romanticismo revolucionario, su foto es única, clara y sencilla; recoge el inconformismo que perdura en el primer mundo (y en los demás) desde la década de 1960 y lo hace con elegancia, plasticidad, belleza y juventud.

Marx es sin duda un personaje de mayor profundidad teórica y de mayor influencia que el Che, pero su vida carece del romanticismo revolucionario de la del argentino y sus imágenes, aunque características y llenas de personalidad tampoco poseen la elegancia moderna de la del Che. Otros personajes revolucionarios, como Mao, tienen también un aspecto romántico y el apoyo de todo un inmenso país y de parte del movimiento

revolucionario, pero al no ser blanco y no tener la belleza ni el inconformismo de la del Che no goza del mismo atractivo para el blanco inconformista, que dicta la moda a los del Tercer Mundo

La muerte prematura del Ché, como las de Marilyn Monroe, Carlos Gardel, Elvis Presley o James Dean también supuso un impulso a la difusión de su mito. Las vidas largas llevan a la poco fotogénica vejez, a conductas alejadas del romanticismo juvenil a errores, traiciones, transgresiones, a alejamientos del inconformismo.... y a la muerte del ídolo y del mito. Las imágenes y personajes que perviven en los posters son en su mayoría seres que perdieron la vida en la plenitud de su juventud y belleza. La vida larga gasta a los ídolos y acaba manifestando aspectos poco atractivos, por eso otros personajes muy famosos no han visto tanta difusión de sus imágenes como las del Che.

La difusión de la imagen del Che también se vio facilitada por su presentación en términos de inconformista y revolucionario romántico, sin las connotaciones históricas concretas de otros líderes. Una foto clara y concreta de un personaje borroso pero atractivo, lleno de romanticismo revolucionario, inconformista, con una elegancia desgarbada y muerto en plena juventud es una combinación perfecta para el éxito, y también para la comercialización.

Mis más sentidos recuerdos al Che real y mi más profundo respeto a su sentimiento por los marginados, a su superación del estrecho



nacionalismo imperante entonces y hoy, a su conciencia de que el cambio sólo se consigue con la lucha y a su idealismo y romanticismo. ★

## REFERENCIAS

- Alarcón Ramírez, Dariel "Benigno" (1997), *Memorias de un soldado cubano. Vida y muerte de la Revolución*, Barcelona: Tusquets Editores.
- Anderson, Jon Lee (1997), *Che Guevara. Una vida revolucionaria*, Barcelona: Anagrama.
- Avalos, Elisa; Guidiño, Mercedes (2006), *Huellas del "Che" en Córdoba*, Córdoba: Universidad de Córdoba.
- Borrego, Orlando (2001), *Che: el camino del fuego*, La Habana : Díaz Ediciones Imagen Contemporánea.
- Castañeda, Jorge G. (1997), *Compañero: vida y muerte del Che Guevara*, Buenos Aires : Espasa.
- Constenla, Julia (2006), *Che Guevara. La vida en juego*, Buenos Aires: Edhesa..
- Feltrinelli, Carlos (2001). *Senior service. Biografía de un editor*. Madrid: Tusquets.
- Ferrer, Carlos "Calica" (2006), *De Ernesto al Che. El segundo y último viaje de Guevara por Latinoamérica*, Buenos Aires: Marea.
- Fernando Díaz Villanueva (2004), *Ernesto "Che" Guevara*, Dastin.
- Gambini, Hugo (1968): *El Che Guevara*. Editorial Paidós, Buenos Aires.
- Gadea, Hilda, *Che Guevara: los años decisivos*, México: Aguilar Editor, 1972
- Guevara Lynch, Ernesto (1988), *Mi hijo el "Che"*, La Habana: Ed. Arte y Literatura.
- Granado Jiménez, Alberto (1995), *Con el Che Guevara. De Córdoba a la Habana*, Córdoba: Oop. Oloop.
- Kalfon, Pierre (1997), *Che. Ernesto Guevara, una leyenda de nuestro siglo*, Barcelona: Plaza y Janes. 84-01-01088-8.
- Kunzle, David (1977). *Che Guevara: Icon, Myth, and Mess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Fowler (September 1997)
- Mayo, José Manuel (2007), *En la guerrilla junto al Che (Testimonio de Urbano)*, La Habana: Gente Nueva.
- Peredo Leigue, Inti (1971), *Mi campaña con el Che*, Chile: El Umbral.
- Rojo, Ricardo (1968): *Mi amigo el Che*. Jorge Alvarez Editor, Buenos Aires.
- Taibo II, Paco Ignacio (1996), *Ernesto Guevara, también conocido como el Che*, México: Planeta/Joaquín Mortiz. 8408041916.
- Tapia Aruni, Eusebio (1997), *Piedras y espinas en las arenas de Ñancaguazú (testimonio de un guerrillero boliviano)*, Bolivia: Ed. propia. .
- Vargas Llosa, Alvaro (2005), *Ché Guevara, la máquina de matar*, Biblioteca Libertad Perú, Partido Liberal del Perú, 13 de septiembre de 2006
- Vargas Llosa, Alvaro (2005), *Diez tiros al Ché Guevara*, *El Iberoamericano*, Agencia Interamericana de Prensa Económica (13 de septiembre de 2006).
- Villegas Tamayo, Harry (1996), *Pombo, un hombre de la guerrilla del Che*, La Habana: Editora Política.

# HUMANISMO REVOLUCIONARIO DE ERNESTO CHE GUEVARA

Alberto Saladino García

Facultad de Humanidades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México

## I. SEMBLANZA

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 nació en la ciudad de Rosario, Argentina el 14 de junio de 1928 y fue asesinado en La Higuera, Bolivia, el 9 de octubre de 1967. La coherencia de su trayectoria ideológica-política fundamenta que se le reconozca como símbolo de revolucionario no sólo en Latinoamérica, sino en el mundo. De ahí que resulte del todo justificado que el Instituto de Graduados en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de la Universidad de Tamkang le organice un evento académico para analizar su pensamiento y su obra, justo a los cuarenta años de su muerte, con el atinado título de “Che Guevara: un héroe inmortal” .

Ernesto Che Guevara se hizo latinoamericano consciente como resultado del conocimiento que tuvo sobre la realidad económica, política y social de los países de la región a través de sus lecturas y por el contacto con su territorio pues tuvo la osadía de recorrer Bolivia, Chile, Colombia, Ecuador, Perú, Venezuela, Centroamérica y vivir

en Bolivia, Guatemala, México y Cuba. De modo que por ambos tipos de experiencia emergió como un latinoamericanista consumado al pugnar por superar la balcanización de naciones mediante la lucha libertaria hacia el establecimiento del comunismo, pues su vida la invirtió en tan caro propósito.

En efecto, los esfuerzos más conocidos de sus compromisos -políticos y morales- fueron sus acciones de apoyo al gobierno nacionalista de Jacobo Arbenz en Guatemala; su participación en el derrocamiento del dictador Fulgencio Batista en Cuba; su entrega a la lucha de la revolución socialista tanto en Cuba, desde el gobierno, como en Bolivia, en acciones guerrilleras, para su propagación por toda Latinoamérica.

Los reconocimientos a la vida revolucionaria que siempre exhibió han sido múltiples, sobre todo después de su muerte, pero en vida, la Universidad Central de las Villas, de la República de Cuba, lo distinguió con el doctorado Honoris Causa en Pedagogía, el 28 de diciembre de 1959,

sobre el que intelectuales de dicha Universidad han argumentado, cuarenta años después:

*Nunca antes un título honorífico fue tan honrado como éste, aún cuando el comandante guerrillero lo había aceptado solo en “nombre del pueblo” al no creerse merecedor del mismo. A lo largo de todo su andar, -el Che- hizo gala de su vocación de maestro, sabía que durante la guerra y aún después del triunfo, era imprescindible instruir y educar al pueblo; sólo así sería posible vencer definitivamente y construir la nueva sociedad.* <sup>1</sup>

Obviamente el mayor reconocimiento que ha recibido es el que la juventud le profesa con la adopción de una fotografía tomada por Alberto Korda al erigirla en ícono de rebeldía y de adscripción al espíritu límpido de revolucionario, misma que se ha universalizado como patrimonio de los progresistas del mundo.

Su imagen de ícono guerrillero no puede obnubilar el hecho de que desde distintas funciones públicas puso en práctica sus ideales para construir otro modo de vida, pues recordemos que fungió como Jefe del Departamento de Industrialización d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Reforma Agraria, presidente del Banco Nacional, ministro de Industrias, representante de Cuba en foros internacionales, en los cuales realizó memorables intervenciones, como las de la

Organización de Estados Americanos en 1961, y de la Organiz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n 1964. Además continuó ejerciendo como oficial de las 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y contribuyó a la fundación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1965), resultado de la fusión del Movimiento 26 de Julio con el Partido Socialista Popular y el Directorio Revolucionario 13 de Marzo. <sup>2</sup>

Al renunciar a sus responsabilidades públicas en 1965 abandonó Cuba para dedicarse a expandir la lucha revolucionaria por el mundo, primero, en África al ayudar a Patricio Lumumba en su lucha por la liberación del Congo belga y, luego, en Bolivia para combatir la dictadura militar y coadyuvar a las luchas de expansión de emancipación revolucionaria por América Latina, a partir de 1966, pero fue capturado por las fuerzas militares en la Quebrada del Yuro, Bolivia, el 8 de octubre de 1967 y al día siguiente asesinado.

Al internarse en el estudio de la vida y la obra del Che se constata -como lo han reconocido otros estudiosos- que el énfasis ha estribado en atender su práctica política, por lo que ahora destacaré la parte complementaria, esto es, los fundamentos teóricos de sus acciones, acotando mi exposición a los rasgos y mecanismos con los que intentó llevar a la praxis su humanismo, que identifiqué como revolucionario.

## **II. FUNDAMENTOS DEL**

---

<sup>1</sup> Nota de pie de página, *Islas* N° 116, Revista de la Universidad Central de Las Villas, Santa Clara, 1998, p. 7.

<sup>2</sup> *Ernesto Che Guevara habla a la juventud*, La Habana, Casa Editorial Abril, 2001, pp. 7-8.

## HUMANANISMO REVOLUCIONARIO

La obra de 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 sustenta su trascendencia histórica toda vez que en ella se constata la fusión de teoría y práctica, por lo que puede ser considerado –apelando a categorización de los marxistas Antonio Gramsci, italiano, y de Adolfo Sánchez Vázquez, mexicano- representante de la filosofía de la praxis latinoamericana. Por eso me parece pertinente clarificar los rasgos de los fundamentos de su humanismo revolucionario.

Los principios en los que ancla su concepción sobre el hombre lo constituyen diversos planteamientos esparcidos en su asistemática obra escrita y que recojo con el fin de sustanciar su idea rectora sobre la dignidad del hombre con base en su concepción sobre la libertad, sus planteamientos relacionados con la superación de la enajenación, la actitud que desarrolló acerca de la solidaridad y su visión positiva sobre de la función del trabajo. De modo que para él el ser humano es producto del proceso histórico cuya expresión clásica la resumió al describir al joven que daría concreción al hombre nuevo en la sociedad comunista, en los términos siguientes: “...ser esencialmente humano, ser tan humano que se acerque a lo mejor del hombre por medio del trabajo, del ejercicio de la solidaridad, con el pueblo y con todos los pueblos del mundo, desarrollar al máximo la sensibilidad” .<sup>3</sup>

Explicar la manera como el Che Guevara pugnó

por forjar al ser humano pleno implica pasar a clarificar los fundamentos que respaldaron sus acciones políticas.

## Libertad

La dignidad humana la busca construir amparado, en primer lugar, en el ejercicio pleno de la libertad, por lo que reconoce la necesidad de esclarecer su semántica al identificar que posee una profunda carga histórica, pues su uso y percepción son diferentes en cada régimen político, y también sus contenidos son distintos, por ejemplo en el capitalismo permea la conciencia burguesa y el comunismo tiene como impronta propugnar diversas acciones para salir del reino de la necesidad. Consecuentemente Guevara de la Serna erigió a la libertad en el principio sobre el cual la dignidad humana alcanzará su máxima expresión; por tanto queda justificada su afirmación: “... Cuba es la vanguardia de América... indica a las masas de América Latina el camino de libertad plena” .<sup>4</sup>

Incluso asimila una nueva conceptualización de la práctica de la libertad al trascender la percepción teórica del liberalismo que la reduce al comportamiento individual irrestricto siempre y cuando no perjudique a terceros, toda vez que la fomenta como la praxis del autodesarrollo, lo cual no niega la función del individuo, sino más bien garantiza las condiciones para su

<sup>3</sup> Ernesto Guevara, *Obras 1957-1967*, La Habana, Casa de las Américas, 1970, T. II, p.173.

<sup>4</sup> 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 “El hombre nuevo” , *Ideas en torno de Latinoamérica*, México, UNAM/UDUAL, 1986, Vol. I, pp. 324-325.

desenvolvimiento pleno.

### **Superación de la enajenación**

Instalar el desarrollo armónico del ser humano en el reino de la libertad implica el triunfo de la lucha por superar el estado de enajenación prevaleciente en 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mismo que sólo lo puede inspirar quien la ha superado, como es el caso del propio revolucionario quien apunta que el propósito por establecer un nuevo modo de producción, gracias a la participación colectiva de la sociedad y por la acción de la educación el hombre “... logrará la total conciencia de su ser social, lo que equivale a su realización plena como criatura humana, rotas las cadenas de la enajenación” .<sup>5</sup>

Trascender la alineación del ser humano resulta condición indispensable para edificar la sociedad libertaria que el Che Guevara finca tanto en la acción revolucionaria contra el modo de producción capitalista como en la acción consciente del trabajo dentro de un nuevo modo de producción, el comunismo.

### **Concepción positiva del trabajo**

Para 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 la actividad productora del ser humano caminará en la ruta de creación de las condiciones del reino de la libertad, al superar la enajenación mediante la acción consciente del trabajo. En efecto, el planteamiento

marxista de que el trabajo es elemento constitutivo de la naturaleza humana, actividad social que lo liberó de su pertenencia a la naturaleza, fue ampliamente argumentada por el Che con base en dos ideas rectoras sobre el trabajo: 1) debe proponerse como el principal mecanismo social para el advenimiento del hombre nuevo y, por ende, 2) lo concibe como punto de inflexión para su constitución. Al respecto suscribió:

*Esto se traducirá concretamente en la reapropiación de su naturaleza a través del trabajo liberado y la expresión de su propia condición humana a través de la cultura y el arte.*

*Para que se desarrolle en la primera, el trabajo debe adquirir una condición nueva; la mercancía hombre cesa de existir y se instala un sistema que otorga una cuota por el cumplimiento del deber social. Los medios de producción pertenecen a la sociedad y la máquina es sólo la trinchera donde se cumple el deber. El hombre comienza a liberar su pensamiento de hecho enojoso que suponía la necesidad de satisfacer sus necesidades animales mediante el trabajo. Empieza a verse retratado en su obra y a comprender su magnitud humana a través del objeto creado, del trabajo realizado. Esto ya no entraña dejar una parte de su ser en forma de fuerza de trabajo vendida, que no le pertenece más, sino que significa una emancipación de sí mismo, un aporte a la vida común en que se refleja; el*

---

<sup>5</sup> Ibidem, p. 320.

<sup>6</sup> Ibidem, p. 320.

*cumplimiento de su deber social.* <sup>6</sup>

En el proceso de construcción del socialismo cubano, Ernesto Che Guevara sustenta que se estaba resemantizando al trabajo como una nueva categoría de carácter moral por su ineludible compromiso social, como expresión de la conquista de mayor libertad al convertirlo en producto de acción voluntaria, pero confiesa que en el momento en que redactó este texto –1965- aún se recurría al empleo de medios compulsivos en el trabajo, empero confiaba en que el cultivo de nuevos hábitos llevará a establecer un nuevo modo de producción, el comunismo, donde el trabajo se expresará como la principal actividad para la realización plena del ser humano. <sup>7</sup>

## **Solidaridad**

El humanismo revolucionario del Che Guevara concitó el esclarecimiento de nuevas actitudes no sólo en las relaciones sociales, sino entre los países al elevar a grado de principio la solidaridad, en particular la que debía fomentarse entre sociedades, al argumentar:

*Acordarse, como debemos acordarnos nosotros... aquí en Cuba, que somos un ejemplo real y palpable para toda nuestra América, y más aún que para nuestra América, para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que luchan también en otros continentes por su libertad, contra el colonialismo, contra el neocolonialismo, contra el imperialismo, contra todas las formas de opresión de los sistemas injustos, acordarse siempre de que somos el mismo espejo que cada uno de nosotros individualmente es para el pueblo de Cuba, y somos ese espejo para que miren en él los pueblos de América, los pueblos del mundo oprimido que luchan por la libertad.* <sup>8</sup>

Claro que esta prédica a favor de la solidaridad internacional igualmente estaba regida por el carácter revolucionario de su autor y se explica también por su adscripción al marxismo al pugnar por el combate al capitalismo, por reconocer que es inherente a la naturaleza humana y adquiere su máxima expresión cuando existe el compromiso por ayudar a la praxis de la libertad real.

Entonces vale insistir en señalar que el humanismo de Guevara de la Serna tiene carácter revolucionario por plantear la imprescindible necesidad de forjar al hombre nuevo mediante una serie de valores como los expuestos, a partir del compromiso de luchar por cambiar las condiciones sociales existentes, por lo cual llega a explicar que tal situación proviene de las circunstancias que él vivió al confirmar “La guerra nos revolucionó. No hay experiencia más profunda para un

---

<sup>7</sup> *Loc. cit.*

<sup>8</sup> Ernesto Guevara, *Obras 1957-1967*, T. II, p. 173.

<sup>9</sup> Ernesto Che Guevara, *Latinoamérica: la revolución necesaria*, México, UNAM, Cuadernos de Cultura Latinoamericana N° 60, 1970, p. 7.

revolucionario que el acto de la guerra...” .<sup>9</sup>

De modo que la conciencia del Che como revolucionario y persona esperanzada en coadyuvar a la construcción de un modelo de sociedad con base en la existencia del hombre nuevo, como su célula constitutiva, lo lleva a insistir en la pertinencia de empeñar los esfuerzos de todos los revolucionarios cubanos para elevar a su patria a paradigma societaria en los primeros años de la revolución cuando demanda:

*Ahora estamos colocados en una posición en la que somos mucho más que simples factores de una nación, constituimos en este momento la esperanza de la América irredenta. Todos los ojos –los de los grandes opresores y los de los esperanzados- están fijos en nosotros. De nuestra actitud futura que presentemos, de nuestra capacidad para resolver los múltiples problemas, depende en gran medida el desarrollo de los movimientos populares en América, y cada paso que damos está vigilado por los ojos omnipresentes del gran acreedor y por los ojos optimistas de nuestros hermanos de América.*

10

Instituido el socialismo en Cuba, Ernesto Che Guevara inspira la germinación de juventudes revolucionarias, como prototipos del hombre nuevo, comprometidas conscientemente en la construcción de la sociedad comunista.

### III. INSTRUMENTOS PARA EL ADVENIMIENTO DEL NUEVO HOMBRE

Ciertamente los principios del humanismo guevarista encuentran su génesis y sustento en el horizonte ideológico al cual se adscribió, pues el mismo Che lo confesó:

*... Marx pensaba en la liberación del hombre y veía al comunismo como la solución de las contradicciones que produjeron su enajenación, pero como un acto consciente. Vale decir, no puede verse el comunismo meramente como el resultado de contradicciones de clase en una sociedad de alto desarrollo, que fueran a resolverse en una etapa de transición para alcanzar la cumbre: el hombre es el actor consciente de la historia. Sin esta conciencia, que engloba la de su ser social, no puede haber comunismo.* <sup>11</sup>

Entonces el ser del nuevo hombre lo enmarca Guevara de la Serna dentro del derrotero histórico de acceder a un nuevo modo de producción, el comunismo, como la principal aspiración de su vida, pero al fin de cuentas resultado de las condiciones sociales que se estaban forjando en Cuba a raíz del triunfo de su revolución.

Así los medios para el advenimiento del nuevo hombre, las bases que permitirían su realización y la edificación del comunismo, requerían apelar a la concreción de la actitud revolucionaria, la

---

<sup>10</sup> 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 “La batalla de Santa Clara” , en Islas N° 116, p. 9.

<sup>11</sup> Raúl Fo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 297.

refundación de la educación, la comprensión de los roles libertarios que pueden sustentar tanto la ciencia como la técnica, etc. A continuación explicaré cada uno de ellos.

### **Praxis revolucionaria**

La vida y obra de 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 exhibe, desde cualquier ángulo que se le revise, un profundo compromiso revolucionario, esto es, de lucha para transformar las situaciones de dominación y enajenación capitalistas, condiciones sine qua non para dignificar al ser humano. De modo que su pensamiento humanista está imbricado de la necesidad de actuar para cambiar el estado de cosas que permita el surgimiento de relaciones armoniosas sobre la base del reconocimiento del otro en términos de igualdad y a través del forjamiento de condiciones que permitan la formación del hombre nuevo.

Para concretar su ideal humanista, el Che Guevara concita en primer lugar desarrollar y poner en práctica la actitud revolucionaria, de ahí que durante toda su existencia propugnara la asunción de esa actitud como compromiso y la fomento como guía de toda acción anticapitalista. Al respecto, su obra está llena de alocuciones en las que excita tal actitud, que inspiran llevarla a la práctica en todo tipo de circunstancias, así, al clausurar el Primer Encuentro Internacional de Estudiantes de Arquitectura, el 29 de septiembre

de 1963, demandó:

*...nunca debemos olvidar que la revolución Cubana, por la fuerza de su ejemplo, no actúa sólo aquí internamente, y que sus deberes están más allá de las fronteras de Cuba. El deber de expandir la llama ideológica de la revolución por todos los rincones de América, por todos los rincones del mundo donde se nos escuche. El deber de ser sensibles ante todas las miserias que ocurran en el mundo, ante todas las explotaciones y las injusticias... 12*

De manera que la misión del revolucionario, realmente auténtica, es erigirse en eje motriz de toda transformación, cuya consecuencia final será gestar la nueva naturaleza humana, desde la misma sociedad.

Más aún, Guevara confiesa:

*... el revolucionario verdadero está guiado por grandes sentimientos de amor. Es imposible pensar en un revolucionario auténtico, sin esta cualidad. Quizás sea uno de los grandes dramas del dirigente; éste debe unir a un espíritu apasionado una mente fría y tomar decisiones dolorosas sin que se contraiga un músculo. Nuestros revolucionarios de vanguardia tienen que idealizar ese amor a los pueblos, a las causas más sagradas y hacerlo único, indivisible. No pueden descender*

---

12 Ernesto Che Guevara, "No olviden que la técnica es un arma" , *Che Guevara habla a la juventud*, pp. 103-104.

13 Ernesto Che Guevara, "El hombre nuevo" , *op. cit.*, p. 325.



*con su pequeña dosis de cariño cotidiano hacia los lugares donde el hombre común lo ejercita.* <sup>13</sup>

Por ende, el hombre nuevo no sólo es un ser por venir, pues era ya una realidad encarnado en la conducta y modo de pensar del Che Guevara, hombre revolucionario por antonomasia, cuya misión estribó en crear las condiciones para el advenimiento de una nueva sociedad, de carácter humanista, que él, como todos los marxistas denominó comunista. De esta manera queda corroborada la identificación que hago de su teoría y su práctica, de su praxis, como humanismo revolucionario.

### **Función de la educación**

Para el Che Guevara la educación tiene como misión esencial forjar los valores que singularicen la conducta y den sentido a la vida del hombre nuevo, en otras palabras, su finalidad consiste en crear las condiciones intelectuales y materiales para el advenimiento del humanismo revolucionario.

Así la educación a la que invoca 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 abarca tanto la de carácter asistemática, indirecta, como la sistemática, directa. Con relación al primer sentido, manifiesta que ante situaciones extremas siempre es pertinente "... potenciar los valores morales; para mantener su vigencia, es necesario el desarrollo

de una conciencia en la que los valores adquieran categorías nuevas. La sociedad en su conjunto debe convertirse en una gigantesca escuela” .  
<sup>14</sup>Consecuentemente, la educación no sólo es la actividad restringida a espacios determinados, sino su función forjadora de conciencia y práctica de valores acontece en la vida cotidiana, dentro de la sociedad en general.

A esa percepción agrega la descripción del cometido de la educación sistemática que el gobierno revolucionario de Cuba instrumentaba:

*En nuestro caso, la educación directa adquiere una importancia mucho mayor... Se ejerce a través del aparato educativo del Estado en función de la cultura general, técnica e ideológica, por medio de organismos tales como 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el aparato de divulgación del partido. La educación prende en las masas y la nueva actitud preconizada tiende a convertirse en hábito; la masa la va haciendo suya y presiona a quienes no se han educado todavía. Ésta es la forma indirecta de educar a las masas, tan poderosa como aquella otra.*

*Pero el proceso es consciente; el individuo recibe continuamente el impacto del nuevo poder social y percibe que no está completamente adecuado a él. Bajo el influjo de la presión que supone la educación indirecta, trata de acomodarse a una situación que siente justa y cuya propia falta de*

---

<sup>14</sup> *Ibidem*, p. 317.

<sup>15</sup> *Ibidem*, p. 318.

*desarrollo le ha impedido hacerlo hasta ahora. Se autoeduca.* 15

Entonces tenemos que para construir la sociedad humanista, por la que entregó su vida el Che se requiere concebir y practicar la educación como la principal actividad liberadora porque tiene la impronta de forjar valores y concientizar a las personas para redimirlas.

Además añade la descripción de propalar una educación integral al vincular la formación intelectual con la formación física, poner en contacto la escuela con la sociedad a través del trabajo al señalar, la “... educación es cada vez más completa y no olvidamos su integración al trabajo desde los primeros instantes. Nuestros becarios hacen trabajo físico en sus vacaciones o simultáneamente con el estudio. El trabajo es un premio en ciertos casos, un instrumento de educación, en otros jamás un castigo. Una nueva generación nace” 16 , producto de otra praxis educativa.

### **Fomento de la ciencia**

Parte esencial del contenido de una educación conscientizadora lo constituye la concepción ilustrada, racional, que promovió, con base en la cual es factible revisar su perspectiva acerca de los beneficios de los conocimientos científicos en el

proceso constitutivo de la sociedad humanista.

Para respaldar tal posición y poner de relieve su enfoque polifacético con el que percibió la ciencia resulta pertinente reconocer que la vislumbró – según lo ha apuntado Raúl Fonet-Betancourt<sup>17</sup> - como instrumento de liberación.

Con la finalidad de concretar ese rol asignado a las informaciones científicas puso de manifiesto su importancia en la formación de mentalidades críticas, objetivas, racionales, vinculadas a la solución de la problemática social, por ello expresó la necesidad de que la revolución cubana la apoyara aunque reconoció “... que al principio las limitaciones han sido grandes. Nuestros científicos no pueden realizar las investigaciones que quieren. A veces faltan colorantes, materias técnicas de cualquier tipo para realizar sus investigaciones...” 18 Situación, por cierto, que persiste en Cuba debido al bloqueo económico impuesto por Estados Unidos.

Al destacar la aplicación del conocimiento científico para atender la problemática y así apoyarse en ella para apuntalar la construcción de una nueva sociedad, lo identificó con el saber técnico, que por sus características y múltiples referencias pasará a revisar en apartado propio.

### **El arma de la técnica**

El Che Guevara, al ser comisionado para dirigir

---

16 *Ibidem*, p. 324.

17 Raúl Fonet-Betancourt, *op. cit.*, p. 301.

18 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 “No olviden que la técnica es un arma” , Che Guevara habla a la juventud, pp. 96-97.

el mensaje de clausura del Primer Encuentro Internacional de Estudiantes de Arquitectura, realizado en La Habana del 29 de septiembre de 1963, el cual ha sido reproducido con el título “No olviden que la técnica es un arma” , sintetizó su propuesta central al expresar:

*... La técnica se puede usar para domesticar los pueblos, y se puede poner al servicio de los pueblos para liberarlos...*

*Para poner el arma de la técnica al servicio de la sociedad hay que tener la sociedad en la mano. Y para tener la sociedad en la mano hay que destruir los factores de opresión, hay que cambiar las condiciones sociales vigentes en algunos países y entregar a los técnicos de todo tipo, al pueblo, el arma de la técnica y esa función es de todos los que creemos en las necesidades de cambios en algunas regiones de la tierra.* <sup>19</sup>

De ahí se desprende su visión de que la técnica ha de promoverse para ser usada en la lucha por la liberación, como arma indispensable para iniciar la edificación de una nueva sociedad y para atender las improntas de ésta y así coadyuvar al surgimiento de nuevas relaciones sociales. O sea, propugnó el carácter humanista de la técnica al orientarla a la lucha por la liberación, al enfatizar su misión de estar al servicio de hombre.

Guevara de la Serna fue clarividente, además,

al ubicar a la técnica como uno de los pilares de la construcción de la sociedad comunista, y por ello se pronunció por promover su desarrollo, aprovechando lo que otras sociedades han aportado. Al grado de que en los inicios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 esclareció: “El camino es largo y desconocido en parte; conocemos nuestras limitaciones. Haremos el hombre del siglo XXI: nosotros mismos. Nos forjamos en la acción cotidiana, creando un hombre nuevo con una nueva técnica” .<sup>20</sup>

En fin, Ernesto Che Guevara acudió a los principales recursos culturales de tipo racional forjados por la humanidad para usarlos como instrumentos con los cuales tratar de hacer realidad su humanismo revolucionario.

Como puede apreciarse, la propuesta de humanismo revolucionario de 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 es expresión fiel de su pensamiento creativo y crítico que da cuenta, por una parte, de las influencias ideológicas que recibió, del marxismo en particular, y de su compromiso político, por otra parte, que permite situarlo como héroe inmortal -según la Universidad de Tamkang-, al lado de próceres latinoamericanos de la talla de Simón Bolívar, José de San Martín, José Artigas, Pablo de O’ Higgins, José Antonio Sucre, José María Morelos, Benito Juárez, José Martí, Augusto César Sandino, etc. ★

---

<sup>19</sup> *Ibidem*, p. 100.

<sup>20</sup> Ernesto Che Guevara, “El hombre nuevo” , *op.cit.*, pp. 326-327.

# ¿REVOLUCIÓN EN LA REVOLUCIÓN?

## LA TEORIA DEL FOCO Y EL CIENTIFICISMO MARXISTA

Juan José Ramírez Bonilla

Centro de 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

Colegio de México

Lo haremos tú y yo, nosotros los haremos,  
tomemos la arcilla para el hombre nuevo  
.....

Y por corazón a ese hombre daremos  
el del guerrillero que todos sabemos.

(Daniel Viglietti: Canción del hombre nuevo)

¿Cuándo? el 9 de octubre de 1967; ¿dónde? en el pueblo de La Higuera, en el sur boliviano; ¿quién? 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 argentino de nacimiento, cubano por decisión propia y del pueblo cubano, combatiente internacionalista por convicción profunda; ese día y allí, moría, asesinado, El Che.

A cuarenta años de su trágica muerte y más allá de la transformación del hombre mítico en una global star consumible, algunos oídos siguen siendo receptivos a su grito de guerra. En medio del marketing y de intervenciones militares aberrantes para imponer la democracia como modelo único de organización social, hay quienes siguen considerando la guerra de guerrillas como El Método para dejar de interpretar el mundo y pasar a transformarlo.

Con la distancia temporal, en estos inicios del siglo XXI, los movimientos guerrilleros latinoamericanos son percibidos de manera diferenciada: las FARC colombianas aparecen como dinosaurios sobrevivientes de la hecatombe

política de los setentas latinoamericanos y mal adaptados al nuevo contexto global; en contraste, el discurso de los zapatistas chiapanecos revivió la imagen romántica del guerrillero revolucionario, imagen liquidada por los regímenes militares encargados de reprimir la oleada guerrillera animada por El Che y por sus contemporáneos; el ERP mexicano, al volver a presentarse en sociedad con una serie de sabotajes, ha dado pretexto para ser simplemente asimilado a los grupos terroristas en boga desde el 11 de septiembre de 2001.

La violencia organizada bajo la forma del foco guerrillero sigue estando presente (¿solamente?) en el escenario político latinoamericano; esa presencia exige volver a someterla a la crítica, partiendo de sus premisas teóricas y confrontándola con las nuevas realidades.

### 1. LAS PREMISAS DE LA TEORÍA DEL FOCO GUERRILLERO

El Che resumió y generalizó su experiencia en la revolución cubana en el manual titulado *La*

*guerra de guerrillas*.<sup>1</sup> De pequeñas dimensiones (escasas 165 páginas), el texto tuvo una gran influencia sobre los militantes de los movimientos revolucionarios latinoamericanos. Dos rasgos definen el estilo literario de El Che: por un lado, las referencias teóricas son escasas y, por el otro, los ejemplos concretos de la experiencia cubana son abundantes. ¿Cómo, entonces, establecer la filiación teórica del pensamiento militar de El Che? Sin duda, esa filiación solo puede ser establecida de manera indirecta y Régis Debray, en una carta escrita desde la prisión de Camiri, nos proporciona la clave: “si algún día se publican sus anotaciones de lectura [de El Che], se podrá ver que **su apreciación de este folleto** [es decir el *folleto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lutte armée et lutte politique en Amérique Latine*,<sup>2</sup> escrito por Debray], demasiado tímido a su juicio, no obstante radical aun cuando expresaba opiniones que eran suyas, contradice la de muchos.”<sup>3</sup> Así, siguiendo a Debray, podríamos decir que El Che compartía, en términos generales, la filiación teórica de Debray; respecto a ésta, nuestro personaje es claro: empezaba señalando que “he sido condenado a treinta años de prisión militar con la ayuda de este folleto como instrumento

esencial de convicción, y de su contenido como primer motivo de inculpação;”<sup>4</sup> terminaba indicando que su condena descansaba sobre un parallogismo y que éste “se apoya en último término (...) en una contradicción asentada en el corazón del marxismo. Contradicción que parece anima toda su descendencia filosófica y política, sus debates recurrentes entre mecanismo y voluntarismo, el respeto por lo económico y la exaltación de la conciencia, el marxismo como ciencia y el marxismo como humanismo, el Marx de El Capital y el joven Marx de los Manuscritos, etc...”<sup>5</sup> Así pues, la base teórica del folleto de Debray y, por extensión, del pensamiento militar de El Che sería el marxismo. Conviene entonces analizar el lugar de la violencia en los textos militares de El Che, a la luz del marxismo; aunque, para ser más precisos, debemos decir a la luz tanto de los marxismos como de la obra de Marx.

## De la guerra

El Che comienza por definir “La esencia de la lucha guerrillera” y adopta un método “científico”, pues “la guerra responde a una determinada serie de leyes científicas, y quien

---

1 Ernesto Che Guevara: “La guerra de guerrillas”; en: *Escritos y discursos*, volumen 1;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La Habana, 1977; pp. 25-190.

2 Régis Debray: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 lutte armée et lutte politique en Amérique Latine*; Cahiers libres n° 98; François Maspéro; Paris, 1967.

3 Régis Debray: “Una respuesta” (Carta enviada a la oficina de la Monthly Review, en Nueva York, en diciembre de 1968); en: Leo Huberman, Paul Sweezy et. al.: *Debray y la revolución latinoamericana*; Editorial Nuestro Tiempo; México, 1969, p. 119. Las negritas son nuestras.

4 Idem. Las cursivas son del autor.

5 Idem. Las cursivas son del autor.

quiera que vaya contra ellas, irá a la derrota.” Poner en claro esas leyes, sistematizarlas y ofrecerlas a quien luche por “cambiar el régimen social” es el objetivo intelectual del texto de El Che: “teorizar lo hecho, estructurar y generalizar esta experiencia [cubana] para el aprovechamiento de otros es nuestra tarea del momento.”<sup>6</sup>

Ahora bien, el pensamiento de El Che parte de un supuesto verificable en el contexto de la Cuba de Batista, pero no necesariamente válido en otras latitudes y/o en otros tiempos: “la imposibilidad de mantener la lucha por las reivindicaciones sociales dentro del plano de la contienda cívica;”<sup>7</sup> así, la oposición opresores – oprimidos se torna irreductible y su solución implica, por necesidad, la violencia.

Los opresores, por su lado, cuenta con el ejército profesional para mantener su situación preponderante sobre los oprimidos y aquí tenemos la primera referencia al marxismo, pero a la interpretación de Engels sobre el pensamiento de Marx; para Engels, en efecto, “el Estado no es de ningún modo un poder impuesto desde fuera a la sociedad... Es más bien un producto de la sociedad cuando llega a un grado de desarrollo determinado: es la confesión de que esa sociedad se ha enredado en una irremediable contradicción consigo misma y esta dividida

por antagonismos irreconciliables.”<sup>8</sup> Una de los dos rasgos característicos del Estado, en la perspectiva engelsiana, es la institución de una fuerza pública, necesaria “porque desde la división de la sociedad en clases es ya imposible una organización armada de espontánea de la población.”<sup>9</sup> El razonamiento engelsiano concluye definiendo el carácter instrumental del Estado: “Como el Estado nació de la necesidad de refrenar los antagonismos de clase, y como, al mismo tiempo, nació en medio del conflicto de esas clases, es, por regla general, el Estado de la clase más poderosa, de la clase económicamente dominante, que, con ayuda de él, se convierte también en la clase políticamente dominante, adquiriendo con ello nuevos medios para la represión y la explotación de la clase oprimida.”

Para los múltiples marxismos, la tarea revolucionaria consiste, siguiendo la lógica engelsiana, en convertir al proletariado, a la clase obrera, en clase políticamente dominante; para las corrientes marxistas reformistas, esa transformación se logra mediante la conquista institucional del poder político; para las corrientes marxistas revolucionarias, la elevación de la clase obrera como clase políticamente dominante solo puede lograrse mediante la destrucción del “Estado burgués” y su substitución por

---

6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 35.

7 Idem. p. 34.

8 Friederich Engels: “El origen de la familia, la propiedad privada y el Estado;” en: C. Marx y F. Engels: Obras escogidas en tres tomos, tomo III; Ediciones de Cultura Popular, México, México, 1974. p. 344.

9 Idem. p. 345.

un “Estado o semi-Estado proletario.” Así, siguiendo a Engels, Lenin deduce que “la ‘fuerza especial de represión’ del proletariado por la burguesía (···) debe substituirse por una ‘fuerza especial de represión’ de la burguesía por el proletariado (dictadura del proletariado). En esto consiste precisamente la ‘destrucción del Estado como tal.’ ” 10

Pero, volvamos al discurso de El Che, para él, los oprimidos, “la población de la nación”, se encuentran en una situación desigual ante los opresores, pues carecen de medios no solo para neutralizar la violencia ejercida por éstos últimos, sino sobre todo, para imponer sus reivindicaciones sociales; de allí la necesidad de la guerrilla, pues, “como núcleo armado, es la vanguardia combatiente del [pueblo], su gran fuerza radica en la masa de la población.” 11

Esta afirmación, derivada de la experiencia cubana y elevada al rango de principio universal, sirvió de base al ingenioso título del folleto de Debray: la insurrección armada del soviet de San Petersburgo, dirigida por la fracción bolchevique del Partido Social-Demócrata Ruso en octubre de 1917 y “teorizada [por Lenin] en unas cuantas fórmulas,” fue convertida por los marxistas-leninistas en el arquetipo de la Revolución. Debray, siguiendo a El Che, insistía: “esas

fórmulas no tienen nada que ver con la situación presente;” 12 por el contrario, “Cuba ha dado inicio a la revolución armada en América Latina. Es ese inicio, irreversiblemente efectuado a partir de una línea [política] justa, lo que es esencial.”

13 Todavía más: “Hoy, en América Latina, una línea política que no puede expresarse, sobre el plano de sus efectos, en una línea militar coherente y precisa, no puede ser considerada revolucionaria. Toda línea pretendidamente revolucionaria debe poder dar una respuesta concreta a la pregunta: ¿cómo derrocar el poder del Estado capitalista? Es decir ¿cómo romper su esqueleto, el ejército, día a día reforzado por las misiones militares norteamericanas?” 14 En conclusión, dada la diferencia de condiciones en América Latina, la insurrección, guiada por el partido, era dialécticamente superada por el foco, comandado por individuos excepcionales. La guerra de guerrillas implicaba una revolución en la revolución y ello en un sentido doble: por un lado, la guerrilla se convertía en el actor central al subordinar las exigencias políticas a las militares para lograr el fin último<sup>15</sup> y, por el otro, la guerra de guerrillas se convertía en la única línea política revolucionaria por excelencia. Sin embargo, pese al esfuerzo de Debray por “liberar el presente del pasado,” su esquema de pensamiento seguía

10 VI. Lenin: “El Estado y la revolución” ; en: *Obras Escogidas en tres tomos, Tomo II*; Editorial Progreso, Moscú, 1960; p. 307

11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 35. Las negritas son nuestras.

12 Régis Debray: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 lutte armée et lutte politique en Amérique Latine* ; p. 15.

13 Idem. p. 20.

14 Idem. p. 21.

15 “...Lograr el triunfo, aniquilar el enemigo”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 39)

siendo tributario de la interpretación engelsiana del pensamiento de Marx.

## De la política

Subordinación de la estrategia política a la estrategia militar y desaparición del *zoon politikon* en aras del *homo homini lupus* son las consecuencias necesarias de la revolución en la práctica revolucionaria. En opinión de otro distinguido marxista revolucionario de la época: “la teoría de la guerrilla del Che es una teoría clausewitziana, en el sentido de que concibe la guerra como la continuación de la política revolucionaria por las armas.”<sup>16</sup> Michael Löwy interpretaba el discurso guevarista forzando el cliché clausewitziano: la guerra es la continuación de la política por otros medios. Sin embargo, el texto de El Che sobre la guerra de guerrillas más bien descansaba sobre una inversión de los términos del cliché: para Guevara, la política no era sino la continuación de la guerra con los medios de la guerra; esa inversión es puesta en evidencia mediante la función otorgada al foco guerrillero; por si fuera poco, también parece explicar, en buena medida, la naturaleza y la evolución del régimen político cubano.

En efecto, El Che muestra una devoción revolucionaria por las masas: “la victoria armada del pueblo cubano sobre la dictadura batistiana ha sido (···) un modificador de viejos dogmas sobre

la conducta de las masas populares de la América Latina, demostrando la capacidad del pueblo para liberarse de un gobierno que lo atenaza, a través de la lucha guerrillera.”<sup>17</sup> De las tres principales aportaciones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 a “la mecánica de los movimientos revolucionarios en América”, nos interesa particularmente la segunda; según ésta: “no siempre hay que esperar a que se den todas las condiciones para la revolución; el foco insurreccional puede crearlas.”

El lector atento no puede dejar de percibir un eco bíblico: en el principio era el caos del régimen opresor; la voluntad de las masas planeaba sobre ese caos; el comando del foco dijo hágase la voluntad de las masas y los revolucionarios se separaron de los elementos malos; los elementos revolucionarios al principio fueron pocos, muy pocos; pero, conforme vieron que la voluntad de las masas era buena, fueron creciendo en número hasta transformar la guerrilla en un ejército popular regular suficientemente fuerte para aniquilar al enemigo.

Los veinte capítulos del manual guevarista sobre la guerrilla tienen una connotación genésica en relación a las condiciones para la revolución; es decir, la política revolucionaria no solo deriva, sino que es condicionada por y queda subordinada a la lógica de la guerra de guerrillas; así, a pesar de otorgar al guerrillero el papel de “reformador

---

<sup>16</sup> Michael Löwy: *Dialéctica y revolución*; Siglo XXI Editores, México, 1975. p. 155-156.

<sup>17</sup> Ernesto Che Guevara: *op. cit.* p. 33.



social” y de asignarle por tareas “cambiar el régimen social que mantiene a todos sus hermanos desarmados en el oprobio o la miseria” y “romper, con todo el vigor que las circunstancias le permitan, los moldes de esa institucionalidad,” el fin de último de la guerra, “lograr el triunfo, aniquilar al enemigo,” termina por imponerse a todo.

Debray, al formular “las consecuencias de la lección [cubana] para el futuro” , expresaba de manera neta esa relación entre lo militar y lo político: “lo que es decisivo para el avenir, es la apertura de focos militares y no de “focos” políticos (···) Para expresarlo esquemáticamente, digamos que **se va del foco militar al movimiento político –prolongación natural de una lucha armada de esencia política–** pero no se pasa, salvo excepciones, del movimiento político ‘puro’ al foco militar.” 18

Casi cuarenta y nueve años después del triunfo armado del Movimiento 26 de Julio, el régimen cubano parece luchar permanentemente con los fantasmas del pasado: “lograr el triunfo, aniquilar al enemigo” sigue siendo la divisa que inhibe el desarrollo de una institucionalidad diferente y favorable al desarrollo del ser social del pueblo cubano. Si El Che viviera, con toda seguridad, también se rebelaría contra esas nuevas formas de opresión.

## 2. LAS PREMISAS DE LA TEORÍA DEL FOCO Y EL PENSAMIENTO DE MARX

Quizá la falla principal de la teoría guevarista descansa sobre la naturaleza esencialmente política del cambio logrado en Cuba y propuesto como objetivo para toda América Latina. La destrucción de la vieja institucionalidad y la creación de otra institucionalidad nueva basada en el ideal del “hombre nuevo” vuelven a remitirnos a la concepción engelsiana-leniniana de la revolución: sustitución de “la fuerza especial de represión” de los oprimidos por los opresores por la “fuerza especial de represión” de los opresores por los oprimidos; solo que, a fuerza de reprimir, los oprimidos se transforman progresivamente en opresores y volvemos al caos primigenio, convirtiendo la guerra de liberación en una tarea de Sísifo.

Ahora bien, mediante la noción de la “emancipación humana,” Marx propone una forma, utópica si se quiere, de romper ese círculo vicioso: por un lado, distingue la “emancipación política” entendida como “la reducción del hombre, por un lado, a un miembro de la sociedad burguesa, al individuo egoísta e independiente y, por el otro, al ciudadano, a la persona moral;” es decir, en la sociedad capitalista o en los reductos del socialismo, el individuo vive en forma escindida: como ser real, sujeto con necesidades individuales concretas, y como ser

---

18 Régis Debray: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 Lutte armée et lutte politique en Amérique Latine* ; p. 129-130. Las negritas son nuestras.

abstracto, objeto de la esfera política; por el otro, define la “emancipación humana” como “el reconocimiento y la organización de sus propias fuerzas como fuerzas sociales y no separa más de sí mismo la fuerza social bajo la forma de fuerza política.”<sup>19</sup>

A partir de la idea de la escisión, en textos de trabajo como los Manuscritos económico-filosóficos de 1844, Marx formuló la noción de la “alienación” entendida como la autonomización de las fuerzas sociales creadas por los humanos y como la inversión de la relación entre esas fuerzas sociales y sus creadores; así, en la sociedad moderna, la vida alienada de los individuos implica el dominio de las fuerzas sociales creadas por ellos sobre ellos mismos.

A través de la Esencia del cristianismo de Feuerbach, Marx comprende que la religión es la sublimación de la alienación. A través de la Filosofía del Derecho de Hegel, percibe la alienación política; es decir, el Estado, para él, más que un instrumento de clase, es un producto social que deviene autónomo y que domina a sus creadores. A través de la Contribución a la crítica de la economía política de Engels, descubre que, aún en la esfera civil, los individuos llevan una vida alienada: la propiedad, producto social, los domina bajo las formas económicas del capital, el salario y la renta. Marx concluye que, en la sociedad moderna, el proletariado concentra

sobre sí todas las formas de la alienación y, por necesidad, es la única clase interesada en una revolución radical, en una revolución que realice la “emancipación humana,” y que lleve a “la organización de sus propias fuerzas como fuerzas sociales” ; dicho de otra manera, la revolución, en la lógica de Marx, no implica la substitución de una “fuerza especial de represión” por otra, más bien supone el restablecimiento del dominio colectivo de los individuos sobre las fuerzas sociales creadas por ellos mismos.

El régimen cubano, como todos los demás regímenes socialistas, se ha esforzado en perfeccionar el Estado como “fuerza especial de represión,” para “lograr el triunfo, aniquilar al enemigo.” La presencia física del “enemigo imperialista” y el sitio establecido contra Cuba son los pretextos para seguir usando el Estado de manera instrumental y para mantener el dominio de una minoría sobre la mayoría. La política sigue siendo sometida a la lógica de la guerra, trasladada, esta vez, a la esfera internacional: el campo de los opresores es representado ahora por el gobierno estadounidense y el de los oprimidos, por el régimen cubano. Mientras tanto, el programa utópico de la revolución radical percibida por Marx es simplemente ignorado.

Debray, con una formación académica más acabada que la de El Che, comprendía perfectamente la incomodidad provocada por el

---

<sup>19</sup> Karl Marx: “La question juive” ; en: Karl Marx: *Oeuvres philosophiques, Tome I*; Alfred Costes, Editeur ; Paris, 1927. p. 2002.

marxismo de Marx; de allí, su referencia explícita a la contradicción entre dos Marx diferentes: el de El Capital y el de los Manuscritos económico-filosóficos; el científico social y el humanista, el personaje atento a las leyes económicas materiales y el individuo respetuoso de una ética humanista. Debray, siguiendo a Guevara, desde el principio optó por el marxismo como ciencia, olvidando que la ciencia, marxista o no, también es una fuerza social susceptible de autonomizarse, imponiéndose a sus creadores y subordinándolos.

En ese sentido, podríamos concluir que, olvidando el carácter social de las fuerzas creadas por los individuos, en aras de la científicidad, la teoría del foco sacrifica el humanismo, creando nuevas formas de alienación emparentadas con los mecanismos capitalistas de dominación. Tal vez las nuevas preguntas puedan ser formuladas de la siguiente manera: ¿cómo alcanzar un equilibrio entre ciencia y humanismo? ¿cómo ese equilibrio puede contribuir a superar la situación de alienación vivida por los seres humanos tanto en régimen capitalista como en los reductos del régimen socialista? Quizá un principio de respuesta sea comprender que el restablecimiento del dominio de los creadores de las fuerzas sociales sobre esas mismas fuerzas no necesariamente se realiza mediante la violencia, sino mediante la participación directa en la vida política.

Más allá de las disquisiciones literarias, el ejemplo de El Che como un individuo dispuesto a

sacrificarse por su ideal muestra esa posibilidad de participación directa en la vida política; tal vez la consigna del presente no sea “crear uno, muchos Vietnam” , sino “movilizar miles, millones de personas con una voluntad de sacrificio como la de El Che” . ★



# 2007年台灣拉丁美洲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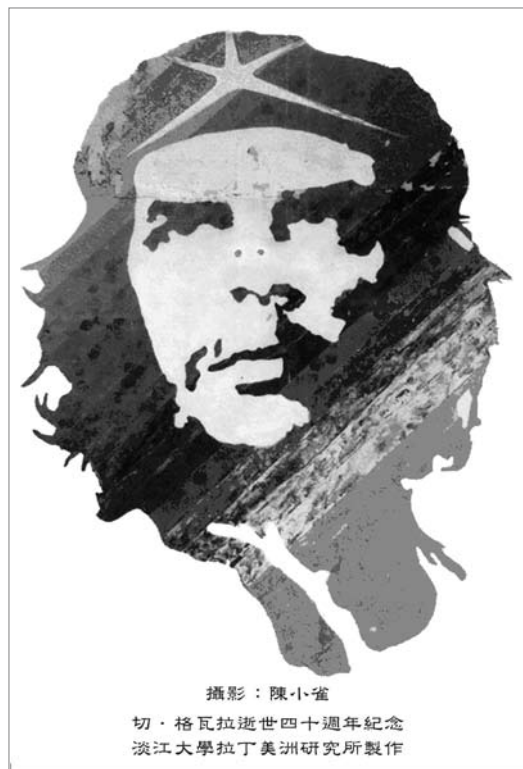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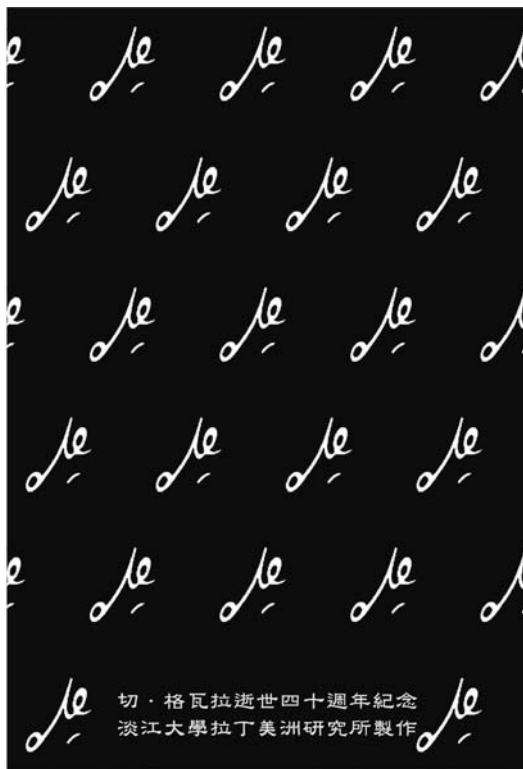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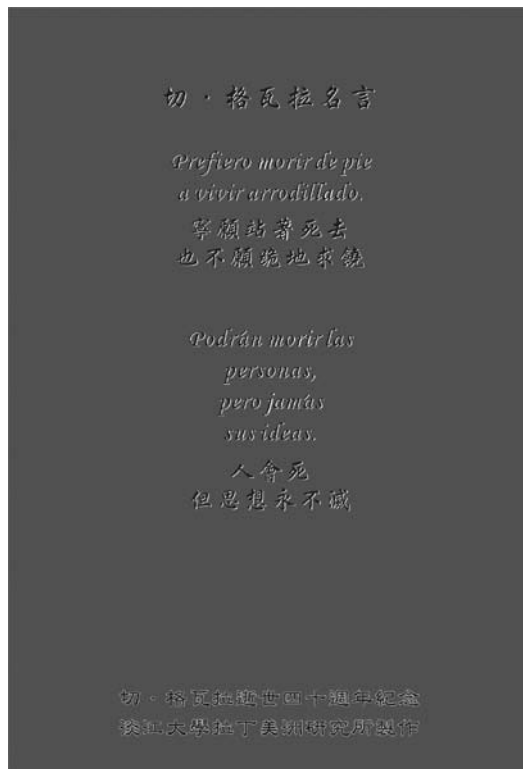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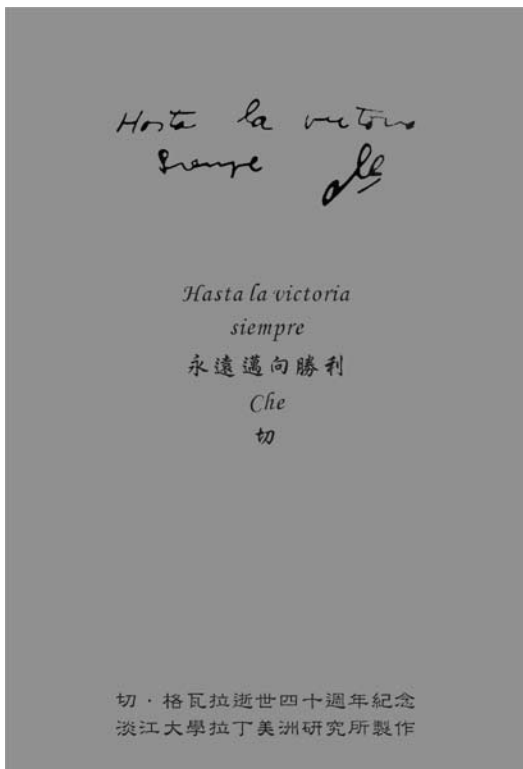
不朽英雄圖像

～切·格瓦拉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壇～



時間	活動內容
8:30~8:50	報到
8:50~9:20	開幕式 致詞人：陳幹男博士（淡江大學學術副校長）
9:20~9:30	Tea Time
9:30~10:00	專題演講（一）：南方朔（文化評論家） <i>切·格瓦拉和現代的拉丁美洲</i>
10:00~10:30	專題演講（二）：胡忠信（文化評論家） <i>切·格瓦拉——從革命到流行時尚</i>
10:30~12:00	<b>第一場 切·格瓦拉的英雄圖騰</b> 主持人：宮國威（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專任副教授兼西語系系主任） 發表者：熊建成（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專任教授、前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台灣拉丁美洲論壇創立人） <i>切：二十世紀的唐吉訶德</i> 發表者：向駿（致理技術學院國際貿易系副教授） <i>兩岸格瓦拉圖像之比較</i> 發表者：陳小雀（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專任副教授兼所長） <i>游擊隊員v.s.文學家——閱讀切·格瓦拉</i>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b>第二場 從人道主義到商品化</b> (以西班牙文進行，現場中文即席翻譯) 主持人：王秀琦（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發表者：沙提諾 Alberto Saladino García（墨西哥州立自治大學專任教授） <i>切的人道主義(Humanismo Revolucionario de Ernesto Che Guevara)</i> 發表者：拉米雷斯 Juan José Ramírez Bonilla（墨西哥學院亞非研究中心亞太地區政治經濟學教授） <i>革命中的革命？——游擊中心理論與馬克思的科學主義 (¿Revolución en la revolución? La teoría del foco y el cientificismo marxista)</i> 發表者——白方濟 Francisco Luis Pérez Expósito（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專任教授） <i>切：全球商品化現象 (Che Guevara: Un fenómeno mundial de mercadotecnia)</i>
15:00~15:10	Tea Time
15:10~16:40	<b>第三場 青年學子的偶像</b> 主持人：王佳煌（元智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 發表者：許菁育（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生） <i>從《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探討切的文化認同</i> 發表者：林煒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陳錦昌（講臺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i>馬克斯青年——以切格瓦拉與郭琇琮之悲劇為例</i> 發表者：褚榮瑩（台灣大學人類學碩士） <i>魔鬼或聖者？——切格瓦拉與玻利維亞農民關係初探</i>
16:40~17: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熊建成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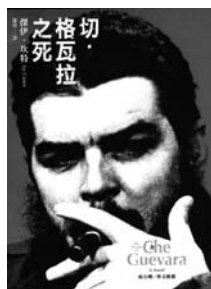
###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 作者：切·格瓦拉/著
- 原文作者：Ernesto Che Guevara
- 譯者：梁永安、傅凌、白裕承/譯
- 出版社：大塊文化
- 出版日期：1996年11月24日
-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578468326
- 裝訂：平裝



### 切·格瓦拉：卡斯楚回憶錄

- 作者：卡斯楚
- 原文作者：Fidel Castro
- 譯者：樂為良、黃裕美
- 出版社：立緒
- 出版日期：2006年12月01日
-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867416597
- 裝訂：平裝



### 切·格瓦拉之死

- 作者：傑伊·坎特
-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 出版日期：2007年01月23日
-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570831146
- 裝訂：平裝



### Che語錄

- 作者：切·格瓦拉
- 繪者：師永剛、詹涓、劉瓊雄
-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 出版日期：2007年10月08日
-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570831719
- 裝訂：平裝



### 切·格瓦拉畫傳

- 作者：師永剛、詹涓/著
-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 出版日期：2005年07月25日
-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57082896X
- 裝訂：平裝

## 切·格瓦拉：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故事

---

作者——熊建成 / 陳小雀 / 向駿 / 褚榮瑩 / 許菁育 / 陳錦昌、林煒舒 / 白方濟 / 沙提諾 / 拉米雷斯

主編——陳小雀

執行編輯——張立卉

美編——林麗華

不朽英雄圖像——切·格瓦拉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壇論文集

出版——世理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3段106號11樓之4

電話——02-27045151(代表號)

傳真——02-27046161

E-mail——wg2704@yahoo.com.tw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六年(西元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印量——貳佰本

訂價——新台幣肆佰元